

大学译丛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Vincent Mosco

传播政治经济学

[加拿大] 文森特·莫斯可 著
胡春阳 黄红宇 姚建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纪出版

《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 1996 年出版后，学界普遍高度评价该书开阔的跨学科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归纳，但作者仍然集思广益，再度修订。第二版不仅案例材料得以及时更新，而且全书的理论胸襟和讨论范畴更加深广和透彻，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积累与分析路径，且以此解析当今全球化、数字化、商业化语境中的传播产业、传播制度和传播现象背后政治经济、科技等权力扮演的角色。

传播学作为外来学科，大陆学界急需引进美国实证主义之外的具有历史脉络和理论阐释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经典论著，本书将传播政治经济学放置于具体社会情境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作者始终坚守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的信念，是目前全球传播学界公认的批判传播理论的标志性作品。

——曹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美国哈佛燕京学者

《传播政治经济学》问世未久，随即取得当代经典的地位，无论赞成或反对其见解，作者从对话中凸显本书立论的用心与成绩，备受瞩目、肯定与敬佩。新版延续原作的主要架构，另见与时俱进之勤，章节结构更显整饬，材料亦作增删。过去十多年来，互联网与手机从传播体系的周边进驻到了核心、《帝国》出版后重新得到注意的自主马克思主义、传媒改革活动及传播劳动研究的扩展，如同初版的文化研究、经济学以及（主流的）公共政策论述，无不纳入新版的对话行列。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之一的彼得·高丁（Peter Golding）教授当年对本书的赞誉，至今贴切："莫斯可教授已为本领域的知识史与制度史厘定图谱，英雄行径，成就非凡。"

——冯建三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　英国李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

上架建议：传播学

ISBN 978-7-5327-6046-6

9 787532 760466 >

定价：38.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VINCENT MOSC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传播政治经济学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 著
胡春阳 黄红宇 姚建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政治经济学/(加)莫斯可(Mosco, V.)著;胡春阳　黄红宇　姚建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SBN 978-7-5327-6046-6

Ⅰ.①传…　Ⅱ.①莫…②胡…③黄…④姚…　Ⅲ.①传播学-政治
经济学　Ⅳ.① G206②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2359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 2009 by Sage Publicati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图字:09-2009-181 号

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森特·莫斯可　著　胡春阳　黄红宇　等译
责任编辑/王巧贞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66,00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6046-6/G·180
定价: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0512-52218653

译者导言

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一版于1996年问世后，出现了两个中译本，一个是冯建三翻译的台湾版(1998)，一个是胡正荣翻译的大陆版(2001)。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莫斯可于2009年修订出版的第二版的中译本。

该书是多门类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图谱，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激动人心的名字，一次次激越地回响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天空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笛卡儿，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卢卡奇，涂尔干，霍加特，威廉姆斯，汤普森，霍尔，杰弗逊，威利斯，吉登斯……他们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文化批判等视角去理解社会变迁，尤其是理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正是在这样广阔而厚实的知识基础上，莫斯可开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开拓之旅。那些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奠基先锋人物以及当代领军人物对当代最新和最有争议的问题提出的真知灼见，使莫斯可洞烛幽微：斯迈思，赫伯特·席勒，哈洛伦，古拜克，瓦斯科，戈尔丁，默多克，加纳姆，奥斯卡·甘地，米汉，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丹·席勒……他们以及莫斯可本人都试图理解，在信息化时代权力是如何在所有媒介中运作的：从报纸到Facebook，媒介权力如

何与全球化、社会阶级、种族、社会性别和监管交织在一起，以及信息劳工的阶层分化及其在权力运作中的地位，并致力于整合批判理论中的诸多关键对话，以便对信息时代的社会与权力变迁做出更全面的分析。

在传播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奠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紧随其后的几年直到1980年，奠基于北美，但如今，研究力量和研究领域扩散到全球。正如莫斯可指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当代有五个发展潮流：该领域的全球化，对历史新形式的日益增长的关注，对抵制立场的日益强调（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聚焦新媒介产生的突出社会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管以及网络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媒介变革和民主（比如，与政治经济传统相关联的社会行动的增长）。这些主题使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朝气蓬勃。

所有政治经济学派别还共享有四个奠基理念：社会变革和历史、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它们关注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新型社会（比如说，是资本主义或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或可被叫做信息资本主义？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是否太具革新性而导致其根本上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根本质变乃至分崩离析？同时，它们也热心探究社会的整体体系（或者说社会关系的总体），比如，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它们还关注有助于产生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和关注那些应该引导社会改变的努力的道德原则；它们强调社会实践性，也就是说，它们反对传统学院派这样的立场：将研究领域和参与社会分离，将研究者和社会行动者分离。

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出发点的三个进程。首先，要分析人们的传播行为是怎样变成能够带来利润的产品，以及人们是如何抵制这个过程的；其次，要分析资本是怎样利用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来克服地理空间所造成的障碍，并由此产生了二律背反：全球化使跨国企业权力延伸的同时，也产生了其宿敌——民族主

义，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比如，本·拉登为基地组织所做的，不过是推行或者直接复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工业世界中大部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所采取的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最后，要分析围绕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社会关系是如何得以组织的。因此，该书的结论是：重返阶级权力，因为阶级权力一直以来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核心位置。

对于观察信息社会的社会组织及其变迁，莫斯可既不满意正统经济学科或新古典主义的方式，也不满意文化研究或公共选择理论。因为经济学倾向于对历史动力和社会变迁弃之不顾，倾向于忽视权力同财富的关系，由此忽视制度控制市场的权力，只对社会提供一般的、静态的解释；新古典主义则将大部分“政治”从“政治经济”里排除，政府和大公司的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全都是该学科最聪明、最机敏的从业者；而公共选择理论有两种偏向——或过分强调政治方面，或过分强调经济方面；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水岭在于“劳动分析”还是“文化分析”，是“结构的”还是“互动论”的方法。因此，莫斯可以为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之间的对话而架设新桥为该书作了结语。基于此，莫斯可对知识领域的团结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良好期待：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疏离。对于如何运用传播来实现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创建民主传播系统的运动，我们应该建立共同的理解，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争取使所有人都获得更大福利。

莫斯可的研究逼迫我们必须直面当下两个切时的话题。

一是，面对当代中国激烈的社会变迁和媒介变革的此情此景，我们如何做传播研究？“仅仅是经济（比如，金钱是推动媒介的唯一力量）或仅仅是文化（比如，人民的价值观塑造了媒介）都无法像魔钥似地开启我们对传播的理解”（第七章第二段）。媒介事业难道不是一度被人们等同为经营或者技术吗？莫斯可提醒人们，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

成功，也是因为它通过提供加强资本主义的信息、建议和政策，为权力服务。这样，将经济学视为一种权力体系至少同样重要。要想理解那种体系并建议改革它的方式，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二是，巧合的是，莫斯可在2009年新版中提到，30年前的197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三厘岛核事故发生的那个周末，由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政治经济学部召开的“工作例会”云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先锋人物，此举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今天，当日本的核泄漏乃至扩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和话题时，改变世界、改变媒介体系难道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吗?

现在，就是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该书的原版序言、中文版序言，第四、五、六章为胡春阳翻译，校译和统稿也由胡春阳进行；第一章由吴冬妮、胡春阳翻译；第二、三、七章为黄红宇博士翻译；第八、九、十章为姚建华博士翻译。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叠床架屋之晦涩，指鹿为马之疏漏，在所难免。但我们都是抱着极为严肃勤恳之态度，无惧尺方之枯燥，任韶华以飘零，勇猛精进。

胡春阳

2011年3月

于香港海滨花园海宁阁

中文版（第二版）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学》新版中文版的出版，正是中国给我的修订本赋予了灵感。过去十年，我很荣幸几次访问中国，人们对政治经济学以及如何应用政治经济学去理解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媒介和传播体系的浓厚兴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让我感到惭愧。师生们来听我的讲座，热切地提出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在我演讲后，他们簇拥着我，继续谈论着上海、北京、香港以及其他城市的街道。当他们带着我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漫游时，他们询问我对以下问题的看法：新闻业中的劳动过程，媒介的私有和国有以及民主传播的意义。曾经有个学生带着我去旅游，他还随身带着一本写满标签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他希望能够从我这里得到资本论如何应用于解释媒介劳工问题的答案，甚至在他为我介绍一个个旅游景点时，他也没有忘记向我发问。

如此程度的兴趣当然感染了我，但也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整个亚洲大学得到发展。于是，我决定写作1996年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更新版，而1996年版已经有两个中文版本。由于以下一些原因，出新版必然是一个挑战性任务：在第一版和我开始考虑写作第二版之间，十年转瞬即逝。任何新版都需要大规模的修订和更新，第一版出版一到两年后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在新版中反映出来；第二，

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这些版本之间问世，包括来自亚洲的主要贡献，新版本不得不反映亚洲的贡献。亚洲的一些研究挑战了原版中的关键观念。因此，写新版不光是旧瓶装新酒，还要对旧瓶（旧的结构）本身进行重新思考。然而，每每当我在写作新版这个艰难任务面前热情消退时，我就想起我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那些访问，如果新版提供了这个领域的改版地图并考虑了自 1996 年以来的显著发展，那么，许多学生和教师的思考、研究和写作也许可能从中获得启发。这些回忆推动我按时完成了计划。

第二版有很多新观念，但也还保留了旧版的精华部分。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与关键特征，在这里概括一下很有必要。*政治经济学是社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各种权力关系彼此建构着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个定义有实用价值，因为它引起我们对传播产业运作的关注。比如，媒介产品如何从诸如电影工厂等制作者链条流动到批发商、零售商以及最后到消费者手中，消费者购买、下载产品，而其注意力反哺了新的生产过程。但是，就其最为普遍和雄心勃勃的定义来说——*政治经济学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控制（control）和存在（survival）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远比标准商业模式要深刻得多。控制特指在一种持续变化的环境中，社会群体成员的内部组织；存在意味着人们如何在同样动态的语境中，生产着为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控制过程广义地讲是政治性的，因为这些过程包含着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组织；而存在过程主要是经济性的，因为这些过程牵涉到生产和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总体来讲，存在和控制需要置于历史条件的语境中。

因此，政治经济学始终被置于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目标的前沿。对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政治经济学意味着理解资本主义大革命，这个社会巨变把主要奠基于农业劳动的社会转变为商业的、制造业的并最终是工业的社会。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

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检视资本主义的动态力量以及资本主义和其他政治经济组织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为了理解社会变迁，而他认为，这种社会变迁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正统的经济学家在19世纪晚期开始联合打击政治经济学，他们倾向于把对历史动力和社会变迁的关注弃之不顾，以便把政治经济学转化为经济科学，而这种经济科学像物理科学一样，将提供一般的、静态的解释。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学家能够精确解释购买者和销售者是如何联合进行市场定价的，但是却不考虑为定价创造条件的广泛的社会与经济变迁过程。当代政治经济学者占据着与成为经济学主流毫不相干的位置，他们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处理社会变迁和变革主题的传统，在当代，他们聚焦于诸如工业向服务与信息经济转型的领域。有关大众传媒、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被这些领域的研究所包围的工业是创造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力量。

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是检视社会整体或者叫社会关系的总体，这些社会关系的总体组成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从亚当·斯密开始，他把社会生活理解为并非由学科界限所约束的——而在今天，学科分界标志着学术生活，经由马克思，再到当代制度的、保守主义的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始终如一地以建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为目标，他们解释政治和经济的彼此影响以及它们与广泛的社会和符号行为领域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者要问的是：权力和财富的关系如何？它们如何建构和型塑我们的大众传媒、信息、文化和娱乐体系？

政治经济学也因其忠诚于道德哲学而著称，道德哲学被理解为既是关注有助于创造社会行为的价值观，也关注那些应该成为引导改变社会行为而进行的奋斗的道德准则。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比起他那本更著名的《国富论》，他更钟情于《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里，他指出，道德哲学意味着理解诸如自利、物质主义和个人自

由这样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推动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对马克思来说，道德哲学就是意识到人类劳动中个人和社会价值的驱动力和把劳动简化为市场商品的驱动力之间的行进式争斗。这就超越了政治领域而进入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因为政治领域只保障了参与政府的权力，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民主的支持者呼吁收入更为均等，对普遍的教育的获得，对各种形式的文化生产的公共参与，以及对表达和自由发表观念的权力的保障。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实践，或者叫思与行的根本统一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具体来说，它反对传统的学术立场，因为该立场把研究领域和社会干预领域分裂；政治经济学者在一种可以追根溯源到古代为领导人出谋划策的传统中，始终把知识生活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把社会干预看作是学习的一种形式。尽管他们对于社会干预的特征各执己见，从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支持作为一种人口控制方式的结扎，到马克思呼吁劳工在革命中实现自身，都是如此，但政治经济学者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研究和行动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必须被克服。

政治经济学在传播研究中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回应物质条件的变迁以及知识生活的巨变，中国在近些年已经经历了这些巨变。本书新版通过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当代重要趋势，回应了这些发展。这些思潮包括政治经济研究的全球化以及重新强调市民和劳工如何影响传播的历史；这些思潮也包括向另类立场的转向，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转向的重点是从老媒介到新社会媒介以及对媒介的政治参与的扩展。这些思考无一是全新的，而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知识上，只不过它们原先被埋藏在该领域的主流潮流之下。如该书所例证的，华人学者，无论是中国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为这些思潮作出了贡献，这是我在亚洲之旅中已经乐见的事实。最终，政治经济学传统，这种一度主要扎根于北美和欧洲的学术传统现在已是全球化的和跨文化的，包括来自中国和关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意义深远的

贡献。

有很多学者我需要感谢，因为他们使这个翻译本问世成为可能，但我想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的曹晋教授，她以许多重要的方式为该书作出了贡献，包括邀请我到中国讲课，翻译我的讲稿和文章，激发关于中国历史及其当代社会转型的对话，以及对该项目的支持。我还要感谢胡春阳教授和黄红宇博士，以及姚建华博士的辛勤翻译，胡春阳教授的认真统稿与精心核对保证了翻译文本的品质。同时，没有曹晋教授的一贯支持，这个中文版的问世必无可能。我也要谢谢她把她的学生姚建华推荐到我这里，姚将完成关于中国信息劳工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这是对该领域全球化的进一步贡献。

文森特·莫斯可

序　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对1996年版作了充分的修改和补充。由于这个领域在过去十年得到充分发展，于是我决定写新版书。新版本将有机会阐述这些新发展且一并评述第一版。除了论述新研究成果，我的目标还将是深化理解那些给予该领域多年发展活力的持续主题，论述那些使这个领域复兴的新成果。为此，将以一种通俗易懂但又体现语言的精确性的方式来进行。以下就是一些重要的具体的变化。

有人认为对政治经济学路径作一个简洁概述是必要的，而概述也可以识别该领域的关键读本和文章。于是，本书开头一章就是概览。我也认为这样做可以把大的章节分为小的章节，使书更加平易近人。因此，我用了较长篇幅阐述政治经济学一般领域，把它分为两章。第二章定义政治经济学路径，并论述其主要特征。第三章阐述主要思想流派，我用了一个长篇幅来图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其当下状态。第四章开头部分是传播的意义，传播意义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的考察更为具体(而第一版没有这么做)，这一章继续阐述影响这个领域的社会和知识要素。第五章检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历史。

第六章包含一个全新的章节，阐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当下的五个潮流。这些潮流包括该领域的全球化，对历史新形式的日益增长的关

注，对抵制立场的日益强调（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聚焦新媒介（尤其是因特网），以及媒介变革和民主。这些主题使整本书朝气蓬勃。但我又认为把它们整合为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的一章会有用些。

第七章到第十章继承第一版的一般模式，但是有一些关键变化。例如，第七章开头是一个新的部分，是关于建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这一章后面继续检视商品化过程及对它的抵制。第八章是关于空间化的，重点强调了全球化概念及其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关系。第九章浓墨重彩于劳动以及在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研究中的差异。最后，在第十章除了强调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较为紧密关系，还为政治经济学厘清了两个新的主要挑战：与科学和技术研究合流（包括参与者网络理论），使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的争议加剧。

在此感谢所有帮助我写作该书的人似乎不太可能。这些观念伴随我已经六十年了，我在知识上浸润于它们已经四十年。我再次谢谢那些在第一版鸣谢中提到的所有的人，这些人中，我尤其要提到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詹姆斯·哈洛伦（James Halloran），托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他们使我在第一版时正式采访他们如愿以偿。遗憾的是，前三者已经不再与我们同在，但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对批评研究的担当风范将长存于世。

2009 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宾夕法尼亚的三厘岛核事故发生的三十周年。当我在事故发生的周末飞到该州时，我想知道是否我的生活将发生彻底改变。我很快认识到：会的！但并不是因为核工厂接近垮台。航班把我从华盛顿带到伊利诺伊，在华盛顿我在乔治敦大学教社会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其时正在召开由国际大众传播研

究协会政治经济学部的“工作例会”。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斯迈思，托马斯·古拜克，珍妮特·瓦斯科，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以及彭达库。如本书所阐述的，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富有意义的贡献。那个周末，我还遇到弗雷德·菲杰斯(Fred Fejes)，珍妮弗·斯莱克(Jennifer Slack)，萨里·托马斯(Sari Thomas)，卡罗琳·马文(Carolyn Marvin)，蒂莫西·海伊(Timothy Haight)等人，他们的研究在这些年丰富了批判的传播研究。因为这个周末为我提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故乡，的确可以说改变了我的生活。因此，我向那些三十年前和我分享了那个充满难忘的知识兴奋以及环境灾难的周末的人们致敬。还有你们中大多数在那以后丰富了我的生活的人们。

自从第一版问世，我享受了在诸多地方讲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机遇。我愿意特别提到几个我在大陆和台湾遇到的人给予特别感谢，他们一直是那些最渴望学习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人。本书第一版有两个中文版，一个是台湾版，一个是大陆版。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已访问过这两个地方好几次并就这个主题作过演讲。感谢这些机构的学生和教员对我的慷慨欢迎和对该话题做的激烈讨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台湾)，上海大学，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大学。我也对有机会就传播政治经济学发表演讲心怀感谢，尤其是在2007年关于媒介民主的北京论坛上的演讲。我将永远珍藏在人民大会堂做演讲时的记忆。确实，无论何时当我完成新版本的动机减弱时，我的思绪就立即回到演讲厅、餐厅、车子里和街道上那些激烈的讨论，我就总会重振精神回到工作状态。

我也感谢如下机构的支持：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加拿大研究讲座项目以及加拿大皇后大学。

我愿意在结束序言之际感谢那些在我准备第二版时为我尤其助力的人。首先，我向丹·席勒(Dan Schiller)感谢致意，我在“三厘岛”

事件后与他相遇，后来我和他在费城、圣地亚哥、渥太华、金斯顿、温哥华、纽约、华盛顿、厄巴纳、伊利诺伊、博尔德、科罗拉多、安卡拉、北京、巴黎以及其他地方有了近三十年的对话。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的聚会都是从评论最新的著作到争论政治经济学，包括历史与理论，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权力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弹性和压力，改良与革命等的价值。这些相遇经常导致我们彼此采取对方的立场，我们论战的结局多半是同意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孩子。无论我们那天对问题的立场如何，我能够肯定我要感谢丹的太多，因为他丰富了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我也想谢谢两个对我这个计划提供了宝贵帮助的学生。当我来到那时的研究助手而现在正在约克大学读博士的戴维·拉文(David Lavin)面前，并请求他找到第一版自 1996 年起关于每一个主题的每项内容时，他没有胆怯畏难，相反，他拿回了注释过的参考文献以及该书每个章节的几箱材料。谢谢你，戴维，谢谢你最初的援手，我知道这些帮助将是你自己毕生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贡献。我也想谢谢安德鲁·史蒂文斯(Andrew Stevens)——我现在在皇后大学的博士生，他把 1996 年版的原稿做成表格，以便我开展新版本写作。安德鲁也对新版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并帮我穿越参考文献的丛林。谢谢你，安德鲁，我知道你将来也会大有作为。

最后，我想谢谢凯瑟琳·麦克切(Catherine McKerche)——我的超过三十年的生活伴侣以及过去六年我研究的伴侣。由于你克服了生活中的最大挑战，你和我共同完成了关于传播工业中的劳工的三本书，你和我穿越欧洲、中国、美国和加拿大，行走得精疲力竭，就传播政治经济学做过激烈讨论。为所有的这一切，我要谢谢你。

文森特·莫斯可

目　录

译者导言 *001*

中文版(第二版)序言 *001*

序　言 *001*

第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览 *001*

第一节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002*

第二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 *008*

第三节　哲学基础 *013*

第四节　内容、受众以及劳动的商品化 *014*

第五节　从商品化到空间化 *017*

第六节　结构化：社会结构与人类机构 *020*

第七节　牵线搭桥：文化研究、公共选择及其超越 *023*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026*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028*

第二节　主要特征 *032*

结论 *047*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048*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与古典范式　*048*

第二节　激进派的批判　*052*

第三节　保守派的批判　*057*

第四节　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058*

第五节　政治经济学的变体或者另类经济学　*066*

结论：经济学的局限性，抑或我们为何需要政治经济学？　*081*

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085*

第一节　传播的概念　*085*

第二节　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和知识因素　*089*

结论　*104*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106*

第一节　北美渊源　*106*

第二节　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114*

第三节　走向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之路　*125*

结论　*133*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134*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　*134*

第二节　传播史的政治经济学路径　*139*

第三节　抵制的立场　*145*

第四节　从旧媒介转向新媒介　*153*

第五节　媒介行动主义　*159*

结论 *160*

第七章 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162*

第一节 第七至九章导言 *162*

第二节 何谓商品化？ *165*

第三节 传播中的商品形式 *170*

第四节 内在商品化 *180*

第五节 外在商品化 *183*

第六节 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替代过程 *189*

结论 *200*

第八章 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202*

第一节 传播与集中：作为制度延伸的空间 *204*

第二节 空间聚合：重绘企业空间 *218*

第三节 国家 *226*

第四节 全球化及其二律背反 *231*

结论 *236*

第九章 结构化：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霸权 *239*

第一节 传播与阶级 *244*

第二节 传播与社会性别 *254*

第三节 传播与种族 *260*

第四节 传播与社会运动 *263*

第五节 霸权 *268*

结论 *273*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275*

第一节　边界　*275*

第二节　他山之石：文化研究　*280*

第三节　他山之石：公共选择理论　*283*

第四节　政治经济学的回应　*287*

结论：重返阶级权力　*303*

尾声：地平线上的挑战　*305*

参考文献　*309*

第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览

在传播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野。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一方法就已为世界上这一领域的学者们指引了方向，在全球得以发展并延续至今（McChesney，2007；Cao and Zhao，2007）。本书的第一章论述了一些将在随后几章中深入展开的主要思想，同时也旨在唤起读者对贯穿于本书中的一些重要参考文献的重视。

本书将用界定与解释的方法来揭开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面纱，其中包括确定其基本特性以及为其主要的思想流派做导言，进而也就转入检视传播学学者怎样渐渐从理论框架进入传播媒介与信息理论的研究中。本章不仅主要着力于突出近期的发展趋势——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球化，历史研究的发展以及那些致力于抵制主流媒介的研究，还强调了从旧媒介到新媒介的转变和传播行动主义的扩展与蔓延。

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在传播学研究中需要着力强调的这些恒久而又新颖的问题，本书接下来还会介绍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具体说来，它需要一种理解方法，这种方法将那些指导我们思考的概念与思想和我们的观察或者我们所感知到的东西看作是真实的。因此，它也就排斥在别的理论中尤为突出的这种观念——要么我们的思想要么我们的观察是真实的，而非两者都是；它同时也排斥这样一种观念——真实性就只不过是一个梦幻或一个我们头脑中的臆想，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无论是观念或是观察都不是真实的。此外，这种视野还意味着现实是由诸多原料建构或者塑造的，并且它也不能被简化成为任何经济学（如，媒介仅凭金钱就能操控）或者文化上（如，媒介受人们价值观的

操控)的本质主义。这种方法也将把社会变迁、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概念带入前沿观察，即使这意味着要重新评价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机构(如，媒介产业)的强调，或者把阶级视作一个范畴而非像这种方法暗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强调。

为了把这些观点付诸实践，本书接下来便要继续介绍组成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出发点的三个进程。首先，商品化的过程是指把事物的使用价值转化为能够为其带来交换价值的市场商品。例如，在把一个老少皆宜的故事拍成电影或写成小说以便其能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商品化。人们的传播行为是怎样变成能够带来利润的产品的呢？其次，空间化的过程是指利用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来克服地理空间所造成的障碍。例如，电视通过把世界事件的影像带到全球的各个角落来克服空间距离所带来的交流限制；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计算机通讯这一方式在世界各地建立业务往来，从而可以取得更大的市场，并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迅速地灵活应对。那么，当传播变得全球化，商业也利用传播来向世界制造及生产它们的产品之时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最后，结构化的过程便是指对社会关系的创造，它主要是围绕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来组织社会关系的。例如，关于社会阶级，政治经济学描述了获得大众媒介与新传播技术是如何被收入与财富的阶层分化与不平等所左右的，这些不平等让一些人可以使用媒介和新传播技术，而另外一些人则被排除在外。该书集中笔墨描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怎样通过为理论分歧架桥回应其边缘学科提出的挑战的，具体来说，是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向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挑战。本书的结尾就是以应对挑战、架设新桥做简单结语。

第一节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让我们密切关注本书的结构以便对其概览有更细致的理解。第二章首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界定，接着解释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以此来阐

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定义囊括了这一学科的广泛方法。从狭义上讲，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研究的一门学科，它们互相构成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种表述的实用价值之一在于它强调了传播企业是如何运作的，它同时也让我们检视，传播产品是如何从产业链的生产者，比如好莱坞电影厂到批发商、代理商，最终到影院和起居室中的消费者手中的。这一表述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方式，比如我们浏览网页和观看电视节目都能反馈给媒介并让其做出怎样制造新的媒介产品的种种决定。另外，它还要求我们深思这么一个问题：那些诱导消费者做出选择的信息乃至我们对媒介的关注又是怎样变为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这一定义指引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对权力关系运作的理解。权力运作的概念论述的是即使当其他人不想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仍然能如愿以偿。它也让我们思考成为一个生产者、分配者或消费者意味着什么，以及对是什么组成了这三个范畴的日渐增长的模糊性有所领悟。

一种更加普遍和更加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关于社会生活中的控制与存在的研究*。控制特指一个社会是如何组织其自身组织、管理其事务的，以及如何适应或者不适应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必然挑战的。存在是指人们如何生产其所需以便再生产其自身以及社会。根据这种表述，控制主要是*政治过程*，因为其构成了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其关涉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它使政治经济学涵括了所有的人类活动，而且可以认为它涵括了所有的人类存在进程。这一定义最初出自我写作本书第一版时对达拉斯·斯迈思进行访谈时他提出的建议，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也是从那时开始，这一定义也就被那些关注人类是怎样与我们日益受到威胁的环境联系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深化了(Foster，2002)。在迅猛发展的科技研究领域，与之相似的观点同样也被其领军人物所深化(Haraway，2003；Latour，2005)。这个宽泛定义的主要缺点是，

它容易导致我们在意识或知觉上忽视人类政治经济学与自然中的一般存在与控制过程之间的区别。

另外一种描述政治经济学的途径是，通过聚焦于构成本方法特性的重要本质，超越在定义中典型探讨的东西，而对其涵义进行拓展。本书第二章将集中关注四个概念：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这些概念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流派都共有的属性。

在认识社会变迁与历史转型的目标上，政治经济学始终处于前沿。对于18世纪与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物和欧洲知识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来说，政治经济学意味着领悟资本主义大革命——主要是以农业劳动人口为主的社会向商业的、制造业的并最终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剧变。卡尔·马克思回应了第一波政治经济学思考，他认为为了理解最终导致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迁过程，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动力的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与其他政治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的探究。解释社会变革这一议题仍然是今天政治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中心，但是这一论辩却已经转入了这么一个问题之中，也就是我们是否现在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具体地说，是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新型社会(比如说，是资本主义或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或可被叫做信息资本主义？是否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太具革新性而导致一种根本上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根本质变乃至分崩离析？不论在这一议题上政治经济学家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分歧，但都对此不乏关注和争议。

政治经济学同时也热心探究社会的整体体系(或者说社会关系的总体)，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政治经济学始终认为人类社会是一幅巨大的图画，我们应该试着去了解它其中的涵义。亚当·斯密并没有局限于仅仅去考察那些狭窄的学科视野认为应关注的事物，他关心包括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所有方面中的各种关系。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也是这样，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无论他们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学派、保守派、新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家、自治论者、女性主义者或环境学派，他们的视野都没有受到狭窄学科的限制。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有差异，但都旨在以政治和经济的整体性为基础，以此来解释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与更广泛的社会与象征活动领域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会问道：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它们又是如何与文化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想知道所有这些是如何和大众媒介、信息与娱乐体系彼此影响的。

政治经济学同样因其*道德哲学*的使命而广为人知，这意味着它关注有助于产生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和关注那些*应该*引导社会改变的努力的道德原则。对亚当·斯密而言，如其《道德情操论》(1976)一书[他喜爱此书远甚于其更为著名的《国富论》(1937)]所表明的，道德哲学意味着理解诸如自我利益、物质主义以及个人自由之类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促成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马克思(1973，1976a)认为，道德哲学意味着把人类劳动看作是个人满足和社会利益的源泉，如他所希望将会实现的那样，还是将其视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仅仅是一种市场化的商品(如他所得出的结论那样)的持续冲突。当代政治经济学支持广泛的道德立场，但为了平衡，又倾向于赞同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价值。这包括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里，民主意味着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但也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在这些领域，民主的支持者们要求收入平等与教育机会平等，文化生产的全社会参与以及对自由传播权利的保障。

政治经济学的第四个特点便是其*社会实践性*，或者说是思想与实践的根本统一。具体说来，它反对传统学院派这样的立场：将研究和社会干预相分离，将研究者和社会行动者分离。政治经济学家始终将知识分子的生活视为以推进知识的形式参与社会变迁与社会干预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沿袭了以向国家领导人献计献策为使命的传统足迹。当然，他们在有关干预的特征方面还存在分歧：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是如此担心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粮食的供给，以至于他支持开放的下水

道，因为疾病的传播也是控制人口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卡尔·马克思却号召劳工们去夺取政权。尽管有这些差异，政治经济学家们在这个观点上是统一的：即研究与行动之间的分离是人为造成的，必须去颠覆这种分离。

第三章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怎样因其内部各种截然不同的流派纷争与犀利的内部争辩而闻名的。可以证实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分歧来自对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回应。其中的一些回应，最终导致了当代经济学的创立，他们聚焦于个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市场当成主干结构，当个体在市场上表现出欲望或者需求时，个体与市场就结合到了一起。渐渐地，这种方法日益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对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以及实践等因素的关注排除出去了，从而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了经济科学。该学科建立在以数学语言表述的关于市场行为的经验调查之上，因此，它被泛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或简称为*经济学*，其作为正统学派已经在政治经济研究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它把劳动简约为众多生产要素之一。根据这种观点，劳动和土地、资本一样，其价值是根据生产率或增加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的能力来衡量的(Marshall，1961；Jevons，1965)，无论人类事务还是非人类事务，无论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只能在可以被生产性使用以创造财富这种层面上加以评价。尽管政治经济学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即权力才是社会的中心的基础上，但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Foley，2006)。

而对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另一种回应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趋势，保留了对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以及实践等因素的关注，虽然这样就意味着放弃创立经济科学的目标。这种回应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多样化方法。其第一次浪潮是由一些包括*保守主义*群体在内的许多群体领衔，他们尝试以传统的集体权威来取代市场个人主义(Carlyle，1984)；这一浪潮也包括*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接受社会干预的古典信仰，但迫切要求将社区置于市场之上(Owen，1851)；这一浪潮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他们将劳动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重新

置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后来建立在这些观点上的表述，则是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广泛的当代表述。

作为学术政治谱系中的右翼，新保守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奠基在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71，2003)、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99)和罗纳德·科斯(Coase and Barrett，1968；Coase，1991)等人的研究上，这三人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用于各种为了扩展个人自由的社会行为中。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该方法最近的一次延伸，该思想流派正在赢得其追随者并也在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著作中得到诠释(2000)。该理论的中心仍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把市场作为制度的普遍的和最为自然的存在物而加以检验(Ankarloo and Palermo，2004)。而其他所有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法则被视作制度的替代选项，即它们只是当市场不能满足社会目标时一种支撑市场面对该情形的方法(Boettke and Storr，2002)。

制度政治经济学的较早形式持有中间偏左的立场，该派主要集中于制度和技术限制是如何塑造市场以便满足那些足够强大以至于能控制它们的公司和政府的利益的(Galbraith，1985，2004；Lawson，2005；Veblen，1932，1934)。制度学派学者们创立了传播研究的框架，这一框架证明了大媒介公司是如何控制大众媒介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在这么做时，公司限制内容的多元性，特别是通过排斥那些挑战亲企业言论的产品。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方法，包括后福特主义理论(Jessop，2002；Lipietz，1988)、世界体系理论(Wallerstein，2004)以及其他参与全球化辩论的学者(Harvey，2006；Sassen，2007)，坚持将社会阶级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主要致力于围绕垄断资本主义、自动化和工作的去技能化之间的关系展开辩论，而且关注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最近，他们的研究已经找到了制度学派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识根基(O'Hara，2000，2002)。最终，社会运动产生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学的流派，主要是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们处理父权制的持续存在、对家庭劳动以及其他生育劳动的忽视(Huws，2003；McLaughlin，2004；Peterson，

2005)。而环境或生态政治经济学则专注于社会行为与更广泛的有机环境之间的联系(Foster, 2002; Rosewarne, 2002; Wall, 2006)。还有一种政治经济学,将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与意大利自治的理论传统融合(Hardt and Negri, 2000, 2004),戴尔-威日福特(Dyer-Witheford, 1999)和泰拉诺瓦(Terranova, 2004)均在传播学研究中对这些传统进行了最有效的运用。

第二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均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传统在传播学研究中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第四章以传播的定义开始,饶有趣味的是,各种广泛的领域都站在各自的优势角度上,认为论述传播的意义殊为必要。包括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信息研究、哲学、语言学与建筑学等学科,当然,也包括传播和媒介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检视了传播的本质。为了与本书最基本的主题保持一致,本书并未介绍任何跨越所有领域的定义。但是为了更深入地剖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把传播视作意义的一种社会交换十分有用,这种意义交换的结果是某种社会关系的测量或者标志。由此看来,传播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数据或信息的传输,而是一种组成某种关系的意义的社会生产。第四章通过论述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社会和知识动力,来检视其具体特征。

第五章介绍了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位奠基性人物,对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卓越影响。斯迈思是第一个在伊利诺伊大学开设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也是与这个研究传统相关的四代学者中的第一代。席勒,在伊利诺伊大学师从斯迈思,其学术同样也浸润了好几代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吸收了制度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日益壮大的跨国传播产业的规模与实力的关注,使之必然成为制度学派的一员,但他们对社会阶级与媒介帝国主义的关注,又让他们的研究带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色彩。然而,与欧洲学者相比,他

们却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去给传播提供一个详尽的理论描述。倒不如说，他们的工作，还有通过他们的影响而在这个领域展开的大量的研究，显然是受到一种不公正感驱使的，那就是传播产业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一种更广范围的剥削性与缺乏民主的公司秩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尽管斯迈思与席勒都密切关注传媒对北美产生的冲击，他们各自发展了一个研究计划，描绘了全世界跨国媒介公司在权力与影响力方面的增长情况(Maxwell，2003；Schiller，1989，1992，1996，2000；Smythe，1981)。

部分原因在于两位大师的影响，北美产生了大量关于跨国企业和政府权力的研究文献，因其积极参与旨在改变当前的主流媒介并寻求商业化重点的替代媒介的社会运动而闻名(McChesney，2007；Mosco and Mckercher，2008；Schiller，2007a；Wasko，2003)。这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促使政府的管制和政策机构促进公众利益，包括对在国际组织面前产生了积极作用的社会运动的支持，以捍卫一种国际经济、信息以及传播新秩序(Mosco and Schiller，2001)。北美传播学的学术成就要求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不断的批判，包括其对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以及媒介实践。因此，依据这一惯例，作者们都纷纷强调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对于媒介传播研究的重大意义与其独到之处。尽管那些采用马克思主义框架的人们在一些细节之处存在分歧，但他们都纷纷强调一种把研究和行动相结合的实践行为以便使之服务于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同样，他们也坚持包括权力关系和社会阶级关系在内的媒介传播的研究(Artz，Macek，and Cloud，2006；Schiller，2007a)。

欧洲的研究，并不那么明确地与某个奠基性人物相关，尽管它们同样与社会变迁运动有联系，尤其是与捍卫公共服务的媒介体系有关。在这个领域的前沿工作一开始就是在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种制度理论传统中整合传播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展开的两个重要方向最为卓著：一是加纳姆的研究(Garnham，2000，2003)，二是戈尔丁与默多克的研究(Murdock，2004；Murdock and Golding，2000)，他们强调阶级力

量以及在贫富之间继续分化的根本性不平等。沿袭着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以及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论述了传播工业的巨大扩张与整合及其与政府权力的联合，并整合进更加广泛的资本主义体系。媒介巩固了社会阶级分化并有助于建立统治阶级的团结。

前沿研究的第二个线索是阶级斗争，这在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2002；Mattelart and Mattelart，1992；Mattelart and Siegelaub，1979，1983)的研究中最为突出。马特拉从各种传统中吸收营养，比如依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从国家解放运动的世界性经验来把传播理解为抵制权力的主要源泉之一。他的研究揭示了在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人们是如何使用大众媒介去反对西方控制并创造当地新闻和娱乐媒介的，而在拉丁美洲，马特拉曾在智利政府(该政府于1973年被军事政变推翻)担任顾问。

贝尔纳·米耶热(Bernard Miège)和彼得·沃特曼(Peter Waterman)为如何把这些观点应用于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其研究尤为出色的是对媒介产业中的劳动的分析。从一种阶级权力的视角出发，米耶热(1989，2003)提供了一种对各种劳动过程的评价体系，包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体逻辑下所进行的各种传媒产业的生产劳动。他认为在媒介产品的种类、产业控制的结构和劳动过程的本质之间存在关联性。在关于劳工和阶级斗争的研究中，属沃特曼(Waterman，2001)的研究最为出色，他例证了劳工和工会使用大众媒介和新型传播技术去促进民主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共同利益。

欠发达国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涉猎广泛的研究，尽管其主流最初是作为对起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发展主义理论的回应而兴起，它们试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景象中强调媒介的角色。现代化理论主张，媒介与城市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一样都是资源，它们将相互刺激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因而，媒介成长被视作发展的标志。根据这种观点，当社会展示了媒介发展(包括报纸、电台及电影

业等行业）已经到达一个具体高度时，它就实现了现代化。在吸收了几种国际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包括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之后，政治经济学家们挑战了发展主义模式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其技术决定论，以及发展主义模式对于权力关系的实际上的遗漏。权力关系形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格局以及在它们之间和它们内部的多层理阶级关系（Melkote and Steeves，2001；Mody，2003；Pendakur，2003；Zhao，2008）。

当大规模的投资无法促进发展时，现代化理论家们寻求修正模式，这些模式包括电子传播与新计算机科技（Jussawalla，1993；Jussawalla and Taylor，2003）。尽管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充分利用了网络技术来加快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民主方面取得的宝贵但却是微小的发展（Lee，2001；Zhao，2008）；而印度却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大公司独领风骚，其一半以上的人口还存在用电问题（Kapur，2007；Kumar，2003；Mosco and Mckercher，2008）。

非洲作为最为贫穷、最为边远的大陆，已经从属于各个纷繁复杂的发展方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信息经济的兴起，新型信息传播技术的繁殖（如传媒发展）现已被视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识。一些来自权威学术派以及政策制定圈子中的业内人士假设，新信息技术的广泛的分布会引导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以一种简单、直接、有序的方式发展变化。除了主张发展中国家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外，这些观点也符合发展主义的范式并且站在技术决定论的立场之上。从目前来看，由于这些观点和政策条款都未能实现其对大部分非洲地区许下的预言及其承诺，而今它们都已被大量的批评理论所湮没（Alzouma，2005；Mercer，2004；Tetty，2001；Thompson，2004；Van Audenhove，et. al，1999；Wheeler，2003，Ya'u，2004）。

政治经济学家们也通过强调这些新技术权力整合了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方式进行了回应。第一波研究浪潮见证了分工主要来源于领土界限：

无技能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最贫穷的国家里，稍有技能的和较复杂的流水线劳动力则集中在半边缘国家，同时，研发与战略制定等工作集中在大量的利润在其中流动的第一世界的公司总部。新近的研究还承认了这一点，也就是阶级分化已经跨越了国界，而且正在形成中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核心是弹性增长或谓之弹性积累，由此公司可以克服任何约束仅凭自身能力就可以控制市场并赚钱(Mckercher and Mosco, 2007; Pellow and Park, 2002; Schiller, 2007a; Sussman and Lent, 1998)。

第六章以全球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篇，为其五大主流做出了一个总结。这一领域不再只被某一具体趋势所定位，也不再由北美和欧洲的研究所主导。如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国际化，因为这一领域被全世界对全球事务日益感兴趣的学者们所把持。

这一领域也扩展了其现有的传播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和政府的历史。这样一来，它就揭示出那些未经检视过的企图在主导商业体制中建立起另类体制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反哺了社会上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同时，政治经济学也拓宽了其传统上关注研究支配力量和剥削过程的焦点，进而也关注起反抗力量，尤其是女性主义以及媒介和传播中的劳工视角。

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从研究旧媒介中的权力运作的优势，转入探究新媒介中尤其是关于网络的种种方法。该领域一如既往地解释新旧媒介之间的连续性，包括介绍统治力量是怎样利用这两者为其盈利的。但是，如今它也同样要回答由新媒介向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出的挑战，以此研究其间的非连续性。而且，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例证了新、旧媒介各自许下的诺言之间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业已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技术的乌托邦，即从电报到网络，再到社会的权力系统。政治经济学家还论证了新媒介使之尤其突出的社会问题，这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控和网络经济的重要性。

第五次也就是最近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高潮是围绕着政治行动主义的扩张而展开的。其中包括如民主传播联盟(the 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与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在内的原有组织的持续发展。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媒介改革运动就充分地诠释了这一潮流。然而，新的国内(自由出版)和国际(信息社会全球峰会，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运动的成功也同样为该潮流提供了佐证。

第三节　哲学基础

在讨论过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和其当前的趋势之后，第七到九章便会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做一个详尽的介绍。第七章以*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基本原则来引出其哲学的基础。认识论是理解我们如何认识事物的一种路径，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在一个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建构性的和批评性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它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承认概念和社会实践二者的现实性，因而把自己同*个殊式*(idiographic)与*律则式*(nomothetic)路径区别开来，前者仅仅论证了观念的现实性，而后者宣称观念仅仅是人类行为的单一现实的标签。遵循这一点，政治经济学是*兼容并蓄的*，因为它反对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将所有的社会实践化约为单一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认为概念是进入色彩斑斓的社会领域的一个切入点或出发点(Resnick and Wolff, 1987, 2006)。某种思想与理论而不是别的被选择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和经验保障了其优先性，但这并非宣称它们自己就是理解社会实践的唯一的或者最好的方式。此外，这种认识论也是*建构性的*，因其承认因果决定论的局限性，并且包含了社会分析单元作为一个整合成型的总体以线性模式彼此互动的假设的局限性。相反，它把社会生活作为彼此建构的系列过程来处理，这些过程在不同形成阶段彼此相互作用，而这些过程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影响只能在具体研究中得以理解。最后，这种方法是*批判性的*，因为它把知识看作是一种研究发现和其他知识体以及社会价值之间比较的产物。比如，这种政治经济学是批判的正因为它规律性地把研究所得的知识置于与可替代性

的知识体的对比中，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多元政治学以及文化研究。此外，它以引导我们实践的价值观，比如，公共参与和平等的社会民主价值，检测了政治经济学知识。

如果说认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认识事物的框架，那么本体论就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存在本质的基础。一般而言，本体论因把事物视作结构还是过程而区别开来。这一点对于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因其通过把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置于前沿而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方法不同，传统政治经济学关注诸如企业公司与政府这样的结构。这意味着研究起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而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也变化不断，从而，确立描述过程特征的起点比确立简单地确认相关制度的起点更有用。研究传播机构是重要的，但是它得基于对社会进程的分析。随后的几章都将会对这些进程进行分析。

基于这个原则，第七章的余下部分以及随后的两章都分别以三个切入进程绘制了政治经济学的真实地图：首先是商品化，它是将使用价值转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接着是空间化，即空间的转化，以及制度扩张的过程；最后是结构化，与社会代理机构一起建构社会结构的过程。将这些过程置于前台并不是要取代那种可以取代一种本质主义为另一种本质主义的结构与制度。更确切地说，这些是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实际理论的切入点，一系列理解社会生活的方法中受偏爱的一种选择。

第四节　内容、受众以及劳动的商品化

第七章讲述了把物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转化为商品的过程或者商品化，比如，食物是为了充饥，故事是为了传播，而商品的价值就是市场赢利，比如，商业化的耕种是为了出卖食物，生产戏剧是供商业电视之用。商品化过程对传播学研究而言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传播实践与技术促进了整个社会一般的商品化过程。比如，计算机通讯的引入，使所有的公司，不仅仅是传播公司，能更有效地操控整个生产、分配与交换

过程，能让零售商以更精确的程度监控销售与产品详细目录。它使公司只去生产并运输那些能最快地销售出去的商品，从而可以减少库存和不必要的商品。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沃尔玛，就是因其不断地应用信息技术而闻名。推动运用卫星和计算机传播跟踪存货清单和控制销售以便把美国的总公司与全国的商店网络联系起来，这点沃尔玛一直都走在最前方(Head，2004)。这种广泛而精确的信息跟踪技术让公司更能准确地监测与衡量顾客的偏好以便提升其效率和收益。

其次，商品化是理解特定的传播制度与实践的切入点。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的扩张，部分地作为对全球经济增长速率下滑的回应，导致了媒介项目的越来越商业化、曾经的公共媒介和电讯机构的私有化以及传播市场的自由化，其中就包括中东这样一度限制商品化的地区(Khiabany，2006；Sreberny，2001)。

传播政治经济学因其强调检视制度的意义而闻名，尤其是商业与政府制度，因为它们主导着传播商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以及传播市场的管制。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没有忽视商品本身和商品化的过程，但这一倾向已经使企业和政府机构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当面对商品时，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集中研究媒介内容，而较少关注媒介受众以及参与媒介生产过程的劳动。因为当前的全球媒介公司以及媒介内容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强调媒介结构和媒介内容也就不言而喻了。像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还有索尼公司等经过高度整合的跨国企业，它们制造的媒介产品具有多重效益。比如，在影片的分级发行中，一个好莱坞电影要先后通过这些企业中的各个主管电视、网络以及商业媒介的子公司。政治经济学帮助理解了企业和政府从新闻(McChesney，2003)到色情描写(Jacobs，2007)之间塑造媒介内容的各种不同方法。网络的发展为商业化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因为它不论在组织和重组传播内容还是衡量和监测顾客偏好方面都深化和拓展了利于商业化的种种机遇。

商业化不仅适用于内容，也适用于各种受众。政治经济学着力探讨了媒介受众，尤其努力研究了在一般的实际操作中，广告商是如何依据

一家报纸、杂志、电台或者电视节目所能到达的受众规模而支付广告费用的。这引起了一场很激烈的论争——是否受众，实际上是劳工，为了回报他们所接收的媒介内容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实际上，他们的注意力)？(Smythe，1977；Murdock，1978；Lebowitz，1986)。这场争议富有成效，因其将商品化的探讨扩展到了媒介内容之外，因为这意味着传播研究必须检视所有的广告企业，而不只是媒介公司。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将媒介受众的研究延伸到了审视受众的历史以及媒介受众与商业文化的生产者之间的复杂关系(Butsch，2000；Compton，2004；Hagen and Wasko 2000；Ross and Nightingale，2003)。同时，相关的研究还扩展到了有关受众劳动力的讨论中，这些受众与斯迈思所描述的既相似又不同，他们参与了网站建设，软件修改制作和营造在线社区等(Campbell，2005；Grimes，2006；Mcmillan，1998；Meehan，1999；Smith-Shomade，2004；Terranova，2000)。

除了检视媒介内容与受众的商品化过程之外，很重要的是思考媒介劳动的商品化。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在其经典性的著作中，直接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劳动转型过程。根据他的理论，通常的劳动是由概念的统一体构成的：想象与创意能力、设计与执行能力。在商品化过程中，资本的作用是把创意与制作相分离，把技能与执行任务的非娴熟相分离，并将创意能力集中于一个管理阶层，该管理阶层可以是资本的一部分，或者代表资本的利益；同时，以生产环节上的新的技能与权力的配置来使资本重构劳动过程。极端的是，与大量的劳动反抗相伴随，这种具有详尽的、侵入性的“科学管理”实践运用到了劳动过程。布雷弗曼论述了在大规模产业兴起时的劳动转型过程，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展示了这个过程延伸到了社会的服务、信息与传播行业。布雷弗曼的相关文献引起了大量的经验性的研究与理论上的辩论，后者集中在探讨这个过程有争议的实质的必要性、劳工们的积极能动性和贸易联盟运动，最终，他们的探讨转到了劳动过程的转型是如何因产业、职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不同的(Berberoglu，1993；Huws，2003)。

在整个媒介生产车间，传播产业劳工们的劳动也因按时计酬而越来越被商品化了。为了减少工资支出并增加收益，经理们用电子系统取代了机械系统，从而在印刷行业淘汰了成千上万的劳工，正如电子印刷系统取代了先前的一些排铸印刷机的操作者。而今天的数字化系统可以让这些公司裁减更多的印刷劳工。记者们越来越多地承担着编辑以及页面制作者的复合角色，他们不仅仅报道事件，同时他们还把该事件转化为可传输到印刷版面的形式，如今日渐是电子页面了。公司通常将重新包装的复制权保留，从而可以在每次再利用中营利。广播记者们扛着照相机，并录制音带通过电视或者电脑网络传送。电影和音像行业要求完全控制电影或者电视剧在因特网或者其他新媒介上发行所得的利润。软件公司在依据顾客对软件报错、下载、安装升级版本以及搞清楚如何解决问题进行调试前，其软件就已经卖得很好了。这种淘汰雇员、整合劳动从事多重任务，限定对劳动多重使用的报酬，并将劳动转移到免费的消费者身上的能力，进一步增加了潜在收益（McKercher and Mosco，2007）。这些从业者们已经做出了回应，他们聚合起包括记者、广播专业人员、电影、录像、电讯以及计算机服务部门等行业的技术专家，组建了代表大规模传播产业从业者利益的工会（McKercher，2002；Mosco and Mckercher，2008）。这也就是在第七章中要重点强调的几个反对商业化的例子之一。

第五节　从商品化到空间化

第八章阐述了重新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出发点——空间化，或者说是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限制的过程。政治经济学家们最初是从研究媒介内容、受众和劳动是怎样转变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开始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把这些纷繁复杂的传播路径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过程。从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来看，空间化就已经和商品化并驾齐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意识到

必须致力于如何估价由领地和我们自己建造的环境所营造的空间。而且，他们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与如何确定并测量劳动时间相关联。马克思(1973)则离空间化更近，他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以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商业利用各种交通与通信手段，可以不甚费时地将商品、人员以及讯息在广泛的空间领域内迅速调度。而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更可以说，与其说是消除了空间，不如说是在各种通讯与信息技术的辅助下转变了空间(Castells，2001)。各处的人员、产品和讯息配置正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可以证实的是，比如，国际劳动分工的剧变导致数百万的工作重新配置在低工资地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

空间化建立在由地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们所提出的观念上，他们强调通过时空的转换导致的结构变迁。吉登斯(Giddens，1990)为了验证我们对于时间与空间依赖性的减弱，提到“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重要性，并建议这一过程扩展了作为可利用资源的时间与空间的可用性。哈维(Harvey，1989)创立了一个叫做“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术语，认为对那些能够有效利用时间与空间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有效的空间再次萎缩。卡斯特尔(Castells，2001)则提醒我们注意物理空间，即地点的空间的重要性已经降低，随着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的重要性的提高，世界地图将根据人员、货物、服务、讯息的流动所确定的边界重新绘制，从而产生了梅西(Massey，1992)所指称的改观了的“权力几何体”(power geometry)。

传播对于空间化的实现非常重要，传播、信息流通过程与技术推进了整个工业的灵活性和可控性，但尤其是在传播与信息部门内部。空间化与全球化如影相随，全球化即世界范围内工业、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的重组。在工业层面，重组在行业层面表现为基于数字技术的整合市场的发展；在企业层面，重组则表现为灵活的或者网络化的公司的兴起，它们利用传播与信息系统，不断地改变企业结构、生产线、营销策略以及与其他公司、原料供应者、劳动力以及顾客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与工业重组彼此都影响了政府重组的四种主要模式。商业化确立了国家的职能，包括主要沿着重要的产业以及创造收益的生产线提供邮政与电讯服务。私有化更进一步将这些部门全部转化为私有产业。而自由化则允许国家开发竞争市场，最终，国际化将国家联系在一起，将一国的经济与政治权威转向将一个地理区域的几个国家融合一起的区域性的或者国际性的权威。最好的一个例证便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Mosco and Schiller，2001）。全球化也同样包括如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全球权威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将空间化视作企业权力在传播产业的制度延伸。政治经济学家颇有代表性地指出这就是媒介聚集的问题，而媒介聚集体现在媒介公司的规模的绝对增长并由资产、收益、利润、雇员数量、股票价值等指标来衡量。比如，美国的传播系统就由屈指可数的公司构成，包括以美国为大本营的通用电气、维亚康姆（CBS）、迪士尼公司（WDC）、时代华纳（CNN），微软公司（Microsoft）和谷歌（Google），还有其他一些不在美国的公司，包括比如新闻集团（FOX）和索尼公司。政治经济学明确地以各种不同的公司聚集形式来检验其增长情况（Herman and Chomsky，2002；McChesney，1997；Bettig and Hall，2003）。横向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出现于当一家媒介公司购买不直接与其最初业务相关的另一家公司的股权时。它的典型形式是跨媒介集中，或者一家旧媒介公司购买一家新媒介公司，比如报纸购买了电视或网络媒介。横向集中也发生在一家媒介公司购买了媒介外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或传媒和通信行业外的公司收购了各种传媒或通信企业时。

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指的是在相同的产业线上多家公司的合并，这延伸了一家公司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比如，一家好莱坞重要制片商购买了一家电影发行公司，或者一家软件公司购买了一家社会网站。这也称作前向的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因为它使一家公司进一步沿着生产和发行过程扩张。还有后向的纵向整合（Backward vertical

integration），比如，《纽约时报》购买魁北克的造纸厂从而扩展时报上行到其生产过程的出发点。

除了揭示媒介公司如何发展为当今在规模与权力方面都和其他任何产业能匹敌的跨国企业集团之外，政治经济学家论述了企业权力多种形式的灵活发展，这一点在合资企业、战略联盟以及其他把多个公司或公司的各个部分（包括竞争者）联合在一起的专项安排中尤为明显。这些措施利用了更加弹性的传播手段来联合和分离彼此利益（Wasko，2003）。

空间化的一个结果是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在的商务能够在国际范围内灵活利用有差别的工资、技能以及其他重要特性。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多集中在计算机与通讯系统的构成部件制造（在东南亚）以及数据输入业务（加勒比海地区）进入以低廉的工资与集权式管理吸引跨国公司的第三世界（Heyzer，1986；Sussman and Lent，1998）。研究的范围已经拓展到强调现在所谓向国外采购零配件，或者是企业努力去发现工资相对低廉但有技术的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在诸如软件生产、呼叫中心销售、不发达国家中的服务（尤其是今日印度）等领域尤为需要（Mirchandani，2004；Mosco and McKercher，2008；Taylor and Bain，2004）。这类空间化也发生在发达国家，主要的例子是美国电影与音像生产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以及其他地区，在那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能够带来企业利润（Magder and Burston，2001；Wasko and Erickson，2008）。最后，空间化还引起了关于抵制、公共空间的形成以及全球化的辩论。第八章的结尾部分检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

第六节　结构化：社会结构与人类机构

第九章研究的是复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切入点——结构化。结构化过程相当于马克思观念的当代阐释，即人民创造历史，但却并非是在自己所创造的条件中创造。换言之，社会行动发生于行动发生

于其中的结构所提供的机遇与局限中。只有在社会结构适宜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带来社会变迁与“创造历史”。基于结构化的研究通过整合人类机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有助于平衡政治经济学分析强调结构的趋势，典型的是聚焦于企业与政府机构。这个观念被吉登斯(1984)有效地探讨过，但是本章却在社会意义上更强地强调了这一点。聚焦于社会结构化对于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之间建立联系尤为重要。

结构化意味着把社会阶级的概念从原来的结构化或类别化层面延伸到该词的关系的和建构的层面，结构化和类别化是以一部分人拥有什么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的形式来界定阶级的。这样做丝毫不会贬低把阶级部分地看作是“拥有者”与“缺失者”之间的区别的一个指称的价值。传播政治经济学通过如下途径对阶级作了阐述：它通过研究证实了在传播系统中持续的阶级不平等，尤其是利用传播手段的地位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在社会机构中的再生产(Kyasny，2006；Murdock and Golding，2004)。这种研究也被运用到了传播业的劳动上，尤其是用于研究通讯与信息技术是如何被用作自动化与去技能化的工作，包括在媒介产业中的作用(McKercher，2002；Rodino-Colocino，2006)。它同样被用于分析监控系统是如何运用通讯手段来衡量与监管劳工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有利于非常精确地管理整个劳动过程(Parenti，2003)。劳动进程中精密的电子监控也被用来建构员工越轨行为(employee deviance)的新形式，这已被新自由主义关于劳工“窃取时间”的论述所例证(Snider，2002)。

为了使关于社会阶级这一类别化观点更加丰富，第九章在这一类别化的概念基础之上还阐释了阶级的关系观，即按照联结社会阶级类别的那些实践和进程来界定阶级的关系观，比如企业和劳动的关系。在这种观点中，劳工阶级，就不再简单地用相对缺少传播手段来定义，而是根据其与资产阶级的和谐、依赖以及冲突关系来界定(Mckercher and Mosco，2007)。另外，阶级一词的建构性概念认为劳工阶级是自身身份

的产物，而这种身份与资本相关并独立于资本(Dyer-Witheford，1999；Maxwell，2001；Mosco and Mckercher，2008)。社会阶级建构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面对关于历史创造行为的局限性条件的成熟研究状况下，致力于揭示阶级如何建构它们自己，它们如何创造历史。社会阶级是一个由某些人拥有什么而另一些人缺失来定义的类别，但是，各个阶级也积极地彼此发生关联，并且它们也以独立于彼此的姿态建构或者创造了它们自己。

第九章同时也揭示了平衡该领域中另外一种趋势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一旦关注社会机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实践，就趋向于强调社会阶级。开始于社会阶级的分析事出有因，阶级结构化是解释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不胜枚举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阶级在持续分化。然而，第九章重新强调了避免本质论的普遍需要。在本质论的情况下，所有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阶级关系。对于结构化的其他维度与社会结构化相互补充或者冲突，比如，社会性别、种族以及包罗万象的社会运动，这些维度与阶级一起，组成了传播中众多的社会关系。

在论述女性主义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中，政治经济学迈开了重要的步伐，即便还有大量关键的工作要做(Byerly，2004；Lee，2006；Mclaughlin，2004；Meehan and Riordan，2002；Sarikakis and Shade，2007)。同时，政治经济学也逐步对信息技术、社会性别、国际劳动分工等做了研究，揭示了诸如微电子行业的妇女员工们所面临的双重压力，在这些行业里她们遭受的是最低的工资与最恶劣的工作待遇(Huws，2003；Mosco and Mckercher，2008，esp. chapter 2；Pellow and Park，2002)。

在这种分析中，更为普遍地是在结构化的社会过程中，种族仍极富意义，如，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方法发展的中心人物——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1998，2003)对种族与媒介进行了多视角的评估。种族分化是当今构成全球政治经济的种族的多元等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无论是作为类别还是社会关系，种族都有助于解释对国家与全球资源——

包括通讯、媒介以及信息技术——的获得（Green，2001；Pellow and Park，2002；Ya'u，2004）。

第九章的结论揭示了，在反对主流媒介及其“常识”看法或者霸权的过程中——这种霸权带有可以融合成一种真正的反霸权的另类媒介——与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交叉的社会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力量（Downing，2001；Hanke，2005；Howley，2005；McChesney，2007）。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在各种结构化中由于各种张力和冲突，媒介终被组织为主流的却又是反对的、另类的形式。

第七节　牵线搭桥：文化研究、公共选择及其超越

为发展一种完备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发展一种承认其不过是考察社会生活的方式之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检视其知识边界的各种方法并为它们牵线搭桥十分必要。政治经济学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野，但它也非探究世界的唯一有效路径。为说明这一点，本书最后一章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置于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对立面。

文化研究路径是基础宽阔的知识运动，它聚焦于文本中的意义的建构，而文本的概念广泛地包含社会传播的各种形式（McRobbie，2005）。文化研究现在也有许多的流派并提供了内部酵素的争议（Grossberg，2006）。不过，文化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助益。

第十章阐述了文化研究是如何对实证主义的广泛批评保持开放性的（实证主义即认为感官的观察是知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文化研究已经捍卫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哲学方法，它集中于主观性，或是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集中于知识的社会创造。文化研究同样拓宽了文化分析的涵义，其大前提是，文化是一种普通的、由所有社会参与者创造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那些特权精英们创造的；同时，社会也是经过社会性别和民族的分化与认同而构成的，正如社会是由社会阶级所构成一样。

虽然政治经济学能从这些新的开端中获益，反过来，它同样有助于推进文化研究。甚至就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趋向接受了主体性，并体现出更广阔的包容性时，它还是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即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基础牢固的道德哲学，坚持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差距。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过分夸张主观性的重要性(也就是主体的自恋)的倾向划清了界限，与文化研究拒绝以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作为思考的依据的倾向划清了界限。政治经济学也同采用专业化语言的文化研究趋向划清了界限，因为它有违文化研究应当为建造社会的普通人所享用的初衷。最后，政治经济学还同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而拒绝研究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的趋向划清了界限，因为它造成的后果是否认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有任何价值(Denning，1996，2004；James and Berg，1996；Maxwell，2001；Mosco，2004)。米汉(Meehan，1999)认为，如果更侧重文化研究批判性的一面而非欢快的一面，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更富有成效地相遇的可能性更大。关于文化研究批判性的内容不仅有助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时它对理解媒介假象、受众和习俗也是至关重要的。米汉的研究工作标志着过去十年在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意见交换所取得的进展(Deetz and Hegbloom，2007；Mclaughlin，1999；Peck，2006)。

第十章也论证了政治经济学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中获益。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右翼倾向于把分析重点放在国家上，而经济上则是旨在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推行所谓的新古典主义(Buchanan，1999；Posner，1992；Stigler，2003)。

政治经济学趋向于把政府看成过度依赖于、决定于特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资本的配置，因此它将从严肃对待政府的积极角色的方法中获益。另外，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都对分析社会整体感兴趣，密切注意社会改革。然而，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多元政治分析趋向划清了界限，公共选择理论把国家视作广泛的社会力量的独立

仲裁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组织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支配社会。与此相左，政治经济学则坚持认为，企业和商品化是社会分析的起点。更进一步说，政治经济学拒绝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整体分析与引导社会改革的价值观的分析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市场理性之上的趋向。相对于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坚持伊始于社会阶级和劳动的社会过程，也坚持把社区和公共生活与市场和合理化相对，从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市场化和理性化实际上复制了阶级权力(Lewis and Miller, 2003)。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研究方法的区别时，为它们牵线搭桥才可能是真正富有成效的。

本书的结尾将会展望另外的两种牵线搭桥过程。一个是聚焦于科技研究的发展，另一个则是将以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其一部分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更为宽泛的研究和包括在当今社会占有几乎全部权威地位的包含物理、化学、生物的科学项目结合起来。早在五十年前，作者斯诺(C. P. Snow)“两种文化”的言论已把上述种种研究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富于争论性。解决这些分歧是一个巨大而又重要的挑战，所以本书将会提供一些有关怎样处理这些分歧的见解与想法来结束全文。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在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前，我们需要考察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全貌。本章首先定义研究方法，然后讨论它的一套主要特征。下一章处理主要学派，正是它们赋予政治经济学丰富性与多样性。

本章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起点，接下来论述由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批判。在19世纪后期，受到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模式创造一种社会科学的倾向的影响，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1835－1882)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等人创立了新古典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继续为主流经济学提供模范。这个学派选择专注于最好是通过一套数学方程式描述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不同组合的结果，由此将大部分“政治要素”从“政治经济学”里排除。[①]

在20世纪，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成为库恩(Kuhn，1970)所谓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或者教科书经济学。与牛顿力学逐渐成为物理学的代名词相类似，新古典主义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代名词。可是常规化经济学的过程是一种学术和政治的持续动乱，本身就值得写专著论述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Foley，2006)。所谓的主流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奥地利和剑桥派系争论市场的中心地位和政府的角色。制度的(Institutional)、马克思主义的和社团主义的(corporatist)理论对于该理论的前提、概念、结论以及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或者这种关系的缺失)提出了更加根本的批判。

常规科学与动乱之间的紧张不断延续。一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看来已经在大学和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上风。经济学杂志主要探讨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有待解决的难题和需要数学精密调校的关系。政府和大公司的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全都是该学科最聪明、最机敏的从业者。另一方面，针对常规经济学的种种局限的根本批判继续增长。该学科科班出身的学者质疑道，就连被定义为经济学正规领域的狭小范围，它也无力解释(McCloskey，1985，2002；Foley，2006)。经济政策的观察家抱怨，传统经济学的灵丹妙药不但不管用，甚至还让情况变本加厉(Shiller，2006)。新古典主义正统学说的反对派成倍增加。觊觎王位者从来就没有短缺过，涵盖了广阔的政治谱系[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保守主义传统的继承人，比如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shott，1901－1990)，到形形色色的制度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同样广阔的实体领域(substantive terrain)(比如女性主义者、生态学和道德经济学；应用于家庭和性行为的公共选择理论，等等)。这些反对派共同致力于拓展传统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和实体参数。本章不足以充分论述当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内部争论的全部重要性。本章仅限于提供一幅版图，分析主流经济学和各种政治经济学学说之间的主要歧异。

读者可能会问，一本集中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有何必要以两章的篇幅论述普通政治经济学。这样做有四个主要原因。首先，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传播，而以牺牲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代价。其次，纵览政治经济学为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和空白奠定了基础。另外，这两章提供了一个机会，让那些思考过政治经济学领域全貌的传播学者的思想也能占据一席之地。最后，评价政治经济学理论帮助我们增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

---

①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新的经济科学缺乏一种政治理论。明确将“政治的”一词排除反映了一种关于权力和政府的重要观点，它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间、还有这种理论的捍卫者和批判者之间展开的争论中不断推进。本质上，它表明经济学不仅比政治学更加重要，作为一门客观的科学，经济学可以并且应该与政治学划清界限。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821－1988)建议，当开始下定义的时候，应该从基本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从完全构想出来的概念开始。他提倡一种既基于社会史也基于思想史的词源学，因为理念的意义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锻造的(1977：11)。一本经济学术语的词典提供了一种抽象概念的观点，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财富的科学”，“处理对象是单数的人（原文如此）为了满足需求和欲望所从事的工作”(Eatwell，Milgate，and Newman，1987：907)。可是根据威廉斯基于社会史的词源学，有必要强调在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以前，在知识分子以它描述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以前，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有关如何管理首先是家庭、然后是社区的社会习俗、常规和知识。具体地说，经济学这个词的词根是古希腊语 oikos(意思是屋子)和 nomos(意思是惯例)。因此，经济学一开始指的是家政管理。这种观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的著作当中还可见一斑，比如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和至为关键的亚当·斯密。[①]“政治的”来源于希腊语 polos，即城邦，古典时期主要的政治组织单位。因此，政治经济学起源于管理家庭和政治家庭。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之前十五年，斯图尔特(Steuart，1967：2)写道：“经济学适用于家庭，而政治经济学适用于国家。”

同样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政治经济学就混合了描述性和规定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如此描述其驱动力或者“超政治经济学”(meta-political economy)：它是“由顾问作为建议提供给社会组织领袖的全体实

① 很难对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置之不论：一门两千年来都是围绕着家政管理组织的学科，现在却仍然必须依靠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敦促才会把家务劳动的价值纳入考虑(Bezanson and Luxton，2006)。

践和理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具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Smythe，1991年12月4日）。这与《经济学术语词典》将政治经济学的原意界定为一种“治国术的分支”保持一致，但是政治经济学现在“被视为一门对特定问题做出道德判断的研究”（Gilpin，1977）。

其他定义集中关注经济学的发展如何缩小了一个本来根基广泛的学科领域。早在1913年，一本权威的经济学词典就说道：“尽管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仍然得以保留，这门科学，按照现在的理解，严格来说并不是政治性的；换言之，它并不局限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主要关注个人的工业活动”（Palgrave，1913：741）。与之相类似，在1948年，《现代经济学词典》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经济事务的理论和实践”，并注释如下：

> 本来，这个词适用于真实价格、过剩和分配的广泛问题。这些问题被视为既是社会关切的事务，也是个人关切的事务……随着19世纪晚期功利概念的引入，重点转移到了市场价值的变化和个体公司的均衡问题。这些问题不再需要广阔的社会视野，没有必要强调政治性。（Horton，1948）

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并非必然。这本1948年的书同样提到了人们对更加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开始重新焕发兴趣。它意识到，随着“近来国家对公共福利的关切日益增长”，“重点再一次回复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点后来在一本经济学术语的权威著作里得到了附和（Eatwell，Milgate，and Newman，1987：906）。根据该书，“从来也不曾放弃过政治经济学这个老术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来自芝加哥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激进自由至上主义右派”结合起来，使这一古老学科重新焕发活力。

这些观察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强调定义基于社会实践，在学术界和政

治界的争论中逐步演化。下面的几节利用这些方式，集中关注本学科的定义和特征，它们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视为“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它们交互组成了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根据这一立场，传播的产品，诸如报纸、书籍、录像、电影和受众，都是主要资源。这种理论表述对于传播学的学生具有某种实用价值，因为它提倡人们关注影响市场的主要力量或者过程。它强调一个公司如何生产一部电影或者一本杂志，它如何与分配、营销产品的人打交道，消费者如何决定看、读或者听什么。最后，它考虑消费者的决定如何被反馈到生产新产品的过程中。

可是政治经济学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因为它要求我们集中关注围绕权力——或者说即使面临抵抗也能控制其他人、过程和物品的能力——组织起来的一套特定社会关系。这就会引导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检视顺着生产、分配和消费线路不断变换的控制方式。例证包括正在缩减数量的大媒介公司如何控制内容的多样性，或者国际营销公司如何通过运用监视和度量的新科技来获取有关消费者的宝贵信息，以此加强自身在媒介行业的权力。它还会引导我们考虑行动主义者在何种程度上运用诸如博客和社交网络一类的新媒介工具来抵制商界和政界的权力集中。

这种定义的主要困难是，它假定我们可以轻易识别和区分生产者、分配者和消费者。可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特别是在一些更加有趣的例子里。比如，将组织和执行必要步骤以创造成品的电影制片人和寻找市场经销机构的发行商和批发商区分开来很有用。可是电影制作就不这么简单了。发行商常常对制片过程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保证制片必需的投资和营销。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发行商在现实中就是制片人，或者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呢？与之相类似，尽管常识往往将受众视为媒介产品的消费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生产者。可以说消费者在消费媒介产品(或文本)的时候，也制作出它们的象征价值(或者意义)。同样，生产者在生产的过程中消费资源。他们还凭借自身作为生产者的名声从事发行工作。这一点表明，尽管定义是个有用的出发点，它并非没

有局限性，如果我们生搬硬套地使用它，就会错失一些东西。

另一个更加宽泛和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控制(control)和存在(survival)”。“控制”特指个人和集体成员的内部组织，而“生存”特指采取手段生产为了再生产自身必需的东西。控制的过程在广义上是政治的，因为涉及社群内部关系的社会组织。存在的过程根本上是经济的，因为涉及生产一个社会为了再生产自身必需的东西。这种定义的长处是扩大了政治经济学的外延，使其包涵至少所有的人类活动和可以说所有的有机过程。这与环境的、生态的和科学研究的分析方式相一致，这些分析方式，除了其他方面，试图识别出对所有形式的生命起作用的过程，并评价其差异和相互关系(Haraway，2003；Meadowcroft，2005；Rosewarne，2002)。在传播和信息研究中没有很多这一观点的显著例证。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1986：107－109)应用信息系统理论(information systems theory)以测定生命系统的基本过程：组织、新陈代谢和生长、反应性、适应性、再生和进化。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91)利用复杂系统理论(theories of complex systems)或者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来理解在生命系统内传播和信息的辩证关系。古纳拉特纳(Gunaratne，2002a，2002b，2004，2005)将吸收了混沌理论的新生命系统理论作为其研究传播和权力的全球系统的核心部分。

一个对政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的狭隘性提出了根本质疑的定义值得多花笔墨。很难质疑这样的声称：这些学科植根于当下的人类行为(主要是男性行为)研究。其结果就是忽视人类如何与其他生命友好相处，忽视除了当代资本主义以外人类制度当中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传播实践。[①]这种理论的弊端在于导致人们忽视人类政治经济学和一般控制和存在过程

① 历史几乎全部发生在西方、以电报的发明为开端的观点在传播研究领域贻害深远。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可以理解但是有局限性的倾向：将该领域视为一系列随着技术形式(印刷、广播、计算机通讯)的发展而逐步进化的产业(广播、电信、出版)。

的区别。这些包括目标导向意识和自反主观性(照字面意义就是意识到自身的意识)的力量。它还会引导人们低估当代资本主义打造出的势不可挡的转变，正是它们积聚成历史突破。如果寻找超越自然和历史差别的共同过程，我们就可能看不到这些过程如何在当代世界发生转化，最后发展到唯一对该转化负责任的一个物种有能力消灭所有物种的自然和历史。尽管有上述种种局限，对政治经济学的广义理解令我们想起：无论我们具体的理论出发点和分析焦点是什么，都和悠久的历史与浩瀚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节　主要特征

定义是有用的，可是对我们的作用还是有限。另外一种描述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是集中关注一系列代表该理论特色的主要性质。这些性质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外延，使之超越了定义通常提供的意义。吸取了戈尔丁和默多克(Golding and Murdock，2005)等学者著作的成果，本节集中介绍作为政治经济学奠基石的四个理念：社会变革和历史(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社会整体(the social totality)、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和实践(praxis)。

传统上，政治经济学优先理解社会变革和历史转变。对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之类的古典理论家，这意味着理解资本主义大革命，即将主要基于农业劳动的社会转化成商业的、制造业的、最终工业的社会的剧变。对于卡尔·马克思之类的政治经济学家，它意味着考察资本主义内部对其增长、变化负责的种种动力。目标是识别出短期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模式，还有预示体制根本转变的长期改革模式。在为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John Kells Ingram，1823－1907)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23 年版所作的序言里，理查德·埃利(Richard Ely)解释了历史在政治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核心地位：

> 现在一致公认，社会受一个本身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支配；脱离历史就无法真正了解任何社会事实。故此，受到旧学派偏爱、据称适合一切情况并解决一切问题的“袖珍公式”已经风光不再。就方法而言，经济学已经变得更具历史性。公认社会进化的几个时期各自拥有不同特征，在实践中要求一种不断调整的干预，这种干预理应随着时期的变化而变化。(Ingram，1923：4－5)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就会看到，埃利对历史在本学科获胜的乐观态度尽管自有其合理性，却显然错了位。历史会始终占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可是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却将历史抛到了一边，或者说至少将它放在了幕后。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使得将经济学转变为一门科学的趋势益发困难。[①]试比较埃利的乐观主义与巴兰(Paul A. Baran，1909－1964)和斯威兹(Paul Marlor Sweezy，1910－2004)的观点。在赞扬了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历史敏锐性之后，巴兰和斯威兹攻击当代经济学家：

> 彻底反历史的当代布尔乔亚经济学藐视任何人尝试研究正在发生的变革的本质或者走向。(1965：29)

对于贝尔(Bell)来说，时间和历史感的缺失是经济学理论普遍危机的一部分：

---

① 我感谢达拉斯·斯迈思向我建议英格拉姆的《政治经济学史》。斯迈思(1991)写道，他1932年念博士生的时候读到这本书，该书对他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尽管埃利和英格拉姆都写到了历史思想的胜利，本学科正在开始偏离对历史的强调。虽说如此，对于一位年轻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说，这本书会在全部课程当中占据核心地位。埃里克·罗尔(Eric Roll)1942年的《经济思想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看来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核心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今天，麦克洛斯基(McCloskey，2002)写道，在一个更加关注构建关于当下的严密数理模式的领域内，经济学史是一个边缘化的次学科。关于经济学如何对待(和虐待)历史，帕克(Parker，1986)近来提供了较好的批判。

> 最终，为了对复杂的新社会安排方式——它们来自经济和社会活动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新的场所——作出回应，经济学理论不得不回到时间（在逻辑的意义上）和历史（基于经验的事实）。（Bell and Kristol，1981：79）

人们之所以对政治经济学重新产生了兴趣，一个原因就是想要断定我们是否正处于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当中，这场变革和占据了几位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思想的那场变革很类似。人们经历着看上去很深刻的社会转型，想知道自己是否正在亲眼目睹一场社会机构和过程的根本重组，该重组反映了一种新趋势，即转向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之一或者某种组合，转向一个网络社会，或者毋宁说，转向自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就一直起作用的根本趋势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对此问题的问答对于我们如何思考社会变革非常重要。此外，问题本身也表明向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思维转变的新趋势。①

政治经济学有着支持历史分析的悠久传统，学科领域内又涌现了这种重新焕发的兴趣，所以为着手研究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做好了准备。可是，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政治经济学需要对历史与其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再生产中所处地位的关系予以更加密切的关注。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集中关注恒定机构的生产和再生产。鉴于时代-华纳、索尼、微软、新闻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谷歌一类机构的绝对实力，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可是，把兴趣集中在这一方面使得整合历史理解非常困难，因为如康奈尔（Connell，1987：44）所说的："历史是作

① 并不是只有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历史关怀。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在"导言"中写道，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噪音》（*Noise*）——一种有趣的、不落陈套的音乐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了"在'历史主义'受到一致声讨（阿尔都塞）、历史和历史解释通常被打上'历时性'（索绪尔）或者纯粹是神话叙述（列维-斯特劳斯）的烙印的一段时期以后，人们对于历史编纂学重新焕发了兴趣"（Attali，1985：p. vii）。

为机构再生产基本循环的附加物进入理论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集中关注构成的过程，而不只是机构的再生产。康奈尔又说：

> 要让历史成为理论的有机部分，必须将社会机构视为不断**构成的**(constituted)，而不是不断被再生产的(reproduced)。只有理论承认机构一直可能由一种不同的方式构成，这样说才有意义。拥有权力的团体的确试图再生产赋予其特权的机构。可是他们是否和如何成功总是一个开放的问题。(1987：44)

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华莱士·克莱门特(Wallace Clement)在政治经济学里为历史设定了一个清晰的视界，在此他抓住了这一主题：

> 在寻求理解历史转型——包括变革的行动者和驱动力——的意义上，它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动态的。(2001：406)

从奠基人的时代开始，政治经济学还主张本学科应该坚定地植根于分析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横跨了形形色色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倾向于位于不同学科的隔间里，那些关注社会阶级的问题归属社会学，关注政府的归属政治学，关注市场的归属经济学，等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划分学科界限，从他的时代开始，政治经济学就一直与社会生活的互相构成与多重规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密尔就描述了从广义上研究社会生活的必要性：

> 出于实用目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哲学的许多其他分支互相纠结、不可分割。除了纯粹细节的事务以外，也许没有任何实际问题仅仅取决于经济学的前提。(Stone and Harpham，1982：12)

即使是在承认他本人的理论与他所谓的“社会哲学”的其他分支互相关联的时候，和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密尔对运用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解社会全体的方式之一饶有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只是另一种理论。它也是一种指南，有助于理解流行于众多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海尔布龙纳(Heilbroner，1986：15)所说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并非只是杞人忧天的知识分子。他们将整个世界当作研究对象，以十几种大胆的态度描绘之——或愤怒，或绝望，或乐观。”

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目标而盛行。到了1923年，即使名称已经改换成经济学，普通教材仍然继续支持这种对政治性的广义看法。理查德·埃利又说：

> 关于经济学在科学总体体系中所占的位置，人们认为无法脱离其他社会现象孤立地研究财富，除非是在暂时的或者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密切关注人类生活若干方面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至关重要。(Ingram，1923：4)①

在其他方面存在本质差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对社会整体的关注。这种常常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也有人使用“实证政治经济学”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positive or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名称]，从经济学理论的保守一翼吸取灵感(Buchanan，2003)。暂时抛开推动这种观点的假定和理念不谈，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分支声称自己能够和应该被应用于社会行为的一切形式。根据布伦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5：x)，公共选择理论或

① 同样有意思的是，埃利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社会学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实际上只有一种伟大的社会学科学，经济学构成了其中的一章，必须与其他各章保持紧密关联。”(Ingram，1923：4)最近的学科地位排名将经济学置于社会学之前，对那些将此奉为权威论断的人，这番话发人深省。

者制度政治经济学标志着向古典传统的回归，将经济学视为研究“市场如何起作用”的学科，这里的市场应做广义理解，包括“通过公共机构协调个人行为”。对于这一理论的推进者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个人与机构之间联系的种种规则。他们主张，这些规则的本质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当代经济学理论理性的、自我导向的效用最大化者”——做出的选择(1985：65)。因此，整个社会活动场所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领域。从商品和服务的传统私人市场，到选票、配偶、子女、性、传播等的市场——创造管理一切市场的规则的种种选择就是其研究对象。[①]这种理论的拥护者之一为其辩护，称之为必要的“经济帝国主义”(Lazear，2000)。

保守派的另一支系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制度理论启发的政治经济学。这些与公共选择的观点在几乎所有的要点上都存在分歧，除了下面一点：尽管理论家各持一端，他们在探讨政治经济学时无不以理解社会整体为宗旨。这种观点牢牢植根于马克思著作，并在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s)、西方马克思主义者(Western Marxists)、自治主义者(Autonomists)、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的理论家，还有与康芒斯(Commons，1862－1945)、凡勃伦(Veblen，1857－1929)、罗宾逊(Robinson，1903－1983)和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08－2006)一脉相承的制度经济学者那里发扬光大。这些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要点上互相冲突，可是承认并且寻求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释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些与范围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制度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信奉社会整体意味着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

① 实证经济学家那种近乎救世主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仅是建立一门学科，用布伦南和诺贝尔获奖者布坎南的话来说(1985：150)，这是创造一种“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它会“部分回归18世纪有关政治和政府的怀疑论”。他们有意“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约束政府的规则上，而不是为政治对公民生活日益扩大的入侵辩护的革新上面。我们作为社会哲学家的标准任务就是型塑这种公民宗教，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无疑都是一个十足的挑战”。

系。作为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于将一切都简化为经济的反应，大批著作问世于20世纪70和80年代，旨在通过主张相对经济而言政治具有“相对自治”（relative autonomy）来修正这一观点（Jessop，1990）。这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令人们对国家的增长及其与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关系重新产生兴趣，也将注意力导向在政治经济学里政治与经济的动态联系。这种纷争很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Jessop，2001）。尽管如此，争论总是关涉相对自治。尽管“相对自治”这个术语比较含混，可能妨碍基于准确了解的观点交流，争论的各方没有一个认真提倡将政治从经济分析中抽离出来。大多数人都承认学术工作现行的学科划分存在严重缺陷，因为那些有权决定其走向的人同意将政治从经济当中正式抽离出来，同意必须让经济学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同意通过消除政治内容、经济学可以不受意识形态偏见影响的观点。

秉承制度经济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也很关注识别出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之间的联系。受凡勃伦著作（1934）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家的兴趣对象是利欲熏心或者贪得无厌与他所谓的“显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或者一心追求权力地位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眼里，引发显性消费的不是作为主流经济学主要特征的理性，而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非理性冲动。

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法国规制学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的作者们注意识别“积累制度”（regimes of accumulation）与相关社会和政治“规制模式”（modes of regulation）——包含但是不局限于政府——的相互关系（Aglietta，1979；Boyer，2000）。他们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式微，但是受马克思与20世纪早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启发的理论家们继续在政治经济学与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之间搭建桥梁（Jessop，2001；Sayer，2001）。除了在理解经济现象时重新考虑政府，他们还提倡在文化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如赛耶（Sayer，2001：697）所说的：

> 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标志和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它探测了经济活动的“嵌入”(embedded)性质——它们是如何被埋置在影响那些经济过程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处境之中。

此外，为了解释他们所谓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种种转型(围绕着大型全国性企业组织起来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的衰落导致了这些转型)，政治经济学家们主张，我们必须考虑从福特主义(Fordist)社会到基于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原则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社会的广阔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动(Castree and Gregory，2006；Fuchs，2007；Harvey，1989)。此外，由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91：129)领导的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反对束缚现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狭隘性，提倡扭转下列趋势：“将我们从整体论、系统论的现实推开，推向将个人(或者其组织对应物：公司，家庭，政府)作为适当的分析单位。”最后，自治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支持一种将社会整体作为一套局域和全球冲突之间的网络联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不是资本的权力，而是所谓“民众”(the multitude)的斗争(Hardt and Negri，2000，2004)。

这种观察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的广义研究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全面支持。比如，那些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潮流结盟的知识分子就反对社会整体的观念，有时态度还相当激烈。尽管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种种歧异，它们一致同意“社会”一词试图将话语的一致性运用于在本质上对立、支离，因而难以定义的事物。它们普遍倾向于认为没有社会整体，没有个人整体，没有话语整体。根据这种观点，部分地由于新传播与信息技术的威力而引发的20世纪生活的内向爆裂已经粉碎了各种整体，成功地带走了曾经在本质上提供某种统一性的时间和空间的度量单位(Lyotard，1984)。给我们留下的任务就是理解局域、碎片和部分，它们曾经被视为组成一个更广阔全体的各种要素，但事实上不过是互不关联或者联系松散的断片。通过除去社会统一体的意识形态胶水，人们可以理解这些断片的真正价值，并且最终庆祝它们抵制所有整体论的工

具，包括资本主义、政府和所有元叙述的制造者。

第九章探讨了这种观点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现在只需要集中关注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特定回应——承认后现代观点的重要性，但保留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就够了。本节开头介绍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和《大纲》（*Grundrisse*）中尤其明显①]著作中对社会整体的理解，这与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等古典结构主义者或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一类的哲学结构主义者针锋相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存在本质差异，可是都同意必需反对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的观点，即一切事物都可以简化为社会全体，都可以分解为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他们的历史性和承认社会生活的偶然性将这样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排除在外。可是利用社会整体并不一定非要本质主义或者简化论的思想。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及其20世纪的阐释者诸如葛兰西和卢卡奇（Lukács，1885－1971）所提醒我们的，辩证思想引导我们承认现实既由部分、也由整体构成，在构成社会生活的整合和矛盾的具体整体中组织起来。

这种观点的主要倡议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9）承认，一种分散、机动、灵活、重组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正在增长。这些发展可能表明变化的身份认同和局域的抵制。可是它们也可能标志着一种组织更加紧密的资本主义，它利用自己对技术和特长的控制，在容忍、抵制、吸收、商业化或者忽视这些抵制方面具有灵活性。因此，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从松到紧、各不相同，而全体本身可能就包含了众多裂缝、喷发和变形。尽管如此，根据这种观点，任何仅仅关涉部分或者全体而不及其余的讨论都是省略性的。这种理论既反对系统理论的理想主义，又反对传统科学提倡对社会领域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直接感官观察的实证主义。它反对试图将优先权毫无争议地赋予全球或者局域，认为这样做都

① 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译者

是本质主义。研究确定抵制和控制、弱势和强势等的性质和程度。艾哈迈德(Ahmad，1992：121)为在文学批评领域使用整体的概念辩护，但还是警告必需“具体说明和历史化构成任何特定学科领域的决定因素”。尽管如此，“如果具备充分的学科知识，具体说明主要的意识形态构成和叙事形式通常是可能的。”[①]政治经济学以其对于视条件而定的、非本质主义的社会整体的开放态度，为这种研究奠定了基础。

*道德哲学*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三个特征。道德哲学家引证社会价值和适当社会实践的概念。这种特定分析形式的目标在于说明和彰显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道德立场，特别是因为道德观点经常带着这些理论的面具。

当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1954－　)，一位前共产主义世界经济重建的主要设计师，被问及他在学科领域内的工作，他一开始就称之为“我们时代最大的道德挑战”(Rusk，1991：B8)。当他的同事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写了一本书(1988)攻击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内的过度行为时，他以《圣经》似的引文引介了每一章。在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纵览中，戈尔丁和默多克(Golding and Murdock，1991：18－19)主张，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色在于，“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它超越了功效的技术问题，与公正、平等和公众福利的基本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内部形形色色的理论当中，这些是几个例子，说明人们对已经成为惯例的将科学从道德中抽离出来感到某种不安。他们对道德哲学的兴趣反映了好几个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物的一种基本关注。

亚当·斯密不是一位经济学教授，而是道德哲学教授，他提供了一个如何提高社会福利的视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像他后来在《国富论》里所主张的通过自私行为或者自我利益，而是通过在社会上行善：

---

① 艾哈迈德(1992：121)为他所谓的“整体性”所作的辩护出自一段更长的论证，抨击那些基于分析“在宗主国的语言里可以读到的少数文本”，论述“第三世界文学”独特倾向(比如国家主义)的理论家对该词的误用。

> 因此，正是为他人着想多、为自己着想少，正是抑制我们的利己思想、放任我们的仁爱感情，构成了人性的完善；光是这些就能在人类中引起情感和激情的协调，构成人类的全部美德与礼仪。(Smith，1937，Pt.1，Sec.1，Chap. 5：71)

同样，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一位传教士的儿子，警告人们不控制人口总数的道德后果。卡尔·马克思提供的政治经济学会创造出一种基于满足人类需求、而不是基于阶级权力的社会。不管人们如何回应他们的特定视界和价值观念，很难否认视界和价值观念是其分析的核心部分，道德领域对其著作不可或缺。正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声称的，接过“这一伦理学的分支”、将其转化为“力求成为科学”的学科，还得有待后来的分析者(Robinson，1962)。

这种道德哲学的辩解有两个要点。其一，道德、文化或者精神领域本身就是分析的主要对象。亚当·斯密选择在分析市场的劳动分工以前写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因为这对了解18世纪后半期英国处于上升期的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至关重要。他感到这部著作比《国富论》好，在晚年又重新回到这部著作，因为据勒克斯(Lux，1990：98)所说：“不加节制的商业动机有严重的问题，他在先前对此认识不足。”同样，马克思一开始写的是道德哲学论文，人们太容易将这些当作“年轻马克思”的作品而草草搁置，可是正是它们形成了理解一个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核心。

这些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道德空想家。他们感到自己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一大基本责任就是识别出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的各种视界。对于他们来说，道德视界成为将理性(reason)与合理性(rationality)区别开来的特征[①]。要理解这一点可能比较难，因为西方文化倾向于将科学与道德分

① 在哲学上，rationality本来指对reason的运用。可是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里，rationality具有行为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倾向性含义。——译者

离。一种声音讲的是合理性、逻辑和实证主义的语言，而另一种讲的是规范的语言，一般来说，它被允许反驳另一种声音，而不是与之交谈。通常，人们被允许最多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46)那样觉得以道德关注为动机是可以接受的，可是科学规范在分析当中没有为道德留下任何位置。对这种观点的辩护理由是，道德关注妨碍了对于科学成就至关重要的客观性，最终阻挡了科学发展出手段，以解决伦理学家们提出的问题。道德哲学的辩护者们对此的回应是指出不能自我反省的科学助长的许多问题，从气候变化到世界贫困。

从政治经济学转换到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接受韦伯有关价值中立定义了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关系界限的观点。经济学可以研究价值，尽管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识别出由市场选择优先选出的价值。道德评论会在经济学家的解释或者评价中占据很少的明确地位，或者干脆就没有地位。有人会争辩说，将道德哲学从经济学中抽离出来仅仅意味着这种形式潜入地下，结果是令它自己悄然进入了经济学家的假定和对观点、概念和变量的选择。比如说，决定将人类劳动定义为仅仅是与土地和资本一样的一种生产要素可能在分析上很有意义，可是它也反映了某种道德视界，尽管是隐含的，即人和物是可以置换的，或者生命和资本是可以置换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样一种理论局限于经济领域，反映了经济实践。批评者回应道，视界溢出，流入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导致原来为了经济学家研究的目的被视为工具的工人，现在被更加广泛地视为工具，并且受到相应的对待。[①]通过将把人类劳动简化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特定经济实践自然化，经济学让一种道德视界从后门溜走。

事实和价值、分析和规定、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二元分立的争论在继续，可是有迹象表明变化将要发生。本节开头已经提到过，今天占主导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不那么反对在他们的经济学话语中使用道德语

① 拉宾纳齐(Rabinach，1990)认为，将人与机器等同——生产主义的精神特质——是现代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之一。

言；尽管“道德挑战”更有可能出现在演讲词里，而不是期刊文章上。他们也更有可能使用特定的道德哲学著作，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它将道德思想和福利经济学联系在一起(Castagnera，2002)。对一个根植于商业价值的体制的道德后果，在主流经济学的内部阵营肯定有不安情绪(Foley，2006：219－220)。

尽管如此，主要是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另类学派延续道德关怀的传统。公共选择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一翼寻求把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延伸到道德选择，企图运用经济学来建立布伦南和布坎南的(1985)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传统深深浸润于有关道德哲学地位的争论。这些争论在近年来采取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特别是阿尔都塞和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08－2009)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人文主义版本提出的挑战。寻求将《资本论》的逻辑运用于思想和行动的普遍形式，阿尔都塞提倡将道德哲学维度从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排除出去。这种攻击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尽管首倡者倾向于延续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事业，利用一种尼采(Nietzsche，1844－1900)哲学的传统来攻击道德哲学价值(Eagleton，2003)。尽管如此，道德维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依然强大，因为它不顾占据支配地位的私利，为民主、平等和公共领域提供了强大辩护。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有来自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方面的攻击，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道德哲学的重要性上保持了强硬立场(Artz，Macek，and Cloud，2006；Golding and Murdock，2005)。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四个特点是实践。该理念深深植根于哲学史，已经发现了好几条传播研究的途径，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思想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在社会学中得到最佳体现的“行动-研究”(action-research)传统。最广义地说，实践指的是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通过自由和创造的活动生产和改变世界，包括改变自身。该词起源于古希腊，通常指自由人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也是神话里一位不太知名的女神的名字)。它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著作里占据一定

的突出位置。亚里士多德将经济、政治和伦理研究视为各种形式的实践知识，以便与理论和生产（poiesis）区别开来。理论寻求真理，生产寻求制造某种事物，而实践的目标是行动。该术语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哲学有关知识划分的争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实践在哲学家康德（Kant，1724－1804）、黑格尔（Hegel，1770－1831）和马克思的著作里占据了核心位置。对于康德来说，实践或者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在由完备理性构成的理论的统一体里占据了首要位置。确实，道德被定义为“绝对实践的”。黑尔格也承认实践超越理论，但是瞩目于一种更高的统一体，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由——在此绝对精神在哲学、艺术和宗教里实现自我——中发现真理。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一部论希腊哲学的博士论文也关注实践，坚决主张应该让哲学变成实践的。他对该术语的主要兴趣在于创造一个异化劳动（alienated labour）的替代选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将劳动从必然性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结果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将劳动力简化为可销售的商品。革命的目标是将异化劳动转变为实践或者自由、普遍的自我行为。

葛兰西和卢卡奇利用实践攻击包含在《资本论》和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重读里的、更加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形式。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尤其是马尔库塞（Marcuse，1898－1979）和哈贝马斯（Habermas，1929－　）的著作——他们将其定义为一种普遍的行动形式，劳动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从而增加了实践的重要性——该术语进入了传播理论的争论。传统上，劳动在经济思想中占据核心位置，因为过去人类历史被迫栖息在要求人类劳动的必然王国里。当生产力发展了，提供了第一个克服必然性的历史机会，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转向了其他形式的实践，以预见构成自由王国的要素。在他对马克思的批判里，哈贝马斯（Habermas，1973）主张区分工作（work），或者有目的的理性行动，与互动（interaction），或者传播行动。可以理解，马克思受前者吸引，因为劳动对资本主义带来的转变非常重要。可是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实践

既是由工作、又是由传播行动组成。后者，基于双方同意的规范和构成性的象征，在能够摆脱限制民主和开放传播的种种歪曲的条件下，提供了另外一种社会生活模式。

实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和实质前提都很重要。简言之，实践指导着一种知识理论，将认知视为正在进行中的理论和实践产品。它反对那些断定真理只可能由沉思产生的认识论，认为它们以偏概全。知识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磨砺和提炼概念思想的过程。它更多地源于概念和实行的相互构成。[①]实践也在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毕竟，政治经济学一开始是作为古希腊城邦的家政管理和控制的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将其放置在实践学科当中，其智慧会指导统治者的行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在渴望理解财富和生产能力的源泉与需要就适当的劳动、贸易和社会福利政策向高层提出建议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传统教育的人明确合并了政治经济学家和行动主义分子的角色，一个例证就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概念。由于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葛兰西身陷囹圄，他在监狱中所写的著作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典范，无论他们接受的是理论的分析工具教育，还是实际的政治斗争和抵抗的常识教育。

在知识领域一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紧张局势在继续。在此，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努力推进以数理的严密来净化经济学，并将其建议出售给企业和政府。这并不是说，由实践提出来的问题与包罗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完全相同。更加重要的是，不管人们多么努力地尝试，也不可能逃避实践为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学者提出的问题。特别是，

---

①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概念与实行的二元分立视为异化过程的一个主要阶段。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开创性的研究运用了这种二元分立。在皮尔士(Peirce，1839－1914)、詹姆斯(James，1842－1910)和杜威(Dewey，1859－1952)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里，它尤其在实质上——如果不是在名义上——占据显著地位。在其传播研究史里，哈特(Hardt，1992)建议，实践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政治经济学与政策研究紧密纠结、不可分割，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既探讨这种关系的优势，也探讨其隐患。

结论

本章通过将政治经济学描述为一种包涵广泛、变化多端的社会分析理论，为详细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设定了舞台。首先通过一系列定义，本章表明了政治经济学如何从家政和社区管理的实践问题中发展出来。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以一种争论为显著特征，一方认为本学科应该包涵全部范围的社会活动；另一方接受一种更加狭义的、科学的控制范围，即使将研究局限于运用数学话语、以可被证伪的命题方式表述的经济现象也在所不惜。本章着重论述了在传播研究中被用到的两种定义。一种集中关注支配资源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另一种关注控制与存在的广泛问题。

在介绍和评价定义以后，本章开始论述交互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这些包括社会交换和历史、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政治经济学发源于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此时它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些概念。它们的意义随着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秩序的检验和反正统的知识界潮流的挑战而不断变更。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与古典范式

政治经济思想史倾向于以两个时代为起点：或者是古希腊时期，政治经济学一词的词源学起源正是由此发端；或者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哲学家们，以亚当·斯密为顶峰。[①]不管选择以哪个时代为起点，凡是回顾主要历史，都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历史都建立在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基础上，它将本学科牢牢植根于西方白人男性知识分子活动的特有模式。引用一个著名的遗漏例子：各种历史都忽略不计阿拉伯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正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科学，尤其是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的著作，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就预先提出了我们西方所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②]本纵览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在短短的篇幅之内，既要介绍作为经济学传授给大多数人的经典理论，又要介绍旨在修正和改革它们的另类观点，必须平衡两者。[③]有了这样的目标，本章的基本任务就是概要综述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分析特有的传统，为下一章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好准备。

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启蒙运动的两大支柱为根基：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的理性视界和培根（Bacon，1561－1626）的经验主义理论。总之，它寻求通过将物理学原则应用于18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拓展17世纪物理科学领域的革命。如贝尔（Bell and Kristol，1981）所提醒我们的，从研究具体对象转变到专注于诸如质量、加速度和速度之类的抽象

属性对科学计划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亚当·斯密及其英国同侪大卫·李嘉图、罗伯特·马尔萨斯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就意味着确定经济恒量，它们构成了一个正在经历巨大转变的世界里稳定、基本的现实。这些当中最重要的理论可能就是将价值的概念与生产劳动挂钩，这与当时盛行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的论敌、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为当时盛行的观点辩护，坚决主张经济财富仅仅根植于土地中。

专注于价值、价格和成本之类的变量导致以数学形式描述其相互关系的抽象法则。此外，通过将价值的特定概念从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s)所看重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还有重农主义者所重视的土地这些狭义的背景中抽取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为将他们的“法则”广泛应用于所有形式的产业和贸易开启了方便之门。古典理论并非经济学最早的学派，可是它可以说是最早的这样一个体系，即一整套人们相信适用于所有经济活动的抽象变量。④

据罗尔(Roll，1942)所说，古典理论直接根植于三大传统。从洛克

---

① 即使是那些以现代为起点的学者，彼此也存在不同意见。大多数当代课本以斯密的著作开头。可是，有些课本以诸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一类更早的人物开头。配第1690年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一书讨论了生产时钟的劳动分工，暗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

② 我想感谢传播学者 Hamid Mowlana 提醒我这种遗漏。我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 Ibrahim Oweiss 和我的思想史教授 Hisham Sharabi 努力拓宽乔治敦大学的优势传统。见 Gran(1990)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和伊斯兰思想之间关系的讨论。

③ 当《新帕尔格雷夫》(*The New Palgrave*)的编辑们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24－　)的痛批——其书评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他们很知道这种平衡行为有多么困难。索洛反对在他眼里该书对批评理论的过度嗜好。他采用了一种宿命论态度，作出结论说经济学将永远“遭意识形态污染”。引用马克思主义(“最执著的”)但不包括奥地利派、后凯恩斯主义和新理查德主义，索洛攻击《新帕尔格雷夫》，因为它没有能够“令各种‘理论’保持适当比例”。编辑们以一个计数回应，即大约15%的词条处于“当今专业领域的一致意见”以外(Amsden，1992：795－797)。显然，这种过度的离经叛道令索洛难以忍受。

④ 对斯密和其他人来说，抽象的方法是一般性的，不仅仅局限于分析经济活动。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位论述斯密评价宗教市场的评论家称他为“第一个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Anderson，1988)。

(Locke，1632－1704)的政治哲学视界里，它吸取了私利(self-interest)、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和劳动价值理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等观念。重商主义者的思想贡献了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概念，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会在劳动价值理论中修正它。最后，尽管这也意味着否定土地为价值本源的观点，古典理论还是支持法国重农主义者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概念，与重商主义者支持援助经济的政府干预的观点相左。

继承启蒙运动的传统，古典理论家们主张个人能够运用理性最大化私利，并由此最大化社会利益。后者被简化为既没有独特存在也没有目的论的个人的聚合体。社会事业机构是人类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可是应该以怀疑的眼光加以警戒，因为它们倾向于限制个人选择和社会交往的自由，包括观念、商业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只有个人自由才能最大化效率，由此最大化国家财富。政府机构特别值得警戒，因为主权国家的传统赋予国家保卫领土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很容易被用来创造特权，包括会抑制产业和贸易的政府企业。

古典理论内部形形色色的变体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提供了大量可支持、可辩驳的话题。最有权威的观点就是亚当·斯密对私利超越善行的响亮辩护：

> 我们所期待的饭食，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或者面包师的善行，而是来自他们对本身利益的关注。(1937，第1卷，第2章：14)①

这种理论走向极端，会驱使托马斯·马尔萨斯赞成让阴沟污水在城

① 斯密关于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引文被反复引用。另外一段也是出自《国富论》的引文表明，他对私利压倒一切并不感到完全自在："看来，专门利己、毫不利人在全世界的每一个时期都是人类主宰的卑劣准则。"(第3卷，第4章，第10段)

市街道自由横流的做法，以此手段消灭弱者，确保人口控制和最适者生存。根据这种观点，政府不应该采取措施控制疫病的蔓延，因为这样的举措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只会带来更多的贫困。为什么？因为不加限制地将人口和资源转向最弱者只会削弱社会的长远实力。[①]但是，尽管对政府管制抱有种种戒心，即使是亚当·斯密也否定了应该将国家的作用仅限制于国防一途的观点。承认劳动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个赞成在别针制作过程中实行分工的人也承认“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仅仅从事几项简单操作……通常会变成一个极端愚昧无知的人，除非政府设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1937：734－735）。此外，在《道德情操论》（写于1759年，比《国富论》早问世17年）一书里，亚当·斯密攻击霍布斯（Hobbes，1588－1679）的自我利益观，提倡对他人行善（Smith，1976：71）。本书无意辨明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真正代表亚当·斯密，而意在建议亚当·斯密被批评家们过度简化，特别是那些认为他捍卫自由化市场的批评家。

大卫·李嘉图（1819）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48）的著作进一步偏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赧颜地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学根据地的形象。他们对自由市场分配后果的注意引发了不平等和剥削的幽灵。李嘉图将最强烈的批评瞄准靠拥有土地牟利，认为这是利用控制关键资源来抬高租金，既损害工人也损害资本家。密尔本质上是个实用主义者，虽然跟社会主义也打过一点擦边球，但还是退步抽身，转而提倡推广教育以控制人口，由此减少贫困。只有空想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s）、当然还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才会将系统地反对不受限制的市场摆上知识界的日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重要，有好几重原因。尽管彼此观念歧

① 马尔萨斯对政府干预的坚定抨击并没有延伸到《谷物法》（Corn Laws），该法允许政府通过高关税保护英国地主。马尔萨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更类似“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不是数学，在这个案例里根本就不适用”（Lux，1990：41），由此支持了谷物法。

异，他们都同意价值由生产劳动决定，从而成功地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当时的主流观点转移开，即将经济价值等同于黄金、其他贵金属和土地。他们懂得市场分工创造财富的威力。他们还意识到，这种实践的扩展正在转变世界。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对自己刚刚开始经历的变革的总体利益抱有深刻的怀疑。

古典理论受到了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有力批评。在转向这些为另类观点奠基的批评之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古典理论何以在某种本质意义上难以自圆其说。尽管注重自由和个体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国家主义的目标视为当然。例如，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旨在解释和推进国家的财富，而他指的基本上就是英国的财富。贸易会提高一个或更多国家的生产率。正如琼·罗宾逊《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所言，尽管他们的理论“声称自身基于普遍善行，可是不用说，它们动辄从国家收入的角度谈论问题……只要操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就差不多足够了”(1962：125)。国家主义霸权如此强大，以至于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成功地使更早期学派确立的许多观点——比方说土地是财富之源——去除了神秘，它还是完全忽略了国家福利和普遍福利之间的冲突。

第二节　激进派的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对古典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从以其名义实施的政策对人类造成的破坏，到其声称的信奉启蒙运动合理性的理论缺陷。他们的激进反应受到工人及其他社会运动的支持和鼓舞。通过吸纳应工业革命而爆发的民主力量，这些运动扩展了知识界的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参与了诸如英国平均主义者(Levellers)和法国大革命激进派之类争取民主、反对政府的社会运动，由此建立起自己的论点。戈德温(Godwin)和佩恩(Paine)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英国

殖民主义的抨击协助激发了美国革命）记录了随着政府取消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防止穷人饿死的保护措施，剥削日益增长。此外，他们攻击古典理论没有能够运用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反对新经济学的基石：私有财产。如果一种学说体系维护将人民大众从他们自身血汗劳动的成果里排除出去的做法，还有哪种体系[或者用卡莱尔(Carlyle，1795－1881)的术语“沉闷科学”(dismal science)]会比这种体系更加不合理呢？这种强烈的道德呼吁和政治承诺驳斥了古典理论的回击：由于人口增长、土地缩减，饥饿和贫困不可避免。后来的几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欧文(Owen，1771－1858)、傅立叶(Fourier，1772－1837)和圣西门(St. Simon，1760－1825)都力图通过明确提倡有规划的、地方自治的社会来修正他们所谓的市场无政府状态。

马克思理论就建立在这种批判之上，一方面接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将争论的要点转向平等和社群，另一方面又反对为了捍卫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观，以道德义愤代替持续的唯物主义分析，不管这种义愤何等有道理。他的分析能力本身吸引了众多批评家，但也赢得了他们勉强的和甚至不那么勉强的尊敬。[①]本纵览不可能也不打算充分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其巨大遗产的众多阐释。本纵览旨在描述从批判古典学派衍生出来的一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脉络。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在古典理论的诸多贡献之上。他接受了将劳动力作为价值主要来源的理论核心，但同时也系统改造了该理论，考虑了劳动力的使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由此可以发展一种剥削理论。这

① 在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马克思的反对者当中比较有才气的一位，对此有相当精到的论述。在一个庆祝“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终结”的时代，这些话格外意味深长：

> 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在一段时间以后会永远湮灭，这段时间短则餐后一小时，长则一代人。有些却不会。它们经历低潮，但又重新崛起，并不是作为已经面目全非的文化遗产成分，而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带着个人的伤疤，人们看得见、摸得着——这些我们称之为伟大的创造或幻想——将伟大与活力联系起来并非这种定义的短处。在这个意义上，这番话无疑正适用于马克思的要旨。(1942：3)

种理论识别出劳动力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异或者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由于增加工作时间[绝对剥削(absolute exploitation)]或者在工作时间增加工作过程强度[相对剥削(relative exploitation)],结果导致剩余价值增值为资本。

马克思的反应来自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将这种理论——尤其是它的劳动力观——历史化的全面努力。古典学派对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很感兴趣,可是在审视资本主义本身的时候,除了关于资本主义是否蕴含固有的、天生的贫困化倾向这一问题的特定争论,倾向于限制运用其历史想象。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具备空前活力的体制,通过新技术和组织劳动过程的新形式,不断革新自身的生产过程。尽管资本主义不断面临冲突和斗争的大漩涡,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实践和形式,最终,没有任何习俗、仪式或者价值可以阻碍市场的发展、商品(包括劳动力)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增长。资本家不断革命的倾向,即熊彼特(Schumpeter, 1942)后来恰当地称之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只能被资本主义本身能够释放的各种力量毁灭。这些力量包括劳动阶级,被定义为那些被迫出卖劳动力并放弃控制生产资料的人。

古典理论识别出驱动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可是倾向于将其视为天经地义。[①]马克思寻求把资本主义放置在历史的辩证发展当中,但是采用唯物主义的视界,从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既定倾向中挣脱出来。这些倾向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著作当中,最看重观念、信仰和政府或者

① 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强调了这一点。在《资本论》里,他如此批评其理论体系:

> 这些提法带有属于某种社会形态的明确印记——在此社会形态中,生产过程控制人,而不是反之——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些提法是一种不证自明、由自然施加的必然,正如生产劳动本身一样。(1976a: 175)

国家的历史。[①]实际上，除了大量继承黑格尔的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和实践哲学的目标（旨在融合理论与实践），马克思还接受了革新其理论的挑战。要实现这一目标，他的做法是展示即便处于不是自己创造的外部条件之下，人们如何创造历史和他们自身。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首先意味着人们如何通过劳动创造自身。

除了这种激进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发展出一种同样激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观。资本主义是一种物质体系，并非因为它看上去是一种物（机器、工厂、产品等）的体系，而是因为它包含了一整套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关系*。自然主义的外表掩盖了大抵上按照社会阶级重组社会生活的实质。此外，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物质体系，并不是因为它从事商品生产——这一点很重要，可仍然只是商品的本质。即便如此，马克思还是大量阐释这种本质。试想，《资本论》（*Capital*，1976a）——可以说是他最成熟的著作——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是“商品”。可是正如前一句所表明的，尽管商品无处不在，却仍然只是一种表象的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以商品巨额积聚的方式出现”（1976a：125）。剥去层层表象，我们就会发现一整套社会关系，尤其是“全部商品只不过是一定数量的凝结劳动时间（congealed labour-time）”（1976a：130）。

广言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体现为大量生产者，他们不拥有生产工具，而是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一个业主阶级，这些业主通过不同的公司组织起来，在各种商品、劳动、原材料和资本的市场上展开竞争。竞争驱动这些不同的公司为了增加资本积累，通过剥削劳动力最大

---

① 马克思对“纯正社会主义者”（True Socialists）的批评很辛辣，认为他们拒绝正视冲突和变革的物质主义根源：

> 很难理解，如果这些纯正社会主义者与哲学家一起相信所有*真正的*断裂都是由*概念的断裂*造成，他们为什么还要提到社会。基于对概念创造或者毁灭世界的力量的哲学信仰，他们同样可以设想，通过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取消”概念，某些个人就“取消了生活的断裂”。（1976b：467）

化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文献充满了对劳资关系准确定义和后果的讨论。尽管如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于主张，建立在资本/工资-劳动力关系之上的体系导致劳动日益机械化、资本集中化和集权化，还有周期性危机——其中过度生产的倾向很可能最明显(Mandel，in Marx，1976a：82)。这一观点无疑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著作衍生而来，特别是李嘉图及其中间偏左的追随者。可是，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人敢如此透彻地分析资本主义，那些表面特征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自然的、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世界，马克思却寻求剥除那些表面特征的威力，揭露出一整套具有社会活力、但本质上自相矛盾、因而不稳定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阶级关系。

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众多批判当中，有一点对于传播研究格外重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走得还不够远。这并不是指广为传播但基本错误的观点——马克思错过了今日管理资本主义和服务经济的兴起。对威廉斯(Williams，1977)、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1)和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81)等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来说，与本质主义的狭隘劳动观所造成的后果相比，这些根本就无足轻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非常重视劳动的概念。在其早期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该书是早期马克思与《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之间的过渡)里，马克思将劳动想象为一种广义的范畴，包括人类构造自身和历史的社会活动。可是，即使在此处，重点也是在于劳动的工具性和生产性，而不是在于它的表现性和构造性。《资本论》将劳动看得更加具有生产性。根据马克思的辩护者，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将劳动简化为工具性-生产性的工资关系，将人简化为生产对象或者仅仅是生产要素。可是，将劳动视为根本的物质活动、但又将其缩小为工资体系的理论的一个后果，就是劳动者的其他物质实践被最小化。对于那些与传播息息相关的物质实践，诸如文化、语言和社会再生产，尤其如此。那些实践被当作非物质的，依赖于由劳动定义的物质基础，并在走极端的理论里成为物质基础的上层

建筑反映。根据哈拉维(Haraway，1991：132)的观点，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劳动包括人类本身的生产，他们最为重视的还是存在手段的生产，由此对于自然性别/社会性别(sex/gender)的劳动分工以及其他一些理论，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传播政治经济学基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批判对抗，一大主要任务就是展示传播与文化如何构成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互为本质、传播与信息如何构成同一社会活动——意义的社会建构——的辩证实例。将这些任务放置在理解权力(power)与抵制(resistance)的更大理论框架内，会将传播直接纳入生生不息、仍然与当前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Potts，2005；Saad-Filho，2002)。

第三节　保守派的批判

回应18世纪后半期震荡欧洲的社会和知识界转型，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955：86)声称："骑士时代结束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谋略家的时代已经到来，欧洲的光荣永远暗淡下去。"对于伯克来说，法国大革命不但作为政治方案失败了，也是知识界的一场灾难。对于他和托马斯·卡莱尔等其他保守主义者而言，法国大革命证明了一种启蒙主义观点的彻底失败，即宇宙是一个宏大的理性机器，就像时钟一样，可以被认识、修理和改善。毕竟，这场革命以理性、民主和自由的名义进行，而它带来的却只是恐怖、大屠杀和独裁主义。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并不是一种机械结构，可以拆开以后再重新拼接起来，而是一种脆弱的有机组织，由传统和智慧连接在一起(Gray，2007)。

这种本质上反现代主义的观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支持者能够改善物质或者理智生活不抱希望。事实上，卡莱尔是将政治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的始作俑者，还说政治经济学比"猪的哲学"好不了多少。如果伽利略和牛顿的大时钟对社会起不了作用(实际上，它只是增加了狂妄

自大，由此激发了许多失败的革命），那么它对由它激发的经济模式也起不了作用。保守主义者特别反对这种假说：经济增长源于个人出于自我利益而理性地寻求最大化自身财富。亚当·斯密笔下的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自我利益也可能会驱使他们互相毁灭。财富的增长毋宁说起源于一种有机秩序，这种秩序令人们尊敬传统，传统令人们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社会角色以及驱使他们行使该角色的道德基础。与此不同的观点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尽管法国大革命刚好证实了这种奏效究竟多么短命），可是长远来说，理性的自我利益是社会统一体一种脆弱的根基。

一种极端的保守主义观点赞成所有对等级制度和差别的维护，不管是基于社会性别、种族还是阶级。自然的秩序会由富有的白人男性领导。在他们的阵营里，没有密尔、马克思或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他们捍卫必须以平等作为有序社群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比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加支持劳动者。例如，卡莱尔（1984）建议赋予劳动者更多权力，以便在工作场所创造更多的集体感与和谐感。他还支持政府干预，以规范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并对那些被摈弃于体系之外的人提供社会援助。在他们的阵营里没有马尔萨斯，他支持放任污水横流，以此手段控制人口。可是，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受到欢迎。不管在承认劳动者和穷人的需求方面，两者在表面上如何契合，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模式在根本上互相抵触。保守主义者拒不接受改善社会变化最恶劣后果的社会干预。他们反对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坚决贯彻的启蒙主义观点，即个人可以干预社会生活，以根本改变其各种安排，创造一个更加理性的世界。他们尤其反对赋予大众权力，以实现这种社会改造。

第四节　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之间并没有一个突然断裂，所以很难准

确界定两者之间的时间分界。然而，大约在19世纪后半期，好几种新发展开始汇合成一种系统表达，最终体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种转变的关键来源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愿意接受边沁(Bentham，1748－1832)对古典主义为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辩护的功利主义攻击。边沁(1907)认为，快乐和痛苦——而不是某些宗教或者自然法规——是伦理道德行为的惟一决定因素。对他而言，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开发一种幸福计算法(Felicific Calculus)，基于最大化快乐超过痛苦，准确衡量社会福利；之二是推荐必要的社会变革，以实现这一目标。在其1870年出版的会重新命名这一学科的著作里，杰文斯显然吸取了边沁的观点，将经济学定义为对“效用和私利机理”的研究。

> 为了满足我们以最小努力实现最大目标的需求，即最小程度地牺牲不想要的东西，以此为代价最大程度地获取想要的东西——换句话说，最大化快乐就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1965：101)①

不像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不关心如何测定人们的需求(needs)和权利，不管它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相反，由偏爱(preferences)表现出来的欲求(wants)——即在资本、劳动力、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上可确定、可衡量的选择才是本学科的实质。并且，经济学并不那么关注一样商品的绝对效用，它更感兴趣的是最后可以买到的一样商品的效用，或者它的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1871年，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

① 尽管边沁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其著作深深植根于可以说立场更强硬的前辈著作。试想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关于在图书馆里披沙拣金的话语：

> 如果我们手里拿着任何一卷书，比如说神学或者大学玄学方面的，让我们问一下：这本书是否包含任何有关数量或者数字的抽象论证？没有。它是否包含任何有关事实或者实体的实验论证？也没有。那么将它付之一炬，因为此书除了诡辩和幻想以外，不可能包含任何其他东西。(Ward，Trent，et al.，1907)

(Menger，1840－1921)，还有稍后一点，美国的克拉克(Clark，1847－1938)，重申了这种观点：在一切同等的情况下，任何商品或者服务，越容易得到，效用就越低。正是边际单位——最后也是最不被欲求的单位——的效用决定了所有单位的价值。此外，边际的概念可以从对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延伸到其供应。李嘉图证明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压力驱使土地拥有者耕作相对不适合耕作的边际土地，结果提高了生产成本。杰文斯及其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制造业也存在同样趋势：当工厂强迫从机器和劳动力中获取更多的时候，就会引发成本的增加。结果，供应的一方同样面临回报减少的问题，效用将由边际确定。

这一见解将由众多继承者阐释发挥，不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般被认为是构筑新古典主义体系的集大成者。简言之，市场价格(对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而言)由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向下是因为消费在边际不断减少的倾向)和向上倾斜的供应曲线(向上是因为成本在边际不断增加的倾向)的交点确定。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里，马歇尔将该观念发展为一种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20世纪在新古典主义世界中制造出主要分裂之一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称之为“一个十足的哥白尼体系，在其中，经济学宇宙的所有元素通过互相平衡、互相作用而各安其位”(Heilbroner，1986：208)。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初版于1890年，又不断出新版，直到1920年为止。该书由两大概念驱动，正是这两大概念持续表明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其一，尤其是追随瓦尔拉(Léon Walras，1834－1910)的著作，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即描述各种力量的相互均衡。正如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识别出物理世界的本质和谐，经济学家会找到并描述各种经济单元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维系了商品世界的平衡。用瓦尔拉的话来说，运动主要是由摸索(tatonnement)组成，即个人对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作出反应，摸索着前进和后退。其二，正如该书卷首题词所简洁表述的，“自然从不突变”。经济学的宇宙，正如牛顿学说的

宇宙，由细小的、增量的变化构成，因此偏爱将范围更广大的公共机构安排视为天经地义的分析。从这些观点不难得出下列结论，对此杰文斯的论述最为清晰："经济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必须是数理逻辑的科学。"（Galbraith，1987：125）

为了成为一门数理的、简约的科学，经济学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基本特征。在对均衡状态大感兴趣的前提下，经济学就会集中关注共时性分析，而忽略对历史的传统兴趣。断定对体制变化和结构改造的研究无法达到数理的精确性，经济学就会将自身对社会变化的兴趣局限于在普遍的均衡格局内细小的、增量的调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然而，他们显然无法分析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转型阶段，尤其是在这种转型以分崩离析和剧烈变动为特征的时候。

此外，简约要求经济学放弃理解范围更广的社会整体。这种新的经济学科学没有给政治留下任何空间，因为过去没有、将来也很可能永远不会有哪种工具能够以数理的确定性研究政治制度。[①]经济学最好放弃理解那些社会制度、心理力量和文化价值的目标，而政治经济学主张这些对于全面分析不可或缺。即使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的兴趣倾向于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前辈及同侪一样广泛——也提倡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严格限定于"与获得和使用幸福生活必需的物质最紧密关联的那部分个人和社会行动"（Clark，1991：92）。不像其他那些理论家仅仅分析如何分配稀缺物质资源以实现任意目标，马歇尔的兴趣和评论对象是工作场所和社会的权力分配。尽管如此，经济学分析必须能够经受住数学严谨性和科学客观性的考验。这就意味着与社会学、政治科学还有历史划清界限。

这还意味着与道德哲学一刀两断。在一个转型阶段作研究，最优秀

① 杰文斯承认"谈到政治，我承认自己如坠五里雾中"（Heilbroner，1986：184），此语在新古典阵营中颇有代表性。难怪他推荐以经济学的名称代替政治经济学——"我们学科又古老又麻烦的双词名称"（Clark，1991：32）。

的新经济学家们都相当精通他们正在抛弃的理论。例如，马歇尔就研究过伦理学，对康德和黑格尔的道德关怀理论展示出扎实的理解。他真诚关注环境污染，还有市场无法提供诸如教育一类惠及全民的商品。尽管如此，马歇尔和其他新经济学家坚决主张，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由偏爱体现出来的欲求，而不是由一种道德哲学确定的需求。当然他们会承认，欲求常常从一种道德立场中形成，但是这种道德立场与理解欲求的经济学意义毫无关系。所以，尽管人们可能对道德关怀的问题抱有知性的，或者更加宽泛地说，人本主义的兴趣，将这些纳入经济学分析将不会取得多少进展。

最后，层层削皮的过程导致经济学家搁置了对社会实践的兴趣。正如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在大学里日益体制化，受制于支配学术分工的种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结果，大学教师越来越可能与社会运动脱节，与大学以外的广大公众脱节。有些人，比如制度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抵制这种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更加典型的情形是，大学教师在相对舒适的大学生活里安顿下来，远离可能具有破坏性的人物和事件。一言以蔽之，数学和科学方法的正统性也带来了沉重的代价：搁置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整合、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使其不再在研究和学术生涯中发生意义。①

---

① 海尔布龙纳沉思他所谓的“第一等的知识分子悲剧”所导致的后果：

> 因为要是学院派对社会底层予以关注，要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拥有霍布森（Hobson）* 那种令人不安的视界，或者埃奇沃斯（Edgeworth）** 拥有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的社会不公观念，20 世纪的大灾难可能就不会突然爆发在一个对于激烈社会变革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世界上。（Heilbroner，1986：211－212）

* John Hobson，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批判帝国主义，积极投身于英国社会改良运动。——译者

**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英国经济学家，热心于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中。——译者

*** Henry George，1839－1897，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提倡征收地价税，其名作《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讨论了社会不平等、工业经济的循环特征与可能的救治方式。——译者

尽管如此，一定要抗拒评论一门学科的早期历史、就仿佛它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现象的根源这种可理解的倾向。今天的经济学家并非杰文斯、门格尔、克拉克、瓦尔拉和马歇尔的必然结果。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转型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学术冲突。想想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奥地利和剑桥分支之间的种种歧异吧。前者以门格尔和庞巴维克(Böhm-Bawerk，1851－1914)的著作为基石，后者奉冯·米塞斯(von Mises，1881－1973)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的著作为圭臬(Boettke and Storr，2002；Chang，2002)。有感于哈布斯堡帝国长期、缓慢的衰落[①]，又在道德上拒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更切近的威胁，这些经济学家们极力主张纯粹资本主义的美德。他们的著作为新古典主义的方法高声辩护，认为为了实现纯粹的市场经济，付出任何代价都不为过。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提供供给和需求的规范，这对于保证最有效地分配资源(包括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和理性行动所必需的信息)至关重要。市场为本身提供了道德依据。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另一主要分支或者剑桥分支就不那么愿意全盘接受这种个人主义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理论。马歇尔传统的继承人，尤其是庇古(Pigou，1877－1959)、罗宾逊和凯恩斯，尽管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观念，还是很关注各种各样的市场失效和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正是这些为包括政府干预在内的补救机制提供了依据。庇古论外部效应的著作被用来为下列政策辩护：分别对创造出净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的公司征税，对创造出净外部利润(external benefits)的公司提供津贴。发现市场无法保证充分的就业产出，凯恩斯推荐政府的财政干预。

这些在发展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的争论揭示了在当代继续引发重大问题的种种困境(Colander，Holt，and Rosser，2004)。在这种理论内部，以下这些根本问题出现了：我们要继续信任市场，把它当作

① 哈布斯堡皇室：德国皇室的一支，繁荣于13到20世纪的欧洲，包括奥匈帝国皇室(1276－1918)、西班牙皇室(1516－1700)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1438－1806)

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惟一的方式来组织和分配包括传播和媒介在内的资源吗？还是说，政府应该以干预的方式调节甚至经营传播和媒介，由此确保人人都花得起钱接触形形色色的内容和各种各样的媒介？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很难预见到新古典主义模式的成功。实际上，在20世纪早期的数十年里，一直到1930年左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再在大众中流行，因为它看上去太学院、抽象、与历史无关、无法分析大型纵向联合公司的增长，这种增长在几乎所有的主要产业内不断吞没竞争。通过开发新的工具并对来自右派和左派的各种攻击作出新的回应，新古典主义模式实现了自我拯救。统计分析和经济度量模型的增长为该理论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同样重要的——看似强大的工具，以此再现经济状态并模拟种种变化对其主要特征的影响力。[①]另外，张伯伦(Chamberlin，1899－1967)的著作论述了如何思考垄断性竞争，凯恩斯的著作强调了资源固有的不均衡和未充分就业的倾向，导致一些新古典主义者吸取了中间偏左批判的要素。此外，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发展也加固了新古典主义思想的货币主义(monetarist)分支。这些发展帮助奠定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所谓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大致从1947到1973年——的基础。这些年刚好也是战后的大繁荣时期，表明经济增长也给主流经济学打了一剂强心针。

今天，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政治谱系内占据了中心和中心偏右的空间。中心反映了凯恩斯理论的残余，即反对将商业周期当作市场活动的自然产物，而市场活动总是发出正确信号、令人们做出合理抉择的观点。对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而言，这种信号机制的代价，即高失业和深刻的贫富不均，不值得赚取的利润。根据这种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经济政策集中关注储蓄不足、假定后者会被自然而然地导入生产

① 不应低估这些工具的纯粹形式美产生的吸引力。正如传播哲学家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1969：58)曾经提到的：“易受形式影响为赞成与其相一致的事物做好了准备。”

性投资的必然后果。凯恩斯(1964)说明了在经济萧条时期，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发生，而储蓄没有被转化为投资的后果会随着经济发展成倍增加，由此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凯恩斯理论提倡政府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消费，以逆转消费者和商业开销的下降，最终刺激投资。短期看来，这会创造政府帐户的预算赤字，可是一旦扩张开始进行，经济增长和控制政府开销所带来的岁入增加会抵消这些赤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多种形态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学科和经济政策。[①] 20 世纪 50 年代的持续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学家们将凯恩斯理论的财政政策视为资本主义习惯性盛衰循环的解决方式(Heller, 1967)。迄今为止，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1915－2009)编写的权威课本将凯恩斯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的金科玉律。可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全球衰退带来了新的问题——经济“滞胀”(economic “stagflation”)，即增长缓慢与通货膨胀并存，提醒人们经济学为何被称为“沉闷科学”，引发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双重转向。[②]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一类中偏右的经济学家提高了他们对于学科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力(Klein, 2007)。与凯恩斯主义者相反，这些货币主义者认为阐释机制的基石是货币的供应(money supply)，还有以通过削减政府开销和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为中心的政策建议。尽管他们承认，短期来说，收紧的货币政策势必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他们觉得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给全世界金融体系带来更大损害，值得付出这个代价。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政府纷纷采用了货币主义的政策，利用他们对世界银行和国

① 这些不同受到了国内政治考虑的深重影响。美国实施军事凯恩斯主义(Military Keynesianism)，这种政策将公共投资主要导入了国防部门。西欧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有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倾向于围绕文官部门制定财政政策，支持国有公司和国内的社会福利项目，比如国家健康保险。

② 许多凯恩斯主义者为其分析和政策建议辩护，认为政府忽略了他们开出的在经济增长时期削减开支的处方。

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组织的控制，将其强加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其他地区。今天，各种版本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继续争夺新古典主义的主流位置，提出了这个理论范式的现状及其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价值等问题。更加根本的问题来自主流之外的数种思潮，下文就要转而探讨这些。

第五节　政治经济学的变体或者另类经济学

当代经济学提供了这个悖论：新古典主义理论，尽管内部存在种种分歧，看来在行业和公共政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从熟悉的来源对此观点的批评在不断深入，新的声音也加强了这种攻击。下一节探讨这些批评学派，其中的几个帮助奠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下一节介绍有些人声称的经济学的全面危机，以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不同思潮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一讨论为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四章铺好了基石。

新保守主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在政治谱系内占据了中间和偏右的位置，看似没有给保守主义者对主流的批判留下多少空间。尽管如此，人们可以观察到保守主义两大不同学派的重要回应，这两大学派经常互相竞争。一派的特征是，认为主流经济学在把全副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行为方面过度谨慎。顶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新政治经济学”或者“实证政治经济学”等诸多标签，这种理论试图把经济分析的原理延伸到所有形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Basu，2000；Klein，1999；Stigler，2003）。例如，斯蒂格勒（Stigler，1971）和威尔逊（Wilson，1980）认为，我们应该将规制（regulation）视为一种组织的市场，它倾向于被寻租的公仆俘获（capture），他们为了最大化本人的收益，增加规制的数量和范围，尽管他们会限制人们获得有价值

的信息。这一观点奠定了分析政府规制行为的基础。他们认为，政府——而不是公众——是规制的主要受益者。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削减规制，由此消除政府对竞争行为的这种限制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局域和全球贸易协议，这种解决办法被日益广泛地运用于国际经济事务。这种观点在被运用于家庭、社会性别和性行为时，更加带有冒险精神(Posner，1992)。同样的论点被用于解释阻碍收养机构的长期延误和文牍主义，纠正方案也大同小异。据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1939－　)法官所言——他是被当时的里根总统擢升为美国联邦法官的一位经济学家——效用要求通过建立一个他称之为“父母权售卖”(parental-right selling)的市场来分配婴儿。按照这种观点，新经典主义经济学太胆怯了：市场行为和边际效用的基本方案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人类行为。

保守主义批评的另外一翼，在尼斯比特(Nisbet，1986)和克里斯托(Kristol，1983)的著作当中占显著地位的社团主义观点，对这种视界的某些方面提出了争议。尽管其观点根本没有新古典主义学派那般条理分明，他们批评后者忽略了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的一面(Streek and Kenworthy，2005)。在本质上，保守主义者为了保证科学性付出的代价就是释放政治，任其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所俘获。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捕获政治，可是根据这种观点，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它过分信仰个人主义和契约主义。个人主义的反面就是将社会视为一个社群的总体，具有有机的规范秩序，经济行为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个人不是遵循理性期待，而是按照社会习俗行事，包括离经叛道行为的习俗，经常和经济学的逻辑毫无相似之处。这种形式的保守主义思想会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学，需要识别传统的社会实践，确定公民的美德，实施政治干预以支持那种实践的道德价值。这种理论是社团主义的保守主义变体。按照这种理论，适当行为的最佳指南就是由各个社会机构的精英们建立的标准。公共选择理论喜爱“制造市场”(making markets)，政治保守主义者们对此冷漠并往往很抵制，将其视为一种对固有道德秩序的入侵，往

往还很激进(Camerer, et al., 2003)。

这两种保守主义立场相安共处，在于它们能够保持经济和政治世界的分界。在前者的世界里，效用(utility)占支配地位，而后者是习俗(custom)和秩序(order)的根据地。新的实证政治经济学和新的制度经济学(不要和下文将要描述的“旧”制度经济学混淆)的增长表明人们不满这种分界，以及这些立场可能不但与主流经济学频繁冲突，彼此之间同样频繁冲突(Little, 2002; Furubotn and Richter, 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及其追随者旨在建立的新“公民宗教”可能不会宣告一个太平王国的到来。

制度政治经济学

左派的主要既定异端立场吸收了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前者主张经济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市场——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主要动力，由此偏离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组织结构包括制度历史、官僚行为的社会学、技术限制和机会的评估，以及社会习俗、法律和文化对价值的社会建构的影响。通过要求一种显然是历史的、整体的观点，制度学派寻求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了达到简约性、数理的严谨性和科学的合法性而放弃的观点放归原位。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上，制度学派理论通过了解由社会习俗、社会地位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一切行为——包括市场行为——之上的种种约束，取代了新古典主义强调将市场作为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

制度理论的轮廓最初主要由索尔斯坦·凡勃伦、克拉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①], 1891－1972)、约翰·R·康芒斯和卫斯理·米切尔(Wesley Mitchell, 1874－1948)勾勒。每个人——但尤其是凡勃伦——都描述了一个对新古典世界的异议看来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大托拉斯公司和垄断公司看来嘲弄了位于新古典主义宇

① 原文为Charles Ayres，有误，应为Clarence Ayres。——译者

宙核心的竞争市场模式。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934）阐明了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常识令顾客作出选择的观点。相反，顾客的决定基于埋藏于内心深处的非理性，表现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显性消费”的仿效有地位者的做法。凡勃伦既格外怀疑劳动阶级又格外怀疑商业领袖，前者宁可仿效而不是颠覆他们的老板，后者的“功能不是帮助制造商品，而是在产品的常规流动中制造故障，这样价值就会上下波动，他就可能利用这种混乱以渔利”（Heilbroner，1986：236）。追随圣西门以降的一条理论线索，他主张机器和工程师会最终取胜（O'Hara，2002；Lawson，2005）。[①]

康芒斯和他的追随者倾向于不同意这种结论，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技术和制度的关系，将之视为集体行动的依据。但是，他们或多或少都同意下列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经济的核心特征：竞争的崩溃和垄断的增长，需求和价值的社会建构，技术革新转变社会的重大意义。

当代制度理论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肯尼斯·戈登（Kenneth Gordon）和瓦尔特·斯特拉斯曼（Walter Strassman）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当然，加尔布雷斯至今仍然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部分原因是他为广大公众写作，擅长以尖酸刻薄的机智为其散文增添风味，凡勃伦会很欣赏这种风格。[②]加尔布雷斯也使得一种制度理论的欧洲大陆变体——熊彼特的著作为其典范——广受欢迎。[③]通过攻击新古典主义关于在市场注册的需求体现了消费者主权的假说，他的著作延伸了凡勃伦对消费的

---

① 凡勃伦不太相信高等教育理解这种分析或者根据这种分析采取行动的能力。他给自己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2005）一书起的副标题就是“对彻底堕落的研究”（A Study in Total Depravity）。

② 下文是加尔布雷斯评论单一的价格理论在流行经济学教材中的突出地位：“将来，过于关注自古以来所谓的价格理论以至于忽略其他理论的经济学家肯定会缩成一位知名人物，其成就不会超越凯恩斯的牙科医生。”（Galbraith，1987：289）

③ 众多学派都声称受到了熊彼特的影响。他不但留下了浩瀚著作，也留下了足够的含混多义性，对之很难简单归类。制度主义者声称继承了他的下列观点：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笨重官僚机构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分析。《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是最早研究广告企业如何影响需求的社会建构的著作之一。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1985)里，加尔布雷斯恢复了制度理论对技术和体制的传统兴趣，研究了他所谓的公司的技术专家控制体制(technostructure)。这意味着管理机构结合技术和组织的长处，使得公司能够以“杠杆收购法”[①]投资于具有规模和权力的公司，由此控制了形式上的自由市场。这样一种观点植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因为人们担心大型媒介公司有能力借助技术和官僚制国家，把持广播、印刷新闻出版、电信和电影的市场。

其他当代制度学家，诸如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 1910－1993)，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专家控制体制格外强大的表现——军工联合企业的增长——和不同于集中化经济权力的体制。可是，他们都倾向于共享一种特征，正是这种特征将他们和新古典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制度学家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最大化视为不管是好是坏，比利润最大化更强大的驱动力(Hodgson, 2004; Rutherford, 200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有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展开了批评(Millard, 2000)。在充分理解没有哪一种综述可以全面涵盖各种学派的前提下，本节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遗产不同因素启发和影响的主要范例。巴兰、斯威兹、曼德尔(Mandel)和冈德·弗兰克(Gunder Frank, 1929－2005)之类政治经济学家的批评显然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的著作信奉一种主要是决定论的认识论，论述了劳动价值理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斗争、经济权力的集中化、帝国主义和危机。它们攻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除了以增量的方式，没有能够有效地解释社会变革。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在资本主义内部向垄断资本主义——或

① 投资者借巨款收购下一家公司，再以该公司收益还债。——译者

者说少数几个大型公司把持市场和限制竞争的倾向——的演变，代表了经济上的主要变动，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却基本忽视了它们。它们还责备新古典主义者创造了一种狭隘的技术性学科，无法研究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包括国家和社会的阶级斗争。此外，在对一种思想体系——该体系满足于让市场把更多资源分配给广告而不是教育、并且忽视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公司的剥削——所进行的技术和道德分析当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

这些五六十年代不断向前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作出的贡献就很重大。鉴于其实践者不断受到攻击——攻击者认为他们在“冷战”中站错了阵营，试图压制他们发表反对意见——他们的贡献就格外难能可贵。当巴兰1964年去世的时候，他被公认为几乎是美国学术界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①]可是，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带来的社会动荡促进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复兴。巴兰死后仅仅四年，在1968年民主党混乱的代表大会以后，一群美国研究生聚会成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简称URPE）。协会在七十年代持续发展，在保守的八十年代大概保持1 000名会员，成为一名会员（Miller，1992：4）所谓的“学术界最古老、最庞大的左派学科团体”。URPE继续致力于支持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进入新世纪。它不再是提倡异端研究的唯一组织（Markusen，2005）。事实上，“异端经济学学会”（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加入了这种努力，提倡形形色色的另类观点，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理论（Lee，2002）。

在那些不断将《资本论》更深、更广地运用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延续人和那些追求在根本的意义上重新思考《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

① 一位朋友在巴兰逝世的时候写道：“保罗·巴兰的去世几乎完全关闭了一个自称开放的社会的大门，显然，这个社会的制度完全无法容忍在学术界或者别处有任何其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Miller，1992：4）

义全部著作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在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期刊及其丛书系列倾向于反映前者。比如，尽管也分析性别歧视和环境危机，它还是倾向于集中关注阶级分析，包括资本的结构和运作、社会阶级划分的本质和后果、劳动的过程、阶级斗争，也探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y），包括在依附世界中的资本、军国主义、阶级压迫和斗争的全球化。

沟通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是世界体系理论的著作。它综合了以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为先驱的法国历史编纂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的唯物主义历史分析和美国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的全球社会学（1979，1991，2004）。批评家和支持者都承认唯物主义历史和社会整体的全面观在这种理论里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些观点紧密交织：历史忙于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组成这种世界经济的是一个国际阶级体系，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等级制度，一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一个世界市场（Chase-Dunn，1989）。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包括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专用和工资体系。他们早期由于忽视阶级分析受到批评，后来就开始吸收和分析阶级矛盾的场所，包括工厂、政府和中心-边缘关系（Sanderson，2005；Wallerstein，2004）。近来的著作表明他们越来越有兴趣将文化、传播和信息技术纳入对世界权力体系的思考当中。（Gunaratne，2005；Wallerstein，2001）。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也涉及公司体制和劳动过程的意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公司的集中化视为可以通过探讨解决的异常现象。制度学家认为它嵌入资本主义的肌理更深，但是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得以纠正（比如反托拉斯法和独立规制）。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将集中化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后果和危机的征兆。新马克思主义文献对经济集中化的意义没有前者确定，它对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规制方式和自治的争论相

当热烈。

这些争论对全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显著变化——包括生产技术、工业组织和世界市场的变革——作出回应。有一种理论回应了这种观念，皮奥雷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1984)的著作开创了这一方法。它们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从大众生产(福特主义)到定制生产或者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涉及向一种新生产体系的转换，该体系基于生产一系列不断变化、多种多样的产品，按照特殊市场的要求定制，由复杂的("智能的")机器和有适应性、也有技能的劳动力制造。克里斯托夫森和斯托普尔(Christopherson and Storper，1989)采纳了这种观点，认为弹性专业化的过程减小了主要好莱坞电影公司的权力，由此开启了弹性专业化对媒介产业有何影响的争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评这种理论不承认弹性专业化实际上扩大了好莱坞大公司的权力，因为这使得他们既享受弹性生产带来的利益，又能少冒一些风险，因为这些风险被所谓的独立制片公司承担，好莱坞的巨头们实际上控制着这些独立公司(Aksoy and Robins，1992)。根据哈维(Harvey)的论述，弹性专业化最好被视为资本主义增强了弹性积聚财富的能力(1989)。维恩(Wayne，2003)重审现在所谓的"大型综合好莱坞媒介产业"，通过呼吁传播政治经济学承认讨论弹性生产的价值，推进了这种理论。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公司将主要决策集中在金融和投资，而把运作的或者日常的决定交付给子公司或者同盟公司，其内部的弹性生产事实上增强了资本主义的权力，特别是大型企业。

弹性专业化理论的各种变体试图综合其对偶然性的接受，同时维护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在弹性专业化的文献里这种系统性倾向于消失。这些变体当中比较显著的一种是规制理论(Lipietz，1988；Boyer，2000)，研究基于积累制度和规制方式综合的资本主义连续发展时期。积累制度是稳定的，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可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尽管受到全球经济的限制，却也包含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独特特征，取决于其历史和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四大积累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史中被识别出来：广

度积累(extensive accumulation)，泰勒主义(Taylorism)或者没有大众消费的强度积累(intensive accumulation)，福特主义或者包含大众消费的强度积累，和一种正在兴起的、包含定制消费和不稳定就业的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制度。规制方式由制度和规范机构组成，它们保证在个人和群体的层次上顺应统治政权。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从垄断到弹性规制形式的转变，即广泛利用传播和信息技术，通过控制劳动的过程和消费物质及非物质产品的模式，将人们整合入社会。

对规制理论的系统批判更明确地主张转向*后福特主义*时期。这包括受到激进地理学(radical geography)浓厚影响的著作，试图整合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以分析在全球物质、信息和文化流动空间的变革(Castells，2001；Harvey，1989，1999；Thrift and Crang，2007)。批判也涵盖专注于政治科学制度文献的研究，主张从有组织资本主义到*无组织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的转变(Lash and Urry，1987)，这种研究近来被应用于理解全球文化产业(Lash and Lury，2007)。最后，有理论试图通过审视革新和发展的各种长期浪潮来理解资本主义。正是革新和发展让资本主义经历了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衰落的新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革新，传播和信息技术为其最新浪潮提供了动力(Mandel 1995；Freeman，2007)。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延续了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后者常常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批判性对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Cohen，2000；Tarrit，2006)在整合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方面，正契合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它攻击新古典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不平等，还因为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能够削减劳动时间的时候，它还是着了魔似的选择增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核心价值受到了攻击：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体系拒绝提供一种社会安全网络——事实上它提供了这种网络——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能够保证用自由时间来追求它许诺最多的东西：自由。这种理论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持批评态度。

尽管如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支持一个理性社会组织的根本承诺，这样可以允许人们控制自己的命运，最小程度地受到社会的约束。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受到了接受市场的好处、但不接受资本主义的著作的影响。诺伍(Nove，1983)和米勒(Miller，1989)追求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视界，以此作为废除资本和劳动的区别——即面对放弃控制生产资料的工人的业主阶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代之以基于工人享有产权的公司的市场体系。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对于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内部收入和公众(不是政府)产权的公平分配，人们又重新发生了兴趣。(Milonakis，200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非常多样化。可是这种传统大部分都在寻求理解资本主义、商业和统治阶级的权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阶级冲突、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自主活动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相对不那么明显。一种寻求矫正这一点的思潮就是自治学派或者自治的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 Marxism)。以意大利社会理论的悠久传统为基础，哈特(Hardt，1960－　)和内格里(Negri，1933－　)2000年的著作《帝国》(*Empire*)和2004年的《民众》(*Multitude*)令这种自治主义观点广为流传(也可参见Dyer-Witheford，1999；Lazzarato，1997；Terranova，2004)；它业已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批评性反思的对象(Sayers，2007)。最重要的北美自治主义者之一哈利·克利弗(Harry Cleaver，1944－　)通过探讨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与劳动和性别的关系而成名。在1993年一次和意大利杂志《面对面》的采访中，他讨论了这些主题。对克利弗而言(“访问克利弗”，1993)，“自治主义者”指工人自主定义自身的权力，“而不是受制于资本、受制于他们所属的官方机构(比如商会、政治党派)，甚至特定的工人群体自主行动的权力，而不是受制于其他群体(比如女性不受制于男性)。”这个名词也代表了承认人们反对自身被简化为“仅仅是工人”的斗争权利。克利弗说：“恰恰是因为资本寻求干预和塑造一切生活和一切生活的反叛者，它的每一个角

落都成为反抗这种从属关系的场所。家庭主妇们要么在家里罢工，要么联合起来走出家庭、到大街上游行。”性别在这种视界里占据了中心位置，不仅是因为家庭成为抵制的场所。自治同时意味着一种拒绝和一种重构，因为“妇女反抗的大部分可以被视为拒绝其在社会工厂里的传统角色：作为劳动力的生产者和再创造者，伴之以对新种类的性别和其他社会关系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传统继续启发着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尽管千差万别，他们在致力于研究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方面大致类同。本纵览的最后两种观点，女性主义和环境政治经济学(feminist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economy)，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强烈的共通性，但是其差异性也相当显著，值得另列专节。这两种观点都来源于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他们都对新古典主义学派提出了重要的批判性评估。

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20世纪早期，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攻击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天真地富有男子气概”，称之为“幼稚的政治经济科学”：

> 他们毫无疑问地假定“经济人”不是不得已的话永远也不会做任何事；做事的唯一目的就是逃避痛苦或者获得快乐；必然会尽量攫取，并且会不择手段地智胜、击败，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毁灭其敌人。(1966：235－236)

一种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逐年发展，部分是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变化甚微。这一学科领域的女性主义理论起源于行动主义(activism)，从忽视家务劳动和家政管理之类的具体问题，到拓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以便将女性主义思想纳入考虑的迫切需要。

行动主义确实大大推进了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经济学。比如玛丽莲·魏林(Marilyn Waring，1952－　)开始从事社会运动工作，该工作促使她进入新西兰国会，负责评估一份采用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United Nations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 UNSNA)的建议书。[①]她不久就认识到，由于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基于市场和交换价值原则，它“支持妇女劳动、环境价值等的不可见性，并令其正式化”(1988：xx)。比如，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计算慈善机构看护儿童、使用在市场上购买的能源燃料、在工厂里加工或者生产食品、自来水、在饭馆吃饭或者洗衣服。可是，当一位津巴布韦妇女单独将这一切作为家务活儿来做的时候，它们却什么也不算。魏林还发现，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把一位男性雇员一天八小时的工作算作“积极劳动者”，却不计算他的妻子在家庭里和家庭附近投入的十一个小时工作。她仅仅是“协助一家之长从事其工作”(Waring，1988：29－30)。

理念和方法论的问题往往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会忽视家务劳动。可是，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更多精力被用于解决由地下犯罪经济、毒品交易和卖淫造成的理念和方法论问题，而不是被用于解决怎样包括家务劳动和抚养儿童的问题。在其 1934 年论家务劳动的著作里，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1935－　)提供了一条解释家务劳动的指导性原则：任何产生可以购买或者雇佣他人从事的服务或者产品的活动就是经济活动，无论金钱交易是否发生。尽管如此，全世界的经济实践和政府政策还是继续反映 1968 版《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在“劳动力——定义和衡量”这个词条里提出的观念：

> 家庭主妇被排除在被算作从业人员的人群之外，因为该种劳动

① 由于在创建此记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理查德·斯通爵士(Sir Richard Stone，1913－1991)获得了 1974 年的诺贝尔奖。

处于工作组织或者生产的独特体系之外。此外，将她们纳入从业人员不会帮助政策制定者解决美国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

结果，女性主义行动主义分子和理论家继续提倡将家务劳动纳入考虑：

> 通过将经济定义为由公司和市场组成，传统经济学没有能够承认并尊重家务劳动、看护儿童和其他家庭成员、购物和家政管理（Meaghar and Nelson，2004：109；也可参见 Huws，2003；Jefferson and King，2001）。

女性主义者奋斗的目标是令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包括家务及其相关劳动，前者成效甚微，后者小有战绩。除此以外，他们还鼓吹将妇女的状况作为重新思考经济学思想基本要素的基础。这就包括使用女性主义思想重新定义这一学科：

> 一种建议是将经济学视为研究人类如何组织自身，为维持和繁荣生活提供给养。该定义既包括选择行为，也包括受到习惯和社会制度强烈塑造的行为；既包括市场行为，也包括非市场行为。（Meaghar and Nelson，2004：110）

学者们不但提倡使用女性主义思想来振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提倡女性主义者——其工作主要忙于文化关怀——多加关注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已经探讨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不断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公共服务的私人化，福利国家津贴的丧失，还有种族主义和社会阶级剥削（Bezanson and Luxton，2006；Peterson，2005；Vosko，2002）。该领域最有趣的一些著作出自研究媒介、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学者（Huws，2003；Lee，2006；Sarikakis and Shade，2007）。结果，在过去十年里，

整合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取得了长足进步（Baker，2005；Peterson，2005）。

环境政治经济学

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了一种完全不清楚怎样计算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妇女所做工作的分析方式的种种不合理性。在一种将经济增长归因于巨量石油外溢、因为清除工作增加了劳动力和主要设备花费的理论里，环境政治经济学识别出不合理性。生态学问题对经济学分析至关重要的观点已经是老生常谈。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作——特别关注面临人口增长的土地负载力。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加速了环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Wall，2006；Rosewarne，2002）。主流环境主义者旨在通过节制市场过剩或者创造表面上令环境的价值更加透明的市场，挽救资本主义本身自我毁灭的趋势——在这一点上，和主流经济学家颇为相似。排放废气得付费，会使得经济更有可能在财政上更好地斟酌具有社会毁坏性的经济活动。公共选择理论家信奉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由市场解决，故此建议以市场作为解决污染的对策，使得公司可以交易污染限额（pollution credits）。在这种体系下——有些司法系统已经将其付诸实践——政府对于允许排放的污染设置最高限额，造成污染的组织可以互相交易污染限额，但总数不能超过最高限额。

传统上，一种主要反映在“绿色经济学”（Green economics）里的坚定的环境主义理论既攻击新古典主义传统，又攻击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两者都致力于工业增长、生产资料的扩展、作为满足人们需要最佳方式的实利主义伦理和不受阻碍的技术发展”（Porritt，1984：52）。可是，最近几年里，一种交互关联的理论网络常常寻求接纳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探讨了针对天气变化必须采取有力行动的问题。这种理论一开始通过期刊《资本主义 · 自然 · 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亦见 Benton，1989）获得关注。它以信奉社会主义和环

境保护主义为起点，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特有的集体式、参与式决策才能创造一种健康的社会生态学。此外，它还认为有必要在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之间建立同盟，以纠正马克思主义的下列倾向："认为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自然因素，无异于将生物性完全抽离存在。"（Soper 载 J. O'Connor，1991：10）

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已经用他们自己的环境批判政治经济学视界做出回应。这种视界探讨了自然和经济价值、将自然作为资本处理的后果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Foster，2000；Burkett，2006）。强调"生物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理论和物质联系，和这两种过程对于经济的重要性"（Perkins and Kuiper，2005：108），还有"边缘化和剥削自然世界以及妇女劳动之间的联系"（Mellor，2005：122）的女性主义者同样如此。最后，制度政治经济学已经着手进行自身的综合，将环境经济学与对公共机构为了增进或者延迟支配自然环境的各种形式采取的措施的正确评价结合起来（Paavola and Adger，2005）。

总的说来，环境主义理论通过融合有机生命的自然整体，提升了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整体的兴趣。随之而来的是，通过将道德视界从人类生命扩展到所有的生命过程，它扩大了政治经济学对于道德哲学的关注。正如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玛丽·梅乐（Mary Mellor，2005：125）坚决主张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必须考虑自然条件、限制和不确定性，因为人类存在于自然世界之内，而不是超越它。"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依赖世界而生长，而不是凌驾于其上。尽管如此，即使我们承认人类根植于世界，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人类是唯一的道德行动者，因此也是能够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结合理念和实行的唯一生物。

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增长引发了对环境的关注，认为这些是清洁技术的观念和它们以毒性危害人类健康日益增长的证据之间的互相抵触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高技术发展的象征硅谷含有一些全世界最危险的废物堆。中国的一些地区也是，全世界的废旧电子设备被搜集和倾倒在这

里(Grossman, 2006; Pellow and Park, 2002; Smith, Sonnenfeld, and Pellow, 2006)。

结论：经济学的局限性，抑或我们为何需要政治经济学?

本章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主要学派的发展，表明该学科一开始就是在激烈的理论争议中得以不断进化，即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建立的古典主义理论和来自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之间。在19世纪后半期，这种斗争发展成为另一种分歧，一方是日益成为正统的经济学，以功利主义原则和一种实证主义方法代替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性；另一方是各种异端理论，包括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制度政治经济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对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展开了广泛批判，而新古典主义理论是各种特征的松散集成，本身就包含内部争端。近来，以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的增长为标志的各种观点加入主要异端理论的阵营。

保守主义、制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对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展开的广泛批判表明该学科处于动荡状态，如果还不是危机状态(McCloskey, 2002; Radziki, 2003)。这与经济学为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成功指明了方向形成鲜明对比。本章结尾总结了上述的种种经济学批判，并且阐释了具体的观点差异，有助于详细说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另类观点。

经济学偏爱描述静态模式，一切在均衡中得以解决。其兴趣局限于在一套特定制度关系当中的增量变化。实际的经济实践，就像更加广阔的社会和物理世界，并没有受到这么简单的局限。均衡只是一种结构；增量变化只是一种形式；一套特定的制度关系只是许多种可能的安排当中的一种。

经济学家没有将许多生产力的重大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纳入考虑，包括公司结构和产权，接触信息、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以及社会背景。它

倾向于忽视权力同财富的关系，由此忽视制度控制市场的权力（Rothschild，2002）。就像一位早期的天文学家，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在，仍然坚持相信太阳绕着地球旋转，经济学家坚持市场竞争使得考虑权力毫无必要的观点。就像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追随者宁可修改数学也不愿意放弃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经济学家坚持相信垄断和寡头垄断是上好的做法，只需要在数学上稍加调整就可以将其纳入竞争模式。批评家，包括一些业内人士（Davis，2006），坚持主张不断增长的经济权力集中化已经迫使这种模式走向断点。

经济学家假定，信息自由流向在市场上登记欲求的顾客。它主张，人类的需求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人类的欲求是个别的，心理的，并且容易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被消灭，这样所有的需求都可以被当作欲求。根据其批评者，该学科最好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欲求如何被创造的原始理论，最差则提供了一种循环论证，将欲求定义为人们在市场上选购的任何东西。经济学家排斥生产、营销和欲望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些组织了信息流动，将其导向具体方向。经济学家既低估了营销建构欲求的能力，又低估了人类欲望的复杂性。后者要么干脆没有得到解释（欲望就是欲望选择的东西），要么当欲望得到解释时，被简化为理性选择。根据贝尔（Bell and Kristol，1981：71），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结论“本身就是对人类行为最狭隘的文化范围的解释，一方面忽略了墨守传统的大块区域，另一方面忽略了道德反思”。这很重要，因为与需求和欲望紧密关联的传统和道德都创造出自身的算法，它在依赖欲求的算法时很不自在，并且常常对之强加的种种约束索性断然拒绝。对于贝尔（1976：223）而言，经济学家认为适用于一切的市场实际上不过是经济活动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它并非适用于一切，而是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其产品终端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其获得商品的动机是欲求，而不是需求。

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市场视为个人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好几种社会活动场所中的一种。他们将市场从阶级、种族、性别还有其他形式的

社会分别中抽离出来，而正是这些给市场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弹性供应低工资劳动、得不到报酬的家务劳动、还有欲望的社会体系——它将需求和欲求联系起来的形式有利于市场交易。结果，市场的成功，一个市场体系的顺利运行，被视为社会的成功，即使其后果加剧了社会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分别，或者破坏了物理环境（Sayer，2001）。那些反对这些后果的人，其行动被视为出于非理性动机，本身最好由市场规则来纠正。

尽管异端理论存在其他种种分歧，它们一致同意经济学的本质弱点可以被归结为在根本上对社会性理解不足。经济学以下列观点为基础：可以既排除不能以科学方法阐释的事物，又不放弃理解经济学的根本法则。反对主流的另类理论主张，试图脱离理解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和文化实践的种种复杂性来理解经济行为，委实是一种空洞的科学。经济学以横跨时空的、自然化的个人为起点，而政治经济学以社会构建的、投入社会生产过程的个人为起点（Jessop and Sum，2001；Sayer，2001）。

有人将这种本质批判导向更深的层次，用贝尔（Bell and Kristol，1981：47）的话来说："简言之，不但有在经济学理论内部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还有经济学理论本身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根据这种观点，在经济学理论内部存在危机，是因为经济学依赖一种天真的、简单化的社会理论：社会是个人的总和；人类行为绝大部分是理性的；信息自由地流向每一个人；市场分散权力，显示人类欲求，并且最重要的是，登记真正的社会需求。可是除了这些短处，经济学理论本身还存在更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来自经济学理论的实证主义根源，即信奉唯一值得研究的现实应该是可观察、可测量、可量化的。

麦克洛斯基（McCloskey，1942－　）在《经济学修辞》（*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1985）里详尽批判了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传统经济学家训练出身的麦克洛斯基害怕许多经济学家被更适用于宗教体系的一系列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要求"弄成了残废"。她得出结论说：

> 信仰由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实证经济学以及其他对定量法的热情组成。在发动圣战捍卫信仰的运动中，这些教义已经僵化成了仪式，现在支撑着许多修女、主教和大教堂。（1985：4）

实证主义的信仰体系包括大量告诫：预测和控制是科学的要点；对一种理论而言，只有可以观察到的影响才能证明其真实性；可观察性由客观的、可复制的实验界定；一种理论是错误的，其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实验结果证明它是错误的，等等。此外，实证主义珍视客观性、区别事实与价值，还有数学语言。根据麦克洛斯基，这种制度愚钝了经济学家的头脑，结果他们倾向于厌倦历史，对社会科学家不是彻底不屑一顾，就是一幅居高临下的样子，任意忽略在其学科狭窄范围之外的一切事物（McCloskey，2002）。这位变节的经济学家认为，恋物癖似的崇拜充满规则的方法论和盲目地热爱可观察事实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很多描述和解释的丰富性都丢失了。

应当承认，麦克洛斯基有言浮于意的倾向。更加重要的是，她对通过揭露其本质的哲学缺点来破坏经济学实证主义的兴趣令她忽视了经济学学科和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之间的关键联系。传统经济学的成功，不仅是因为经济学家就一系列研究和话语的狭隘规则达成了一致意见。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它通过提供加强资本主义的信息、建议和政策，为权力服务。将经济学正统视为一种修辞体系固然很重要，将其视为一种权力体系至少同样重要。要想理解那种体系并建议改革它的方式，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第四章从定义传播并继续探讨传播政治经济学兴起的社会和知识语境开始。第五章和第六章通过利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日益增长的文献，讨论其多种关键轮廓以及我本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十余年的耳濡目染，来描述和分析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通过这种评估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主要横跨马克思主义和制度路径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成果比例大大超出其所得到的组织支持。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尽管采用这种视角的人的数量已经增长，不过人们主要还是作为孤立的个体来进行研究。既然合作研究主要是那些个体之间共同利益的产物，而这些个体普遍面临充其量是不温不火的制度支持，而更多时候是彻底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有研究中心出现。

第一节　传播的概念

任何一门学科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本质主义这种可以理解的倾向，也就是说，把现实简化为学科的中心要素的倾向。在第二章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时，特别指出为避免把社会现实简化为政治经济现象，需要把政治经济学看作理解社会生活的众多方式之一。我们当然感谢对本质主义构成压力的那些学说。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还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它们都具有纯粹的解释力，为那些把社会现实简化为政治经济或者只是一种经济逻辑

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然而，也有重要的认识论的、理论的以及充分的理由来抵制这种趋势。鉴于此，我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社会分析的一个起点，也就是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进路，而不是将所有路径统统简化为此。

同样，不但弄清楚传播的含义非常重要，避免传播的本质主义也十分必要。当然，这种面向的压力也很强大，尤其是在当前的知识气氛中。这些压力包括，通过把引导科学发展三百年的分析方法转向大范围的以传播为基础的路径，来重构认识论，而这些路径又是以修辞学和一套在话语规则中显现的标准为中心（Burke，1969a，1969b；Latour，1999；McCloskey，2002；Rorty，1979）。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会话的修辞，如同调查的逻辑一样应该提供科学的标准，尤其是，这种观点坚持认为理解不是一个人使用揭示实在的语言去揭示现实并对现实做观察和报告的过程，相反，理解发生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人交换观察结果、观念以及用并不只是揭示现实、而是有益于建构现实的语言来表达观察结果与观念时。

此外，文化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视围绕诸如文本和话语这样的传播内容的要素做组织化的分析。结果，学者们倾向于将认识论（即我们如何认识事物）和社会分析简化为传播，尤其是，这意味着把知的行为和知识的对象二者主要或仅仅看作通过阅读文本完成的话语。通过聚焦这种路径如何为揭示除了知识的其他形式之外的科学和经济学的普世主张提供有力工具，对传播和话语的强调开创了一种重要的另类路径。然而，这种权力可能压制技能娴熟的使用者，这些使用者有效地把会话的认识论和话语分析普适化。我们这儿采纳的路径是既承认这个视角的优势也承认制造一种新的本质主义的危险，这种本质主义带着传播简约主义的观念。

政治经济学为避免传播本质主义小心翼翼地提供另类理由。尽管对此有可理解的张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已经追求去中心化的传播媒介，即便他们致力于调查媒介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物质组成部分，去中心化

的媒介意味着把传播体系看作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的一部分。有几种方式可以达到这种目标，例如，从资本主义构成要素为出发点，比如，资本积累，劳动工资等；也可以把媒介置于这些基本要素所设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框架中。根据这种观点，媒介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向度与教育、家庭、宗教和其他制度行为的核心平行对应。这些向度中的一种向度区别于所有其他向度，因为每一向度在某些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由于所有向度彼此携手建构了资本主义。因此，无论是媒介或是其他制度行为都无法遗世独立。也就是说，传播的政治经济路径把它的主题置于一种广阔的社会总体中，并因此尤其倾向于在传播研究中力图避免本质主义。

牢记这些警示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传播的意义十分必要。在对如何定义传播作背景研究时首先要注意的是，本质上，从自然科学到各种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每种学术科目都有其自身的传播定义。概括起来有两类定义：一种致力于信息传输，一种强调意义的建构。例如，生物学把传播看作“两个有机体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中，信息从一个有机体搬运到另一个有机体”（《生物学辞典》，2004；也可参见 Breed，1999），同样，计算机科学把传播看作是信息的搬运（Losse，1999；Walton，2000）。

传输的模式通过香农和维弗（Shannon and Weaver，1949）的经典研究在传播研究中开辟了道路。由于人们留意的方式能够彼此影响，他们开始于无足轻重的通讯观念，但是他们聚焦于传播者或者编码者通过传送器发送讯息或者信号的过程，这种发送过程尽量降低噪音并到达收信者或解码者那里。就像经济学家窄化了政治经济学的要领以便把它塑造为数学科学一样，香农和维弗追求创造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传播科学（他们称其模式为“数学的”）。对于数学家和工程师来说这是最大的收益，而对于那些把信息看作不只是噪音与非噪音的二元选择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损失。尽管二进制打开了一道门，通过这道门，工程师以常见的 1 和 0 来编码计算机系统，但同时人们得以发现传播的复杂和精微之门也关闭

了。这些就使相当广阔的路径范围变得屈指可数了。于是，社会学家把传播看作一个“建立意义的过程”（Scott and Marshall，2005），社会系统理论家把传播看作“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互动，这被社会和认知规则所决定”（Klüver and Stoica，2005：877）；而市场专家把传播看作“两个或者更多方的交互过程，凭这个交互过程，意义通过符号的有意图使用被交换”（Holom，2006：27）。

我的传播观念与普遍观念别无二致，即把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置于研究的前沿。它开始于这种观念，*传播是一种社会交换过程，交换的产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标记或者体现*，[①]广义地说，传播和社会是相互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分析形式的趋势将聚焦于传播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的，并进一步分析推动传播渠道形成的社会势力，以及通过这些渠道所传输的讯息的范围。这样的探讨有助于建构关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结构性势力是如何影响传播实践的重要研究；再者，也有助于将这些结构和实践置于资本主义、贸易、国际劳动分工的更为广阔的领域。然而，承认社会过程并不终结于建构传播实践这一点也十分重要。

传播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后果，也不仅仅是描述一种只能由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真诚地加以解释的文化景观。因为传播倾向于实践这种本质主义形式，所以一般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忽视了传播以及一些真实的变迁，这种在传播中发生的变革正有助于这种变迁在当今世界发生。因此，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样重要：传播实践（包括传播者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是如何建构一种包括迷思和符号的社会、文化世界的。例如，关于像因特网这样的新媒介的传播不仅仅由从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公司所型塑，也是由在渴望的引导下去建构海市蜃楼或迷思的人们所型塑（比如，创造一个打破空间、时间和政治阻隔的新世界，实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Flichy，2007；Mosco，2004）。

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输，也是意义的社会建构。后者包括但不局

① 这看来接近斯迈思所讲的意思，他指出了传播和信息的辩证关系。

限于把人们汇聚在一起的那些社会仪式(Hodgetts, Bolam, and Stephens, 2005)。我们用传播去分享经验但也对比经验，我们用传播去整合我们的价值观并展示它们的差异。传播包括会话中的两个人以及高音解说的 Super Bowl[①] 的播报，包括给母亲打电话以及 AT&T 网络；传播是观看孩子玩耍，是《纽约时报》发布“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以及福克斯播报它的“公平和平衡的”报道；传播还包括会话、印刷、广播、电子传播以及因特网。但是，对于政治经济学者来说，也许重中之重不仅仅是关于在网络中的合作，还是关于等级制中的权力。

于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即要抵制把政治经济看作是结构、制度和物质行为的领域。而传播占据了文化、意义和主体性。政治经济和传播这二者是从社会和文化实践中相互建构出来的。这二者就是交换过程，彼此的交换过程虽不同，但都是由共享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所多重决定的。

第二节　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和知识因素

这一章的其余部分检视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发展的社会、知识影响因素。检视对一个跨越至少五代产生广阔影响力的领域不止一种方法，其研究者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一些人不会明确承认其政治经济学路径取向。这种局面在今天备受挑战，因为这个领域不再局限于北美和欧洲少数大学中。正如第六章描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现在无论就其地理分界还是知识地理学来说都是全球的。尽管如此，这样做也是十分有益的：首先探讨那些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广阔的社会驱动力，然后在下面章节讨论当我们进入一个更具体的情形时那些对个人产生具体影响的因素。

① 美国橄榄球的锦标赛。——译者

社会驱动力

对政治经济学路径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出版、电子媒介和电子传播的变革——这是从名不见经传的、通常是个人或是家族拥有的企业到为20世纪的工业秩序打上烙印的多分工组织的变革。这个变迁的过程并非不可避免，也不必然是线性的。一些主要媒介公司掌控在家族手中并且为那些刚愎自用的权势者经营得声誉鹊起，比如，福克斯电视网络和电影公司之父——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所掌管的新闻集团。我们所知的是，位于权力顶点的人与应用严格的工业模型于媒介生产和严格的财务会计(这种财务会计把收益、利润和股票价值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绝少干系。很快，大部分现代商业所熟悉的工业和企业管理行为的发展，包括产品应用、营销、财务和会计工作在内，已经扩展到整个媒介产业。

一些早期的政治经济研究肩负描述大型传播企业的运行与结构的责任，并关注在如此大型企业中权力是如何运行的。丹尼利恩(Danielian，1939)研究了如AT&T这样的巨型公司并举例说明了这种趋势，这也正如斯迈思(Smythe，1957)例证了美国媒介工业的结构一样。这种传统在以后几代的研究中持续着，尽管这种研究继续反映企业跨越不同媒介工业的整合趋势，并且进一步扩大到制造业，甚至涵盖了服务行业(Artz and Kamalipour，2003；Schiller，2007a；Thomas and Nain，2004)。许多研究是关于“赶超”占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模式，比如讨论资本主义的转型(在广播中，公共利益原则如何让位于完全的商业主义？)以及工资劳动的创造(媒介专业人员如何成为薪资劳工？)；研究也包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注，比如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一个或一些媒介公司如何最终支配了市场？)，创造一个把观念和实施分离的劳动过程(媒介管理如何控制媒介劳动？)。这些赶超式的研究结果既源于对引进技术革新的新近成果以推动市场实践的应用(McKercher and Mosco，2007)的持续关注，也源于对媒介工业的技艺传统、媒介中工会主义的力量以及这些企业商业化的问题的持续关注。

在关于所谓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和文化驱动力的争议的背景下，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穷于应付。例如，政治经济学者现在承认理解朝向工业或者福特主义经济十分重要。媒介沿着工业路线被组织并且大多数媒介劳动是为薪水而工作的，与工厂工人毫无二致。然而，媒介公司在联系松散的各部门中更弹性地被组织起来，或者在合作生产的安排中通过和独立公司联盟，而这些合作生产安排常常跨越了国界。工人全球性地是专职的、兼职的、合同的或者是租赁的。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去回应那些把这种状况当作媒介公司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强有力的证据的人。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这些论证缺失对在全球媒介聚结中的深层次的聚集研究，而媒介聚集现在如此有力以至于无须保留完全所有权的风险就可以控制积累循环。弹性积累巩固了全球媒介权力(Baltruschat，2008；Wayne，2003)。

政治经济学的路径通过检视传播工业的增长及其与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学的联系，开始主要聚焦于传播过程的生产方面。尽管如此，大众消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家探讨实现价值的完整过程，这包括社会关系和消费组织。这些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检视消费增长来讨论消费，这种消费增长是对过度生产的经济危机的结构性回应，也是对民主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回应，每一种危机兴起于北美和欧洲的工人阶级的大众化组织(Ewen，2001)。资本主义将如何回应让人们购买川流不息的商品而不赋予人们在经济和政府中要求发言权的权力这一挑战？大众报纸的发行，国家电信体系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广播和电视的发展，都是构成具体的大众消费形式的核心因素。但这对于政治经济路径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大众消费和大众传播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亲密无间的联系，这意味着传播政治经济学只能选择20世纪关键发展之一来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大众消费和大众传播与生俱来的观念和行为从根本上有别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围。比起对商业探讨的娴熟，政治经济学对于探讨围绕家庭组织起来的行为是穷于应付的。同样地，谈论受众所使用的一种新语言也挑战了政治经济学，而受众通过收听、阅读、观赏外加购买

媒介内容来参与积累过程。[①]现在，对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使这些议题更为含混，因为这些理论对于弹性和特殊性的消费走势的意义有着冲突的观点(Harvey，1989)。今日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围绕用户化或者市场一隅(niche)而不是大众市场来组织生产的走势的意义。后福特主义应用于消费时，其弹性的特殊化的观念表明了一种实质性的重构，这种重构瞄准为特殊市场持续生产特殊化或者用户化的产品。这个议题对于传播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在生产循环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包含着传播。传播体系对于用户化生产线尤为重要，对于推销这些产品给消费者至为关键，对于把顾客的实际购买信息的行为转化为新产品的生产决策所需要的快速反应次数生死攸关。最后，传播和信息交换渠道容量的增殖要求为日益分化的受众提供特殊化和用户化的媒介产品，这是这个生产过程的具体后果。这些发展引导当代政治经济学去思考这些发展的普适性(这些发展构成了一种新的划时代转变的因素吗？)以及发展的广阔涵义(在全球政治经济体中权力关系的意蕴是什么？)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增长也是对政府扩张为传播的生产者、发行人、消费者和管理者这一现实的回应。政府的这些行为是随管理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国际商业的冲突要求的压力应运而生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表明庞大的资本主义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如果有人需要更多证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我们一个更为强有力的答案。这些结果可以从政府的知识、信息收集、宣传、广播和电讯体系的扩张一管窥豹。军事和媒介、电讯以及计算机之间的关系尤其为几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萦绕于心(Der Derian，2001；Dyer-Witheford and Sharman，2005；Mosco，1989a；Pike and Winseck，2007；Roach，1993；Schiller，1992；Smythe，见于

① 我们再次看到为研究家庭劳动而建立起来的学科的反讽，两千多年后仍在艰苦探索新的积累过程，而这种积累是围绕作为生产行为的基本单位的家庭所组织起来的。这个过程仅仅是消费？还是生产加消费的过程？抑或是完全不同的某种事物？再有，经济行为的基本循环不断重组，使得这个过程为获得其“学名”而进行艰苦努力。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什么？——阶级吗？性别化的家庭吗？受众吗？诸如斯迈思(1977)的“受众即商品”的提法激发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争议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可以理解的困难过程的结果。

Guback 第 7－9 章，1993）。此外，国家传播部门随着规范和政策制定体系的完备而日益壮大，这些体系在商业竞争对手之间斡旋，回应阶级、性别、种族以及社会运动压力集团引起的抗争，并协同资本的领导部门制定长远规划。政治经济学在国家电讯、广播和信息体系建构中以国家为已任并评估以公共和市场为基础的策略的系列后果（Chakravartty and Sarikakis，2006；Garnham，1979，1990；Schiller，2007a；Smythe，1957）。在应用政治经济学路径研究传播的发展早期，当务之急是支持为公共接近和控制这些传播体系而产生的社会运动。接着，全球私有化的压力引导政治经济学去探讨私有化过程的工具性与结构性根源。近期，尤其在回应私有化走势所造成的接近权的不平等和主要反映市场压力的内容变迁时，政治经济学复兴了对以下问题的探讨兴趣：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以及社区传播的广泛的可替代性形式（Hackett and Zhao，2005；McChesney，2007）。这些研究主要回应日益增长的新媒介使用兴趣，而使用新媒介是为了抵制或创造由民族政府和大多数国际政府组织所支持的居支配地位的私有媒介世界的替代物（Abbott，2001；Hanke，2005；Howley，2005；Stengrim，2005）。

商业与国家力量增长有助于西方核心国家把它们的权力投射到其他国家从而造成全球剧变。其结果是政治经济研究对媒介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论。二战以后的头二十年，一直是以美国为大本营的传播工业的跨国化，而与此相伴随的又是反殖民运动的大规模进程。跨国化过程正是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诉求，而全球化则频繁而含糊地指向跨国化，全球化触发了有力的政治回应以及传播领域最为重要的论证。20 世纪 60 与 70 年代之间，从不结盟运动发展而来的一次真正的抵抗运动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这个运动组织是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它们声称要为国家自决而奋斗。这次运动真正地呼吁全球传播民主，包括对传播媒介的普遍获得、对传播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予以控制以及传播是基本人权；运动同时给传播政治经济学赋予一种新的动态的研究议程与政治意图。这个领域要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在以美国

为首的战后重组中传播的角色。此外，它还检视传播与文化在对先前独立的国家的重新支配中如何相互牵连。进一步说，这种新研究议题要评估在克服传播全球不平等中需要跟进哪些做法，包括建立政策机制以推动民主传播。

来自北美洲的学者，如加拿大人斯迈思，来自欧洲以及来自南半球的学者，如作为双重宗教的著名代表人物马特拉以及政治经济学家，如赫伯特·席勒都加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都对主流理论回应以一种强有力的批评。[①]现代化和发展理论起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该理论试图把传播整合进与支配性学术和政治利益适意的解释性发展观。发展理论主张媒介是资源，这些资源与都市化、教育和其他社会势力相伴随，并在欠发达世界里刺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结果，媒介增长被看作是发展的指标。通过应用几种主流的国际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包括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家挑战了发展主义模式的基本大前提，他们尤其攻击发展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及其对权力关系的毫无兴趣，而这些权力关系型塑着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关系条件，以及在这些关系条件之间与之中的多层理的社会阶级关系(Pendakur，2003；Thomas and Nain，2004；Zhao，2008)。

与现代化理论相反，政治经济学家在详细阐述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方面功不可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确认了充当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的工具的一系列结构和实践。由于美国制造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以低廉市场价格倾销，国内新闻生产以及正在成长的穷国的娱乐的生产被倾覆了，这种倾覆为从中心流向边缘的单向文化和信息流动铺平了道路。跨国公司以及其政府的支持者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商业媒介体系的引入，以允许

① 这些研究对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增长都进行了相当细密的讨论，其中代表作有Schiller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研究(1992，1993)；Atwood与McAnany(1986)，Beltràn与Fox de Cardona(1980)，Dorfman与Mattelart(1975)，以及Freire(1974)，对拉丁美洲的研究；Smythe(1981)对加拿大的研究；Ibrahim(1981)对非洲的研究；以及Tran van Dinh(1987)对亚洲的研究；由国际学者共同完成的论文集请参看Mowlana，Gerbner和Schiller(1992)，Nordenstreng和Schiller(1993 and 1979)，Roach(1993)，以及Sussman和Lent(1991)。

它们打广告并制作节目，这些广告和节目将培育消费主义。这种驱动力代替了发展的优先性，而这种优先性是有利于对充分的食物、水、保健以及教育的普遍获得。而且，就其自身而言，消费主义引起环境和文化破坏的后果。

此外，当奠基于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政府以及在南半球的它们的买办，利用像海底电缆和通讯卫星这样的新技术以扩大它们的控制时，国家主权遭到了破坏。使用正在兴起的计算机通讯体系的全球数据网络进一步使大公司优越于国家权威。作为结果，全世界的受众看到了被扭曲的穷国形象，那些来美国学习的外国人接受了嵌入式的美国假想的教育，这种假想就是私人的、为广告商所支持的媒介应该支配所有形式的公共传播。于是，图绘跨国传播公司的增长和权力以及它们和美国亲近的联动装置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种富有意义和持久的焦点。

不结盟运动在它们自己的会议上，在联合国面前，都致力于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并把大多数活跃在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召集在一起(Nordenstreng and Varis, 1974)。这些学者都做出了基础性的研究，提供了政策分析(Somavia, 1981, 1979)以及对运动本身的评估；这些研究、分析和评估包括西方媒介如何运作去破坏不结盟运动(Preston, Herman and Schiller, 1989)。为整合学术研究和政治行动所进行的广泛努力，例证了为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理想而奋斗。20 世纪 80 年代几乎得到主流媒体全力支持的新保守派政府除了做一些象征性努力去贯彻联合国在此议题上的倡议外，完全罔顾其余议题(UNESCO, 1979)。[①] 尽管如此，政治经济学家主要通过麦克布莱德的圆桌会议(MacBride Roundtable)，继续推进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目标，这个会议是一个致

① 迹象表明，反对国家主权的声浪甚嚣尘上，这种迹象在支持回归殖民主义的主流精英报纸上显而易见。一个例子是，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 1993)(著名的历史著作《摩登时代》的作者)在纽约时报中曾撰文“殖民主义归来——眨眼之间：让我们面对它——某些国家并不适合自治”。他号召“文明世界”回到殖民托管体系，来掌控那些不适宜自治的国家。2003 年入侵伊拉克就是这种观念的直接产物。

力于执行媒介去殖民化任务并证明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是持久需要的组织(Traber and Nordenstreng, 1992; Roach, 1993)。

的确，文化帝国主义的诸多批评的解释力，以及它们在国际争论中日益充当试金石，很快触发了逆反应。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结束了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财务支持，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常常聚焦于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代化理论家追寻修正模式，他们宣称修正模式可以通过重新聚焦于电讯和新计算机技术而提出新颖洞见。因为大学研究者坚称信息与传播技术将改进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他们发现了来自多边机构的支持，比如世界银行。

有着不同地区背景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回应是论述信息与传播技术具有重新整合全球劳动分工的力量。首先，研究者看到了分工主要在领土范围内。不熟练的劳工集中于最贫穷的国家，半熟练和较为复杂的流水线劳动集中在半边缘社会，研究、发展以及战略计划囿于第一世界的企业大本营，滚滚利润流进这个大本营。晚近的研究承认阶级分工抄了国土线的近路，也强调由于跨国公司对克服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局限的新传播技术的掌控，弹性工作制被它们所享用(McKercher and Mosco, 2007; Pellow and Park, 2002; Schiller, 1999a; Sussman and Lent, 1998)。

劳动分工以及劳动过程的转变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转型的组成部分：在整个资本投资和利润赚取中，传播和信息上升到中心位置(Schiller, 2007a)。传播和信息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已造成新一轮的争议和知识酵母。以早期研究为基础，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开始用文件证明传播机构的整合以及信息传播新秩序在新保守主义所鼓吹的商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议程中的中心角色。

伴随着跨国企业的增长、政府角色日渐扩大以及为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奋斗，一个公认的“信息社会”出现了，这刺激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信息社会”这个词最狭窄的含义是，其简单承认了信息和传播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已最终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相对更多的份额，这是相

对于农业或制造业而言的，后二者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支配了生产。这种发展势头已经吸引了人们的巨大关注，因为许多人论证道：这种发展在传递出一种革命性的社会转型的信号，这种社会转型具有如下潜力：扩展政治民主，创造社会平等，加速文化多元化，并且指明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彻底断裂(Flichy，2007；Mosco，2004)。

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动力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从使用价值而来的交换价值的生产，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组织，仍然是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传播和信息技术通过扩大产品和劳动的市场规模为资本主义作出贡献，但并不构成对资本主义根本属性的质疑。借用丹·席勒(Dan Schiller，1999a)“数字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我们可以将信息社会的经济学描述为“数字资本主义”，但这个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的。

谈到争论，那些至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抱有同情的人声称，“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这些术语表征了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同时，通过扩张并挑战市场的方式强化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些根本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说，信息社会远不止是对一类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而是一个其更多的经济活动与信息捆在一起的社会。进一步说，它指涉这样一个社会：其行为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存能力的主要问题，因其在该体系的内外及其法律结构的内外开启了生产新形式。也许，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2001)的研究是当下最好的研究之一，因为它跨越了资本主义及与其根本性断裂的非此即彼的论述的藩篱。事实上，卡斯特尔在称之为“信息资本主义”和“网络社会”之间来来去去地转换，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现实的关注态度。这种关注是，尽管传统资本主义的因素还持续着，但我们需要对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根本上的新社会这种观念保持开放的态度。充分利用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手段依然重要，生产的社会关系如果日益围绕传播和信息而组织，就仍然是明白无误的资本主义。然而，创造传播和信息网络的巨大而加速的能力挑战着资本主义管理和包容这些网络的能力。大量信息和传播偏离了价值榨取的轨

道，我们从一些简单的行为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下载免费的材料，通过YouTube向全世界发布视频讯息，在赛博空间的掩护下实施像洗钱这样的犯罪行为，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单一的支配地位。在数字世界，开放源和黑客网络挑战了所有权，罪犯和恐怖主义者使用数字技术隐藏并由此扩张他们的行动。对于卡斯特尔和其他那些质疑传统资本主义的持续支配地位的人来说，网络开始取代商品成为社会发展的中轴。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打上了矛盾的烙印：一方面，人们渴望信息的免费使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想利用信息达到创造剩余价值的单一目的。

卡斯特尔公开在双重观念中摇摆，并且他的研究对一个信息社会的意义的看法在学术圈和政治经济学家中体现出张力。其他人，如哈特和内格里(Hardt & Negri，2004)以及泰拉诺瓦(Terranova，2004)，采取了一种较为清晰的立场，认为信息社会正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某种全新的事物，这是就信息社会的网络模糊了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而言，也是就其劳动混淆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区别而言。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需要重新思考一些其根本原则。为何如此？因为受资本主义过程和体制的局限，资本主义对包容价值创造过程无能为力，于是变种为一个信息社会，这个社会的规则和关系日益是待价而沽的。根据这种观念，一个围绕信息网络而建立的社会抹去了工作和家庭、劳动和休闲、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一度清晰的界限，当这种混淆发生后，这个社会成为一种新型社会。除了制造迷思，这显然不是乌托邦社会，因其仅仅依赖于厚实的监管，这挑战了乌托邦想法。但是，根据这种观念，多元性以及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挑战强度的增长开始提出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带领一些人在一个新型社会中——一个信息社会中去寻找答案。

知识潮流

每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受到可感知的需要的影响，即需要创造在正统的经济学之外的可替代性的路径，并且由此需要发展以这些替代性

路径为基础的媒介政策。由于第二章讨论的理由，政治经济学家拒斥创造了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学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始终如一地认为古典经济学尤其不适合分析传播产业，因为传播产业的大部分基本特征在新古典经济学观念里都被视为例外的个案。自 20 世纪以来，媒介产业已经高度集中在一个或者几个巨型公司手中，他们控制了生产和发行市场。再者，在美国之外，大众媒介和电讯网络已被组织为政府所有的垄断。即便是在美国也只有邮政服务把持在政府手中，电讯和广播网络在早年则被置于政府规制下。此外，这些传播产业生产的产品的本质是什么，至今仍然模糊不清。

尽管广播新闻是由广告赞助商播放，使之看来是一个标准的商品，但它仍然保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征（比如，人们在消费新闻产品时产品并没有消失），这就使正统的经济学路径采用含混的态度对待它（新闻）。另外，斯迈思在他所点燃的关于受众商品的知识争论中，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媒介产业很清楚自身既运行在节目制作市场中也在受众市场中。要点就是关于传播产业的首要商品的本质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以至于需要考虑标准经济学路径的替代性路径。总之，许多批评指出西方经济体中许多部门并不能轻易适应于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的模型，传播产业尤其表明了这种不适切。使传播部门解禁并私有化的驱动力减少了其独特性的争议，但保持非商业化和规制化的因素也十分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传播产业更是与以前的主流经济学的竞争性市场模型渐行渐远（McChesney，2007）。

跟随这种对主流思想的替代性路径的兴趣，几代政治经济学建构了正统的传播政策之外的替代性路径。例如，达拉斯·斯迈思，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就追求一种结合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动主义的生涯。他于 1937 年进入美国农业部担任紧急政策分析师，接着被派到劳工部，在此和代表报纸、邮政、电报工业工人的工会共事。1943 年他被任命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这里他提出了许多战时被耽搁的广播和电讯问题。进入学术生涯后，他的政策研究继续推进

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这些关注包括支持公共广播，支持对传播卫星网络的公共控制，支持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发展，也支持全球传播体系的去军事化。

同样，由赫伯特·席勒和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领军的年轻一代的政治经济学者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传播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帮助。托马斯·古拜克，作为斯迈思的学生，应用政治经济学于全球电影工业中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民主传播的鼓吹的全盛期时进行电影工业的政策研究。威廉姆·梅洛迪(William Melody)是斯迈思的亲密同事，制度政治经济学出身，他长期活跃于为北美新古典经济学所激发的政策批评领域，以及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主要政策中心工作。他的学生曼塞尔则在法国和英国从事这一工作。尼古拉斯·加纳姆是英国传播工业公会的行动主义者，后来加盟的还有默多克、戈尔丁、罗宾斯(Kevin Robins)以及其他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这些人对英国广播和电讯系统的解禁和私有化展开批评。

我们也能在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发现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政策应用，比如：安德森(Robin Andersen)、卡拉布雷斯(Andrew Calabrese)、唐宁(John Downing)、甘地(Oscar Gandy)、哈克特(Robert Hackett)、赫尔曼(Edward Herman)、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米汉(Eileen Meehan)、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席勒(Dan Schiller)、萨斯曼(Gerald Sussman)、瓦斯科(Janet Wasko)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近年来，以下研究者更是积极地把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政策研究和行动主义结合起来：贝蒂格(Ronald Bettig)、戴尔-威日福特(Nick Dyer-Witheford)、马泽帕(Patricia Mazepa)、雷迪克(Andrew Reddick)、赖德奥特(Vanda Rideout)、赖尔登(Ellen Riordan)、斯科特(Ben Scott)、里根·谢德(Leslie Regan Shade)、温瑟克(Dwayne Winseck)以及赵月枝(Yue-Zhi Zhao)。麦克切斯尼通过在席卷美国的汹涌澎湃的媒介变革运动中担任领导角色，尤其对美国的行动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研究发展中国家传播议题的政策行动主义者并获得实至名归

的声誉的领军学者马特拉，在80年代以后将视角转向欧洲传播政策的动荡。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耕耘的行动主义学者的模型为许多根基在南半球的学者所采纳。比如，爱敏(Alhassan Amin)、班纳吉(Indrajit Bannerjee)、切克拉瓦提(Paula Chakravartty)、天万文(Wan-Wen Day)、侯普(Wayne Hope)、开迈利波尔(Yahya Kamalipour)、开普尔(Jyotsna Kapur)、库马尔(Keval Kumar)、冷特(John Lent)、马斯尊尼(Guillermo Mastrini)、内恩(Zaharom Nain)、托马斯(Pradip Thomas)、托马斯瑟里(Keyan Tomaselli)以及亚(Y. Z. Ya'u)等人的研究。

以上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案例样本，有关其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将在后面详述。这里所要把握的要点是：五代左右的学者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引导下，已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干预传播主要政策议题。

除了对正统的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展开持续批评，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发展还反映出知识分子的深层关怀。第一代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迎击遍布在正统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范式，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也被置于行为主义范式中。[①]行为主义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一个学者的工作就是通过检视其意义可以直接观察并被测量、并且更便于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的那些行为去创造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基于道德哲学考量的批评性观念在这里毫无地盘，当然社会实践在此也毫无空间。尽管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议引起人们极大关注，但首先考虑其与行为主义的关系至为重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于对抗多学科整合运动的知识背景，反对把物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比如，使用经验观察去建立法则

① 这个要点来自我对斯迈思的专访(1991年12月)。他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路径应用于传播学时的紧张关系这种问题迷惑不解。他早在20年代读研究生时，在他的主要知识分野中，就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曾共谋批判行为主义。在他看来，行为主义画地为牢，把研究限于基于经验观察的实证主义方法。政治经济和文化路径开辟了关于意义、辩证法和批判问题的研究。作为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知识对手，这种行为主义的观念也被我对赫伯特·席勒(1992年1月)和詹姆斯·哈洛伦(James Halloran，1992年4月)的访谈内容所证实。

般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要素是可证伪命题，处在完善过程中的额外经验证据不断推翻命题或者假说。本质上说，这种看来服膺于物理科学的科学方法会实现创造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目标(Nagel，1957)[①]。实证主义路径被用于社会科学后，其调查方法通常被称为*行为主义*。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研究典范在心理学[巴甫洛夫和斯金纳（Pavlov & Skinner）的情境理论]、社会学[见诸霍曼斯（Homans）的群体行为分析]以及政治科学[见诸科伊（Key）关于公共舆论的研究]中历历在目。行为主义通过几条道路把它的触角伸向传播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成果是拉扎斯菲尔德和坎特里尔(Lazarsfeld & Cantril)，他们通过检视媒介讯息产生的行为反应，意图创造一种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科学。这里的要点不是要重述行为传播研究的历史，这种历史已经得到一些研究关注(Buxton，1994；Gitlin，1979；Morrison，1978；Park and Pooley，2008)，而是为了使第一代政治经济学置于其主要学术对手的情境中。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从来不反对经验调查或者收集材料证据，无论量化还是质化方法去推进论证。[②]相反，政治经济学要和经验主义以及把所有知识行为简化为对可观察行为进行证伪的理论生产这种做法保持距离。其目标是用一种基于理论和被观察的行为间的辩证关系(我称之为相互建构)的广阔分析去代替这种做法。再者，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在于把大众媒介行为置于政治经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宽泛框架中。政治经济学也论证批判的路径，这种路径根据批判的目的检视那些经验发现，比如，通过建立公共传播体系来推动民主的传播。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经验结论既不是来自暗箱操作也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来自一种与理论表述的辩证关系，并且是对一种具有广泛内涵的政治利益

① 我用“看来”这个词，因为一个广阔的研究群体已经开始质疑：物理科学在经历了其本身就是科学方法的责难后，物理学是科学还有多少可靠性(Haraway，2003；Latour，1999；Sokal，2008)。

② 斯迈思曾首次对商业电视做过内容分析，来支持公共电视网的建立。这项研究吸引了《时代》杂志的关注，他向福特基金申请了资助并用于对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米老鼠俱乐部”做内容分析(1991 年 12 月访谈)。

发言。最后，政治经济学把研究者看作是在调查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弃绝成为“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政治经济学追求解释研究者和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正如斯迈思详细指出的(1991 年 12 月的访谈)：将政治经济学置于人文解释学路径中，这种路径在人类学中已经充分发展，尤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评判的文化研究的路径中。本质上，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1996)详细描述的那样，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容忍在具体研究中的变数，并和文化路径联盟反对二者均认识到的为行为主义所提出的本质主义解释。

随后的几代政治经济学继续把它们自己和行为主义划清界限。然而，在反对实证主义方法时一度是其亲密战友的文化路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政治经济学反目成仇(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5)。正如第十章论述的，这两种路径之间的矛盾由于学者们彼此联合与最终欣赏并广泛彼此引用而得到值得关注的缓释(Meehan，2005；Miller，2007；Ross，2004；Wasko，2001)。尽管如此，在这里有所提及也是必要的，因为了解当前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方法是把它置于转换的语境中，这种转换是从强调与行为主义的差异(至今仍是如此)到其与文化研究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产生过这样几个关注，比如，文化研究对主体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的辩解，这一点很像本质主义者；文化研究也把言说、概念和命名行为看得优于一切；文化研究也反对发展联合系列行为的解释框架。追溯行为主义努力书写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元叙述的同时，政治经济学者也关注元叙述，然而，从它公开反对总体性思维诸形式(总体性包含在文化方案中)这一点来看，这又是自相矛盾的。根据加纳姆的看法，这种趋势源于文学与电影的研究，延伸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中。在其发展过程中，加纳姆总结道：

> 它的浪漫主义情愫如影随形，它渴望逃离人类生活的社会枷锁和物质囿域，它要走出被视为人类本质的异化状态，进入一个身无

羁绊、心无牵绊并随心所欲的世界(Garnham, 1990a: 1-2)。

强烈的批评不仅仅限于分裂的一个方面。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倾向于拒斥政治经济路径，把其看作是经济学的、总体性的或者仅仅是“过时”的马克思《资本论》论调的衍生物(*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5)。再者，这样的论辩热潮也不仅限于传播和文化研究。任何学科都执迷于二者任何一方提出的理论(Sokal, 2008)。[①]然而，正如第十章揭示的，新世纪与生俱来就证明了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分裂正在减弱(Miller, 2004; Mosco, 2004; Pratt, 2004; Ross, 2004; Wasko, Philips, and Meehan, 2006)。

结论

这一章开始检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它始于把传播定义为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尺度或者标记。在追述这个领域的广阔路径的同时，这个定义也包括了信息的传输和意义的社会建构，在其所有形式中，也包括面对面传播和中介传播——从印刷页面到 Facebook。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对几种社会和知识挑战的回应。社会挑战包括媒介作为产业的发展，跨国企业尤为突出；也包括政府的发展以及围绕需要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以矫正全球不均等的争议的发展；最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部分原因是论述这样一个推断——一个信息社会的兴起。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出现于这样的争论：包括主流的经济学及其所支

① 要考虑历史上语言学转向的这种分析。在承认“语言学转向并不完全是有害的发展”后，社会历史学家帕默(Bryan Palmer)总结道：

> 我所质疑、拒绝和把我自己区别于语言学转向的是：语言学转向物化语言，将其客观化为无中介的话语，把语言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之外所丢失的东西，以及语言学在取代本质结构与构造历史附属物的过程中所丢失的东西(1990: 5)。

持的政策这样的主导型的知识传统，比如，鼓吹一种为不大会失察的政府所支持的商业媒介体系。这一章通过解释，得出的结论是：行为主义传统——实际是一种知识“元叙述”，在早年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正式挑战。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研究构成另一种主要挑战。然而，新世纪却给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带来一种不说是亲善的至少也可说是亲近的联系。现在，我们转向图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章中的头一章。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紧随其后的几年直到大约1980年，本章从讲述其早期发展史上北美和欧洲的关键人物与观念开始，到论述世界其余部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结束，尤其考察了由那些我们一度称之为第三世界所组成的社会里的情形。不过，自苏联这个曾经是第二世界枢纽的国家解体后，要处理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有诸多困难，在这种情形下，简单用发展中世界来指称更为有效。

第一节　北美渊源

对于这个渊源的分析会有很多潜在起点。例如，丹·席勒(1999b)已经对罗伯特·布雷迪(Robert A. Brady，1901－1963)的研究有专著问世，罗伯特·布雷迪是商业权力的早期批评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呼吁媒介民主的人。然而，我们要从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开始，这两位北美人无可争议地在该领域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力。[①]

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始于斯迈思。他在这个领域开了第一门课程，他的几个年轻同事和学生继续进行了卓越研究。正如那些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耕耘的人一样，斯迈思深受他卷入其中的核心政治问题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对他来说，这些政治与社会问题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斯迈思尤其说明了有三个转折点，使他的政治态度从一个于1928年把选票投给成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转变为一个追求激进的观念和政治行动主义

的人。

这些包括他对国家卫队和罢工的码头工人之间的冲突的观察，他对赤贫的移民农业工人作了访谈，而这个访谈构成了关于农业援助项目的研究生学院的基础，以及他与那些在西班牙国内战争中支持和抗击法西斯力量的人们的接触。[②]他的结论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个人版首先成长于政治奋斗的实践经历，只是后来才是成长于知识相遇。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迈思被训练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他博采各家学说尔后获得许可进入经济学领域。尽管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主义视角正取得一些定论，但由经济状况的恶化所支持的来自制度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成为当时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斯迈思阅读了奈特(M. M. Knight)等的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奈特收录了诸如制度学派学者凡勃伦(Veblen)的思想，马克思在美国的翻译者的思想也被他收入经济学文集。再者，斯迈思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在提供了政治经济状况的具体分析的政府报告和档案中，包括政府针对19世纪90年代经济崩溃所举办的广泛的听证会记录，以及有关交通行业的研究，后者构成了他日后博士论文主题的基础。

如果说大萧条促成了斯迈思的思想形成，那么，新政[③]方案则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斯迈思进入了联邦政府农业部，后来转入劳工部，在此他与政治上进步的公务人员和工会分子结盟，这种联盟强化了他的批评思考。斯迈思对媒介的研究始于他在劳工部的工作，在那里，他的职责之一是跟踪媒介和电讯产业，了解他们的劳动实践与工会活动。他亲自观察到激进分子的支持者和公司工会之间的抗争，这些抗争是为了获得电话巨型公司AT&T以及电报工业西联公

① 这部分利用转写的录音，这些录音是来自对斯迈思(1991年12月)和席勒(1992年1月)的访谈，以及我与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的交往谈话。

② 他对反法西斯主义阵营的支持日后把他置于美国政府称之为一个“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人们中间，这个标签对他50年代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③ 指罗斯福新政。——译者

司的工人们的支持。这些工作经历使他近距离接触传播工业中劳动过程的变化，比如，广播和电视公司中技能娴熟的接线生开始感到新技术正在使工作不断机械化并使技能不断磨蚀。

斯迈思1943年离开了劳工部并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成为首任经济学家，他的工作是跟踪劳动关系并为费用率听证会提供参考建议。他也参与了广播频率分配的最忙的工作阶段，因为此时委员会应广大业界要求颁发无线电波的执照的要求，分配新的调频(FM)频率，这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电视频道分配。斯迈思后来的工作无法磨灭地打上了这样的经验教训的烙印，即动员商业利益去捍卫对广播和电视的私人控制。①

斯迈思1948年离开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在伊利诺伊大学开始了学术研究的生涯，在那里施拉姆(Wilbur Schramm)已创办了传播研究所。该所开办了传播研究第一个博士项目并成为好几个后来在该领域留下痕迹的研究者的交汇地，包括几个从事批评的媒介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如传播心理学家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以及后来的格伯纳(George Gerbner)，短期访问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赫伯特·席勒。由于当时正处于冷战气氛中，并且传播研究对日益强大的大众传媒至为敏感，于是，斯迈思小心翼翼地开设了一门传播经济学的课程，之后才发展出一门主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个阶段他也完成了几项重要工作：支持公共广播的建立的研究，出版了第一部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957)，开始了作为商品的受众的理论研究。②

当美国的政治变得使人压抑时，斯迈思决定返回他的本土——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在那里的女王大学他建立了传播研究的项目。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已经认识了赫伯特·席勒，因此，在他离开

① 在鼓吹市场的委员的影响下，联邦电讯委员会投票通过保护最大的商业调幅(AM)广播行业的利益(它们“清晰的频道”的发射台在夜间覆盖半个美国)，来对抗调频和公共广播事业的倡议者的挑战。委员会也指定第一个电视频道分配给商业利益，而大多数商业公司同时也是广播工业的执牛耳者(Mosco，1979)。

② 斯迈思第一次正式表述受众商品论是在1951年，是他在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的消费者联盟学会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

后，赫伯特·席勒从经济所进入传播研究所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斯迈思在女王大学用了十年的时间和莱温特(William Livant)进一步发展受众是大众媒介的第一商品的观念。1974 年，斯迈思离职，加盟英属哥伦比亚的西门菲沙(Simon Fraser)大学，在那里，他和制度政治经济学家梅洛迪(William Melody)共事，将主要精力投入电讯政策(主要是以反对 AT&T 公司的反托拉斯法案为主)、受众商品论文以及撰写他主要的学术著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这本书辩证地分析了与美国对加拿大经济和媒介的支配联系在一起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时期，他到处旅游，研究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tore Allende)的普遍联盟(Popular Unity)政府的改革，研究中国、日本、英国和东欧的传播实践与政策。在伊利诺伊，他的主要学生古拜克后来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的领军人物。在西门菲沙大学(Simon Fraser)，他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影响了许多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家，除了梅洛迪，还有巴贝(Robert Babe)、彭达库、莱斯(William Leiss)、贾力(Sut Jhally)、曼塞尔(Robin Mansell)和萨马拉吉瓦(Rohan Samarajiwa)。

1980 年，斯迈思离开西门菲沙到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任职，在那里他与瓦斯科(Janet Wasko)、丹·席勒和我有过短期合作，瓦斯科曾经是古拜克在伊利诺伊时的学生。斯迈思在系列访问学者经历中，继续作研究。最终他返回英属哥伦比亚并于 1992 年长眠于此。我们编辑了一本纪念文集(Wasko, Mosco, and Pendakur, 1993)，书中见证了他对于全世界四代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影响，他在西门菲沙的研究以及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协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也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学者产生了影响，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协会很多年来给予政治经济学以充分关注，部分原因归功于斯迈思的研究努力。

正如同斯迈思一样，赫伯特·席勒把他的政治态度和知识发展归功为他对美国与全球政治经济转变的体验。赫伯特·席勒与斯迈思相隔半个世代，也就是说他在大萧条时期进入中学和大学岁月的学习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接着，他到纽约城市大学任教，这座大学给纽约

工人阶级提供免费的教育，许多科目都弥漫着高度的政治讨论气氛（Maxwell，2003）。尽管他的兴趣在文学，他还是选择了研究经济学。对他来说，是一个“萧条引导的选择”。比起集中精力于英国文学，这更有可能使他找到一份工作。和许多人一样经历了这个经济大动乱时代，席勒强烈地感觉到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根本性的错误存在。

此外，他从军的经历以及退役后在为驻德美国军政府工作的经历都对他产生了实质影响。后者的经历尤为重要，因为它给予席勒直接观察一国的政治经济被压缩为一个非常短暂时期的强制性的转变的机会。对于知识影响，席勒强调美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对该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研究以及大萧条成因的分析。对他而言，这些细致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了关于商业力量如何运作的具体的、系统的证据。

大战、经济需要以及他自己关于学术选择的彷徨耽搁了席勒学术生涯的展开。[①]在他于1960年在纽约大学以战后救助努力的政治经济学为题而获得博士学位前，他有十年时间在做废寝忘食的会议讲师。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和商业研究局（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做访问学者期间，其研究兴趣从资源分配最终转向作为自然资源的广播频率的研究。虽然这期间，他隶属于伊利诺伊的经济和商业研究局，席勒的研究还是吸引了传播研究所的注意，在该所他遇到了斯迈思并于后者离开该所返回女王大学后接过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的《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一书于1969年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也遭到了来自伊利诺伊保守派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这些保守派并不欣赏该书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反对他对越战的反对态度。这些因素外加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提出的一个替代性方案的

① 尽管他被责难“对商业有着敌意”，哥伦比亚大学还是于1941年授予席勒硕士学位。但他对这个精英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并无好感：

> 这里给我一个启示，因为我终于意识到研究生学习过程对我来说是彻头彻尾地不充分的。当时的教科书不过是糟糕的保守主义的调和物，是以脱水过的抽离于现实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更不用说这些调和物所表达出来的理论（有多糟糕）（来自作者的访谈）。

吸引力，他于1970年离开了伊利诺伊，而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马尔库塞已经在圣地亚哥安营扎寨。

在圣地亚哥，席勒完成了一系列的著作，这些著作为定义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贡献了力量，并对世界上的批判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席勒的著作一直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语境中。他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通过论述信息与文化产业日益增长的集中和跨国化，以及主要范例公司，比如盖诺普调查公司，《读者文摘》以及《国家地理》的广阔的政治与文化力量，展开了对信息社会观念的首次持续批评。[①]接着，他的著作《传播与文化支配》(*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论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对智利阿连德(Salvatore Allende)政府努力建立替代性传播体制的直接观察。席勒和努登斯特伦(Kaarle Nordenstreng)合编的《国家主权和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一书论述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的核心问题。[②]

在接下来的两本书——《天晓得》(*Who Knows*)和《信息和危机经济》中(*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席勒回到信息控制这样的主题。这些主题检视了信息和传播体系对于跨国资本的普遍运行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在第二本书中，他论述了这些体系在克服继续困扰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中的极端重要性。

在《文化，公司》(*Culture*，*Inc.*)一书中，席勒重访文化工业的主题，并通过论述学术科目的趋势，尤其是对转向文化研究的关注而与先

① 这本书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同年出版，后者设置了关于“信息社会”的议程，比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和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一书早一年出版。《劳动和垄断资本》现在是“信息劳动”研究的经典文本。在广受欢迎的《现代心理学》杂志的一项民意测试的摘录中，席勒特别引人注目，杂志的编辑们给了一个席勒认为是“煽动性”的标题：“民意调查是为现状而工作的妓女”。

② 这本书也非常著名，因为它是由Ablex出版公司出版、由Melvin Voigt编辑的第一本传播专著，该书呈现了90年代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

前的研究分道扬镳。席勒致力于文化，因为他知道文化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通过检视在城市街道、公园、户外广告、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的文化，评估了文化对于社区的重要性。对他而言，那些地方展示了“社区的经济生活不能与其符号内容分离”，并且“言说、舞蹈、戏剧、音乐以及视觉和造型艺术从远古时代以来就是人类经验的生死攸关、必不可少的特征”（Schiller，1989：31）。他对文化持一种批判的视角，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从经济基础引申而出的上层建筑，文化不但不可避免地与物质内容纠缠在一起，而且文化是一种物质。他对学术界文化研究的关注是基于一种担忧，他担忧学术界贬低文化，而这种贬低是通过把文化抽离于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彼此建构中所发挥的最为重要的作用的领域。

在席勒与普雷斯顿（William Preston）二世、赫尔曼（Edward Herman）合作完成的《希望和愚顽》（*Hope and Folly*，1989）（该书例证了建立信息新秩序的呼招的衰亡）以及与努登斯特伦第二次合作完成的论文集《超越国家主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1993）两书中，席勒回到他对国际传播变革的日久弥坚的旨趣。他也与莫拉那（Hamid Mowlana）和格伯纳（George Gerbner）合作，在一本由国际媒介研究学者写就的论文集中，提出了思考海湾战争的全球视角。①

席勒最后的两本书把研究精力转向美国及其日益深化的麻烦。在《信息不平等》（*Information Inequality*，1996）一书中，他描写了接近传

① 《希望与愚顽》例证了由美国为主导的保守势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大获全胜。该书原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理出版，在此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了由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的支持者所提出的诸多关注。但是，等到该书完成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如此希望通过让美国和英国重返该组织而变革自身，以至于它拒绝出版该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但是一份免责申明指出，该书的内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毫不相关。根据 Nordenstreng（1993：253）的说法，这不是联合国“反知识分子迫害”的第一案。早在 1973 年，它就把 Dallas Smythe 排除在为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研究项目而设立的专家小组名单外。这是在他撰写了两篇批评主流的国际传播政策以及醉心于新传播技术的文章后发生的。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82 年出版的文集中，拒绝刊载原本委托席勒撰写的文章。

播的日益增长的鸿沟，预言了很快成为热门话题的“数字分裂”。但与那些把鸿沟仅仅看作是为人们提供技术而已的人们不一样，席勒把它看作是经济和政治资源产生了鸿沟的美国正在进行的社会阶层和族群分裂的征候。最后，在席勒于2000年辞世时还在继续写作的《生活在第一国》(*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一书中，他就扎根于世界帝国中心的作为批判学者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话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个人见解。

席勒是行动主义学者的楷模。除了以多种主要语言出版发行的大量研究贡献外，他在诸多地方的、国家的与国际组织面前发表了关于文化和信息议题的演说。他在遍及发展中世界、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组织以及第一世界面前发表演讲的非凡的记录揭示了他这样的信念：反对全球媒介工业并产生一个商业文化的替代方案是必要的。而在第一世界中，由泰格(Tiger)写作并出现在独立媒介上的经典文章——“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中，他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席勒的研究是世界信息新秩序观念的主要灵感之一。他是国际媒介与传播协会的领军人物之一，尽管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提出另类学院的想法被新保守主义所摧毁，席勒还是在那里对许多学生以及他自己和后几代的传播研究产生了影响。

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中期，当欧洲的研究展开时，北美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还基于席勒和斯迈思的研究。直到斯迈思的学生古拜克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任职并吸引在那个时代受政治与社会剧变影响的学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北美的政治经济学才出现一个极具意义的向上转型的成熟时代。

单单一次会议并不足以产生一个领域。然而，如果在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有一个关键事件的话，那一定是1979年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把斯迈思和希勒的学生以及那些了解他们的研究并对发展政治经济学路径充满兴趣的人们召集在一起。作为电影工业的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古拜克和他的几个弟子在此领域占有领导地位，这些弟子包括研究电影的瓦斯科，研究受众的米汉

(Eileen Meehan)，研究技术的斯莱克(Jennifer Slack)，以及研究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菲杰斯(Fred Fejes)。以讨论批判的传播为主题，这次会议聚集了众多后来继续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实质贡献的人们。除了这些人，也包括斯迈思自己及随他而来的他在西门菲沙大学的研究生彭达克(研究电影和印度媒介)，还有甘地(Oscar Gandy，研究技术和种族)，马尔文(Carolyn Marvin，研究技术史)，海特(Timothy Haight，研究传播社会运动与政策)以及那时是乔治敦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我自己(研究社会学与政策)。

这次会议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而意义深远。一是，第一次聚集了包括斯迈思及其学生古拜克与彭达库，还有古拜克的学生们在内的三代政治经济学者；二是，此次会议表明政治经济学学者网络的形成迈开了主要的一步，也表明政治经济学路径那时至少在北美主要局限于斯迈思和席勒的研究的状况向前迈进了主要一步；三是此次会议表明该领域正开始吸引一批女性进入这个曾被男性主宰的路径，甘地的出席意味着该领域并不限于白种人。最后，此次会议是朝向民主传播联盟的形成的主要一步，该组织将近30年里都最好地代表了北美政治经济学和行动主义的传播研究路径。

在大约同一时期，其他几位学者开始在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展开有意义的职业生涯。埃文(Stuart Ewen)对广告的研究，丹·席勒对新闻史的研究，萨斯曼(Gerald Sussman)对亚洲媒介和政治传播的研究以及麦卡娜尼(Emile McAnany)对拉丁美洲媒介和发展传播的研究都是代表性的例子。

第二节　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描写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的出现不如描述北美那么容易，因为在描述北美时，我们可以清楚地指出如斯迈思和席勒这样的关键人物。然而，从早期人物英国的哈洛伦(James Halloran)和芬兰的努登斯特

伦开始讨论是有益的，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国际研究引起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注意。

哈洛伦在英国传播研究发展中是领军人物。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在他主持的莱斯特(Leicester)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中，戈尔丁和默多克的研究成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议题设置作出了贡献。此外，哈洛伦在担任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的主席的近二十年里对世界传播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Hamelink and Linné, 1992; Hamelink and Nordenstreng, 2007)，尽管长期担任国际专业协会这个最接近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袖，哈洛伦并没有首肯这个路径，而是选择了把其研究及其中心的研究置于批判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传统中(来自1992年4月的访谈)。他指出中心的设立是为了回应1961年内政部对不良少年问题的关注以及评估电视影响的兴趣。尽管他承认政治和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但他的主要的学术和研究项目的兴趣聚焦于发展一种批判的社会学路径(*Center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4: 8)。哈洛伦把这种路径区别于传播研究的主流先锋，这些先锋的实证研究路径把数据收集置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之先(Halloran, 1981: 23)。

在哈洛伦作为主任的任期内，该中心坚持出版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其中几个学者，尤其是默多克和戈尔丁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正如哈洛伦、默多克和戈尔丁所认同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采用了社会学的或者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对待具体的社会问题。尽管研究范围依然很广阔，但是，重点却是强调年轻人、家庭和社区面临的问题，包括对少数民族的传播需要和社会学关注。事实上，默多克看到该中心获得很少的资助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大部分的研究，比如哈里斯(Philip Harris)对于新闻通讯社的研究，哈特曼(Peter Hartmann)对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研究以及默多克对广告工业的研究都结合了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几种研究路径，并且，所有这些研究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以及政策研究实际构成了1984年

以来该中心的所有报告(来自1992年4月与哈洛伦、默多克和戈尔丁的访谈；Center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1)。尽管人们把政治经济学与该中心联系在一起，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出版物几乎全部在该中心的赞助之外。确定了这一点后，戈尔丁总结道，在近似由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霍尔(Stuart Hall)领导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这种意义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叫做政治经济学的“莱斯特学派”，甚至比不上由布卢姆勒(Jay Blumler)和麦奎尔(Dennis McQuail)在利兹(Leeds)领导下的政治传播学派(School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那些看来是一种制度化的研究项目，遵循一种遍及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模式，实际上是一群个人努力的成果，默多克、戈尔丁以及埃利奥特(Philip Elliott)和不时加入的其他人努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Golding，Murdock，and Schlesinger，1986)。他们共同钟情于批判的社会研究，而不是给予政治经济学特别注意。

哈洛伦并非同辈欧洲传播学者中唯一支持(如果不直接说是塑造)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学者，例如，普罗科普(Dieter Prokop)对媒介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把传播工业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连接起来(1983；1974；1973)。恩曾斯伯格(Enzensberger)的文章——“一种媒介理论的构成”(参见Enzensberger，1974)提出，通过发展一种着重强调阶级关系、冲突以及媒介矛盾而又颠覆性的本质的媒介理论，来填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空白范畴”之一，该文是这方面的早期努力之一。这里的要点是，尽管我们能够识别出如果不是如斯迈思也是席勒这样的同时代的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但他们对后来的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力并不如斯迈思和席勒对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那么证据确凿。从这个视角进行的持续研究开始于随后的那一代传播学者。

芬兰的努登斯特伦多年以来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以及在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政治争论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着力于对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技术乌托邦的问题作批判

(1968)。他因对全球传播尤其是努力矫正不均衡并因此使大众媒介民主化而闻名于世(Traber and Nordenstreng, 1992; Nordenstreng, 1984)。他的研究素养深厚扎实，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致力于使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诞生的不屈不挠的政治行动主义，并在被称为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中，努力把这个新秩序延伸到因特网和其他新媒介中(Mansell and Nordenstreng, 2006; Nordenstreng and Padovani, 2005)。努登斯特伦尤其擅长于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策行动主义者召集在一起。当今世界只有极少地区未曾受到他的组织能力的影响。

努登斯特伦(1993, 1979)和席勒合编了国际传播的主要论文集，这些论文集显示了强烈的政治经济影响。然而，他与斯迈思和席勒不同，我们不能轻易确认他采纳了政治经济学路径。这并非因为他缺乏对政治经济学者的主要关注的理论问题的兴趣，他曾使用显然是席勒和斯迈思的交叉的学术框架做了研究(Nordenstreng, 2004)。然而，尽管显然分享了适切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价值观和评价，但他并没有对大众媒介和传播的经济维度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比之于哈洛伦选择批判的社会学作为关注的焦点，努登斯特伦则聚焦于传播的批判政治学，尤其是在国际和道德宣言中，这为他长期致力于政策研究和干预提供了基石。他的这种行事风格影响了包括政治经济学者在内的众多传播学者和行动主义者。然而，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并不如斯迈思和席勒那么直接，因为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方面并没有持续的研究兴趣，加上他选择了聚焦明白无误的政治议题，他对媒介商业和文化与传播的商业化少有发言权。

斯迈思和席勒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型方面产生影响的该领域开展了研究项目。哈洛伦和努登斯特伦为针对欧洲的研究和世界其余部分的研究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这是通过哈洛伦为 IAMCR 工作以及努登斯特伦在大量国际议题中的研究来做到的。然而，一种政治经济学路径在欧洲的持续发展出现在 1974 年和 1982 年之间，一系列具有理论色彩和项目特征的文章对于把这个领域放在欧

洲的知识地图中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核心的研究包括默多克和戈尔丁(1973)的“为了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以及他们的(1979)“资本主义、传播和阶级关系”(“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加纳姆(1979)的“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作贡献”(“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以及马特拉为他和西格劳布(Seth Siegelaub)二人合编的两书——《传播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ism, Imperialism*, 1979),《传播和阶级斗争:解放与社会主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iberation, socialism*, 1983)写的像书一样长的导言。这些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建立了项目位置,而这一点深远地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①

默多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后,他通过把这种知识训练背景运用于理解文化生活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在苏塞克斯(Sussex)大学撰写了在精英艺术市场中纽约的兴起与巴黎的衰落的论文。他对流行的青年文化产生的兴趣把他带到莱斯特,在那里的二十年中,他在文化和传播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工作,90年代中期,他离开莱斯特和戈尔丁重新合作,那时,戈尔丁在莱斯特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后已来到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学就职。尽管戈尔丁对传播研究的社会政策维度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兴趣,但其知识训练也是社会学。加纳姆来到传播研究领域是以电影研究为背景,他创办了《媒介、文化和社会》(*Media, Culture*

① 这是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除了这些研究,其他一些人致力于整合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由传播实践提出的特殊问题(de la Haye, 1980; Hund and Kirchoff-Hund, 1985; Prokop, 1983)。提到政治经济学团体在意大利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包括切萨雷奥(Giovanni Cesareo),格兰迪(Roberto Grandi)和里凯里(Giuseppi Richeri),这些人的著作影响了政治经济学在欧洲和北美的发展。在西班牙,一个包括马德里学者布斯塔门特(Enrique Bustamente)的团体发行了期刊 *Telos*,这份期刊刊载传播和新技术议题的政治经济和政策分析的文章。

and Society）的期刊，并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度过了其学术生涯。[①]

出生于比利时的马特拉在鲁汶（Louvain）大学得到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在索邦神学院[②]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从 1962 年开始，他是智利大学的教授，直到 1973 年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在民主改革的平台上被选举出来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其在拉丁美洲度过的岁月中，马特拉受到该领域的影响并为该领域的研究课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也就使他有机会与斯迈思和席勒联系，当时，后两者正在该领域研究美国媒介的影响（参见 Schiller，1976）。他也承认由社会学家莫兰（Edgar Morin）发展出的法国“文化工业”路径对他的影响。离开智利后，他一直是巴黎大学的教授。

尽管在一些方面有差异，这些学者的早期研究对以下做法都有着明白无误的共同兴趣：批评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及对其进行不同解读，并由此来理解传播、大众媒介和文化实践。默多克和戈尔丁 1973 年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操练，因为这项研究开始描绘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地图，在英国文献中，无人曾经涉足这个领域。[③]他们以英国媒介作为个案，见识了在出版业、报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唱片行业中的工作结盟与所有权集中的过程。除了提出已被接受的媒介所有权集中趋势——整合和多样化经营，他们也呈现出那个时代的一种新发展——英国媒介的国际化。最后，他们评估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广泛含意，包括在娱乐与信息方面选择的局限性。尽管他们对大众媒介的商业力量进行了早期的系统分析，但是他们也通过把他们自己置于开放性的情形中，小心地限制

① 加纳姆强调了影响其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和脱胎于霍加特、利维斯（Leavis）、汤普森（Thompson）和威廉斯（Williams）的研究的社会史，这带领他进入文化工业的领域，在该领域，他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的纪录片电影，包括一个与威廉斯合作研究的电视节目；二是他卷入了英国电视发展和 BBC 角色的争论中。

② Sorbonne，巴黎大学的前身。——译者

③ 他们指出（1973：205）：媒介，不像教育研究，其“在很大程度上并未经检视”，并引用 1973 年的一个文集《权力在英国》（*Urry and Wakeford*，1973），这个文集不仅缺乏媒介这一章，而且在索引中未包括关于媒介的参考文献。

他们的结论：

> 描述和解释媒介的商业利益并非是为了建言一个确定性的关系，而是图绘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的局限性。文化生产保有一种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来自传统、职业意识形态以及对自由主义共识的真实包容性。(1974：226－227)①

默多克和戈尔丁1979年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更为清晰明确的理论蓝图，从而把政治经济学路径置于批判理论的宽泛框架中。这表明，对他们而言，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述的批判性解读可以为马克思的遗产及其应用于传播研究之间提供一种基本联系。例如，默多克和戈尔丁通过指出霍克海默尔和马尔库塞在社会研究所的贡献以及突出阿多诺对于音乐工业的研究，开始做马克思主义路径的文化分析的文献综述。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 阿多诺坚持文化支配的过程根源于“文化工业”的经济动力，这是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必要起点。(1979：18)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强调“这只是起点”，并接着批评道，“简单地宣称‘文化工业’的资本主义基础必然导致和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致的文化形式理由并不充分”(1979：18)。②同样，加纳姆在同一年的文章中指出，原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与后阿尔都塞倾向的对照中论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默多克为他们论述的奇特方式而喝彩。他相信法兰克福学派承认“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确实被工业

① 早期著作试图把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置于一种宽泛的理论框架中，看到他们如此小心谨慎颇为有趣。这意味着从一开始这种路径清除了“经济主义”。

② 在一次访谈中(1992年4月)，默多克指出了普罗科普(Dieter Prokop)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术传统的直接关联。

化；上层建筑被侵蚀并且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通过瓦解为基础而被打破”。他将这种观点与另外一种替代性的学术立场——也就是为文化研究所采纳的立场对比，这种立场的结论是，我们正在观察“基础向另外一种自治的上层建筑话语转型的过程”（Garnham，1979：130）。尽管如此，像默多克和戈尔丁一样，加纳姆把法兰克福传统的研究议题归结为：

> 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立场的弱点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基础或者经济的重要性，而是未充分考虑他们所观察到的经济过程的矛盾本质，由此也就把文化的工业化看作是毫无疑问的且是不可抵挡的趋势。（Garnham，1979：131）

马特拉从立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马克思思想文献出发，并不是那么关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径的关联。毫无疑问，这种做法部分地源于他所承认的法国传播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诸如阿尔都塞和巴特（Barthes）这样的法国知识分子所开辟的理论工作——这些理论工作影响了伯明翰的斯图尔特·密尔，却几乎没有在法国的基础媒介研究学院得到教授职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产生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的法国版，这一点也导致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缺乏（Mattelart and Mattelart，1992）。尽管如此，就如同马特拉的英国同行，马特拉拒绝把权力看作是单一的，而是超越它直抵基本矛盾，因而，从一开始就把对待意识形态一成不变的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路径弃置一旁。①

---

① 他这样解释道：

> 阿尔杜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最具误导性的倾向之一是，其关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装置的运行方式的统一的、垂直的观念，并没有把意识形态装置考虑为从属于阶级矛盾。这种路径最为明确的后果是把被支配阶级对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抵制实践边缘化，并且也忽视了那些意识形态装置的运行的内部失调特性。（Mattelart and Siegelaub，1979：29）

这种把传播研究植根于马克思思想传统的兴趣引导这些作者及他们的同行坚决地采取去媒介中心化的立场。[①]这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确实是真实的，而且这意味着把资本主义的分析推向前台，包括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商品化、社会阶级的分化和斗争、矛盾和反抗运动。去媒介中心化实际上反而提升了媒介研究的高度，这是通过如下做法实现的：把媒介从孤立的、边缘的并主要是非理论的活动领域，转向一个在广阔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对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基础性的领域。默多克和戈尔丁(1979)用媒介研究和社会学中的“双重真空”(“double vacuum”)来明确讨论媒介中心化的缺陷：鉴于这类媒介研究典型地是以一种开列清单的方式来探索社会领域的——媒介和阶级，媒介和青年，媒介和女性等，这种方式意味着一种松散连接的多元主义。因而，社会学理论简单地倾向于忽视媒介。

加纳姆认同传播需要置于广阔的理论框架中的做法，他论述道(1979：202)，把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置于资本主义的总体分析情境中，“在那种广泛的框架中，以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为辅，这种广泛框架是对一种重要的但却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广泛过程做历史具体性模式的分析”，加纳姆对该领域的大部分兴趣都来自他对围绕着英国的大众媒介和电子传播过程的核心政策的争论的解读和参与。[②]其兴趣也源自与雷蒙德·威廉斯的联系中，后者以为流行文化保留地盘为目标，而这种流行文化与以市场为驱动的把流行和大众消费结盟的企图形成对比，因

① 讨论以上这些作者的所有同行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如此，提及西格劳布(Seth Siegelaub)十分重要，他与马特拉在几个项目上亲密共事，包括合编两卷本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以及编辑发行多卷本的参考书目 *Marxism and the Mass Media*。他也初创了国际大众媒介研究中心并掌管出版业 International General，这个出版社正是负责出版以上著作以及其他媒介批评的著作。西格劳布的主要政治经济学知识来自他作为政治行动主义者和手工劳动者的实践。

② 这种观念的重要表述见诸于加纳姆在 1973 年的专著中(1978 的修订版)，这本专著对英国的电视工业的政治经济和公共政策进行了专门论述(Garnham，1978)。

为它是民主的、具有抵制性的和可替代的(来自 1993 年 11 月的访谈)。[①] 同样地，对于马特拉来说，“传播装置运行的方式决定了讯息的交换和精致化，也是与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人们的行为提供条件的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机制一致”(1979：36)。

媒介去中心化的过程将资本、阶级、矛盾、冲突和反抗斗争概念置于前台，对默多克和戈尔丁(1974)来说，对资本的分析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明显开端”。具体说来，这意味着“大众媒介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工业的、商业化的组织，它生产和分配商品”(Murdock and Golding，1973：205－206)。加纳姆挑战了他自己所指出的大众媒介是社会成型为相对自治水平的理论化，而赞同把大众媒介看作是“首要的经济实体，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其作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具有直接的经济角色，同时通过广告，在商品生产的其他部门中的剩余价值创造中也具有间接的经济角色”。(1979：132)结局并非是相对自治，而是“在具体的各种体制内部以及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具体商品形式中具有一种紧密的彼此交织的关系”(1979：132)。在默多克看来，马克思对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核心洞见是，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把一切简化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动力中。马特拉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作是其“最成熟的作品”，并详细描述传播生产模式的具体维度：(1) 生产工具(被用作传输信息的机器)；(2) 工作方式(具体实践的类型，符码等)；(3) 生产关系(所有权关系，传-收关系，劳动分工，组织形式与实践)。

在欧洲政治经济学家眼中，尽管阶级关系的联合是一套复杂而矛盾过程，社会阶级关系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这些关系主要牵涉传播工业企业家和广泛的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关系，媒介工业领袖和那些

① 加纳姆强调，传播政治经济学本身是流行文化行为的广阔过程的一部分，例如，它是为了民主行动而进行的广泛的知识和流行运动的一个学术派别(来自 1993 年 11 月的访谈)。

实际生产媒介产品的人的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①]，以及接收动力——比如，人们如何采纳、重构和抵制那些或紧或松地体现在文化商品中的系列意义。

尽管资本具有权力，但资本稳固的每一个时刻都打上矛盾的烙印。因此，虽然政治经济学者承认资本具有把社会(包括传播)实践吸纳进交换价值的逻辑的能力，但他们仍然拒斥一致论(correspondence theories)，一致论毫不含糊地把资本的逻辑与文化生产的逻辑联合在一起。加纳姆指出了把这种逻辑的强制性看作是非矛盾的趋势并总结说：

> 学者在一开始就必须强调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固然资本控制文化生产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商品必然会在其明显的内容中或者在其挪用的模式中，支持支配性的意识形态。(1979：136)

按照加纳姆的说法，这些产品不仅能够具有“深刻的颠覆性”，也必然被看作是在明白无误的资本家和非资本家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抗争的产物，也是在这些结构之间和之内的阶级抗争的产物。例如，用艺术或工匠的手法来制作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也可以适合于资本的逻辑，只要资本还控制着大众再生产和分配；而艺术工匠的生产为资本提供多元性并吸收了资本的大部分风险。尽管如此，这种形式的生产也已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的场所，是捍卫为了使用的用户化的、工艺化的生产而反对单纯为了利润的大众生产。

马特拉通过把矛盾和冲突置于全球语境中而扩展了他的研究。其早期研究对于大量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传播学者普遍采纳的观点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他对文化帝国主义提出高度精细的视角，除了理解传播

① 尽管默多克和戈尔丁赞同阿多诺关于资本主义对音乐工业的影响的观点，但他们(1979：18)指出他忽视了“那些实际生产‘文化工业’售卖的产品的人的具体活动过程”。

权力的模式，这些视角还考虑“第二帝国主义”的复杂形式——比如在墨西哥、印度、埃及以及意大利的发展；也考虑这些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多样社会实践——比如，体育、旅游等；还探索使生产和接收的矛盾和冲突过程概念化的多种形式，包括大众、流行与民族文化。①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传播政治经济学即将在北美和欧洲发展为一种集体的事业。这一章结束于确认这个基础的另一个支柱，即政治经济学视角在世界其余地方的发展。

第三节　走向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之路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打下了基础，包括发达地区，如：澳大利亚(Graham，2000)、新西兰(Hope，2006)以及日本(Morris-Suzuki，1988，2005)。一些研究在随后的章节中将被提及，但本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论述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在发展中国家的诞生。

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奋斗的呼唤在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之间得到发展，这是从亚非拉国家不结盟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国家宣称忠于国家自决，给予传播政治经济学以政治目标和一种新的动态的研究议程。在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组中，传播扮演了何种角色？传播和文化如何复兴了对形式上独立的国家的支配权？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来矫正国际传播的不平等？

发展中世界的研究与发达世界的同行是分离的，因为它主要是从一系列的社会抗争中淬炼出来的，而这些斗争为不同地区的多种形式所界定，可以被不同地确定为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或者社会主义斗争。这

① 这些观念出现于 1979 年文集中，并在 1983 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扩展。正如马特拉指出的(1979：56)，他的妻子米切尔·马特拉(Michèle Mattelart，1977)对大众和流行文化的区分提出了更为清楚的界定，后者不是大众文化的正式替代，而是“一种质上具有差异的实践，此中包含人们的经验，从追求解放的谋划中，人们成为文化体验的积极主体”。

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爆发的运动有助于创造一种知识和研究的议题。实际上，那些在革命运动中作为领导人物的人士，如毛泽东、胡志明、卡布拉尔[①]和格瓦拉，其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这个阶段的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也因为他们明确地承认控制传播手段的重要性而著名，包括控制广播和其他电子手段去为革命提供支持。诸如阿尔及利亚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65)和巴西的弗莱雷(Paulo Freire，1974)这样遍布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领袖们，就大众媒介和文艺作为革命行动的工具而著书立说。尽管马克思思想和其他批判思想的早期变种对传播、公共舆论和意识形态颇为关注，但他们的著作一开始就与经济倾向相分离。

发展中世界的研究萃取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热战”，它从两个相关方向同时起步。首先，它淬炼为一种对现代化路径的批判，认为现代化路径是前殖民势力对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政治与军事成功而展开的主要回应；其次，发展中世界的研究提出一系列视角，令人耳熟能详的是依附理论，此理论建构了理解政治经济的全球转型的独特框架。所谓发展主义或者现代化理论路径也是淬炼于斗争中的。对于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说，他们感受到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庆功，因为共产主义以及被西方看作是其表现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解放的运动正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拦路虎。为了克服障碍，赢得对“第三世界”战争的胜利，比如，为了击退共产主义和安抚发展中世界，西方社会的全球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运动空前甚嚣尘上。

发展主义作为一种领导性的知识灵感，整合了以顶尖大学和研究中心为基础的精英学术团体，去确定如何安全地捍卫为资本主义包围的发展中世界。由于发展主义的核心观念隶属于一种正在凋敝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立场有助于磨砺发展中世界以及发达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学

① Amilcar Cabral，刚果独立运动领导人。——译者

者们的知识锋芒，于是，现代化理论很容易被看作资本主义霸权的简单辩护而烟消云散。但那也许是错误的，现代化视角的使用毫无疑问是捍卫美国是一种相当不同的力量的一种工具，这种力量是帮助其疆域之外的民族国家——包括那些在战争中为它所征服的国家，加入现代世界中。然而，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可以作为传播理论包含一套老练的工具，这套工具是针对变迁的军事、政治和知识条件以便建构一种霸权。

现代化理论脱胎于美国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其西方盟友在二战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西方面临遍及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剧变，只有美国处于掌管这些发展并把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带入正在变化的战后的资本主义分层等级中的有利地位。诸多现代化理论是古典社会学模式的副产品，尤其清楚的是来自腾尼斯(Tönnies)的著作，这使传统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乡村区别于都市，礼俗社会区别于礼法社会(Mattelart and Mattelart，1992：171－172)。这种观念的问题是，它暗示了现代化的支持者都是单纯的社会学家，这些社会学家试图运用简化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学来做研究，这些学者如勒纳(Lerner)、普罗(Pool)以及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他们不仅读腾尼斯的著作，也从其世纪转折的观念来理解“现代”的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型的。

现代化理论意味着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构，将非西方国家纳入正在兴起的国际结构的等级中。重构的一个因素是“民族建构”，这是一个创造精英的过程，这些精英可以有效地以民族主义取代由苏联和结束大战不久的中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民族身份认同的旗帜下，这些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会联合其余的必要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去抵御革命的挑战，抵御社会主义的挑战，后者扬言超越民族的差异、组织广泛的被排斥的阶级和阶层来反对日益增长的跨国商业和日益军事化的美国政府。尽管美国不断地努力去推动“民族建构”，但还是无法仅仅通过军事手段达到此目标，其国内压力也不允许它再次在欠发达国家推行一个二战

后如马歇尔计划那样的不堪重负的援助项目。[①]伴随着军事与经济攻势，美国还利用那些传播和知识工具，也就是其媒介和信息工业已经在战前开始磨刀霍霍并从战争的冲突中赚得盆满钵满。[②]

早年间，正如萨马拉吉瓦(Samarajiva，1985)和其他人(Mattelart and Mattelart，1992；Sussman and Lent，1991)指出的，传播策略意味着用心理战的方法，用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拉斯维尔(Harold Laswell)的话来说，在和苏联的对抗中“搞清楚真正的同盟和敌人”。勒纳(Daniel Lerner)的书《心理战》(*Sykewar*，1949)一书成为他后来在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1958)的原型。后者用了广泛的访谈，去图绘支持或者阻碍现代化的系列态度与价值观(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可以以多种方式加以理解)，但特别是支持那些其目标是建构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国际力量。接着，特别是在施拉姆(Schramm，1964)的著作中，现代化理论家直接转向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工具的大众媒介。事实上，媒介发展的水平成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的主要指示器之一。直接遵循这个前提，罗杰斯(Rogers，1971)开始检视革新与社会变迁的普遍倾向，包括现代传播手段的导入。这点是至关紧要的，因为改善对媒介技术和媒介讯息的普遍接收条件对于实现发展的广阔目标是生死攸关的，这些目标包括改变大家族结构的社会需要、创造市场经济的经济需要以及建立一个国家的和地域化的领导者的支持阶层的政治需要；图绘创新扩散的曲线是另一种刻画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追寻包括大众媒

---

① 建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项目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严肃关注，即使如总统肯尼迪对拉丁美洲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提出议案，但实际的美元援助与其政治修辞相去甚远。指出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即尽管马歇尔计划包含一个真实的经济承诺，但这种承诺最为重要之处在于，很好理解的是美国商业急于赢得未受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威胁的欧洲市场。

② 战时知识行为和美国发展策略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问世(Samarajiva，1985；Sussman and Lent，1991)。但传播策略不仅淬炼于反对敌人的行动中，实际上，在调查和知识研究中最有意义的大踏步进展是依赖于最为真实的“被俘获的受众”以及其军事力量来执行的，而这些“被俘获的受众”曾几何时已经列阵在美国历史上了(参见 Stouffer，1949)。

介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机遇目标。

由现代化理论激发出灵感的传播研究项目非常具有影响力，这些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的大量信息，并且有助于形成大学传播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就拿拉丁美洲来说，麦卡娜尼(McAnany，1986：29)总结道，第一代或者两代本土传播研究学者都受到美国功能主义传统的熏陶，这也就是现代化所出之门。在资源缺乏的地区，这意味着大多数学校、杂志和教科书都是美国政府的援助所资助或者组织，并且由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所掌管。尽管如此，无论对这些层面的影响力有多大，现代化在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真实经济条件时几乎无能为力。现代化的理想和实际成就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填在鸿沟中的是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一些批评家通过解剖现代化理论磨砺了他们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技能。拉丁美洲的情况尤其如此，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无可争议地是发展主义蓝图的最重要的目标。自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对美国而言，与处在贫穷和社会剧变中的国家分享半球的一般问题复杂化了。

作为现代化规划带给拉丁美洲的“特殊待遇”的部分结果是，批判研究在相对较早的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展了，比如，智利的马特拉的研究，巴西的弗莱雷，委内瑞拉的帕斯夸利(Pasquali，1967)，阿根廷的贝隆(Veron，1967)。[①]这些都是首批检视媒介发展规划的后果的人。在他们对文化、大众文化、新闻和电视的研究中，他们展示了西方媒介公司是如何成为现代化规划的主要受益者的。对拉丁美洲的人们来说，这些规划既是金钱的浪费也是加深发达国家中的贫富分化以及对西方富裕国家依赖倾向的工具。

---

① 帕斯夸利和贝隆的研究在北美并不那么著名。前者利用其存在主义哲学的知识背景，批判现代化理论家的机械表述，他论争说，这些现代化理论家对传播根本不感兴趣，不过是利用信息和技术作为在拉丁美洲建设一个大众社会的手段。贝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和巴特结构主义著作的影响，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批评意识形态，包括西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装置。对拉丁美洲文化研究兴起的综述，请参看A. O'Connor(1991)。

20 世纪 60 年代和整个 70 年代，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风起云涌的批判扩展到大众媒介，并且由于依附理论的兴起而收获了富有意义的理论基础(Beltrán， 1976)。政治经济学研究在 1976 年，由于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Mexico City of the Instituto Latinamericano de Estudios， ILET)的成立而取得长足进展。该研究所原先是由玛塔(Fernando Reyes Matta)、荣卡利奥鲁(Rafael Roncagliolo)、施米克勒(Herbert Schmucler)和波塔莱斯(Diego Portales)所领导的一群学者组成的，其主要兴趣是跨国商业研究，尤其是媒介公司的影响力研究。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影响力在国际政策争论中最为有力地被感受到，特别是通过索马维亚(Juan Somavia)致力于矫正信息的全球生产和分配的不均衡的研究，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U. N. 's McBride Commission)的成员之一。根据荣卡利奥鲁(1986： 79)的研究，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媒介研究议程论述了三个政治经济学家一直面临的中心问题：

1. 在跨国化过程中的文化，以及在文化过程中的传播的地位是什么?

2. 除了表明在跨国层面上将需求同质化之外，消费的跨国化还包含什么含意?

3. 真有一种叫“跨国文化”的东西? 还是仅仅是行为类型的跨国化?(请参见 Chakravartty 和 Zhao 的最新版本，2008)

这个概念框架将媒介置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情形中，同时将消费置于普遍的跨国化的过程中。再者，该概念框架把跨国化、国际化和同质化之间的关系置于其研究议题的中心。[①]除了向拉丁美洲人民论述了媒介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对于一个替代性理论框架的发展，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依赖理论，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以及其他人不仅是贡献者也

① 这个路径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拉丁美洲媒介学者早早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是重要的也是有问题意识的并且是复杂的。同样，跨国的、国际的以及同质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既不是简单化的也不是机械的。

是受惠者。

在其他一些传播研究中心中，在秘鲁首都利马成立的拉丁美洲所（Institute for Latin America，IPAL）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来源格外突出。在其创立者荣卡利奥鲁的指导下，IPAL 把政治经济研究带入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对于该路径在当代的发展日益重要起来。IPAL 除了研究印刷和电子媒介，尤其关注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使它站在了对现代化理论的新阶段的争议的中心，比如，市场导向的电子传播的建立以及遍及发展中国家的远程信息处理体系的建立。而且 IPAL 对社会抵制文化以及围绕大众文化和传播组织起来的另类社会实践颇有兴趣。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古巴的鲜明特征，哈瓦那大学的冈萨雷斯-马内（Enrique Gonzalez-Manet）是领军人物。冈萨雷斯-马内（1998）在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方面特别活跃，他全面分析了拉丁美洲的媒介体系，为发展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社会主义版本的推广做出了努力。

在发展中国家淬炼于实践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却是由依附理论的理论性表述所激活（Amin，1976；Baran，1957；Cardoso and Faletto，1979；Dos Santos，1970；Emmanuel，1972；Gunder Frank，1969）。尽管关于依附的含义有很多争议，以至于我们在简介这个视角时要小心为妙。但是，少数核心概念似乎还是最被赞同的，包括这些观念：跨国企业基于核心国家并得到他们各自国家的支持，跨国企业通过设立进行资源、生产和劳动的市场交易的条件来对核心之外的国家实施控制。通过控制交换条件和市场结构，跨国资本确立了在其腹地的经济活动的条件。往好的说，后果是依附性的发展；往坏处说，是欠发达的状况的持续。批评家毫不犹豫地指出，依附路径主要关注外部力量如何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式设置条件，而很少注意地方力量和包括当地的阶级结构在内的生产关系作出的贡献。

依附路径的另一种版本是将争议的条件转向文化领域，这些学者的兴趣主要在媒介和文化，他们检视了对为跨国媒介公司和国家控制的生

产、发行和接收循环的依赖。这里的研究不仅是经验地评估现代化理论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发展目标，依附理论也提供了一种替代性解释，这种解释把现代化理论家所描述的实践置于跨国权力及其依附的广阔语境中，也包括一个公认的功能性的观察结果：现代化是延续欠发达状态的工具。

依附理论享有广泛的影响力以及受到同样广泛的批评。它因为聚焦于跨国企业对发展的影响、忽视国内阶级和权力关系而受诟病。依附理论家以检视这些国家内的买办精英的角色、特殊区域的较为富裕的半边陲国家的影响力作为回应。它们各自都对核心内陆地区价值创造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批评也指出了依附视角内部的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具体说来，批评家指出，依附理论倾向于停留在这样的逻辑上：跨国资本似乎控制了国家，并把政府变成不过是管理积累过程的一种工具。对此的一种回应是，通过纳入一种关于国家的更为行动主义的解读来扩展依附路径，承认在欧盟、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秩序的基础上，发展跨国国家结构的需要，协调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冲突的需要，以及回应社会阶级、运动和利益冲突的需要。再者，对依附理论的批评为文化分析、发展中国家持久的评判传播研究兴趣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不过，这种研究旨趣与依附路径提出的总体的经济推动力很难彼此适恰。尤其是，一种更为成熟的依附理论可以为从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人们提供一些空间，尤其是使之检视政治经济的完整循环过程以及检视构成文化接收和建构的过程与抗争(Mattelart，1986)。

尽管如此，对依附理论的批评，也深层次呼应了那些后结构主义的各种思潮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攻击。后结构主义拒斥讨论资本循环和政治经济过程与文化实践的关系的价值，坚持认为依附理论的分析错误地从充其量是松散连接的、游离的、地方性的实践中建构社会总体性。后结构主义指出依附理论不过是在制造另一种宏大叙事的努力，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社会和文化实践考验的总体性话语(Tomlinson，1991；Featherstone，1990)。这种攻击加深了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一种全球文

化研究的兴起之间的裂痕，这些裂痕有待于新研究去探讨，尤其是出现在西方核心的外围的研究，要面对这些裂痕并努力克服之。其他一些结论，我们在第六章将转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趋势。

结论

这一章描写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持续研究的头几十年的历史。它兴起于对主流研究的缺陷的思考，尤其是对支配性的行为主义范式的关注，以及对那些保护大的媒介公司而不去发展一种更加民主的媒介体系的政策的关注。在欠发达国家，对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形成的具体的政治抗争，在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包含在依附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现代化理论，随后和后结构主义论辩，争论关于在西方核心国家之外理解传播和文化最有用的方式是什么。这些都是朝向全球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端。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论述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影响的社会和知识因素，第五章接着讨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这一章讨论当代研究的五个趋势。

过去十年左右，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具深远意义的发展是大量文献的产生。当我 1996 年写作本书的第一版时，用几个章节描绘出这个领域是可能的，在当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状况下，再这么做已经不可能了。要对今日的研究进行清算仅仅一本书的容量是难以承载的，这需要一本类似于百科全书的东西来完成。然而，检视为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益向导的当代研究的核心趋势仍然是可能的。因此，在进入讨论我自己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观念的第七章到第九章之前，我们要先考察当代研究的五个主要趋势。这些趋势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对历史研究的持久重视和扩展；另类立场的增长——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从对旧媒介的重视转向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传统相关联的行动主义的增长。这些趋势没有哪个是全新的，而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趋势基础上，只不过这些已存在的趋势常常潜藏于主流趋势之下。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包含国际维度。例如，两个奠基人物——斯迈思和席勒与马特拉合作帮助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媒介体系。再者，发达的核心国之外的研究是作为对可感知的西方媒介帝国主义的回应而产生的。尽管如此，总体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绝大

多数的研究具有民族主义趋势和明显的地区重点。例如，斯迈思大部头著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论述了加拿大对美国媒介的依附，并质疑为何加拿大这个民族国家允许这种状况如此长久地持续。从这种角度来看，民族主义成为对美国媒介帝国主义的替代物。同样，对西方媒介对发展中国家支配的抵制呼应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线，顺应了民族抵抗的要求。二战后，这些民族解放运动使许多民族都赢得独立。

除了聚焦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媒介的抵制，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地区性特征，这种趋势使北美的政治经济研究有别于欧洲，也使北美和欧洲有别于发展中国家。如同前几章描述的，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倾向于论述传播工业中系统的和特殊的问题，包括媒介权力日益深化的集中以及支持性的国家政府力量的增长。这些趋势有助于建立一个军事-工业-媒介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却威胁了那些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的民主和自由。欧洲研究更自觉更理论化，主要关注如何把传播研究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的总体中，明确地说，也就是整合进马克思的思想。最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支持了为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努力的社会运动。这些研究处理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反驳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依附理论的国家和地区运用。这些趋势当然也有例外，但当我写本书第一版时，该特征还是足够明显的，因此我完全有信心沿着这些地区的研究重点描绘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但现在由于地区差异明显地消逝，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来自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学者对共同面对的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Calabrese and Sparks，2004；Wasko and Murdock，2007），并且，一个地区正在处理的主题就是另一个地区曾经的突出主题，这种情况已是稀松平常的了（Artz，Macek，and Cloud，2006；Mansell，2004）。

北美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包括如下研究：数字技术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经济（Schiller，1999a），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播研究的关系（Artz，Macek，and Cloud，2006），以及自治论理论应用于利用新媒介开展的社会运动（Dyer-Witheford，1999）。人们也可能发现对

媒介问题的具体研究，比如，媒介的商业化，欧洲研究中有关公共媒介的衰落(Mansell，2002；Sparks，2007)。最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继续参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以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运动。虽如此，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第三世界的知识圈已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增长产生了浓厚兴趣(Chakravartty and Zhao，2008；Liu，2006；*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2004)。

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正在蓬勃地展开，这其中某些纯粹是学者们推动的结果，这在过去二十年是加速发展的。例如，加拿大政治经济学者曼塞尔(Robin Mansell)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立了制度政治经济学研究基地，赵月枝为中国媒介和电子传播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她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加拿大，为这几个国家的学者建立了重要的联系。[①]赵月枝的一个学生——布伊研(A. J. M. Shafiul Alam Bhuiyan)从孟加拉国来到加拿大，以后殖民主义主题为视角，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2008)。韩国政治经济学家尹(Dal Jong Yin)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和丹·席勒合作完成了韩国电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专论。尹一度加盟赵月枝和哈克特(Robert Hackett)，在加拿大的西门菲沙大学极具历史感地继续阐述政治经济学视角。

除了跨地区的学者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有着强烈传播政治经济学导向的大学已建立聚焦国际研究的体制化基地。例如，加纳姆帮助威斯敏斯特大学确立了政治经济学视角，在斯帕克斯(Colin Sparks)的领导下，威斯敏斯特大学建立了一个主要的全球研究项目，这一项目尤其强调中东和中国的传播体系研究。同样地，政治经济学者唐宁(John Downing)曾经以英国为基地，如今却在领导南伊利诺伊大学全球媒介研究中心的发展。

---

① 她的劳动成果之一是系列书的出版，这些书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被翻译成中文并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了重要贡献，这源自她与复旦大学曹晋、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丹·席勒和我之间的合作；另一个成果是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成果的汇编的两卷本在中国的出版，这是赵月枝和曹晋合编的(Cao and Zhao，2007)。

在更为正式的层面上，学术团体在支持全球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IAMCR)于1957年成立，多年来，一直是支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的全球性学术团体，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其主力。这一组织在持续发展，并且继续支持具有国际导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其目前的主席曼塞尔(Robin Mansell)的率领下并通过政治经济学部首领瓦斯科、默多克和索萨(Helena Sousa)的艰苦工作，IAMCR为世界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真正的家园。为认可年轻学者的研究而设立的赫伯特·席勒和斯迈思奖肯定和激励了那些还在坚持政治经济传统的人们，而这些奠基人物对这个传统的发展起着铺路石的作用。①

学术刊物的普遍增长也助长了全球化过程，但只有个别案例尤其有助于政治经济学。2002年，由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卡马利普尔(Yahya Kamalipour)创办的《全球媒介刊物》(*Global Media Journal*，http：//lass. calumet. purdue. edu/cca/gmj/gmj_about_us. htm)是一个在线学术刊物，其特色是批判的、尤其是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2008年开始，这个杂志有十一个不同版本，包括非洲语版、阿拉伯语版、澳大利亚版、加拿大版、中国版、印度版、地中海版、巴基斯坦版、波斯语版、波兰版、西班牙版以及土耳其版。除了内容是世界各个地方的实践状况，语言的多样性真正保证了全球性特征。②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批判学者和媒介从业者的组织，民主传播协会创办了《民主公报》(*The Democratic Communiqué*)，该杂志强烈支持政治经济学研究。

人们也许会有充足的理由担忧这些变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除了多做研究，全球扩张的过程使政治经济学者要说的内容不同了吗？毕竟，从早期开始，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对以下全球事务充满兴趣，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现代化理论，呼唤世界信息

① 以斯迈思命名的奖项在民主传播协会的例会上以及每年在西门菲沙大学颁发，都是为了向那些为该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政治经济学者致敬。

② 我对其中三个版本有贡献，包括一篇描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这是我和我的一个研究生合作完成并被伊朗学者翻译成了波斯语(Mosco and Lavin，2007)。

与传播新秩序，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偏好的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这样的理论路径。主要的差别乃是目前的研究处理全球政治经济及其媒介体系的深刻整合。迄今，研究的焦点是，在不过是生产了依附和欠发达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美国)或者一些国家(美国加欧盟)及它们的企业是如何支配弱小国家及它们尚未成熟的经济的。今天的研究重点是跨国、跨地区、跨越发展鸿沟的企业、国家和阶级的整合(Mosco and Schiller, 2001)。在查·克拉瓦蒂和赵月枝(Chakravarrty and Zhao, 2008)看来，这关涉到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观念在一本包含主要来自非西方的学者的学术贡献的书中得到例证。

包括传播工业中的企业在内的公司一度扎根于本国，随后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如今，这些公司日益被整合进社会结构中，以致常常难以确认其宗主国。作为所有者、合作者以及与基于主国的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合作运行，它们使政治经济学者从谈论多国企业转向论述全世界的跨国经济。这些企业多是发端于西方但成长于其他经济体中，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它们使得许多来自西方支配的标准模式过于简单化。比如，印度，这个在传统上被准确描述为英国和随后是整个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整合进了包括来自北美公司的西方经济体中。像 Tata， Infosys， WiPro 和 ICICI 这样的集团在北美深深扎根，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一些人在训练好了其替代者后被解雇，这些人的工作被外包回印度。这些公司也雇佣北美的学生作为实习生并在拉丁美洲操作他们自己的外包投机事业(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政治经济研究也例证了包括民族国家、地区集团、全球治理组织在内的公共权威，也描述了这些权威整合进商业部门，产生出在每一个政府行为中都混淆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差异的混合物。我们再次申明，问题已不再仅仅是揭示这样一点： 巨型公司如何通过驾驭政策和资源分配以有利于大企业来“俘获”一个政府，而是，我们正在见证在政治权威的跨国化中权力的两种形式的彻底整合(Braman， 2007)。结果，国内社

会阶级分化这个曾经占据政治经济学的大量社会阶级分析内容的主题，现在比起跨国阶级分化来说不再重要，这种跨国阶级分化在跨越国家间重构了权力网络，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新富人群与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同类人物联系在一起。的确，检视媒介精英可能需要从那些在美国掌控巨型公司的人开始，但如果不指向那些在诸多其他国家挟权力而颐使气指的人就逐显不完善并且是彻底不够了。例如，这会包含中国的经理人群体，他们拥有和运作着联想集团，而这个集团曾经是 IBM 的个人电脑的部门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支配权的象征。

这些行为大部分是以进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为目标的，传播工业首当其冲。通过制造全球劳动市场和广泛利用传播技术来进行重构过程，跨国企业获得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弹性，并因此而最大化地从劳动中获利。文化专业的学生花大量时间在图绘文化跨国化的曲线(Lash and Lury，2007；Tomlinson，1999)，这些工作丰富了我们对意义的全球化社会生产的知识。但是，政治经济学者和一些文化专业的学生正在弥补这方面研究的巨大鸿沟：劳动的跨国化不仅生产了当代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也生产了文化。

企业、政府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全球整合是一项正在进行的事业。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张力和矛盾，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派，这在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中可见一斑，这些社会运动在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团体(如，信息社会的世界峰会，WSIS，其目标是把这个过程延伸进传播工业)这些国际机构会议上抗议这种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学者不仅检视这些发展，也严肃地开展实践并参与政治和政策过程。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承认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跨国化的重要性，也承认创造跨国民主以及世界公民社会的必要性。

第二节　传播史的政治经济学路径

第一种趋势例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空间扩展，例如，从民族国家到跨

国方向展开。但从时间的角度看，历史研究也有实质性增长。就像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历史的主要特征一样，充分利用这种视角的传播研究也总是对历史格外敏感。例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聚焦于政治权力中心和媒介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这包括赫伯特·席勒(1981；1992)对一个全球的、严重军事化的电子媒介系统的研究，还有斯迈思(1981)对加拿大横跨出版业、广播电视和电子传播的依附进程的研究。后几代的学者进一步发展和修订了他们突出的主题，非常强调政府和企业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包括美国广播研究(Kellner，1990；Winston，1986)和电子传播研究(McChesney，1993；Mosco，1982；Schiller，1982)以及他们在加拿大的同行对加拿大广播的研究(Raboy，1990)和电子传播历史的研究(Babe，1990；Martin，1991)。丹·席勒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其研究确认了权势在电子传播工业里的发展并且这些工业开始为五斗米折腰的过程。这些权力都是电子传播服务的大型企业使用者，而且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工业权力结构的重要转向。拉柏伊(Raboy)的著作挑战了这个观念，即公共广播必然有利于政治民主，他的著作证明了国家控制公共体系的方式实际上使社区和公民社会群体的声音销声匿迹了。

近些年来，历史研究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长，比起早期研究有了重要进展。的确，研究的扩展引导一个领军的政治经济学者去呼吁将批判视角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历史，因为后者为媒介改革运动提供了更好的导向，包括那些致力于推动民主传播的人(McChesney，2007)。我们能够理解这个视角，仅仅因为历史研究，尤其是在建构一个更为民主的媒介体系这个领域中的历史研究，是批判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特别的原因还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来自草根历史观的传播权力的检视产生了浓厚兴趣，草根历史观以劳动和社会运动的组织的角色为特征。例如，蒙哥马利(Montgomery，1989)研究了跨越政治地带的媒介改革运动的历史，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92)论述了为建立劳工广播电台的奋斗，温瑟克(Winseck，1993)考察了在高度发达工业社会里，社会

劳工参与电子传播政策的过程。并且，我们将看到，这个特殊的兴趣领域在近年来成长不少。然而，我们对保持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联系也是理直气壮的。历史，伴随着这样的承诺：研究社会总体、道德哲学以及实践，因此，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柱之一。没有历史的维度，我们几乎不可能做好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样，在创造民主的传播中极为活跃的人群主要由强调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学者组成。厚此薄彼会削弱团结，而团结本身为进行社会干预的政治经济学打上了普遍的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当前的研究继续着从政治经济视角去追求历史分析的趋势。更重要的是，研究已经与较传统的传播研究的历史分析形式分道扬镳了。这种传统的形式倾向于强调个人，比如，像默多克(Rupert Murdock)这样的媒介巨鳄被看作是媒介发展的驱动力。媒介历史就是“大人物”的历史这种叙述方式可能是愉悦人的，但这种研究如今之乏善可陈如同在赫斯特(William Randolf Hearst)时代那样。这样做对理解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有好处，但却不利于理解媒介。对媒介历史较为深思熟虑的做法曾经是聚焦于技术发展的弧面，以及将传播史与广播或电视等具体媒介的历史相等同。然而，这种路径倾向于具化技术，给技术以自我生命，这与社会和政治势力型塑技术发展的方式不成比例。当历史研究转向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它已倾向于对政策和政治做倒转研究，后者是政府和企业精英们制定的。比起将一个媒介巨人或者一门特殊的技术神化(它们充其量提供了分享着一种普遍的政治倾向的精英人士之间的冲突的洞见)，这种视角更有意义(Hills，2007；Winseck and Pike，2007)。但这种视角通常也忽视了考虑精英圈子外的抵制，尤其是传播历史如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斗争领域。

这种认识描述了今日历史分析的特征，这种历史分析就是采纳了政治经济学视角。具体说来，他们揭示了今日适宜的媒介体系是深刻抗争的历史结果，不仅关乎决斗的资本家和他们在政府中的联盟，还包括工会、市民群体、消费者联合、宗教狂热家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公正组织。麦克切斯尼(1993)在分析为控制美国的广播而进行的战斗时，牢固

地确立了这一路径的地位。从很早以来，广播既不是超越政治，也不是对少数精英分子有利的政策领域，而是被确认为对民主和诸多社会运动组织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些运动组织使用他们能有的权力去使广播民主化。为达此目的，他们为广播台而战斗，工会、当地社区和各种公共利益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去控制这些台。他们为市民接近广播电视而奋斗以反对支配性的企业对广播的控制。他们通过推动对规制的大众控制，为使政策过程民主化而斗争，这些规制可以拿走执照，可以分配波段，并为媒介的公平使用建立规则。本质上，为广播奋斗也就是为民主奋斗。广播不仅是少数先锋的工具，或者是深奥的空中魔力占卜者，它还植根于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战斗中，使美国新政的支持者与支配性的保守势力竞争，这些保守势力通常在美国政治中占上风。

同样，广播也是丹宁(Denning)所称的“文化前线”的中心工具。“文化前线”是一种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延伸到50年代早期在美国的一场运动，这个运动为试图建立由大企业引导的美国传统权力结构的替代物提供了文化活力。除了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者，这个运动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以及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大萧条中，该运动获得活力，而在50年代衰微。那时，商业开始大规模复苏，包括麦卡锡主义在内的反动运动。今日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撰写传播历史的学者明白无误地或者含含糊糊地讲述媒介在文化前线的角色的具体故事。一些人继续丰富广播的历史，如歌德弗雷德(Nathan Godfried，1997)检视了一家芝加哥广播电台的历史，这个广播站为代表这个城市的劳工联盟所建立和掌管，在商业广播的一片汪洋大海中，该台发出劳工的声音，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事业。尤其是许多联盟的成员同时也是商业台的拥趸，这些诸多的联盟为定义一个劳工的另类媒介而奋斗。在面对巨大的广告和商业压力下，芝加哥劳工联盟(CFL，Chicago Federation of Labor)仍能够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保有其独特的特色，既有劳工的立场也提供新闻和娱乐。冯斯一伍尔夫(Elizabeth Fones-Wolf，2006)重返芝加哥劳工联盟，描述了广播在20世纪的美国努力建立一个民主的左派中的广泛角色。她不

仅描述了商业台的几种替代方案，也描述了劳工及其同盟在当时一些中心政策的争论中与商业台的政治战斗。这些战斗包括授予和更新广播执照的决议，确定电台所有权的限制的决定，为什么是可接受的内容设立规则，广播多元视角的要求的准确决议（也请参看 Fones-Wolf and Fones-Wolf，2007）。

政治经济学也处理其他媒介的历史轨迹，尤其是报业。例如，特蕾西（Tracy，2006）撰写了国际打字工人联合会在为控制劳动过程和在报业中新技术的引入的斗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斗争在 1964 年发生的异常罢工中达到高潮，致使纽约市的报业关闭了四个月。特蕾西还做了对劳工行动领袖的访谈，记录了劳工在媒介工业中一度有力的声音，而且评估了劳工的优点和缺点，比如，依赖于狭隘的工艺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弱化了他们的声音。我和麦克尔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的研究延续了这样的观点，叙述了贯穿美国传播史的传播工人中间工艺和阶级之争（也请看 Mosco and McKercher，2008）。

正如研究媒介集中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企业能够击败那些为民主传播呼吁的人并迫切要求一种媒介的单一的商业形式的方式之一是，交叉拥有或者购买位于单一社区或者地区的多种媒介。但这种方式也遭到市民联盟和劳工组织的强烈反对（Fones-Wolf and Fones-Wolf，2007）。在旧金山，为了接管由赫斯特集团控制的媒介而开展的斗争为这样一个公司做了最炫目的注脚，这个公司在报纸和广播媒介中，拒绝忍受任何哪怕是轻微背离保守主义立场。

我们也能找到最近的主要例子，这些例子例证了电子传播和计算机工业中的抵制历史。格林（Venus Green，2001）反对大发明家、技师和企业支持者对 AT&T 历史的传统阅读方法，他检视了该公司历史中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互动。丹·席勒（2007b）叙述了工作场所中的抗争以及政策制定圈子里的斗争，这些斗争挑战了商业为了控制邮政和电话行业的努力。佩洛和帕克（Pellow & Park，2002）用这种分析视角分析了硅谷，讲述了首先是当地人们的抗争，接着是农业工人，现在是做着肮脏的硬件

工作的移民女性以及享有特权但经常被剥削的年轻软件师。

这不仅是美国的故事，美国北部边境的政治经济学者也以这种讲述历史的异端形式在这个领域耕耘。即使在拥有类似 BBC 以及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这样的国家，这些机构为反对普遍的商业化而捍卫公共利益也是老生常谈了。但马泽帕(Patricia Mazepa，2003，2007)在对加拿大媒介历史奠基性的研究中指出，历史是意味深长地更加复杂，不像学术复杂性往往看来无关紧要。马泽帕的研究为我们如何理解公共媒介以及我们可以为公共媒介做些什么提供了不同视角。她利用档案资料，揭示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发展不但是为了抵制横跨美国边境的商业化广播，也是为了抵制关于“公共”的替代性定义，这些替代性定义体现在由移民、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组织建立的加拿大媒介中，而国家广播公司通常忽视了这些媒介。在加拿大，公共广播最终和白种殖民者媒介，主要是英语版，主要是精英话语的法语版联合，这些版本主要以魁北克为基地。结果，为外在于主流媒介的组织所建立的社区和地区媒介并不被认为是适合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移民的、社会主义的以及劳工的媒介奋起，既反对商业化媒介，也反对国家媒介。国家通常显示出极小的宽容并且非常热切地使用政策权去破坏兴起于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和私人广播公司体制外的媒介。马泽帕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媒介生产和来自底层的抵制的历史，还号召学者，尤其是那些参与制定广播政策的人去质疑公共广播中“公共”一词的含义。最后，其研究把公共的含义扩大到包含真正的民主替代方案，而不只是那些表征一种加拿大白人殖民者的方案。

麦克尔切尔(2002)所写的加拿大新闻史图绘了在劳动过程控制、技术采纳以及新闻形成中爆发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那些拥有出版社的人所制造的，也不是由工作中不断变迁的技术强加的，而是源于罢工和其他劳动行动。一些冲突为工人们和那些希望或需要一个更为不一样的新闻事业的人们提供了生存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少有成功感。但是她的历史研究，就像其他那些政治经济学者在本部分描述的那样，为标

准故事提供了真正的替代物，并且这样做时，就把恰好是属于社会行动者及工人自己的机构还给了他们。

第三节　抵制的立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已开始强调抵制，而不仅是承认强权是如何支配的这样的重大故事。在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对抵制的强调日益普遍化，这就使以资本、支配企业和精英为核心的中心立场转向了女性主义和劳动研究。这标志着与一种一开始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特点的趋势分道扬镳：关注媒介集中和内容多样性的被侵蚀（Bagdikian，1992；Green，1973；Herman and Chomsky，2002）。

传播政治经济学曾经特别关注这种趋势：越来越少的企业比从前变得更大，大到控制更多的媒介市场。这种集中发生于媒介中，越少的报业公司控制着越多的报纸市场。这种集中也在跨媒介中发生，因为报业的所有者买广播端口以及其他媒介，这个过程被称为跨所有权集中。这也经常成长为合并（conglomerate concentration），因为建立在非媒介企业中的跨国企业买下了媒介资产。普通的电子企业购买了 NBC 网络就是一个好例子。政治经济学者确认了龙头企业，解剖它们的结构以及检视它们对内容多样性的影响。结果，我们现在对谁拥有媒介看得洞若观火。最有分量的企业名单是变化的但最突出的那些是：新闻公司（Fox），维亚康姆（CBS），迪士尼（WDC），通用电气（NBC），时代华纳（CNN，AOL）以及索尼。加上电子传播和新媒介这个名单会扩大到 AT&T，微软，谷歌（McChesney，2007；Schiller，2007；Wasko，2003）。这些公司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全球市场。政治经济学者也揭示了在美国之外媒介集中的普遍类型。例如，四个公司对加拿大媒介企业有支配性影响，他们以 BCE 为领头，该公司在电子传播市场上，把最大的广播企业以及最大的国家报纸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下。其他几个公司是：CanWest，Rogers 以及在法属魁北克市场拥有最大的影响力的电影公司 Quebecor（Winseck，

2008)。

随着一些文献聚焦于媒介集中(Kunz, 2006),另一些集中于作为结构性力量的媒介资本主义的组合权力(Artz and Kamalipour, 2003),文献中强调的重点也就变了。差别具有重要含义。那些聚焦于媒介集中的文献可能呼吁打破大媒介公司以利于那些将比今日竞争得更激烈的小公司发展。那些把重点放在资本的组合权力的研究对打破媒介巨头不屑一顾,因为对他们而言,无论大还是小,问题与公司数量或者规模关系不大。它们共有的兴趣是利润最大化,这是通过把受众卖给广告商并使用其他方式去创造网络和内容来完成的,而这些网络和内容是为他们的利润服务的。他们所有人可能同意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巴兰和斯威兹(Baran & Sweezy, 1966)的研究结论,即问题是垄断资本主义。因此一些研究聚焦于垄断,一些集中于资本。

传播政治经济学最近的研究承认集中的重要性,但主张另辟蹊径。与聚焦于媒介集中或者资本作为中心问题分道扬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毕竟,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检视阶级斗争的长期传统产生了当今的经典研究,比如汤普森(E. P. Thompson)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这项研究开始于工人阶级,把资本主义不是定义为资本的支配而是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接下来的斗争。当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这个立场有具体反映,比如在马特拉和加纳姆的论述中,他们把阶级斗争看作核心点。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加速了人们找寻把资本作为支配力量的立场的替代物。

这种思考的典型之一是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它坚持社会科学应该是应用的并且社会需要从女性经验而不是男性经验来理解,后者是通常的社会科学大多数坚持的。哈特扫克(Hartsock, 1999)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发展的理论认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在哈尔丁(Harding, 2003)、哈拉维(Haraway, 2003)以及其他人的研究中已经繁荣,这些人坚持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为理解那些广泛分布的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些议题包括

认识论和本体论等哲学问题，也包括诸如在研究中采纳恰当社会科学技术这样的实际问题。这个视角遭到了来自女性主义研究内外部的指控（Haraway，2003）。但它反对这样的观念，即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为将科学和普遍主义等同于由男性做出的以及关于男性的研究提供了真正的替代选择，也为把女性主义的研究简化为仅仅是记录女性被剥削的研究找到了替代选择。

女性立场的思考开始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开始进入权力和媒介的讨论。把该话题置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表单上的领军人物是爱尔兰学者盖拉赫尔（Margaret Gallagher，1992，1985，1984，1980），他对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提出普遍批评，并继续图绘性别化的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的地形图。这种路径的要素包括，女性在历史上的文化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几乎从印刷出版业以来，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女性的市场已经很强了，但那个市场以显著方式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例如，她记录了 19 世纪小说中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四重从属性。女性小说家作为工匠是被允许的，只要她们的工作并没有打乱她们的主要看护家庭的职责。再者，女性被归属为在印刷商业中无技能的劳动领域（与童工一起）。更进一步，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的被剥削还是侍养了中产阶级的女性的阅读和时不时的写作。最后，小说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建构和诉求女性为浪漫的、柔弱的、主内的、母性的消费者。盖拉赫尔通过分析建立了这一历史论述，即将文化工业中女性的结构性地位，例如除了某些高度可见的位置外女性的过度空缺，与跨文化工业的女性描述联系起来。历史的、社会结构的以及将社会阶级与性别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分析的结合，为重新思考文化工业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提供了重要模式。

除了盖拉赫尔·柔奇（Colleen Roach，1993）对和平运动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政治经济学也做了性别化评估。斯蒂夫（Steeves，1989）开始了“全球性别问题”的议程。她的阐述包括：跨国企业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家长制的工具，广告与编辑和激发了阶级和性别的观念与形象的

娱乐内容的关系，以及在媒介生产过程中和媒介组织中女性的到场与缺席。她的结论说明了对社会阶级和性别分化的抵制形式以及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问题与机遇。[①]对于斯蒂夫和其他一些人来说，一种基于家长制和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路径具有提供一个分析的广阔领域的好处，因为当人们在做资本主义父权制或者家长制的资本主义时，它容许人们聚焦于具体的基础也不罔顾其余。但这个路径面临任何基于两种因素彼此建构的框架都可能面临的同样挑战，比如，如何刻画他们占据的领域的特征，哪个是形容词，哪个是名词以及如何描写二者互动的本质。

当代女性主义研究建立在从女性主义视角去检视媒介和权力这样的基础上。第一个主要的尝试包含在米汉(Eileen Meehan)和赖尔登(Ellen Riordan)的文集中，米汉对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她延伸了斯迈思关于受众是如何被制造为有利可图的商品的问题。2002 年，米汉和赖尔登写出了《性别和金钱》(*Sex and Money*)一书，这本书汇集了领头的女性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者处理这些议题的研究。具体说来，该书描写政治经济学的和女性主义的立场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个人的、经验的、制度的和结构的层面上——如何对理解资本主义都作出了贡献，比如，巴勒卡(Balka)写的那一章是关于在电子传播工业中女性的工作，始于当她们理解她们所谓的“不可见的日常生活”时，她们活生生的经验。包括：女性如何经验她们工作中的尺度和监管以及她们为获得控制这些尺度和监管做出的努力。巴勒卡对这个过程的描写与工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联系在一起，这个工业是在她所研究的沿大西洋的加拿大区域中，并且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具体地说，就是从公共利益的规范转变为更为强烈的商业模型，这个转变导致公司削减工

① 斯蒂夫(1987)在另一篇文章中，对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对媒介的女性视角提出了批评的评述，她的结论认为自由主义视角倾向于“仅对白人的、异性爱的、中上层的女性说话”。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激进主义视角青睐文本，忽视广泛的社会框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最有希望的，因为它能够关注女性的经济和文化地位之间的联系。比如阶级、性别以及工作和消费的彼此建构。

作，通过高级技术的采纳强加严厉的控制在那些留下来的工人身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性别化对一种经验作了丰富的解读，而这些经验经常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技术变迁和全球宿命的必然后果。类似的章节使米汉和赖尔登呈现了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真正整合的经验观察的细节。

在萨拉卡奇斯和谢德(Sarikakis & Shade)的《国际传播中女性主义的干预》(*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一书中，进一步推进女性主义立场。这本书处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处理过的中心问题，但采取了清晰明朗的女性主义出发点。就像许多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样，这本书描述了权力、技术、劳动和政策，但从性别出发看待它们。于是，比如，媒介工业的全球化紧紧地和女性在媒介和新技术中的就业联系在一起。通过运用女性主义立场，它们使我们重新思考国际传播研究。诚然，诸如新闻在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流动这样的传统问题确实重要，但是，国际传播也是关于女性发展政策、色情的媒介生产、艾滋病的表征以及结束这些灾难的运动；是关于女性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媒介和高科技劳动中，以及女性针对工作中的剥削而开展的活动。本质来讲，萨拉卡克斯和谢德展示了国际传播不是无视性别，也不会是一个仅仅描写对女性的各种影响的领域。相反，她们以及该书的其他一些作者揭示了女性如何从生产到就业再到政策等方面来建构国际传播的，他们的书通过把所有这些问题看作是女性问题而迈出了重要的步子。

从这两本书所处理的问题开始，这方面的文献已有强劲增长。李(Micky Lee)的研究(2006，2007)以及麦克劳林与约翰逊(McLaughlin & Johnson)的研究(2007)，包括其他一些研究在内，在从女性主义立场论述这种政治经济权力方面做了大量清理地基的工作。她们的研究主题从媒介、电子传播到信息技术，从消费到生产以及从家到办公室(也请参看Huws，2003；Mosco and McKercher，2008，第2章)。也有一些关于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有趣研究，这些理论通过检视受众行为如何被看作是

保卫或者抵制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表现而跨越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Atkinson, 2005)。

第九章将重新检视女性主义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结尾就是从劳动的立场出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的新航程。通常的传播研究在处理媒介内容和受众方面比处理传播劳动方面做了更为彻底的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政治经济学文献为处理这些盲点做了一些事情，尤其是检视了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应用(Mosco and Wasko, 1983)。研究开始处理工作转型，比如，就业的类型，媒介和电子传播工业中劳动的变迁本质。哈特(Hardt, 1990)通过谴责新闻史中劳动视角的缺席，把政治经济学视角和编辑部的文化史联系起来，而编辑部往往聚焦于引进新技术来执行工作。这延伸了在传播研究之外耕耘的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先锋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学者检视了编辑室的劳动过程(Zimbalist, 1979)。①

与此相关，研究论述了新技术被应用于减少企业中的雇佣，并通过执行电子网页设计以及通过电子新闻收集改变记者的工作来重构编辑们的工作(Russial, 1989)。这些研究论述了劳动过程观念的具体运用，即使用传播和信息技术来改变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的观念活动(他们对于传播手段有一定控制)并在管理上的受控的技术体系中使权力得到平衡。相似的研究开始处理电影中(Nielsen, 1990)、广播中(Wasko, 1983)、电子传播中(Mosco and Zureik, 1987)以及信息工业中(Kraft and Dubnoff, 1986)的劳动过程的转变。

处理国际劳动分工和劳动的国际化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初见端倪。前者源于使生产合理化的压力，以及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电子传播

① 哈特做了一个有意义的综述，综述把当前围绕电子新闻生产技术的冲突置于一百多年的斗争的语境中，在这样的语境中，“编辑室，就像工厂的地板，一直是技术革新的实验室，是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战场”。然后，他用一种政治经济学视角去解释对劳动的忽略：在一种流行的有利于新闻业的支配性愿景的历史条件下，新闻的历史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问题和劳动实践问题(这反映了出版者反劳动的态度)(Hardt, 1990：355)。

中的技术所提供的克服了曾经为商业设置了局限的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机会。这些研究开始探索全球劳动市场的形成，这个市场使企业在国际规模上利用差异工资、技能和其他重要特征。这个领域大多数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于硬件(东南亚)以及数据入口(加勒比海地区)商业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低工资和专权统治吸引了公司(Mosco，1989b；Sussman，1984)。传播中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增长激发了人们对劳动国际化的兴趣。具体来讲，这牵涉到利用传播手段包括新技术，跨越疆界去铸造工人阶级和工会利益的亲密联系(Waterman，1990，2001)。

对劳动国际化的研究随后滥觞，并且一种真正的劳动立场开始出现，我和麦克尔切尔的合作研究展示了这种滥觞的不同向度(McKercher and Mosco，2006，2007；Mosco and McKercher 2008)。对我们来说，虽然去理解企业权力、新技术以及保守的政府如何改变了劳动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确定劳动对此做了什么。我确认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集中的出现，这种集中把分布于传播工业中不同区域的工会联合为一个巨型的工会，它代表记者、广播员、技术员、电话员以及那些在高科技领域被雇佣的人。两个主要的巨型工会是：美国传播工人工会(the 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以及它的加拿大同行传播、能源和文员工会(Communication Energy and Paperworkers Union)。跨越兼并媒介和信息技术企业的联合工会的发展为更好地面对跨国企业的权力提供了资源。“美国传播工人工会”揭示了这一点，当国家广播公司把其工人开除时，工会为反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执行了一项有效行动。因为工人拒绝接受向兼职劳动转变以及转包而加拿大广播公司相信一个把高报酬执行者和低报酬技师聚集起来的工会将不会持续团结，尤其是由美国工会领导的工会，CBC 预料到了团结的快速衰落。通过使用其经济资源和国际网络，“美国传播工人工会”提供了需要延续的支持，工人们不仅展示了他们横跨职业和社会阶级界线的团结，他们还能够把受众招揽到他们这边。七周后，CBC 放弃了原主张。另外的案例不是那么成功但已有足够成功的例子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大的工会运动回归的希

望，只不过这一次的转变是在传播工业里。

第二个劳动策略是工人协会的成立，工人协会出现于处理重要问题的社会运动。戴尔-威日福特(Nick Dyer-Witheford)在其书——《赛博马克思》(*Cyber-Marx*)中，用了社会运动立场阐述今日全世界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也请参看 Hackett and Carroll, 2006)。他尤其痴迷于社会运动如何使用新媒介去反对跨国政治经济。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所说的普遍智力的增长是依靠信息丰富和媒介精通运动(Information-rich and media-savvy movements)的，这些运动抵制和展示了现状的替代选择。麦克尔切尔和我在工人中也关注了这一点，这些工人们在信息或知识劳动世界里开展新运动和发展新组织。我们尤其倾注心力于传播工业中的主要分裂的两方面：技术工人——比如那些生产像计算机系统新编码这些软件的人，还有就是文化工人——主要是那些生产媒介内容的人。技术工人华盛顿联盟或者 WashTech 已建立一种合同制计算机工人的运动并在微软已取得一些成功，而且在努力处理外包高技术工作到印度和其他国外场所这样的问题时站在最前沿(也请参看 Brophy, 2006; and Rodino-Colocino, 2007)。再者，美国自由作家联盟也从一场运动中快速成长起来，运动的人们是为媒介公司工作的短期的合同工人，他们的工资很低，福利少到几乎没有。

类似这样的组织通过重新思考工会主义，通过把自己的行为与更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而重新定义劳工运动的本质。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些组织展示了采纳劳动立场的重要性(也请参看 Kumar, 2007)。聚焦工人们的自我组织可以捕捉到大范围的行为和问题，这些行为和问题是青睐资本如何剥削工人的传统研究所忽略的。这两种视角都很重要，但现在是该通过描述传播工人的积极机构来重新恢复平衡了，这具有政治含义。因为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决定这些技术和文化工人是否能够团结在一起。更宽泛地说，这不仅仅是关于下一个新事物是什么的问题(比如，最新的技术小玩意儿)，而是世界上的传播工人是否将会团结起来。

第四节　从旧媒介转向新媒介

虽然可以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专门聚焦技术的研究持怀疑态度，但后者在理解传统媒介方面还是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传统媒介包括：广告和公共关系（Ewen，2001，1996）；新闻（Chomsky，1999；Curran，1979；Herman and Chomsky，2002；Sparks，1985），广播（McChesney，1993），电视（Kunz，2006），电影（Guback，1969；Pendakur，1990，2003；Wasko，1982，2003），音乐（Attali，1985）以及电子传播（Babe，1990；Garnham，1990；Martin，1991；Schiller，1982；Sussman，1984；Winseck，1998），这些研究也面向当时被看作新媒介的东西。斯迈思（1957）在电视问世时对电视作了讨论，马特拉和西格劳布（1979，1983）讨论了有线电视，我本人讨论了可视图文，而可视文图预示了经过十五年左右因特网将问世（Mosco，1982）。政治经济学绝没把旧媒介弃置一旁，而是后来又转向青睐新媒介，尤其是转向因特网及由因特网所激发的新媒介形式。

一些政治经济学者通过强调旧媒介和新媒介的连续性而做出回应。对他们来说，旧媒介问题持续在新媒介世界中；对另一些人来说，重点却是非连续性或者网络化媒介产生的可能的新联系。仍然有一些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新媒介专家和领袖们鼓吹的那些承诺，而还有一些聚焦于当今媒介引起的新问题。为了理解政治经济学者如何看待从旧媒介转向新媒介，考虑其中的每一点都是极为有用的。

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重点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体系：把工人、原材料、土地和信息等资源转化为有利可图的能够为那些投资于该系统的人赚取利润的商品。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聚焦于作为资源的媒介、信息和受众，图绘了它们被打包成出卖的产品的方式。许多从研究旧媒介转向新媒介的人强调新旧媒介资本主义的连贯性。对他们来说，新媒介通过打开把媒介和受众转化为可售卖的商品的

诸种可能性而深化和扩展了早期形式的资本主义中的趋势。结果是，媒介集中、商业主义、富裕国家对全球经济的支配，信息富裕和贫乏的分裂以及军国主义的延续和增长（McChesney，2007；Murdock and Golding，2000，2004；Schiller，1999a，2007a；Sparks，2007；Wasko，2003）。新媒介可以用丹·席勒的一本书的书名来解释，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但它还是资本主义，并且毫无疑问它是较为重要的词汇。

在这个框架下，社会和技术变迁确实发生了，因为新技术扩大了市场，全球治理成为必要，但这也为资本主义制造了麻烦。曾经对于电影和录像以及受众来说主要是国家市场，现在却是全球市场，这造成对协调的严重的挑战。在这样的市场，曾经主要是国家体系的政府和政府规范已证明是不充分的。要想确保复杂如因特网地址系统的协调，全球治理体系就是必要的。结果，我们有了一种国际组织的新字母缩写，比如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提供因特网地址。然而，当美国通过控制 ICANN 试图保护其利益时，这种解决方案制造了新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起来反抗，因为他们把这个组织看作不过是美国权力的延伸。尽管如此，在变化、矛盾、敌对和冲突中，深化和扩大资本主义体系这种中心趋势仍然持续着。

对于其他政治经济学学者来说，强调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这种趋势的非连续性和背离性。哈特和内格里（Hardt & Negri，2001，2004），拉扎拉托（Lazzarato，1997）和戴尔-威日福特（1999）始终是政治经济学学者，因为他们关心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之间彼此建构的权力关系。然而，作为新媒介增长的结果，他们与那些聚焦于资本主义的诸种关系中的连续性的人相比，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些权力关系的。他们自治论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开始于工人阶级的自治）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为那些在其中工作的人们的活力和行为所推动。从这种视角来看，焦点需要放在哈特和内格里所称的“大众”的自我行为和自我组织上，这些大众就是被其他批评视角典型地看作是被剥削的绝大多数。此外，传

播和信息技术的增长并不只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也意味深长地破坏它。这一切的发生有三个主要方式。

资本主义是基于市场和私有财产体系的，这些都需要为人们能够做什么设立界限的法律控制。版权、商标以及专利法抑制人们使用他人所有的信息和观念。市场确立产品的价值，包括当代异军突起的信息产品。根据自治主义者的立场，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广泛可获得性使得资本主义很难保留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而这些制度历史上限制了传播和信息的流动。现在，当技术挑战传统的生产、消费、使用和交换价值时，要想出资本主义何所作为的妙招实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困难。自由下载音乐、录像以及分享数据、音频和视频，复制所有类型的材料，这些便利挑战了资本主义保持和管辖其财产和市场制度的能力，就像普通的土地，曾经被所有人广泛获得直到资本主义使它们成为私有财产，赛博空间也曾经为所有人获得。但为了赚钱，它也需要被转化为财产，微软、谷歌、迪士尼以及其他商业巨鳄的知识产权就是如此(Terranova，2000)。但是，不像旧的意义上的空间(commons)，赛博空间难以设置篱笆，因为它归根结底是非物质资源。

对自治论者来说，资本主义面临第二次挑战。尽管传播和信息技术为它提供了管理和控制来自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巨大人群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也为大众所获得并且以相对低的成本获得。对自治论者来说，技术不仅挑战了财产权和市场规则，也使人们恰好在资本主义需要小心翼翼进行全球协调时破坏这种体系。例如，电子社会网络允许社会运动的动员和协调以从前从未有过的方式进行。在生产破坏性软件方面驾轻就熟的人的数量海量增长，他们公开地破坏看似安全的程序，为私人财产权、市场和资本主义保持权威的整体能力制造关键问题。

最后，自治主义者的结论是，恰好是为资本主义所需要以执行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的非物质劳动呈现了保持控制和规训的严重问题。 资本主义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这种劳动力比起其蓝领前辈来说更不大可能放弃对管理思想和观念的控制。不管是被雇佣为软件开发者还

是在呼叫中心就职，知识工人更不可能顺从严格的时间和情感控制。恰好是松绑规则以及为工作场所引入愉悦氛围的尝试导致了更多的对任何规则的质疑，包括那些决定谁可以从劳动中获利的规则。你管得了白领、蓝领的劳动力，可你如何去管理一个“无领”的工场(Ross，2004)？

除了强调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路径，传播政治经济学以第三种方式回应新媒介，那就是，对不可避免地与新媒介结伴的狂热采取怀疑论视角。这个视角在历史性的研究中尤其重要，这些研究展示了当旧媒介成为新的时，新媒介中很多被看作新的和革命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和每一种传播技术相联系的。例如，温瑟克(Winseck and Pike，2007)处理了融合(convergence)的概念，融合在当代关于计算机传播新动向的讨论中是一个流行概念。融合表示使媒介技术更有力量的技术整合(Jenkins，2006)，同时也指大公司利用新媒介而整合。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技术和大的整合了的公司创造融合，融合的发生是为了发生革命性变化。派克和温瑟克怀疑这种观念，即融合对于新媒介是独特的，他们揭示了融合如同电报一样古老，我们加在因特网上的许诺和挑战都被19世纪中叶的技术预料到了(也请参看Standage，1998)。

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保持连续性毫无新意，伴随今日媒介的夸张或者迷思也没有任何新鲜之处。马丁(Martin，1991)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描述了与电话相关的许诺。鉴于电报被期待给世界带来和平，她例证了电话将结束女性的被剥削状态的期待，因为电话将容许女性们掌管家务并充分参与社会。同样的研究已检视了因特网。在弗里奇(Flichy)的书——《因特网想象》(*l'internet imaginaire*，2007)中，他把因特网不仅看作是工具或者社会力量，还体现了一种神话。他用神话意指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不仅包括可替代现实的乌托邦愿景，还包括关于在一个不断扩散的计算机和传播网络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和怎样组织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

这项研究之所以也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在政治经济学学者中与

日俱增的兴趣，那就是通过参与文化，致力于揭示新老媒介之间的连续性。文化，我在本书的第一版呼吁过并为《数字化崇拜》（*The Digital Sublime*，2004）所论证。吸引了马丁和其他人的研究，《数字化崇拜》揭示了关于因特网做出的就像电报、电话和电视还是新的时所做出的一样的承诺。世界和平，性别平等，在线教育，种族和谐——所有这一切都曾经被看作是这些曾经新过的东西不可避免的后果。对于相信者来说，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库日韦尔（Raymond Kurzweil）的研究表明的，因特网将实现所有这些承诺甚至更多，自然也包括我们所知的死亡的结局。最后，数字技术想象着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我认为那些鼓吹这一点的人正在做贯穿“新”媒介历史的某种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把技术援引为达到顶峰的机遇或者超越日常生活约束的经验（包括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以便达到超越语言的乌托邦。过去曾是艺术和文学（顶峰的绘画或者诗歌）以及自然（比如，顶峰的大峡谷）的疆域，顶峰现是通过技术以及日益是通过传播技术达到的。

揭示连续性及其与文化的联系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回到政治经济学并论证所有这一切如何事关权力研究。首先，那些对研究顶峰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不会充分关注建构顶峰和市场化（不管是售卖最新的电脑、视频游戏或者政治候选人）之间的关系，超越的愿景是有利于巨大的广告市场的；第二，把新媒介与历史、地理和政治终结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把当下的政治经济学僵化为几近必然和永恒。讯息是简单的和有力的：如果创造一种替代性没有可能，那么，为控制跨国资本而斗争就毫无意义；最后，顶峰可以掩饰日常政治的平庸世界。纽约的世贸中心体现了顶峰的信息资本主义的新世界，这种资本主义超越了建立在工业时代的旧的政治关系，直至地动山摇的“9·11”，那时所有的历史带着复仇的种子回来了。顶峰的诱惑，使其追随者盲从于恰好潜藏在角落的平庸而糟糕的政治。

政治经济学对新媒介的第四个回应将是，处理那些在传播和信息技术发展循环中尤其有意义的问题领域。一个人不应该毫不犹豫地称它们

是新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实在没有忽略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相反，有些问题在今天尤其重要，并且在主要问题中，版权/知识产权、监管以及朝向人称网络经济社会的趋势都是值得评述的。

从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时代起，版权都是围绕媒介争论的热点。有趣的是，当他的小说19世纪在全美发行时，他责骂为他的小说付版税是美国的失败。对于今天的媒介学者，包括政治经济学学者，关于版权的争论甚嚣尘上，因为新媒介使复制和分享版权著作日益便捷。贝蒂格(Bettig，1996；也参看Bettig & Hall，2003)讨论过商业如何把版权当作收紧其控制的工具，以及席勒(2007a)和赵月枝(2008)研究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挑战。谁将控制知识产权是今日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中心问题。

电子监管的威胁也一样。正如莱昂(Lyon，2003)和其他人所揭示的，新媒介使政府和公司以一种空前的规模来监控我们的行为成为可能。所谓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加速了监管的扩散，曾经被看作是不可接受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的行为现在合法化了。政治经济学学者已经论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并已经开始论证对此能有何作为(Kiss and Mosco，2005)。

最后，正如自治主义者揭示的，新媒介导致质疑传统经济种类和资本主义经济控制它们的能力。但在自治主义者轨道外的政治经济学学者也对新媒介对理解经济学所构成的挑战充满忧虑。尤其是，我们应该开始考虑网络经济的出现并需要一种网络经济学来处理这些问题吗？网络经济学论证了在一个电子网络时代商品的价值的转化。尤其是，当他人买了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时，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增加了，特别是当购买行为把人们连接于网络中时(Mansell，2004；Melody，2007)。新媒介是基于手机使用者、因特网使用者、社会网络站点的参与者等组成的网络。有人主张，传统的经济学低估了网络的增值，因为它没有考虑潜在交易数量是以几何级增长的，而潜在交易就是网络产生的增值。对于政治经济学学者来说，问题是它对权力概念有何影响？换句话说，网络经济学是否也是政治经济学？

第五节　媒介行动主义

实践，或者说研究与行动的统一，是政治经济学路径的根本特征。大多数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既是学者，又是媒介民主、发展传播、独立媒介和普遍接近以及劳动、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行动主义者。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民主传播联合会(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继续团结行动主义者——学者和媒介实践者。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为政治经济学学者提供了全球论坛，包括那些从事公共政策工作的活跃分子，比如，现任主席曼塞尔。赫伯特·席勒和马特拉曾在这里工作，他们致力于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为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主要阵地，政治上积极的学者步其后尘，通过众所周知的信息社会的世界峰会这样的国际项目致力于因特网的民主化。

和这些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政治社会行动最有意义的进展之一是2002年政治经济学学者麦克切斯尼(McChesney，2007)创办了自由出版(Free Press)。该组织是美国引人瞩目的复苏的媒介改革运动的主要阵地，这项改革团结了多种公共利益群体，比如消费者联盟、数字民主中心、媒介接近计划、美国消费者同盟。这些群体已加入独立媒介组织，如，即刻民主(Democracy Now!)，这是一份由记者古德曼和冈萨雷斯(Amy Goodman，Juan Gonzalez)创办的国家范围的、独立的、日常的新闻项目。自由出版吸引了无数注意力，包括获得知名人物莫耶斯(Bill Moyers)，方达(Jane Fonda)以及令人尊敬的牧师杰克逊(Jesse Jackson)的支持。它还资助了一个媒介改革的年度会议并吸引了数千人参加，包括学者、媒介行动主义者、政治家、工会主义者，而过去这样的会议只可能召集至多几百人。这一点说明了我们目睹着一个围绕媒介改革议题的一场民粹主义的剧变。

媒介改革运动的风起云涌可以归因于以下普遍的观念：在内容多样

性的尺度下取消限制媒介所有权以及限制主要的光纤、卫星和其他媒介公司可以向消费者收取的费用的规则，已经威胁到了媒介民主、媒介质量以及对必要服务的普遍接近权的现状。过去五年，美国一百一十万媒介工作中有将近二十万个丢失，具大的失业率揭示了媒介融合是一个巨大的劳动节约项目，它正在侵蚀新闻业的质量以及其独立性的现状。为反对这些趋势，自由出版动员行动主义者，游说政治家，并且利用媒介（包括莫耶斯自己的公共电视秀）去催生另类媒介。这包括结束掌控在少数几个巨型国际公司中的新老媒介的集中，支持内容的多元化以及富有活力的论辩，创造能够保障普遍接近必要的电子传播和因特网服务的社会政策。

尤其重要的是保持“网络中立”的斗争。当媒介公司增长利润的压力增长时，公司试图重构他们的网络去赚更多的钱。尤其是，他们喜欢为信息高速公路创造一种较快和较慢的“通道”，为付高价的内容提供者，比如某个广告客户，或者为那些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关的人，比如它自己附属企业预留快速带宽；而对那些付费低廉的人或者竞争者，网速将会很慢。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在主流之外的公司网络站点，比如另类媒介站点，它们没有资金为快的带宽付费，所得到的服务质量必大打折扣。为回应这个威胁，媒介改革运动为立法和规范而战斗，立法和规范将保留那些已经是标准实践的部分，即平等对待所有内容（有个别例外）——等于给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以同样速度，发布关于质量的同一标准。无论这些斗争的结局如何，政治经济学学者显然已为围绕主要传播问题而开展的行动主义的整体复苏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结论

这一章论述了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趋势，包括研究的全球化。这个领域不再如从前那样打上了具体的地区趋势的烙印，也不仅仅是由北美和欧洲的研究所支配。政治经济学研究当前是全球性的，因为

遍及全世界的日益对论述全球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在做着这些研究。

这个领域也把其研究领域扩展至传播历史，尤其是对商业和政府中支配性权力的抵制历史。在这样做时，历史研究揭示了未经检视的建立支配性商业体系的替代方案的故事，而这滋养了更广泛的反对运动。政治经济学已经偏离其传统焦点论题——检视支配性权力和剥削过程，而转移到论述抵制的立场。这些立场尤其包括女性主义有关媒介和传播的立场。

再者，政治经济学已开始转向，从强调检视旧媒介中权力如何运作转向针对新媒介的多种路径。除了解释新老媒介的连续性，如描述支配性权力如何使用二者去赚钱，政治经济学学者也处理了新媒介对传统资本主义发展类型提出的挑战中的非连续性。再者，它们例证了新旧媒介的允诺之间的关联，以及更为重要的是把这些努力与达到顶峰联系起来——从电报时代到因特网，到社会中的权力体系。政治经济学学者也看到了尤其是新媒介产生的突出社会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管以及网络经济的重要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后趋势是政治行动主义的高涨，这包括诸如民主传播联合会和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这样既已确立的组织的发展壮大。新的国家范围的(自由出版)和国际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运动也为它们注入了活力。

后面三章将描述和分析一种指导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的理论。有一节描述理论路径的哲学基础，然后，我要转向其主要维度：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的过程。

第七章

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第一节　第七至九章导言

前面数章检视了政治经济学进路、传播的概念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本书现在要提供一种指导我们理解的一般理论。具体说来，本章和接下来的两章将提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框架。本章以一种哲学基础开始，接下来探讨思考本学科的核心观念。

我们一开始先以非技术性语言思考哲学基础，然后进行更加正规的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将指导思想的抽象概念和我们的感官所接受的具体观察都接受为真实的存在。因此，它反对在某些理论当中盛行的观点：只有我们的观念或者只有我们的观察——而不是两者都包括在内才是实在的。政治经济学也反对这种立场：现实不存在、观念和观察在重要的意义上都不实在。此外，这种哲学意味着现实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不能被简化为一种本质。仅仅是经济（比如，金钱是推动媒介的唯一力量）或者仅仅是文化（比如，人民的价值观塑造了媒介）都无法像魔钥似的开启我们对传播的理解。这种哲学基础也将社会变革、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观念推至最显著的位置，这些观念要求重新评估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重点，即强调媒介企业等社会机构，或者将社会阶级视为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社会关系，

接下来，本章和后面数章将这些观点付诸实践，识别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的三种过程，由此引导我们如何将政治经济学应用于传播世界。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就是将因使用而产生价值的物品

转化为可以销售的产品，其价值来自它们能交换来的东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将一个朋友们喜欢的故事转变成一部可以在市场上售卖的电影或者小说的过程。人类的传播行为如何成为一种为了牟利而制造的产品？空间化(spatialization)是这样一种过程：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克服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比如，电视将全球事件的图像传送到世界各地，克服了距离障碍。此外，各个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通讯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营生意，由此能够更广泛地接触顾客、工人、技术和资本。当需求出现的时候，比如可以在别处获得成本更低或者技能更高的劳动力，电脑通讯也使得它们能够灵活地采取快速行动。当传播遍布全球、商业利用传播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和制作产品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第三个关键概念是结构化(structuration)，即创造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主要是那些围绕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例如，政治经济学描述了准入大众媒介和新传播技术是如何受到了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影响，这种不平等按照收入和财富区分人们，使得一部分人有准入的经济能力，而其他人则被排除在外。

用更加正规的术语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以特定的认识论和存在论原则为基础。认识论就是理解我们如何认知事物的理论范式。传播政治经济学基于一种唯实的、包容的、建构的、批判的认识论。它是唯实的，主要是因为它承认观念和社会实践都是实在的(见 Latour，1999，第 1 章；Shimony and Malin，2006)。在这个意义上，它既不同于提倡只有观念才实在的律则式(nomothetic approach)，又不同于主张观念不过是为人类行动的个别现实贴上标签的个殊式(idiographic approach)。[①]由此出发，政治经济学也是包容的，因为它反对本质主义或者将所有的社会实践简化为唯一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的倾向，提倡一种将观念视为研究一

①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最先使用 nomothetic 和 idiographic 这两个术语来描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方法，前者基于康德所描述的总体归纳的倾向，常用于自然科学；后者基于康德所描述的具体说明的倾向，常用于人文学科。——译者

个多元化社会领域的出发点或者切入点的理论范式(Resnick and Wolff, 1987, 2006)。为了理解社会现实，你需要选择各种观念和理论。选择一种观念或者理论而不是另外一种，是因为你作出结论说这种观念或者理论比它的替代选择更有价值。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断言这些选择就是理解社会实践的最好的或者唯一的方式。

此外，认识论是*建构的*，因为它承认因果决定的种种限制，包括因果关系分析的前提：各个单元作为充分形成的整体、以线性方式互相作用。政治经济学宁可将社会生活理解为一套互相构成的过程，它的各个单元在形成的不同阶段互相作用，其方向和影响只能在具体的研究中得以描述。最后，这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是*批判的*，因为它将知识视为与其他知识体系和社会价值互相比较的产物。例如，笔者的政治经济学是批判的，因为它常常将在研究中获取的知识与替代性的知识体系进行比较，比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多元论政治科学和文化研究。此外，对于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收集的知识，这种理论范式的衡量标准是多年以来指导很大一部分这种研究的社会准则，包括民主以及构成民主的公民参与和社会平等。

认识论为理解我们如何认知事物提供了一个框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存在论为理解存在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框架。具体说来，存在论区分将各种事物视为*结构*或者视为*过程*。这条河是一种物还是一种流动？它两者都是，可是哪一点受到强调呢？传统上，政治经济学强调物或者结构，例如跨国媒介公司和监管它们的政府。笔者的理论框架则提倡通过将各种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置于最显著的位置，偏离这种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范式。这就意味着，本研究以这种观点为出发点：社会变革无处不在，各种结构和机构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与仅仅识别出各种相关机构相比，发展切入点以描述各种过程的特性要更加有用。根据这种观点，研究媒介机构很重要，可是这种研究是建立在分析一种社会过程——比如将故事转化为电影和其他有销路的产品——的基础上。

以这种原则为指导，本章剩余的部分和接下来的两章以三种启动过

程为政治经济学描绘出一幅翔实的地图：一开始介绍商品化，即将使用价值(use value)转化为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过程；接下来介绍空间化，即传播对空间的转变；最后介绍结构化，即通过社会手段建立各种结构的过程。将这些过程置于最显著的位置并非要代替各种结构和机构，这样做的话无异于以一种形式的本质主义代替另一种。这些过程毋宁是一些切入点，它们组成了一种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社会现实的多种可能方式里一种优先的选择。

第二节　何谓商品化?

亚当·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了使用价值(即一种产品的价值来自对一种特定人类欲求或者需求的满足)和交换价值(即一种产品的价值基于该产品能被用来交换什么)。商品是当产品的生产主要围绕着交换过程组织起来的时候，这些产品所采用的特定形式。**商品化即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开始就分析商品，因为他发现商品是最可见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最明确的表现。资本主义外表上基本就是各种商品的巨额积累。尽管这种外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并非没有受到关注，古典学派倾向于将其自然化，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其展开了批判。斯密及其追随者所谓“不证自明、由自然强加的必然性”，对于马克思而言却不过是“一种社会形态——在此，生产过程控制了人，反之却不然——”的产物(Marx，1976a：175)。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关键之一，就是解构商品以确定其外表有何含义，揭露隐藏在商品形式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正如加利(Jhally，1990)所记录的，在传播文献对于商品形式作出的少数几种持续分析当中，马克思广泛观察了商品和使用价值的含义。对于马克思(1976a：125)而言，商品来自形形色色的需求，既有物质的也有文化的(“来自胃也好，来自想象也好，并无不同之处”)，其用途可谓“千差万别”。商品可能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需求，

包括满足生理的饥饿感和满足或者违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地位惯例。此外，与一些诠释相反，使用价值并不局限于满足生存的种种需求，还延伸到由社会构成的形形色色的使用。

有些批评家不满意这种理论，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与其说让事情变得更明了，毋宁说变得更含糊。例如，根据萨林斯(Sahlins，1976：15)的说法，马克思承认所有价值的社会性，但是倾向于将使用价值自然化，“将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因素弃之不顾，只关心它们满足‘人类需求’的生理事实”。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1)延伸了这种批判，强调使用价值最终被摒弃于构成特定交换价值的成套结构和惯例之外。这种批判提醒我们：马克思的主要目标是质问资本；由于以此为基本兴趣，他忽略了详细处理体现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的观点，包括使用价值和一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勾画出的社会轮廓。尽管如此，这种文化批判也为政治经济学划定了一条它不会跨越的边界，因为这种批判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指出差距。它也代替了一种完全按照文化惯例的具体规定来定义价值的唯心主义相对论；人类文化实践的可变性说明，这实际上相当于任何事物。政治经济学承认可变性，可是又对其加以限制，认为各种使用无不受到商品结构特征的“调节”(用马克思的术语)或者“限制”(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术语)，从它们那里实现自身的存在。汲取了鲁宾(Rubin，1886－1937)的观点[①]，加利(Jhally，1990)建议，使用“部分必要性”的语言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有用性并非悬吊在半空中”的认可。与此相对立，有人可能建议各种使用价值互相构成，并保留由社会构成的使用价值和来自一套特定的社会安排——比如产生交换价值的市场——的价值之间的区别。

剥除马克思称之为商品外表的“洋葱皮”就会揭露出一个生产体系。在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里，有两个总体维度很重要。其一，传播的

① 俄国经济学家鲁宾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家。——译者

各种过程和技术促进了整体经济的普遍商品化过程。例如，提高服装产业的传播渠道，特别是随着引进全球的电脑和电信技术，将信息扩展到生产、分配和销售的整体循环。这提高了盘点存货控制，由此节省了空间，提高了商店仅仅储存顾客需求商品的可能性。其二，影响社会整体的商品化过程渗透了传播的各种过程和机构，以至于社会商品化过程的各种进步和矛盾影响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传播。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逐渐加速的企业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国际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将公共的和国有的媒介和电信机构转化为私有企业。这将公共服务传播转化为商业传播，前者有社会义务提供全民准入和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内容，后者只向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准入，并提供将受众移交给广告客户的内容。

由于本书关注将传播放置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中，因此从商品化的一般过程开始、检视其如何与传播发生关联非常有用。从资本的角度而言，生产过程起始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些商品。全部产品的出售价格比起初的投资要多，多出来的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本身可以被用来投资以进一步扩大资本的积累。在本质上，资本是通过生产和交换过程得以扩展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分析，得出结论说这些是剥削的过程，因为资本家控制的扩大淘汰了替代性的生产体系，迫使劳动力进入一种社会关系，它在其中和土地、原材料一样处于一种商品或者生产要素的地位，并被迫放弃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结果，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换取不足以酬报其所出售劳动的工资。通过绝对剥削（延长工作时间）和相对剥削（强化劳动过程）等深入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商品劳动力实现再生产。剥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可是剥削的程度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例如，当工人组织工会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反抗剥削的时候，资本就必须在劳动过程中做出调整。因此，商品的出现满足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要求，而商品也是一整套隐蔽的社会关系，它们将资本与商品劳动力联系起来，两者为了控制由生产和交换产生的价值而开展斗争。例如，出现在影像商店

的好莱坞电影的数字影像光碟也是一整套社会关系，将好莱坞的制片人与电影演员、导演和编剧联系起来，他们为了谁能从通过在商店里销售或者在网络上发行产生的价值里获利而开展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商品通过将剥削的社会关系以一种令其貌似自然的隐蔽方式呈现，将这种社会关系客观化。因此，在我们眼里，一台电脑就是一种具有一套确定使用价值和由其价格标明的具体交换价值的商品。它在使用和交换中的价值倾向于蒙蔽人们的理解能力，阻止他们将这台电脑看作一种国际分工的具体化，这种分工令生产关系沿着阶级、性别、国家和空间的维度分层。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分析揭露了更深层次的蒙蔽性。按照这种分析，商品不但隐蔽了各种社会关系，隐藏了围绕价值的斗争，还自具生命和权力，超越了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命和权力。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拜物教曾经局限于宗教：

> 因此，为了找到一种类比，我们必须遁入宗教的蒙昧王国。在那儿，人类大脑的产物作为自具生命的自主人物出现，既互相建立关系，又与人类建立关系。充满人类手造产品的商品世界同样如此。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一旦劳动的产品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它就会依附于其上，因此与商品的生产密不可分。(1976a：165)

其实，对马克思而言，商品拜物教比它在宗教领域的对应物更加强大，因为商品拥有实体化身，能将自身直接呈现于感官之前，而宗教信仰却不能。[①]按照这种观点，商品包含双重蒙蔽性。首先，它将资本与劳

① 人们可能驳斥这种论点，认为它不应当将实在(real)和物质(material)混为一谈。一种神灵可以是实在的，却不是物质的。尽管如此，赞成商品拜物教并不依赖于认同由于某种原因商品比宗教信仰更加实在。

动力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化。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电脑，而不是在生产现场围绕生产电脑的工人会挣多少钱等的斗争。其次，商品被物化（reified），即它自具生命，与个人和社会相对立，并成功地塑造后两者。我们将电脑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偶像，体现了笔者所谓的“数字化崇拜”（the digital sublime）（Mosco，2004）。上述第一点将商品视为一个生产过程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一种重大社会斗争的社会结果；第二点完全切断了商品和一个生产过程的联系，将其放置在自身的社会领域里。电脑扮演的角色是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那种力量塑造、确定、限制或者以其他方式控制社会发展。这种双重蒙蔽的结果就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产物被赋予自主的存在和塑造社会生活的权力（Free and Hughson，2006；Hope and Rosser，2004）。

商品化指的是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即将价值由其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的能力确定的产品转化为价值由其市场价格设定的产品。部分由于许多政治经济学思想将重点放在结构和实体上，而不是放在过程和关系上，商品化这个术语尚未受到大量的显性研究。尽管如此，它暗含在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种种讨论当中，包括市场的全球扩展（Fürsich and Roushanzamir，2004；Murdock and Wasko，2007）、公共空间的私人化（Gibson，2003；Schiller，1989）、在人际生活（Ewen and Ewen，2006）和性行为（Mayer，2005）中交换价值的增长。

将商品化和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区别开来很重要，人们倾向于将它和这两种过程联系在一起。商业化是一种更加狭隘的过程，具体指在受众和广告客户之间创立一种关系。例如，电视广播频道的商业化意味着广播广告的增长和将受众移交给广告客户的节目制作得以发展。既然市场不仅仅包括商业化，还包括劳动力的商品化等，我们将商品化视为一种范围更加广泛的过程。客体化是一种经常与商品化混淆、但范围更加广泛的概念。例如，卢卡奇（Lukács，1971）在研究物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种过程，在此人际关系“具有物的特征，因此获取了一种虚幻的客观性”。商品化是这种过程的一种具体形

式，在此获得虚幻客观性的“物”是一种商品，即价值由市场决定的物品。客体化是一种普遍过程，指非人化(de-humanization)发生的许多不同方式。政治经济学集中关注这种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 商品化过程。

第三节　传播中的商品形式

传播政治经济学因为强调描述和检视各种负责生产、分配和交换传播商品的组织化结构，以及负责管制这些结构(主要由政府实施)的组织化结构的重要性而著名。尽管政治经济学没有忽略商品本身和商品化的过程，它倾向于将公司和政府的结构和机构置于最显著位置。在处理商品的时候，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集中关注媒介内容，并在更小的程度上关注媒介受众。它对传播产业中劳动力的商品化给予的关注要小得多。

将重点放在各种媒介机构上容易理解，因为今天的全球媒介企业集团拥有巨大权力。它们能够通过创造内容——全世界的受众每次使用或者再使用这些内容，都能够带来收益——扩展那种权力。接下来，公司采用同样的内容重新包装，供横跨出版、电视、电影和新媒介部门的子公司使用和再使用，愈发深化了那种源源不断的收益(Broe， 2004)。

尽管机构很重要，一味强调其活动意味着对大众媒介的商品形式——特别是对受众和劳动力的商品化——给予的关注还远远不足。

内容的商品化

当政治经济学家们思考传播中的商品形式的时候，他们倾向于从媒介内容开始。具体说来，按照这种观点，传播的商品化过程涉及将从小到几比特数据、大到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的各种信息转换为可销售的产品。例如考虑一位新闻记者，他的工作就是运用职业技能制造包含许多不同使用价值的新闻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报纸生产史涉及众多过程，包括商品化——它将新闻报道者变成了一名工资劳动者，靠出售其劳动力或者撰写新闻报道的技能来换取工资。资本将那种劳动力转化为一篇

报纸文章或者一个专栏，它们和其他新闻报道与广告一起形成了一个套装产品。它在市场上销售套装的报纸，如果成功的话，赚取利润或者剩余价值，接着又投资以扩展报纸业务或者投资到任何其他有希望增加资本的经营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此视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因为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拥有印刷厂和办公室等）使它在利润中赚取的钱比它在工资中付出的更多。

剩余价值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劳动力、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众多因素。就劳动力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检视了创造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前者涉及延长工作时间，换取同样的工资；后者通过对工作时间的使用加强控制，包括使用测量和监管系统以在单位工作时间里获取更多劳动，强化了劳动过程。这些策略是否成功取决于劳动力的抵制能力，而这种能力依靠其自身组织的实力和更加普遍的社会状况，诸如资本以新工人和新技术取代劳动力的能力。具体说来，代表新闻界工人的行业工会有多大实力？将新闻劳动外包和订购机器来从事新闻业务有多么容易？它还取决于政府在法律和公共政策上支持资本或者劳动力的程度。

资本还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策略控制消费者市场，最终目的是达到“自然的”或者一般认为理应如此的产品供应者的地位。这些包括建立一种市场垄断或者控制一种寡头垄断的体系，利用广告创造与公司的品牌认同，将产品线多样化以实现弹性、克服市场需求的种种变化。实现剩余价值的能力也取决于消费者能够抵制的程度；这种因素取决于它的集体行动历史，以及普遍的社会状况是促进还是阻碍消费者使用替代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它还取决于政府支持资本或者消费者的程度。最后，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市场的状况，具体说来，取决于允许以资本代替劳动，还有允许扩展商品形式（例如，从报纸的样式扩展到一个全部是新闻的付费有线电视频道或者一种网上服务）的资本成本。

这个简短的描述说明，创造传播内容的交换价值的过程将全套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引入了商品化的轨道，包括劳动力、消费者和资本。传

播研究一般倾向于集中关注作为商品的内容，进而识别出内容的商品地位与其意义之间的关联。结果，传播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异常强大的商品，因为除了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因此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运作)，它还包含了象征和图像，其意义有助于塑造意识。众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种理论及其结论的价值，该结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媒介已经通过制造反映了资本利益的信息等手段，扩展了商品生产的过程。不管这个过程多么迂回曲折、自相矛盾和备受争议，这些信息提高了对于资本全体和资本特定部分的利益的支持(Bettig and Hall，2003；McChesney，2004；Meyer，2006；Murdock and Wasko，2007)。

尽管他们总体上同意这个结论，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加纳姆和斯迈思，提出了另类的理论。两人都对强调媒介生产的意义或者意识形态维度的趋势提出了关注。终其职业生涯，加纳姆一直将他最猛烈的炮火齐齐射向那些会在事实上抛弃经济学、转而分析“自主话语”(autonomous discourses)的理论家。[①]尽管如此，他也关注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种趋势：论述广告词句及其意义和意识形态，以便——用加利的话来说——采用一种“传播的消费者模式”，却没有充分探讨大众媒介，将其作为“各种经济实体，既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创造剩余价值，从而直接起经济作用，又通过广告在商品生产的其他部门内创造剩余价值，

① 在其1979年出版、影响深远的“对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一文里，加纳姆写道：

> 因此，经济主义——关注在占支配地位的交换关系当中直接的肉体存在和繁殖——是对社会存在决定因素的一个直接和理性的反应。E·P·汤普森(E. P. Thompson，1924-1993)近来所戏称的“成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容易忘掉这一点，既是因为他们存在的物质条件往往并非那么直接起决定作用，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相对于生产性物质劳动所处的主体剥削关系感到问心有愧。(1979：126)

在其专著《资本主义与传播》(*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里，加纳姆首先攻击了“赋予文本特权的倾向”(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因为其空想性并无根据(一个“杆菌”)，这种观点“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文化工人的意识形态被完美地设计出来，因为它将特权赋予他们与符号相关的专门活动领域，并提供廉价的研究机会，因为必须出示的唯一证据就是个别分析者没有确实证据的观点”(Garnham，1990：1-2)。

从而间接起经济作用”（Garnham，1979：132）。按照这种解读方法，大众媒介很重要，既因为它们是商品生产的直接场所，也因为它们通过广告媒介，在遍布经济的商品化过程中起到了一种虽然间接、却很重要的作用。要点并非意识形态性无关紧要，而是它被彻底整合进了一个生产过程，这种过程过于频繁地被看作对意识形态有帮助作用（在某种政治经济学里），或者脱离意识形态自主存在（在某种文化研究理论里）。

新媒介扩展了将内容商品化的机会，因为它们主要基于数字化过程，具体指将包括数据、文字、图像、电影和声音在内的传播转化为一种通用语言。数字化在传播速度和弹性方面极大地超过了更早的、主要依赖模拟技术的电子传播形式（Longstaff，2002）。数字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一个单一的电子传播现在可以被分解为几个数据包，顺着电信网络沿不同路径发射，在目的地又重新组合，由此保证了最有效地利用各种网络。

通过扩展测量和监管、包装和重新包装信息和娱乐节目的各种机会，数字化扩展了传播内容的商品化。一张报纸或者一本书白纸黑字形式的材料包装提供了一种弹性的、但是有限的测量商品和监管购买的方式。政治经济学家伯纳德·米埃耶（Bernard Miège，1941－　）所谓的“流动型传播体系”——最重要的是电视——兴起以后，对传播商品化的挑战也随之兴起（Miège，1989；亦见 McAllister and Giglo，2004）。怎样包装一个电视节目才能将它销售给一名观众？一开始，商品化基于一种没有弹性的体系，将一批广播频道传送到家里，观众为接收机（收音机或电视机）付钱，也为标高售价或者在广播里得到广告宣传的产品的零售价格涨幅付费。这种体系没有考虑对于媒介的差别使用，也没有在收看和购买之间建立任何清晰的联系。它最终发展为一种将通用的广播电视节目传送给大规模受众，以每千名观众某个价码销售给广告客户。

朝电视数字化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在改进内容的商品化，允许信息流被捕获，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允许商品按照更加具体或者更加定制的方式被测量、监管和包装。早期的有线电视通过每个月为一套频道收

费，改进了商品化的广播系统。随着这种媒介变得数字化，公司现在可以提供比以前多得多的频道，并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包装它们，包括每看一次就收一次费地销售内容。通过电视、网络或者这些和其他有线、无线的新体系的某种混合传送的材料现在可以被灵活地包装，然后再包装，以便以某种相关形式销售出去，交易受到了同一数字体系的测量和监管。

扩展商品化过程的能力本身并不能保证其成功。网络企业家们吃了苦头以后才认识到，为内容收费可能真正是一种冒险的生意。技术、管理、经销和顾客需求的问题可能经常从中作梗。尽管如此，每看一次就付一次费的电视、卫星传送的订购广播、网络传送的影像、网络摄像机、iTunes[①] 的兴起、每下载一支歌就付一次费的体系已经让苹果公司成为最大的音乐发行商，这说明新的媒介商品化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Lynch，2004；Murray，2003；Thrift，2006）。这种进步受到了知识产权法的帮助，它允许内容的产权拥有者——越来越多地是大型企业——控制对内容的使用，甚至内容被传送的样式。所以，一个公司现在可以控制的不仅仅是电视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所传送的娱乐，它还可以通过将该节目的制作样式授权给其他国家的公司——比如制作《加拿大偶像》（*Canadian Idol*）的公司——而获取利润（Baltruschat，2008）。

受众的商品化

尼古拉斯·加纳姆检视了媒介商品化的两个主要维度：直接生产媒介产品和使用媒介广告以完善整体经济当中的商品化过程。斯迈思（Dallas Smythe，1977）则通过提倡受众是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的主张，令这些观点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对他而言，大众媒介源于媒介公司生产受众，并将他们传送给广告客户的一种过程。媒介节目被用来吸引受

① 2001 年由苹果公司推出的媒介播放器应用程序。——译者

众；对斯迈思而言，这就好比酒吧一度使用“免费午餐”来吸引顾客饮酒。从这个观察事物的有利位置来说，受众劳动或者它的劳动能力是大众媒介的主要产品。

新媒介进一步阐释了斯迈思观点的要素(Shimpach，2005)。除了扩展传播内容的商品化，数字体系的循环性质扩展了整个传播过程的商品化。精确测量和监管每一次信息交易的数字体系现在被用于完善将观众、听众、读者、影迷、电话和电脑用户这些受众传送给广告客户的过程。在本质上，公司可以用具体反映顾客的实际购买和他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形式来包装和再包装顾客。例如，这些包装——比如，18 到 25 岁的男子在每看一次付一次费的电视上选购功夫片——可以卖给公司，公司在这条信息上花费更多的钱，因为它们想将自己的产品销售给这个特定人群，而尽量不把广告投向那些无意或者无力购买的人们。比起更早期的传送大规模受众的体系，这是商品化观众方面的一个主要改进，今天它已经被应用于包括国际互联网在内的几乎每一种传播媒介，像 Facebook 一类的社交网站就提供了用户的详细信息。

斯迈思的分析激起了政治经济学文献里更有意思也受到广泛研究的一场对话(Livant，1979；Murdock，1978；Smythe，1978)。与其回顾受众主要是商品还是劳动力的种种争论——这些对话已经不止一次得到了详细论述(Jhally，1990)——不如继续研究斯迈思论点更广泛的意义更为有用。有关受众是否从事劳动或者它是不是唯一的媒介商品的争论可能忽略了斯迈思对我们理解媒介商品化过程作出的主要贡献。对他而言，这个过程将媒介公司、受众和广告客户结合成一个三联体，由一套互惠关系联系在一起。媒介公司利用它们的节目建构受众；广告客户付费给媒介公司以便接触这些受众；受众因此被传送给广告客户。这样一种观点拓宽了媒介商品化发生的空间，使之不仅局限于媒介公司生产报纸、收音机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和网站的直接过程，也包括了广告客户或者全体资本。商品化过程令媒介产业彻底加入了整体资本主义经济，而做到这一点，并非主要通过创造浸透了意识形态的产品，而是通过为广

告客户生产受众，受众既有全体的，又采取在人口统计学上令人满意的特定形式。因此，通过证明对商品化过程起主要作用的是为全体资本主义经济制造受众，而不是制造意识形态，斯迈思旨在拯救对媒介的唯物主义分析。

搁置受众是否构成劳动力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争论并且不一定有效的论点，斯迈思对劳动过程概念的展开作为一个隐喻或者类比很有用，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媒介公司-受众-广告客户三联体的思考方式，而没有听命于这样一种结构性论点所招致的机械思维。比其考虑受众是否工作——在该词的传统意义上——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所有问题)，思考受众行为与劳动过程的相似性会更有用，因为后者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资本和劳动力为了控制过程和产品展开的合谋和论争。这比将受众视为惰性大众(inert mass)或者媒介产品的联合生产者要有价值得多：起源于奥特嘉·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t，1957)的所谓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理论家召唤了前者；而菲斯克(Fiske，1989)和安(Ang，1991)之类的多元论者在出售后一种观点，他们对一个被动大众社会的传统批评作出的反应就是走另一个极端，描绘了一种作为联合生产者的主动受众。后者在指出媒介产品的联合构成或者互相构成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将这个过程放置在一个决策的结构当中，这个结构将大部分——尽管不是所有的——控制生产什么、怎样发行和花费多少等决策的手段交付到了资本手中。

资本，在其自身多重和富有争议的展现当中，必须像建构劳动力一样积极地建构受众，可是即使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受众和劳动力都在一个协议条款主要由资本确定的社会舞台里，通过确定如何激活受众和他们的劳动能力而建构自身。对受众而言，这意味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机会：如资本所愿地参加或者观看，以相反或者另类的方式阐释节目，或者干脆就完全不看。玩电脑游戏的新媒介领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受众劳动的概念的理解(Grimes，2006)。研究工作的著作表明，传统的劳动力对生产现场作出形形色色的反应，从完全服从到出工不出力——与此相

类似，受众也行使权力；但同样像劳动力一样，受众的权力受到了主要由资本设定的种种条件的限定。

政治经济学通过检视资本和受众的关系在媒介接受的时刻如何得以进行——凭借以牺牲非商业的公共和社区广播为代价来扩展商业广播——进一步扩大了这种类似性。它做到了这一点，也是通过探讨使用新技术来扩张测量和监管受众行为的过程，并引进每看一个频道、每看一次节目和每下载一支歌曲都得付一次费的服务。此外，政治经济学检视了受众如何通过文件共享、博客、社交网络和旨在抵制占据支配地位的商业体系的媒介使用的其他形式，来回应和抵制。这些活动已经激发了受众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新作(Andrejevic，2003a and b；Arvidsson，2004；Carlson，2006；Grimes，2006；Hope and Johnson，2004；Morris，2005；Shimpach，2005；Thrift，2006)。

劳动的商品化

为了检视内容和受众的商品化，人们倾向于忽略劳动力商品和生产现场发生的过程。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的著作通过直接面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革，引领了知识界结束这种边缘地位的潮流。[①]在他看来，劳动是概念(conception)或者预见、想象和设计业务的能力和实行(execution)或者将之付诸实施的能力的统一体。[②]在商品化的过程中，资本插手令概念和实行、专门技术和未经训练实施一项任务的能力分离。它还将概念的权力集中于管理阶级——它要么是资本的一部分，要么代表其利益。最后，资本重组劳动过程，以回应这种在生产现场中技术和权力的新分配。在极端情况下，这种重组的完成是通过应用由弗雷德里

① 布雷弗曼的著作出现得特别及时，因为它问世于1974年，正好是战后持续繁荣之后经济衰退的开始阶段。这段时间也刚好是强化使用电脑通讯系统来控制工厂和办公室的开始阶段。

② 区分概念和实行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正是构想或者想象的潜力，而不仅仅是执行或者实行由我们的基因支配的本能将人类建筑师和蜜蜂区别开来。两者都能制造美妙的结构，可是只有前者才能将概念和实行统一起来。

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首倡的所谓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实践。[①]这些实践就是精确地测量以最有效的方式——即保证投资有最大回报——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和劳动量。在此过程中，管理部门变成了一个企业的科学智囊团，而曾经拥有控制生产过程权力的行业技术工人却被转化为机器的附庸。布雷弗曼记载了随着大规模企业兴起的劳动变革过程，而他为世人公认的突出成就却是：他是作出了持续性研究、证明这种过程延伸到了服务和信息部门的先驱之一。布雷弗曼的著作引发了连篇累牍的经验研究和学理争论，后者主要集中于必须探讨这种过程富有争议的本质，还有工人和工会运动的积极能动性(Burawoy, 1979; Edwards, 1979)。这些著作的很大一部分组成了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70)所谓的“常规科学”，即解决并扩展布雷弗曼的贡献里包含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可能的影响。这包括为生产现场富有争议的地域绘制地图，记载其历史，证明劳动过程的变革如何在不同企业、职业、阶级、性别和种族那里得到不同的体验。最近的著作——包括学者的评估和商业出版社的报告——倾向于开始关注随着技术成熟程度的稳步提高而得到改进的传播方式如何增强了全体劳动过程的商品化(Baldoz, Koeber, and Kraft, 2001; Huws, 2003;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尽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尽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文化产业拥有广泛的兴趣，传播研究还是倾向于将其研究对象定位于消费领域，这促成了研究者集中关注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不是媒介的劳动过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对于制度对媒介生产的控制和这种控制对受众的影响——包括受众劳动力的概念——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更多的注意力可能已经转向了受众劳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产

① 在莉莲·吉尔布雷斯(Lilian Gilbreth, 1878－1972)手里——她丈夫是泰勒的一位信从者，开发了衡量工作时间的单位“therblig”——这种泰勒化的过程被应用到了家庭，由此使得主要是妇女能够“科学地”管理家政。

业的劳动过程，尽管这种情况在不断变化。此外，媒介产业的工作负载着强烈的行业、职业和手艺传统，即使劳动过程发生了变革，这些传统仍然在延续(Deuze，2007)。征战的专业记者或者高技术企业家的形象颠覆了媒介和高技术世界不那么浪漫的现实——这些领域的大部分工人都在昔日产业工人似曾相识的条件下辛苦地工作。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是强调媒介生产的个人创造维度，创造性将这个部门同许多共享工业生产特征的行业部门区别开来。作者写书，一些导演是电影的主创作者(auteurs)，明星出演电影或者电视节目，等等。这种观点证据确凿，主要是基于这个产业要求相对高层次的概念思维。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出版业工人和他们的工会在全体劳动大军中占据一种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可是一味强调个人创造性只会遮蔽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不管这个过程多么不均衡，它看上去已经越来越像一般经济中的劳动过程。

组织传播学和社会学已经令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媒介产业的官僚结构和生产过程。塔齐曼(Tuchman，1978)、费什曼(Fishman，1980)、甘斯(Gans，1979)，还有更新的杜兹(Deuze，2007)等人的著作检视了管理主要是新闻制作的复杂过程的官僚控制体系。他们的著作强调了如专题报道、明细的劳动分工和规律化的特辑一类简化性的日常工作为可能不受限制的生产过程建立了一种模板。这些研究证明：大量的组织规划和预先处理被运用于收集、包装和发布新闻和信息的日常工作。这种路数的研究对于探讨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很重要，因为它以丰富的经验细节描述了帮助构成媒介制作的工作的社会-技术过程，即使该过程将劳动力转化为可以销售的商品。然而，尽管这种研究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致意，但由于偏爱一种基于官僚主义和组织理论的框架（而它又把抽象的行政需要和行政功能置于前台）这些影响没有得到理论化。尽管认可权力和利润，这种理论却延续一种起源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罗伯特·米契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著作的文献传统，集中关注官僚机构的种种结构性压力如何将文化产业的生

产合理化，贯穿复杂的由官僚主义管理的一种经济始终，它们莫不如此运行。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组织传播学文献贡献了丰富的经验细节，却倚赖一种唯心主义的根基，以一种管理本质主义代替在它看来的市场经济本质主义。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建议的，它将管理方式的决定性影响置于生产方式之上。组织传播学文献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挑战是发展出一种立场，检视了将政治和经济权力置于最显著位置的生产过程，尤其是将劳动力的商品化置于最显著位置。这会在制度分析和文本分析之间建立一种重要的联系，从而保留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唯物主义优势。重要的并不是通过复兴一种本质主义来收复另一种本质主义的失地，而是对媒介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商品化进行理论化。正如第六章所描述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出了几步，可是大量工作还有待进行(Huws, 2003; Kumar, 2007; Martin, 2004; McKercher and Mosco, 2006, 2007;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Wasko, 2003)。

第四节　内在商品化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传播的商品化过程的三个主要产品：内容、受众和劳动力。本章现在转而考虑商品化的另外两个方面：商品如何生产自身的新商品或者内在商品化(immanent commodification)，以及新商品如何通过不同商品之间的联系被生产出来。

我们从重返受众商品开始，政治经济学家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提供了对它的一种另类思考方式：以节目的受众欢迎程度排行服务为中心。由于“信息和受众都没有被交换：只有节目的受欢迎程度排行被交换”，她主张(1984：223)这些关于受众规模、组成和媒介使用模式的报告构成了媒介系统的基本商品。米汉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好几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A·C·尼尔森公司(A. C.

Nielsen Company)[①]使之变得著名的一种产业的唯物主义历史，和对受众欢迎程度排行这种统计资料的社会建构——受众欢迎程度排行根据现实经验记录受众的种种实际特征，故此它的交换价值一点也不像它的使用价值。对笔者的分析来说，她的研究格外有价值，因为当它和其他领域的研究综合起来的时候，就指向了商品化过程的循环本质。受众欢迎程度排行是由另一种商品产生的一种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商品直接从创造另一种商品的过程中产生。我们把这个叫做一种内在过程，因为一种商品直接导致了另一种。

商品化要求使用测量程序以生产商品，使用监管技术以掌握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即时动态。前者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广告的准确长度或者生产出来以销售给广告客户的广告时间的数额。监管的例证有各种各样的实践，包括传统的商业结算、市场营销研究、资本成本评估、工资和福利研究、消费者调查和更加新近的各种新事物，比如数据对比体系——它将一宗信用卡或者付款卡的购买与人口统计和个人风格方面的信息联系起来。这些实践是商品化过程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产生的信息被用于生产诸如报纸、电视情景喜剧和社交网站一类的商品。它们是内在的，因为信息产生的过程导致了一种新商品的生产。就此而言，节目的受众欢迎程度排行是内在的商品，因为它们由促进商品生产过程的种种商品构成。具体说来，它们被作为内容和受众商品化过程的一种要素而生产出来，而它们本身也是受众欢迎程度排行产业的主要商品。这使得受众欢迎程度排行服务非常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是媒介商品本身，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媒介商品化总体过程中一个相当高级的阶段。利用高级的传播和信息技术，普及化的监管和监测程序得以发展，产生出一个商品族群，而受众欢迎程度排行服务就是其中的一部分(Campbell, 2005; Campbell and Carlson,

①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一家全球性市场营销研究公司，以创造测量电视、广播和报纸受众的尼尔森受众欢迎程度排行而闻名。——译者

2002；Carlson，2006）。[①]就此而言，受众欢迎程度排行和根据自动搜集的、有关消费者购买的数据而生产和营销的商品一样重要，尽管并非在本质上更加重要。两者都是内在化商品，包含了一种交换价值的二级次序，它取决于一种一级次序。

回到1992年，一家营销这些内在商品的主要公司的首脑具有先见之明，承认了它们的重大意义。对德西蒙（DeSimone，1992）而言，它们以原有的商品化过程为基础，

> 将内在于产品的价值转化为与谁需要它、谁供应它和它做什么的信息联系在一起的价值。你买一本杂志，用一张信用卡付钱。这是一笔简单的交易吗？几乎不是。有关你是谁、你偏爱什么杂志的信息——由一台电脑记录下来——其价值和销售这本杂志获得的报酬一样多。这个信息可以用不同方式包装。它可以销售给别人。此外，所有的内在过程都受到了你的决定的影响——从营销到购买到财务。今天，所有的组织无不在从事信息业务。

尽管公司的信息产业中心发布的信息往往言过其实、不可全信，留给我们的却是这样的观点：超越寻找媒介唯一商品的观念至关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将扩大交换价值的螺旋式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实践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商品化过程置于最显著位置——德西蒙作出结论说，这种螺旋将

---

① 吉登斯（Giddens，1938－ ）的著作在提倡我们关注机构监测体系的发展方面无疑很有价值。尽管如此，通过把监测确定在由“信息控制和社会监督”占据的体制领域、并和他描述为主要从事“在竞争性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条件下的积累”的资本主义分离，他和许多其他社会学理论家忽略了积累过程对监测体系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还有这些体系对于扩大资本积累的必要性。吉登斯的确谈到了“互相渗透”（interpenetration），可是积累和监测仍然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他“将监测与民族国家等同”（identification of surveillance with the nation state）时得到强化。后者肯定卷入了监测的构成，可是通过将监测确定在国家中，吉登斯摈弃了下列论点：以合理化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形式出现的监测是商品化过程中商业公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受到这些公司的推进（除了其他以外，见Giddens，1990：55－63）。对公司和政府测量与监管交易的种种形式的深入分析，见安德烈杰维奇（Andrejevic，2003a and b）和莱昂（Lyon，2006，2007）。

所有的组织吸引进了生产内在化商品的信息产业的轨道。正是在这种商品化的总体框架里，检视应用新的测量和监测技术以扩展媒介商品的生产变得很有用。网络终端数据、数字电视录像设备、智能卡等，生产新产品，采取的形式是报告收视和购买的情况，包括和众多数据库联系起来的人口统计学细节。可是新产品不仅仅是离散的单位。它们是将它们以结构化的层次体系连接起来的商品化过程的一部分。根据一位分析家的观点：

> 在这种窥探背后的驱动力是商业。目前在线广告的巨大增长区域是“行为的目标市场选择”（behavioral targeting）。网站也收取费用，如果他们能够告诉某种豪华赛车的制造商它的广告会出现在由高收入的中年男性点击的网页上。
>
> 不过，这些信息比年纪和性别要具体得多——也敏感得多。技术公司也随时记录一位特定网络用户搜索匿名戒酒互助社的聚会、访问成人网站、在网上购买治疗癌症药物或者参与反政府讨论群体（Cohen，2008）。

内在商品化不但制造新的商品，也创造威胁隐私的强大的监测工具。

第五节　外在商品化

人们也可以观察到一种扩展的过程，它将商品化推广到那些由于各种各样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在历史上被遗漏在这种过程之外，或者只是受到了轻微影响的区域。这些包括为数众多的信息和文化区域，以往都是传播和文化研究（Murdock and Wasko，2007）、地理学（Graham，2002）、城市研究（Gibson and Lowes，2006）、发展研究（McDonald and Ruiters，2005）和环境研究（Dorsey，Steeves，and

Porras，2004）的专题。本书描述了商品化的过程如何扩展到了公共机构区域，这些区域曾经是与市场权力无关、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资源。这些包括媒介和电信，但也包括水、教育、街道、公众聚会游乐的场所、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事物、地点和服务，这些当然都是从各种各样互相竞争的力量和动机中创造出来。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保留了使用价值和惠及全民而无论其支付能力如何的原则。

广泛的商品化有多种显著的表现形式，尽管这里不是逐一详细探讨它们的地方。经济增长的衰退和政治权力的右倾引发了削减图书馆和公立学校等公共信息机构的基金（Monahan，2004；Tracy and Hayashi，2007）。我们已经亲身经历了公共信息、邮政、广播和电信系统的大范围私有化和商业化，还有推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于成本”定价的逻辑——也就是对那些市场权力拥有者有利的管理方法。广泛的商品化也包括转变公共空间——将公园变成私人管理的购物中心，博物馆、体育比赛和节日也越来越依赖商业赞助（Gibson，2003；Gibson and Lowes，2006；Gittings，1998；Negra，2001）。品牌化日益增长的力量和人们穿戴企业标志和其他广告的趋势将身体和个人身份商业化（Arvidsson，2005；Klein，2002；Rajagopal and Bojin，2004；Riordan，2004）。随着人们必须付钱来维护匿名性，我们也见识了隐私本身的商品化（Deery，2004a and b）。这些发展说明，商品化过程已经延伸到了那些曾经倾向于按照一种不同的社会逻辑——基于普适性、平等、社会参与和公民身份（citizenship）——组织起来的场所和实践；尽管历史详尽地记载了这种社会逻辑的种种短处，它还是扩大了社会行动的基础，而现在，它正在被日益简化为一种将权利与市场权力画等号的市场逻辑。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记载了政府和大公司的权力扩大商品化的过程。这种理论需要比以前探讨得更加充分的，就是这个过程如何与*扩展点*（the point of extension）的现状发生联系。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于理解商品化的成功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商品化过程缩减了

其他替代性过程可以利用的资源、时间和空间，这样商品化就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权力的过程，而是被理解为社会生活的自然秩序、常识和天经地义的现实。这个论点很重要，可是得出它的过程摈弃了将我们带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的一个重要步骤。提倡一种逻辑而淘汰其他替代性逻辑的制度权力对于构建一种权威观点或者霸权（hegemony）至关重要。可是，还有联系制度权力和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多层关系上发挥作用的权力的问题。交换价值的扩展，不仅是通过削弱使用价值或者非商品价值，也是通过利用这些价值来增加自身的魅力，并在此过程中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

再来思考一下克劳福德（Crawford，1992）是如何描述这种过程在购物中心发生作用的。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记载了使用制度权力来改变交通、土地使用、投资、媒介以及其他制度政策，以重建购物的模式，并且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重建围绕购物中心的社交模式。克劳福德向这种文献致意，但集中关注的却是商品化过程如何在购物中心内部发生作用。她举出的一个例证是一家商店的橱窗布置，将一个普通的罐子放在一种摩洛哥后宫的布景里。她认为，这样做将这个罐子从相关语境中抽离出来，由此将它转化成一种出人预料的、异国情调的、因此令人兴奋的事物。如她所言：

> 这种联想的逻辑使得非商品化的价值增加了商品的价值，但是也强加了相反的过程——先前非商品化的实体如今成了市场的一部分。一旦这种属性交换被吸收进了本来就已经是开放和不定的商品和需求之间的交换，联想可以无限制地产生共鸣。（Crawford，1992：15）

无限制共鸣之说言过其实，因为其将一个互动的过程转化为失控的反馈。众多过程，包括回想我们与罐子打交道的日常经验，能使这个无限制短路。此外，将这个过程描述为“零售魔法”将由实体的使用和联

想的意象共同构成的事物理想化。尽管如此，克劳福德的描述通过表明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遇的扩展点商品化如何发生，赋予该过程质感和精妙感。它提供了一种手段以深入分析一种过程，这种过程的总体结构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家详尽地描绘过。

如果说克劳福德有效地拓宽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交界，其他两种趋势就不那么富有成效。由于这些趋势直接与商品化过程相关，在此处探讨它们、而不是等到论述政治经济学边界上一般挑战的第九章会很有用。一种没有成效的趋势就是将商品化与社会互惠的普遍趋势混为一谈。后者指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性，它将人们通过交换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的支持者(J. Davis, 1992; Schudson, 1984)倾向于引证有关礼物交换仪式——譬如“炫财冬宴”(Potlatch)[①]——的人类学文献，这些文献说明市场的建构和交换价值的发展深深植根于更加普遍的社会群体形成过程，换言之，市场是自然形成的。从这个有利角度来说，商品化并非理解社会领域的一个主要入口点，它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交换的普遍趋势的许多表达方式之一。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将注意力导向了依附于各种社会过程、并促进其构成的层层仪式(J. Davis, 1992)。

在政治经济学里，凡勃伦(Veblen, 1899)运用了这种理论，其研究最好被理解为体现了在休闲和商业阶级当中一位人种志研究者的人类学洞察力。[②]可是凡勃伦识别出并避开了将仪式交换的一般趋势与其在商业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混为一谈的诱惑。他承认前者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陷阱，在抽象普遍性的意义上表明引发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动态过程不如部落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普遍相似性重要。凡勃伦

① 西北太平洋海岸美洲印第安人一种仪式性交换财产和礼物的社交聚会，以此确认赠与方的社会地位。——译者

② 这段话暗指凡勃伦的名著《有闲阶级理论》(1899)，该书认为：由工程师运转的“产业”生产产品，而寄生性的“商业”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替一种休闲阶级赚取利润。凡勃伦还引证人类学，主张当今社会的劳动分工正是从史前的部落生活演变而来。

会意识到这种强烈的反讽意味：如今，学者们企图将交换从具体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通过引证资本主义已经消灭殆尽的部落社会习俗，缩小导向资本主义的变革的实际意义。政治经济学承认商品化的过程涉及仪式习俗——它们可以加紧或者放松社会纽带。它对正统经济学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正是后者倾向于在经济生活中排除风俗和道德的力量。可是，政治经济学也企图避免唯心主义，因此集中关注蕴含在历史特定的实体和形式中的权力——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呈现出这些特定实体和形式(Rucinski，1991)。

另外一种有问题的趋势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无所不在的商品化采取的一种形式以社会习俗的生产取代了商品的生产，以符号价值(sign value)的霸权取代了它与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变的传统联系(Baudrillard，1981)。[①]与将商品化掺和进部落仪式的理论背道而驰，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29－2007)建议一种激进的核分裂，在此过程中，物品和产生它们的劳动过程在符号自由流动的权力面前断裂、分解。一切都被吸收进了一个被改变的商品化过程。他再三强调：

> 符号的超意识形态和符号具(signifier)的普遍运作今天处处都受到了结构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和控制论等新主流学科的承认，已经替代政治经济学成为制度的理论基础。(Baudrillard，1975：122)

本书无意检视围绕鲍德里亚观点的广泛争议(见 Kellner，1989；

① 鲍德里亚攻击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认为一件物品有四种方式产生价值：(1) 功能价值；(2) 交换价值；(3) 象征价值，即某主体赋予一件物品与其他主体相关的价值，如一枚钻戒能公开声明对配偶的爱；(4) 符号价值，即该物品在一种物品的体系当中产生的价值，如一枚钻戒能表明佩戴者的品位或阶级等社会价值。前两种价值常常受到第三种，尤其是第四种价值的破坏。由此出发，鲍德里亚认为，消费而不是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译者

Gane，2006）。考虑其观点对商品化具体过程的种种影响更加有用。在此，鲍德里亚看来支持商品化以其无所不在的权力横扫各种替代物、独霸天下的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也认同这种观点。可是，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对该论点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尽管以现代主义的普遍污染话语或者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必胜主义为框架，提倡商品化的兴起暗示这种无所不包的过程没有替代物。商品化就是一切，所以尽量利用它吧。这样一种论点没有认识到在商品化过程和其他替代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此外，商品化的胜利究竟是何含义并不清楚，因为这个术语的含义在鲍德里亚的分析里完全变了。特别是在他的后期著作里，鲍德里亚以一种创造符号价值的普遍化社会过程替代使用商品化的工资劳动力以便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可是在具备明确含义的意义上，符号价值仅仅局限于资本需要制造一种密集的、等级分明的意义体系和地位识别体系，以巩固其权力。尽管被授权为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解读，它却通过排除政治经济学两大必须思考的问题来购得这种授权证书——第一是各种人类需求的存在，它们在使用价值中显露，从劳动阶级的视点来说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第二是围绕着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组织起来的一种制度体系，也就是站在资本立场的政治经济学。

重新思考一下凡勃伦。鲍德里亚承认凡勃伦的影响力，但是将他对地位的分析当作社会组织的独立基础，却缺乏在凡勃伦看来支撑它的主要根基——人类需求的存在和一种支持与颠覆它的制度化政治经济学。在鲍德里亚那里，商品化的过程被简化为各种象征的自由环流——盗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机制让这个结果变得晦涩难解，而该机制本身也被简化为一套自由流动的术语，从它们由历史构成的特定含义中剥离，给一种本来无足轻重的论点增加分量。对政治经济学更加有用的做法，不是躲进商品化即一切的令人绝望的结论，而是牢固地树立商品化并非一切、真正的替代物存在并且理应受到研究的观念。

第六节　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替代过程

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包括那些反对在传播研究中使用它的人们，一致提出它倾向于本质主义。这种论点以多种方式表述，可是就传播研究而言，它反对这种观点：可以将所有的传播和文化实践简化为一种作为基础的或者更加根本的、涵盖商品化过程的政治经济学现实[《大众传播的批评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5]。前面几章提供了证据说明这种观点言过其实。无论是普通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它在传播领域的应用都包含丰富、多样和全面的研究，根本没有被简化为简单的分类或者简单化的指令。具体说来，商品化改变了媒介内容，但并没有将它简化为一个奇点，使得人们直接从商品化过程阐释媒介内容。通过以商品化为起点，本章已经建立起一种理论参照系，即使也承认一切过程的多重决定和互相构成。本章现在要开始识别另外的过程以及与它们相伴的另类的、反对的实践构成的结构。

在这个领域比较有价值的理论方案之一探讨了政府在奥佛(Offe，1940－　)所谓的“行政的再商品化”(administrative recommodification)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奥佛而言，强调市场作为大部分问题解决方案的自由放任政策时期必然会带来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或者政治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化”。这是对不顾一切依赖市场机制的失败所导致的不稳定和冲突作出的反应。2007—2008 年房屋和借贷危机引起的银行和投资公司的崩溃导致政府干预，以国有化或者其他方式援助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和美国的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之类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它还给无力偿付按揭的房屋业主提供援助。非商品化涉及创造社会政策和计划，以保护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行列的社会行为者——包括那些基本上不能也不会参与商品化的人——的经济存在。可是，阻止这些人从过程中“掉队”的转移性支付和其他收入来源已经证明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奥佛还强调，这个过程已经证

明在政治上同样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事实上无法做到既在政治上管制经济，又不在实质上将它政治化(Offe，1984：35－64)。结果，奥佛看到了资本以再商品化作为回应，即“通过在政治上创造条件使得法律和经济主体可以作为商品运作，从而解决商品形式的问题”(Offe，1984：124)。

具体说来，这提倡一套计划，目标是提高劳动力的市场价值、整合和集中跨国资本、支持那些消费成瘾的人、允许将那些没有通过市场检验的人排除出列。但是，根据奥佛，这些做法只能部分取得成效，因为政府沉湎于试图以非市场的手段推进市场，必须为把部分人排除出列的做法付出代价——比如控制犯罪和扩建监狱，尽管这种付出可能不是直接的。此外，自马克斯·韦伯开始的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已经证明，其结果往往是非市场机制一开始被作为一种手段引进，后来却变成了目的本身，损害了再商品化过程。这引发了政府本身的反应，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早期尤其显著，结果导致将市场原则应用于政府，期望如果政府外表看似一个市场企业，它就会推进市场原则。问题是——奥佛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到这个问题——尽管可以让政府在外表上类似一个市场企业，要让它在行动能力上也类似市场企业存在种种根本的限制，主要是因为政府被排除在直接积累的行列之外。换言之，当政府通过赚钱成为一位成功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就会迫使政府停止和私人企业竞争。

奥佛的观点——也得到其他人的响应(Jessop，2001)——进一步纠正了坚持一种简单的、确定性的商品化过程所固有的本质主义。尽管如此，它还是局限于证明社会变革的发生来自商品化的种种限制，还有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对真正社会变革的种种限制总是回归到商品化。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是否存在商品化的真正替代物？

私人生活的社会过程

本章的剩余部分将概要介绍当代社会学思想和传播研究中指向商品化替代物的种种趋势。它们表明，尽管商品化具有强大的威力和无所不

在的渗透力，却并非独一无二。这些替代物，每一个都在广义上和使用价值、在狭义上和我们通常所谓的私人和公共生活（private and public life）联系在一起。私人生活特指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哈贝马斯（Habermas，1989）称之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区域，现象学社会学称之为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领域。基于私人生活的过程往往都是与情感有关的，聚焦于身份构成、友谊和亲情。重点被放在了人和物（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象征的）按照其本身的价值受到评估，而不是按照其市场价值。那些源于公共生活的过程倾向于具有市民化过程，该过程将人们聚集到一起交流意见，自我管理并支持、抵制、反对哈贝马斯（Habermas，1989）所谓的在“系统”世界里权力和金钱的组织，并创造“系统”世界的替代物。在私人领域里，商品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替代物是友谊和亲情的构成；而在公共领域里，是公民身份。

试图探讨商品化和在私人与公共生活中发生作用的种种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克服机械化思维的倾向——最强烈地体现在将讨论简化为私人和公共的二元对立的普遍趋势。这样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私人”一词负载多重含义，既包括最亲密的人类经验，也包括跨国商业体系的市场行为。两者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在如此重压下，这种理念很容易崩溃，严重束缚了我们理解商品化更广泛含义的能力。如果淘汰“私人部门”一词，将“私人”保留给亲密的领域，让“市场部门”或者类似的术语指代商业，会让情况好得多。私人、公共和市场领域的划分并不完美，但无疑是对私人-公共二元对立的一种改进。可是，由于流行用法的威力和惯性，纠正与“私人”这个术语相关联，或者与私人和公共生活的机械二元对立相关联的种种问题不容乐观。本书可以被视为朝此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反映了社会科学内部分界的传播学结构使得将各种私人过程和商品化、还有那些标志公共生活的过程之间的关系理论化变得异常困难。这是因为该学科倾向于根据社会复杂的程度组织起来，因此将人际传播与组织/机构传播区别开来。尽管有例外，一般说来，人际传播，犹如微观

社会学，被隔离出来作为可以检视感情和亲密的领域。当人们离开了分析的人际层次，感情和亲密逐渐丧失了重要性。当人们到达了处于社会复杂程度上层的政治经济学，微观或者人际层次研究的那些问题消失殆尽。这对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使命意义重大，因为既限定了理论的全面性，又限定了它的社会应用(Eagleton，2003)。由于缺乏与人际层次的直接遭遇，政治经济学很难解释经验的领域和情感的领域。因此，在权力的制度层次(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聚焦中心)所发生的一切和人们以少数人群与语言/图像经过中介的表现发生一系列遭遇、彼此之间也发生一系列遭遇的日常生存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对于经历这种反差的人们，政治经济学也很难解释其行为的重大意义。

多年以来，对斡旋制度和个人两个层次的关注已经收获了大量的理论反思。回溯到1959年，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在社会学的一本经典著作里，一开始就识别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人们无法将私人的福利和各种问题与“历史性变革和制度性矛盾……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兴衰”联系起来。他接下来说，如果我们无法将我们的生活与历史联系在一起，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以变革历史是相当困难的(Mills，1959：3)。为了纠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观察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研究身份认同(identity)——包括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的著作的增长(Calhoun，1994；Castells，2004；Giddens，1991；Hall，1989b；Van Galen and Noblit，2007；Woodward，2004)。众多原因造成了这种增长，包括霍尔(Hall，1989b：12)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曾经令我们的身份认同保持稳定的主要的社会集体性——阶级、种族、性别和国别的主要的稳定集体性——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受到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深刻冲蚀。”全球化经常被引证为推进这种不稳定化过程的主要社会-政治发展。此外，女性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克服父权制下社会学思想的显著分界——将个人与政治分隔开来——的政治和学术倾向，已经在围绕这些发展和重建的过程与可能性的随后的争论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最后，新媒介的增长使

得在网络空间创造虚拟世界成为可能，进而使得通过虚拟社群发展多种面具人格成为可能。

由这类文献提出的种种问题有大量争论空间。例如，考虑到全球化、女性主义运动和数字媒介，人们能够理解霍尔提倡关注主体身份认同的不稳定化是如何正确。可是，另一种情况也同样存在，正如政治经济学已经证明的，资本主义总是令身份认同不稳定，并且就教育、收入、权力和总体的生活机会而言，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与以往相比同样要紧，甚至更加要紧。

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家已经对分裂自我(divided self)的问题各自提出了特有的解决办法(Bell，1976)。前者提倡回归传统，传统在历史上为私人生活中的自我提供了道德支柱。后者倾向于赞同更多传播，将参与各种流通的电脑网络——包括形成今日数字社群的社交网站——视为对过去将人们束缚在一起的更加僵化和专制的种种联系的改良(Castells，2001；Jenkins，2006)。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所谓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体现出来的更加激进的思维方式已经通过接受断裂、分界和解构的必然性，探讨了私人生活的种种问题。它们不是用旧的价值或者新的传播来攻击这些，而是珍重它所提供的自由。这包括从需要建构和维护单一身份认同当中解放出来的自由(McGowan，1991；Newman，2007)。

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它在检视商品化对私人生活的威胁方面——而不是想清楚怎样抵制和创造替代物方面——更加训练有素，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它被一场重要的争论遗漏在外。当它与这些问题打交道的时候，它斥责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研究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选择如此强烈地集中关注坚固事物如何一一化为乌有、宏大叙事如何逐个分崩离析，以致它们倾向于忽略房间里那头重达800磅的大猩猩：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坚固的全球力量和一种宏大叙事，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生机勃勃。

一种更加积极的替代做法，就是让政治经济学通过在一种包括道

德、性欲和美学的生命体验中创造商品化的各种替代物，回归批判社会学思想的各种支柱。这些与诸如社会阶级、种族、民族、性别和社会运动之类我们认可的、更加显著的社会形式互相作用。倘若我们不是将这些视为赋予我们的僵化类别，而是视为我们为了创造历史和我们自身而设立的种种社会关系，它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个人和政治之间建立联系（Eagleton，2003：222）。这会使得政治经济学论述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在私人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各种过程在此遭遇商品化，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处于不断进行当中。此外，人们可以超越对这种紧张关系的勾勒，抵达奥康纳（O'Connor）如下描述的抵制：

> 这种危机时刻恰恰是转变成一种社会个体成为可能的时刻……在这一刻，人们可以将内心的斗争外在化，或者知道和感觉自己受苦受难的方式也是其他人受苦受难的方式，将苦难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通过社会和政治斗争将苦难外在化。（1987：181－182）

关于这种抵制，两个主要问题继续横阻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家面前：它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又是怎样被表达出来的？鉴于此，现在我们从私人生活转到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的社会过程

社会学理论和传播研究将公共生活作为推进民主基本特性——即社会平等和最充分参与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的一套过程来考察。因此它是一种抵制商品化的形式，为发展替代性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指南。哈贝马斯（Habermas，1989）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著作尤其重要，因为它批判性地检视了这个观念，并提供了几个概念工具，有助于复兴一种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身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他的著作吸引了传播学者的注意，部分是因为他主张传播或者“理想的言说情境”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公共领域奠定了根基。他还得出结论说：当代商品化的大众

媒介，伴随着消费主义和官僚政府的普遍扩张，是它衰落的根本症结所在。哈贝马斯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共领域的争论，其他人通过吸收妇女、非西方世界和其他会令其范围更加普遍性、世界性的特征，改进了这种观念（Negt and Kluge，1972；Peiss，1991；Crossley and Roberts，2004）。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此感到满意。有些人会抛弃这种观念，认为它毫无希望地作出妥协，如德里达（见 Keenan，1993）就声称“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被简化为“一个幽灵的轮廓”。批判性地推进这个观念的另一企图则将公共领域视为包括民主、平等、参与和公民身份在内的一套原则，指向与商品化捆绑在一起的成套实践的替代物。后者已经在传播研究里占据了最为显著的位置，那些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人尤其持此观点（Calabrese and Burgelman，1999；Calabrese and Sparks，2004；McChesney，2007）。这种研究探讨了利用出版界和新媒介以及各种规制和政策体系来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发展创造各种对立的空间。传播研究也关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概念，该术语源于规范传播产业的法律。这个概念已经受到了广泛讨论，包括对其含混性的批评，特别是在貌似更加清楚的市场考验的衬托下。尽管如此，公共利益的观念在法律里保存了下来，但是商品化的过程已经削弱了它的地位。它也作为公共领域概念的延伸在研究里保存了下来，指那些超越商业收益和消费主义的利益。

关于公共领域的争议无疑是当今社会思潮里意义最为深远的思潮之一。部分原因是它构成了一种广为传播的运动，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市场和商品化过程的各种实质替代物。但它同时也是一场令人恼怒的争议，因为公共领域的大伞覆盖了最广泛多样的定义和立场。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既反对政府，又反对市场；对其他人来说，它与政府或者市场结盟。例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1989）对政府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但又指出政府运作的公共机构——比如遭受商品化侵袭的公共图书馆、公立学校和大学——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1993）令人信服地将市场视为对规制的压抑形式的一种反

对力量。理论家们各执一端，认为公共领域包含了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为其所包含，或者与其截然不同。它能够占据物理空间、制度空间，或者电子的网络空间。它包括最广泛多样的社会行为，从有关主要公共事务的争论到购物和音乐影像。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彻底废弃这种观点的替代观点还不如它有吸引力。

问题是如何探讨它究竟*为何物*？或者说，既然很流行将它视为一种领域，它究竟*在何处*？笔者认为，后一个问题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一个关键问题。人们倾向于将它想成一种占据可指定空间的物体，不管是物理的、社会的、电子的还是神话的。公共领域的辩护者听上去好像在守护一片领土，阻止一个志在征服的强大敌人入侵。这种类比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市场和公众如何互相对立。可是当它引导人们将市场和公众想成占据具体场所的物体——它们本身就很难确定，如果不是不可能确定——的时候，这种观点变得非常糟糕。这种困难导致对于什么处于公共领域内部或者外部的立场变来变去。“公共”这个术语远非毫无歧义，可是看来和它相关联的问题要比和“领域”的观念——无论人们如何具体定义它——相关联的问题少得多。

探讨这种问题的一条途径就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贯彻民主——即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上全面推进平等和最充分参与——的一套社会过程。这些过程既不同于那些以私人生活为中心、提倡人际亲密的过程，又不同于那些促进交换和剩余价值创造的市场过程。从过程的角度来思考的价值在于：尽管平等和参与更有可能遵循某些制度形式和空间而不是他者，但它并没有在定义上排除任何一种结构的化身或者地点。后者更适合被视为有争议的地带，无论它是政府、市场，还是诸如社会运动一类设法令自身与政府和市场都保持距离的结构；在这些地带，商品化和民主的过程互相竞争。一切都可以成为个人的不同身份——例如，作为一名消费者和作为一名公民——互相斗争的场所。

从一种公共过程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困难，因为各种替代物——显然声名卓著的各种制度和结构——将实在感赋予了要不然就会被视为唯心

主义抽象概念的东西。不仅如此，它们还提供了一幅路线图，尽管经常需要修改，还是通过建议走什么和不走什么路线，为从一个地点到达下一个地点提供了指南。尽管如此，制度和机构也可能提供错误的安全感。现在很时兴一种观点，认为许多人曾经求助于政府来寻找商品化的替代物，可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即使没有彻底被市场污染和官僚化，但除了形式的民主以外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东西，最起码也毫无希望地作出了原则性妥协。正如2000年和2004年美国大选所证明的，即使是在选举中投票的形式民主看来也作出了原则性妥协。结果，搜寻反对和替代的形式，包括媒介和文化，必须在外部、在设法与政府和市场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能找到。对于政府的指责有大量实质内容，寻找未被污染的空间大有文章可做。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自由——比如在自由空间转化为市场或者政府空间以前可以吸收多少污染——传播领域的各种自由空间既包括传统形式，诸如另类的出版社、公共服务(相对于政府控制的)广播，也包括新形式，比如公众都准入的有线频道和通过博客和社交网络开辟了一种电子聚会场所的计算机网络。将这些视为自由空间各种化身的问题在于：在一些远非琐细的方面，它们既不自由也不是空间。另类的出版社可能是最自由的，但也取决于政府的做法，它利用了邮政津贴和直接的政府补助金，以及包括订购费、广告和商品化劳动力过程和发行网络在内的市场援助机制。同样，取决于司法权，公共服务广播依赖用户付费、政府补助金、商业广告和政府任命的主要管理人员，这些人员经常被要求证明他们有能力满足政治或者市场的成功标准。公众都准入的有线频道显然制作出更加多种多样的内容，可是它们被局限于那些能够付得起有线订购费的人。 同样，取决于司法权，受到有线电视运作公司和政府管理者的双重监督。交互式电脑网络特别受到市场和阶级因素的限制。它们要求电脑和电信的准入权，以及要么有能力支付通讯收费，要么有大学教授的特许准入权——其费用由政府、大学(它们收到了大量的政府援助)或者试图创造一个新通讯形式市场的公司认购。

强调这些媒介提供了另类的和反对性的传播的主要形式很重要。尽管如此，通过将它们看作自由空间，我们倾向于忽视再现(representation)和根据阶级、性别与种族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结构如何通过种种有效方式得以复制，显然在这些媒介形式的每一种里都有特定的变体。此外，它还令注意力偏离了在抵制政府和市场商品化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斗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作出的贡献很有意义，因为他们探讨了政府行为核心部分中有争议地带——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媒介、传播和信息问题。此外，关于商业用语和设计的研究描述了在市场最核心地域的商品化过程富有争议的性质。最重要的是，这种研究起始于人们的真实生活体验，如今他们面临着学校、购物中心、社会服务机构和职场各种对立过程的冲突，正如他们面对着替代性媒介和计算机网络各种对立过程的冲突。此外，本书要传授给读者最重要的训诫之一就是：市场、政府和公众在真正的意义上无所不在，因此没有固定坐标。这应该阻止以下趋势：考虑寻找自由空间，或者在一种特权阶级或者一种新的社会运动中寻找那种可以格外强大或者纯粹地展现社会对立的理想社会形式。

这应该鼓励人们思考各种社会过程，那些形成社会生活不同维度里不同关系的社会行动的载体。更加有效的思维方式是将公共领域概念化为一套过程，以按照公民身份组织起来、并被认可为公民的人民的行动构成，并提倡民主的精髓——平等和参与。这些过程仅仅在与一门社会学学科的关系中存在，该学科的基本切入点——商品化——赋予它原型和起初的形状，可是这种关系却不断由商品化与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各种社会过程的相互作用重新构建。这是一门以商品化为立足点的社会学学科，可是这个立足点由私人和公共生活互相构建。我们所谓的公共媒介是公共的，并不是因为它占据了一个单独空间、从市场必须考虑的问题中相对解放出来，而是因为它由一个赋予民主超越商品化的特权的各种过程的一个特定模式构建。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公共媒介这种说法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在私人生活中抵制商品化是建立在建造基于亲密和像友谊一类个人关系的替代物的基础上，而在公共生活中抵制商品化是建立在民主和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民主是另一个复杂的概念，这个概念也经常和技术混为一谈。据说，越多人使用国际互联网和手机，他们就越可能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此外，民主经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一种特定实践——投票，而投票不过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我们需要将民主视为具有社会基础、比投票行为远为广泛，正如我们如此看待传播。具体说来，这意味着将民主视为公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这包括政治舞台，但也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当然，投票行动是政治民主一种重要的社会声明，可是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它导致民主的能力是有限的。换言之，集中的市场权力减弱了投票按理说应该导致的民众权力。与此相类似，当文化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例如一小撮公司拥有一个国家主要的报纸、广播、电信和电脑公司，投票能够实现的目标显然也很有限。这意味着控制最重要的传播工具的那些权力代理人同样使意识形态霸权永久化，并为之进行辩护。要令民主繁荣，社会需要为横跨各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相对平等和公民参与创造条件。财富的两极分化和权力的重大分裂使得公众充分参与决策制定几乎不太可能，包括参与工人组织和行业工会。可是即使是相对平等适用的时候，没有令广泛参与成为可能的各种制度和传统，社会仍然面临着民主会停滞不前的风险。

民主与公民身份互为本质。T · H · 马歇尔(T. H. Marshall, 1964)对此作出了权威性贡献，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其贡献为基础。他注意到公民身份一开始是一个表达某些权利的法律概念，包括人身保护权[①]、法定诉讼程序、假定无罪原则和被告有权接受由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对之进行审判这些基本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众多社会斗争的推进，这些法定权利被扩展到政治领域，包含了投票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① habeas corpus，指被军警机关拘捕的人须立即送法院受审的公民权利。

今天，各种斗争聚焦于将这些权利扩展到经济一类的新领域，由此产生的观念包括参加工作、加入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和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水准等权利。这些斗争也致力于扩展社会公民身份，包括参与社群和保存、使用公共领域的权利。最后，行业工会和社会运动已经将公民身份和一套传播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后者包括传播信息（而不仅仅是接受信息）和使用那些令传播权利成为可能的公共设施的权利，比如受教育权和使用传播工具——包括全民的公共邮政服务、全民的电话准入，现在还包括了全民的国际互联网准入——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公民身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包容在内的概念，也可以被用作一个排除在外的概念，即作为一种将“我们”与“他们”分离的手段。这可以以积极的方式完成，以便建立内部的共同一致，也可以以消极的方式完成，成为将人们从集体成员的利益当中排除出去的一种手段。可是，总而言之，在更多情况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围绕公民身份的斗争代表了一种争取包容更多人的斗争，聚焦于努力扩展充分参与一切社会领域的权利。

结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一种理解方式把引导我们思想的抽象观念和我们凭感官感知到的东西或者具体观察都当作真实的存在。因此，它反对在某些理论当中盛行的观点：只有我们的观念或者只有我们的观察——而不是两者都——是实在的。政治经济学也反对这种立场：现实不存在，观念和观察在重要的意义上都不实在。此外，这种哲学意味着现实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不能被简化为一种本质。仅仅是经济（比如，金钱是推动媒介的唯一力量）或者仅仅是文化（比如，人民的价值观塑造了媒介）都无法像魔钥似地开启我们对传播的理解。这种哲学基础也将社会变革、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观念推至前台，这些观念要求重新评估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重点，即强调媒介企业等社会机构，或者将社会阶级

视为一种事物或结构，而不是一种社会关系。

商品化是开始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化的切入点。商品化被定义为将因使用而产生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传播）转化为因投入市场而产生价值的商品的过程。有三种类型的商品化对于传播很重要，分别是内容、受众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在所谓的内在商品化里，商品导致新商品；在所谓的外在商品化里，它们通过与非商品化的产品和服务相关联而被制造出来。通过在私人生活中培养亲密、友谊和亲情以及在公共生活中发展民主和公民身份，商品化的替代物可以存在。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下一章将论述第二个切入点：空间化的过程。

第八章

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商品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或者说切入点。这样，它开启了一个分析的领域，其中包括源自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过程研究，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彼此联系，并与商品化联系在一起。本章将讨论空间化这个切入点，这一术语来自社会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79)所指称的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过程。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空间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传播是在社会中实现空间化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正因此，空间化使得传播产业格外重要。

虽然人们对于空间化的兴趣较之于过去正变得越来越浓厚，但是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对此问题却关注已久。对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如何测量土地和劳动时间的价值以及如何理解市场的空间扩张和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都成为核心的议题。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概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73)中评论了资本主义“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趋势——这指的是资本日益增长地利用和改进运输和传播工具，从而减少用于在两地间移动货品、人和信息的时间的能力。因此，作为资本扩张限制的空间距离的重要性大大地降低了。在对这个理论进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972)尤为突出。他不断努力，试图在不同媒介形式、时间、空间和权力结构之间建立联系。当代政治经济学(Harvey，2006)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并没有消灭空间，而是通过重新构建人、货品和信息之间的空间关系转变了空间。在这个重新构建的过程

中，资本自身得以转型。①

对于“空间化”这一术语的使用来源于对全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传播学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在过去二十年里所使用的概念和观点。举例来说，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0)曾使用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这一术语，探索时间和空间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减弱。电子邮件可以轻易地穿过半个地球，这种便捷性揭示了时间和空间能够更好地作为弹性资源的合理性(Giddens，2000；Hutton and Giddens，2000)。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描述与此相似，虽然这个说法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例如国际银行系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处理大约数万亿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资金流动和其他事务，这些往往很少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信息技术的社会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89，2002)则提醒我们注意他所谓的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组织能够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地理位置而建立本地和全球的网络，物理空间的重要性相对于流动的空间已经降低。曾经的商品运输需要水流得以保障而运作，当货品从密西西比河一路向下到达新奥尔良港口时候，这些特定的地理位置对于构建当今的政治经济而言并非举足轻重。女性主义地理学家朵琳·梅西(Doreen Massey，1992，2005)强调用联系的观点来解读空间。她认为空间包括了许多动态的社会关系，组成一种“权力几何体”(power-geometry)。她同时揭示出，这个概念和对空间的传统性别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对空间传统的性别认知往往是一种没有时间的状态，而且它将空间看作“时间的切片，大地母亲的变化能力依赖于时间的动力”。最后，空间政治经济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2007)图绘了一个新的网络的图景，它涵盖了金融资本、全球城市和从民主视角出发抵御

① 我们不能够苛求马克思所说的消灭空间。他承认在实际中，这将意味着资本投入注意力的转移，开始指向不同的空间，特别是新的市场：“运输和传播设备的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使得资本必须为越来越远的市场而服务，简单地说——为世界市场而服务。”(载*Grundrisse*，de la Haye，1980：156)

由商业主导的全球化的传播。

第一节　传播与集中：作为制度延伸的空间

一般来说，空间化研究强调的是组织活动的地理和制度的延伸，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特别论述的空间化，主要涉及传播产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这主要表现在媒介公司规模的快速增长上，包括财产、营业收入、利润、雇员人数和金融市场中股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企业集中(corporate concentration)的不同的形式，或企业增强自身的组织以主导市场的途径。这一聚焦的主要原因在于更好地理解权力在传播领域的运作，因为企业集中对整个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集中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控制传播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并限制竞争，进而限制社会可获取的信息和娱乐的多样性。虽然对当代传播的图景而言，增长以及合并成为最为核心的特征，但是对这些发展的社会影响的关注则由来已久。例如，一百多年前，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就批判了查尔斯·哈瓦斯(Charles Havas)对于电报服务拷贝的垄断而造成信息资源的减少。

最简单的集中形式就是一家媒介公司购买另一家同行公司的控股权。[①]《纽约时报》购买《波士顿环球报》就是这个基本形式的最佳例证。对集中不同类型的传统研究将集中分为横向(horizontal)和纵向(vertical)形式。然而，虽然这些术语被广泛使用，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传播研究中，它们的概念、界定和应用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媒介集中研究的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媒介产业对研究课题的影响力所造成的——它促使我们更多地致力于

① 对于控股和主要股权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一个股权很分散的公司，取得2%的股权就算拥有了主要的股份。但是也有人认为，只有拥有51%或者更多的股权才算控股，从而控制董事会。

对产品市场化的研究，而非对媒介集中本质和内涵的揭示。概念上共识的缺失部分也是产业飞速变化和发展的结果。产业结构、科技、服务以及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变化（后两者的变化通常落后于前面的变化），使得提供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语言用以图绘媒介集中变得非常困难。

考虑到术语上有限的认同后，我们就可以来考量媒介集中的几种主要思考方式。横向集中往往发生在当一家媒介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介公司的主要股份，后者可能并不与前者的行业直接相关，或者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根本与媒介无关。[①] 第一种，或者说跨媒介集中（cross-media concentration）的典型例子是一家传统的媒介行业公司（比如说报纸）购买了一家较为现代化的媒介公司（比如说广播电台或电视台）。这是像报纸出版业的产业在面临新的媒介形式时维持盈利的一种方法。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新闻集团对 20 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和社交网 Myspace 的购买就是例证。横向合并同样发生在当媒介公司转向完全与媒介无关的产业或者当媒介公司被非媒介公司吞并时。举例来说，2007，谷歌兼购了谷奥（Panoramio），一家旨在帮助数码摄影师对他们的照片进行地理定位、存储和组织的公司，这一兼并使得谷歌能够更好地使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和谷歌地图（Google Map）上的图片。被非媒介公司接管的例子来自通用电气公司（The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对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收购。通用电气公司是一家电子产品和承揽国防业务的公司。而它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拥有者。这种形式的横向合并造成了企业集团（conglomerate）所有权的产生和扩张，这往往是不同产业公司合并的产物。

纵向合并描述的是在相同的产业生产线上企业的集中，使得一家企业能够控制整个生产过程。时代—华纳对于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① “不直接相关”这个短语很重要。这不仅仅只是定义问题，因为购买一家相关的公司将降低某一个或者更多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反之，人们也会认为购买一家相关的公司更有可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因为这能够使得买方公司的经营更为合理化。

Cable News Network)的购买为时代—华纳公司提供了更多分配其新闻产品的机会。同样，美国广播公司(ABC，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电视网对娱乐体育节目网(ESPN，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体育电视和电台的购买，为其自身在体育节目的发展和成本的节约方面提供了诸多良机。这通常也被称为向前的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因为它使得一家企业在实现价值的循环上前进了一步。当《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购买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造纸厂，从而使其公司的控制扩展到生产过程最底层的时候，向后的整合(backward integration)往往会发生。一家公司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由纵向整合所带来的经营合理化的机遇，它就很有可能获得竞争的优势。当然，这也取决于公司对于生产阶段流程管理的能力。如果电视网拥有了节目制作公司，那么它就能够保证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得到节目。与此相同的还有，拥有自身设备补给的电话公司，控制了掌握电影播放场所发行片商的电影公司，以及拥有自己网站的电脑公司。

这些形式的整合是控制不确定因素的必要手段，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产生于当一家公司不得不依赖于外部的市场来完成生产周期(Wayne，2003)。商业史学家早就认识到整合过程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不管我们称它是财团、经营、组织还是垄断资本主义。举例来说，钱德勒(Chandler， 1977)记录了整合企业的经营策略，如杜邦(DuPont)、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希尔斯(Sears)，它们在数十年都成功占据支配地位。钱德勒认为，这些公司成功的因素在于它们采用的经营策略能让本公司不受许多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的左右——比如在生产周期中存在许多强有力的竞争者所导致的不确定性。通过生产线上分工的竞争，这些公司在这个受到保护的环境中创造了许多的市场。通用汽车公司的成功和其他公司的失败，一部分的原因在于通用汽车公司横向和纵向的整合保护了它不受市场竞争的伤害；同时，创造了一个内部市场，使得旗下的奥斯莫比(Oldsmobile)、庞蒂亚克(Pontiac)、雪佛兰(Chevrolet)、凯迪拉克(Cadillac)等不同的车厂以各自独立的生产线来迎

合各自增长的目标。在这家多层分工的整合企业中，执行董事会既是经理又是银行家，负责评估各公司经营的成功，并相应地调动资源。[①]根据钱德勒的观点，组建这个结构的公司会从内部市场的竞争中获益良多，即使他们降低了外在公司敌意竞争的不确定性。钱德勒和其他商业史学家(也参见 Brunn and Leinbach，1991；Yates，1989，2005)同时指出，传播与信息技术以及运输系统都成为这些系统的核心，因为它们为经营提供了工具，以控制整合的速度和形式。对一家整合的、多层分工的公司来说，其成功来自能及时评估各部分的相关绩效。比如，哪个部分的投资回报最好？为什么？诚然，快速有效的传播系统对于内部信息交流的多样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战以后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的加速发展为媒介产业的增长提供了另一种形式，并日益引起传播学者的关注。正如史密斯(Smith，1991)、汤斯托(Tunstall，1977)、温瑟克和派克(Winseck and Pike，2007)所指出的，跨国媒介公司像大众传媒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在19世纪，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被三家国际新闻大集团控制——英国的路透社(Reuters)、法国的哈瓦斯社(Havas)、德国的沃尔夫社(Wolf)。它们把世界的市场分为若干垄断区域，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摒除竞争。[②]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十年中又有所扩展，传播公司不断寻求新的产品市场、低成本劳动力和政府监控与管制最少的地区。传播产业对于跨国化的一般过程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媒介直接通过广告，但却又间接地以各种媒介的形式引起人们对包括特定媒介产品在内的一般

① 钱德勒对照了两类公司，一类是成功的公司，它们运用了多层分工的准市场功能。另一类是不那么成功的公司(如福特)，虽然它们的整合程度也很高。在他看来，这些不那么成功的企业忽视了内部市场的功能，仅仅保留了功能性的企业结构。它们根据传统的财务、销售、生产和会计来划分内部部门，这样就排除了企业内部的竞争，或者说这样的部门部分使得内部竞争很难产生。

② 在世界范围内的报业卡特尔垄断下，美国显得最为焦躁烦怒。美国要求规模和资产本身不应该决定谁将控制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若干年后，像许多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如出一辙地将向美国提出这样的要求(Schiller，1976：26－29；也参见 Cooper，1942)。

商品的关注。此外，传播的方式，包括新科技在内的通信卫星和高负载电缆，使得各公司能够在大部分的传播产业中，以更高的成本利用率和更容易的方式跨多个国界而进行运作。一些大的跨国媒介公司仍然在某个特定的国家保留了基地；然而，这些公司越来越能够运用其生产、销售、劳动力和财务方面真正意义上的跨国性维度，超越其基地所在国家的法律、规范、文化和金融上的限制。

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在媒介、传播和信息的不同领域中大量出现了巨型的全球企业。其中包括时代—华纳(Time-Warner)、贝塔斯曼(Bertelsman)、新闻集团(News Corp.)、迪士尼(WDC)、索尼(Sony)、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维亚康姆(Viacom)以及其他许多公司。这些公司通过控制生产、分配和放映等环节来完成纵向整合；而它们的横向整合跨越了一系列的媒介产品，包括软件和硬件，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国际劳动分工，灵活而更符合成本效益地使用劳动力、资本、研究和发展。它们的经济权力非常集中。然而，聚合的公司形式并不是唯一的，也不能算是对全球重构最有效的企业回应。高度整合的联合大企业从内部竞争中获益，同时又收缩了外部市场的力量。但是，这样做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大型的联合企业通常意味着巨额的负债。此外，虽然联合大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但同时可能助长官僚主义的趋势，阻碍创新部门的活力，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20世纪90年代的微软(Microsoft)以及新世纪的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

政治经济学家对集中的许多不同形式都存有兴趣。不过，他们最主要的兴趣集中在所有权(ownership)的问题上，因为它是媒介集中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所有权的集中限制了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而限制了传播和信息的流通。因此，对纵向和横向及跨国的集中形式多样性的研究往往源于对所有权集中后果的讨论。虽然对于测量集中程度及其重要性的评估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主要聚焦于公司

控制的市场份额，公司的规模和市场中产品多样性的研究。然而，这里的分析单位都是公司，其所有权必须与市场中其他公司的所有权不同。例如，在报纸市场中，默多克新闻集团(Murdoch's News Corporation)拥有的日报和甘尼特集团(Gannett)旗下的日报被视为是竞争对手，但是两家报纸都是甘尼特旗下的报纸，所以就不是竞争对手。虽然这里强调的是市场，但是检验集中度的单位仍然是公司。

集中化较为宽泛的概念一方面考虑到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所有权的集中度上。而所有权的集中，使得公司可以使用在*一系列市场*(a range of market)中运作的资源。此外，分析的焦点从纯粹的产品的数量(有多少数量相同的产品)转移到了产品的*多样性*(diversity)(产品如何不同)。举例来说，这一途径可以很好地解释《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作为新闻集团的一个单位，使用母公司及其分部的生产、金融和政治游说能力。《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因此从根本上不同于完全没有这些背景的公司。然而，如果只是进行特定的市场分析，它无异于其他没有母公司联系的独立公司。

除此之外，这个较为宽泛的集中形式的分析使得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单纯地局限于市场中渠道的数量问题上，而是转移到各个频道提供的内容的多样性上。根据这个观点，在一个特定的市场里面，尽管只有一家公司垄断有线电视的所有权，但它同时在许多不同的频道中提供多种不同的意见；而在另一个特定的市场中，虽然存在所有权不同的许多报纸，但其观点大致相同。那么两种情况比较，还是前者的集中度较小。虽然对于集中不同形式的测量实属不易(什么构成了一种相同或者不同的观点)，但是建立在市场份额指数上更为狭隘的视角，只能提供一种机械式、不全面的集中度的测量。①

① 正统的经济学家不愿意对较为宽泛的多样性观点多做研究，不管它有什么价值，因为它没有办法进行经验的测量。正统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竞争者的数量和节目的多样性同等看待；同时将节目预算的多少与产品的质量等同起来。

诚然关于集中的观点或是宽泛，或是狭隘，但是它们主要的焦点都集中在所有权上，并把它作为测量集中的核心标准。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宽泛的观点对于企业董事会(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分析的兴趣。这种途径并不旨在考察媒介的所有权，而是要勾勒出对于公司绩效负有主要责任的不同人员之间的关系。虽然管理公司董事会的法律因地而异，但是大多数公司履行董事会的职责形式是一样的：一是选任最好的管理层，包括任命最高执行主管；二是决定主要预算分配，诸如资本的支出和削减，其中包括建造和关闭厂房和办公室等。董事会通常由股东选出，但实际上，董事会自行决定自身的组成。董事会的大小因公司的规模和经营的多样性而不同，通常有十个到四十个成员。在董事会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内部成员和外部董事。内部董事通常指公司管理层人员，而外部董事通常是其他公司的执行主管，这一分类可能同时包括市民社会组织的象征性代表。

举例来说，2008 年 1 月 1 日时代—华纳董事会，包括下列成员：

理查德 · 帕森斯，时代华纳董事会主席

詹姆斯 · 巴克斯代尔，巴克斯代尔管理公司主席

杰弗里 · 比克斯，时代华纳主席和最高执行主管

史蒂夫 · 博伦巴克，2004 年至 2007 年希尔顿酒店公司，联合主席和最高执行主管

弗兰克 · 考菲尔德，克莱恩纳 · 帕尔金斯 · 考菲尔德 · 菲尔斯，共同创办人和合作者

罗伯特 · 克拉克，哈佛大学著名售后服务教授

马提亚斯 · 德普夫纳，阿克塞尔 · 斯普林格报纸分部，主席，最高执行主管和负责人

杰西卡 · 埃因霍温，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保罗 ·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主任

鲁本 · 马克，高露洁公司主席

迈克尔 · 迈尔斯，福斯特曼 · 里特公司特殊有限合伙人

肯尼思·诺瓦克，明兹·勒文·科恩·费里斯·格拉弗斯基和波比奥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弗朗西斯·文森特，文森特企业主席

黛博拉·赖特，卡佛合众公司卡佛联邦储蓄银行主席，最高执行主管

在这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中，董事会既包含了企业高级层级中的董事，又包含了主要来自其他企业的董事，他们其中的一些来自非企业部门。同样寻常的是，时代—华纳董事会中有两位女性，且没有一个董事来自于劳工阶层，抑或是当下活跃的许多公民运动的组织。

对企业董事会的研究考察了董事会成员与共同信托责任之间的联系，即最大化持股人投资收益的责任。分析家们把连结形态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连锁*(direct interlocks)，两家公司由同一个人产生联系，此人既是一家公司的主管，又是另一家公司的董事。另一种是*间接连锁*(indirect interlocks)，两家公司之间的联系源于第三家公司的董事。高露洁和斯普林格(Alex Springer AG)通过与时代—华纳公司直接相连(代表出席时代—华纳董事会)，而具有共同的职责。另一方面，高露洁和斯普林格之间同时通过有人担任时代—华纳董事而存在着间接的联系。此外，企业董事会尝试着不仅仅在一处董事会发挥作用。比如说，弗兰克·考菲尔德(Frank Caulfield)同时也是外交关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是相当重要的研究和政策机构，并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相当大的作用。史蒂夫·博伦巴克(Stephen Bollenback)在担任 KB 家庭(KB Home)董事会主席的同时，担任了哈乐娱乐集团(Harrah's Entertainment, Inc)以及梅西百货公司(Macy's Inc)的董事。因此，媒介集中通过在相同的市场竞争中分担责任而得以延伸。对公司董事会的分析通过运用相同的统计手段、网络分析和矩阵代数，而发展出了若干严格的标准(Burt, 1992; Scott, 1991)。这类分析的核心论点是，董事会结构的重叠为相关公司的代表提供了密切合作的机会和密切合作的责任，而这些公司有些原本应该是互为竞争者的。

在董事会以外的其他地方也为精英集团提供了相互影响和共谋的机会。这些地方包括私人的会所、协会与专业组织，它们是阶级权力网络的交叉点。全球精英每年在瑞士达沃斯(Davos)的年会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然而，企业董事会和上述的场所不同，因为成员们往往需要承担法律信托的责任。时代—华纳董事会不仅仅为来自不同公司精英提供聚会和商议共同议题的机会；同时，董事会成员代表时代—华纳公司肩负法律的责任，从强调间接连接重要性的观点来看，他们也为对方公司的利益考虑。正是通过这个过程，集中具有了这样的特征，即相关公司的合作和计划，既是机会也是责任，彼此的区别变小了，竞争也缓和了。这个过程由许多日常接触与互动构成，赋予了集中一种霸权(hegemony)的性质，一种理所当然运用权力的权利。

对于企业来说，还有许多一起合作的重要机会，因此权力的集中并非需要实际意义上的合并。这些形式包括一系列的“团队协议”(teaming arrangements)，如为了特定计划，比如媒介联合制片或者为了共同开发新技术(Fuchs，2007)而采取企业伙伴关系(corporate partnerships)或者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s)。它们也可以是销售协定(merchandising arrangements)，它把媒介公司与销售和市场开发公司联系起来。[①]这些实践行为对包括媒介公司在内的企业来说并不新鲜，但是这些年来，它们越来越普遍。这部分缘于空间化的过程让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如某项计划进行的期间)能够重构内部的运营程序以及它们外部的关系，但又不会引起组织上的分裂——组织上的分裂在过去经常使这些协议无法得以运行。无论这个计划是否成功，公司都能够重新建构，完成其主要的经营业务。而且，他们之间能够同时存在合作和竞争。

理解这些发展的一个要义在于：用来描述这些发展的语言之所以产

① 如瓦斯科(Wasko)所指出的，销售协定通常是对版权商品进行制造和销售的机械性行为。授权是一种法律途径，版权商标的拥有者可以通过对商标名称、相似物或者形象的使用，而得到特许权使用费。

生，不仅具有分析的价值，同等重要的是，它具有公关的价值，比如说协同作用(synergy)。因此，像策略联盟和协作作用这样的术语，固然有其修辞上的分量，但也同时负载了不同的含义。[①]从字面上来说，策略联盟是指让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企业，或者这些企业之内的特定单位，在没有产权变化也没有相互投资的情况下，共同执行一个或者多个项目。联盟可能涉及一个新的公司的成立，尽管这并不是必须的。媒介合资制片协定就是纯粹策略联盟形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经济压力驱使并有较低生产成本的诱导下，这个形式的联盟迅速成长，支配了欧洲影带以及电影的制作。国际化联盟也对一度自成一家的美国制片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类活动同时将在新传播科技领域内的企业联系在了一起。举例来说，IBM 和苹果两大激烈的竞争者为了共同开发新一代的元件，如超强个人电脑系统而形成策略联盟。因为 IBM 已经放弃了大部分的硬件经营(曾经备受好评的 IBM 个人电脑现在归以中国为基础的联想所有)。苹果公司现在与为企业计算机流水线提供处理器的英特尔合作。

联盟因为很多原因将企业合并，如对于高清晰度电视或者新一代电子影像播放器的技术标准而达成一致的需要。此外，还可能包括游说政府，以寻求援助。这些援助包括去除他们认为不公平的竞争、防止知识产权的窃取，以及反对输入更多低成本外国工人的需要。

最近这一波媒介合并和联盟的浪潮，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企业都急于从硬件与软件系统的整合中获益，并借此控制整个生产、分配、展示或者演映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具体而言，企业都想在娱乐和信息网络的重建过程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参与者。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s)购买了社会网站个人空间(Myspace)，微软通过极大的努力购买雅虎。这些发展将垄断的幽灵召唤了出来，并达到了新的高峰，以

① 在赫伯特·席勒看来，协同作用是一个光鲜的字眼，表示企业集团控制了整个消费形象与产品。瓦斯科汲取了米汉的“文化基金”的概念，认为文化协同作用是这些公司所创造的这种文化现象的重叠。

至于最后一家整合的集团企业可能具有实质控制传播、信息和娱乐的生产与流通的潜力。然而，在科技快速发展的环境中，怎样的企业和科技特殊的联合将是最成功的？这个问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家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挑战苹果在美国作为最主要音乐经销商的主导地位？一家企业是不是需要聚焦来自社会网站监控数据的开发和营销？非常大的公司可以通过在多个领域的投资而分散风险，因为它们可以承受其中一些领域的投资失败。谷歌曾经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但是因为它能够集中于满足微软不能满足的特殊需要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微软所不能满足的需要往往是因为比尔·盖茨(Bill Gates)公司的广泛投资而导致的。

企业权力网络也可能通过产品植入和销售协定而构成，各家企业通过这个方式结合，一起销售特定的媒介产品，如故事片或者体育明星。这一分水岭的时刻出现在糖果制造商 M & M 公司将好时公司(Reese's Pieces)的糖果植入电影《E. T. 外星人》之中，而拒绝了制作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en Spielberg)所提出的当时更为流行的商品。在电影上映之后，好时的销售量大增，而制造商也蜂拥地将他们的产品植入好莱坞的电影中。然而，产品植入并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支持。在美国，代表好莱坞媒介产业工作的作家工会和演员工会都对此举行了反对游行，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产品植入的过程中获得经济上的收益。销售协定不同于产品植入。以媒介公司为例，比如好莱坞的工作室，销售协定意味着授予第三方制造商使用电影角色姓名、肖像来为服装、玩具以及传媒产品等衍生产品命名的权利。如今销售协定非常有利可图，以至于许多动画片制作期待从中获利，而不是依靠票房获得更多的收入。尽管这样，这仍然是件冒险的事，因为很多电影在这方面最终还是失败的。体育是所有销售协定中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在这里，运动员通过和协会以及大型广告(或是管理)咨询公司签订一系列的合同协定，运用在各种媒介上精心打造的形象，获取丰厚的利润。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体育销售协定市场的价值超过 1 000 亿美元，其中仅美国就占据了超过 25 亿

美元。同样，由于这项业务获利丰厚，将赌注压在运动员身上，一旦其声誉受损将增加这项业务的风险。

策略联盟的纯粹形式涉及签订合同、协调合作，但却不涉及全部或者部分的股权买卖，可以说这开创了企业集团实务的新天地。但是在传播产业史上，由联盟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实体或者是导致其中一方进入另一方的情况，也并不新鲜。联盟跨越产业部门或者产业技术的现象也不奇怪。电子媒介史上最大公司之一的美国无线电集团(RCA，the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就是在策略联盟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在20世纪20年代，它是电子媒介早期发展中的主要企业力量基于策略联盟关系而组成的，这些企业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 T)，西屋(Westinghouse)、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以及联合果品公司(the United Fruit Company)(这个公司投资大笔资金设置无线电通信网络，以联络公司在美国及拉丁美洲的运营)。20世纪6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 T)，美国无线电集团(RCA)以及国际电话电报公司(The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形成新的策略联盟，创置了美国通信卫星公司(The U.S.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Corporation，Comsat)，负责创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卫星系统。以上这些例子绝非例外，传播产业不同部门的主导公司各自在传播技术的相同或者不同领域中创造了联盟的成功案例。美国无线电集团和美国通信卫星公司的例子清楚地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的动态过程历来如此，必无特别之处。正如弗农(Vernon)所指出的，今天的联盟与当年彼此竞争的炼油商和经销商联合拥有油田和矿山的做法，在功能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ARAMCO)、南秘鲁铜业公司、几内亚的哈尔高公司(HALCO)。变化，包括商业界结构的变迁一直在持续。

然而，当前重新建构的浪潮中，在一些方面，它与既定的模式存在着差别。第一，可以说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在加速进行。企业集团重新建构的步伐，正式与非正式结合和分离的过程都在加快速度，并且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此外，通过这类活动进行空间集结面对的限制少了很

多。从前的联盟很少跨越国界，如今跨国联盟已经稀松平常。其中包括：合资制作和签约协定一起推动某项计划，以及各种形式的所有权联合(可能是创建一家新的企业，一家企业进入另一家企业，或者是完全的合并)。

除此之外，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稍后我们还会以更多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但这里需要先强调国家活动的显著变化。固然国家活动因为国家及其历史情境的不同而存有差异，但总体来说，以前的国家在传播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现在很不相同。这是因为传播产业和其他的经济部门不同，它曾经完全归国家拥有，或者说，即使它不完全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通过国家预算的分配、政策的监控以及规范的过程，与广泛的国家职能紧密地结合。回到美国无线电集团的例子，策略联盟的创立有美国政府的全程参与，这是除了政府对电台具有所有权外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公司得以成功组建的交换条件是允许政府介入董事会和管理层。同样，联盟组建美国通信卫星公司时，也满足了美国政府的具体要求，否则它就将面临着完全国有化的威胁。结果新公司不仅要受到政府的规范，还要允许政府代表直接参加董事会。需要承认的是，国家拥有传播设备并提供传播服务的事例仍然存在，在电信与广播电视部门中尤为突出。但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国家的参与正在减少。此外，虽然国家在跨国联盟中仍扮演特定的角色，比如规范合资协定，但是这也在发生改变。如今，无论是在本国之内或跨越国界，更典型的情况是，相关的公司自己直接进行协商。现在的国家在评估是否有反托拉斯的情形，或者评估贸易的影响上仍发挥着作用。今天，国家更多地鼓励这类协定，而并非规范它们或者入股参与。在以前，策略联盟的出现一度是国家政策选择工具(chosen instrument)的结果，如今则是企业集团的政策使然。企业集团以此扩张，找到合作伙伴，一起集结专业技术，并且共同承担风险。

再者，当今联盟的形式越来越显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最主要的传播资源的使用者(users)也被拉入联盟组织中。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正

如联合果品公司参与美国无线电集团联盟所表明的，策略联盟在传播史上早有先例。然而，最近几年来各种策略联盟所涉及的企业集团用户特别包括了银行、投资公司与其他大型传播消费企业，这说明以前偶然的事物正在变得越来越平常。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传播和信息技术对于自身发展与控制的重要性，业务范围在传播产业之外的公司也开始运用个人的力量或者联合起来，引导传播产业的发展方向，创建高质量而低成本的网络与服务，以求符合自身的利益。传播产业的空间化过程涉及了越来越多的大型用户，这表明重要的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传播产业的中心有了许多新的参与者，加入传统的生产以及销售硬件与服务的公司中来。除了重要的权力转移以外，空间化的过程也重构了传播产业的版图。以前偏向高度分化的部门，其界限与其他经济产业部门，很容易就可以分得清楚，现在则越来越整合到一个更大的经济体中，各个部门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传统上消费服务的部门，现今却变成了重要的生产者，我们从私人资料网络、家庭录像服务和即时库存控制系统等许许多多快速成长的商业活动，就可窥测。实质上，传统的产品类型，以及与之相伴的法律、规范、政策机构都正在解体。美国公司与日本公司的差别何在？电话公司、有线电视公司与电脑公司的差别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区别？随着我们向全球化电子服务市场(electric services marketplace)的接近，所有的这些差异都正在消失。[①]这些发展是在更大的过程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公司采取了新的组织结构(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这个结构具有两种能力，一方面掌握资源，另一方面又能灵活地应对变化的市场。经济的重新建构有时候会产生企业的聚合，但这并不是成功的关键。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使得自己的结构更为灵活，这样才能快速转化成新的形式，以满足变化中的需求。

总之，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虽然企业的规模和集中化很

① 或许，由于媒介公司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迷茫，因此它们总是倾向于坚持旧的分类，这也就造成了媒介公司之间激烈的竞争。

重要，但是它们只是理解传播产业转型的一个起点。全球性的重构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得控制的形式扩展到更为灵活的其他形式。最重要的条件是，资方要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核心环节（拥有全部的产权只是许多形式之一），同时要保持灵活性以应对市场与技术的变化。

第二节　空间聚合：重绘企业空间

策略联盟与其他形式的产业联结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在不涉及产权改变的前提下，甚至在不需要重大投资的情况下，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反思传统的对企业集中问题的研究。公司规模与市场的控制，依旧是企业集中的重要指标。但是企业重构同时产生了另一些集中的模式，它们以生产者、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网为基础。所以，除了对于权力传统的层级结构这个集中研究所聚焦的问题为外，我们现在需要观察网络层级结构的发展。

除了企业集团的重新建构以外，产业活动空间类型的变化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产业集中。具体来说，与原先的预测相反，电信的发展并不一定促使商务活动的分散化，而是使得商务活动更多地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和其他国际大都市，这为空间集中作为商业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提供了依据。经济重构和空间整合是人们对地理学兴趣复苏的核心要点。虽然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注意到了这些发展，但是它们对于地理学的影响最为明显。地理学如今处理的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其中包括了空间结构与资本积累、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关系（Bruff，2005；Graham，2002；Harvey，2001；Vertova，2006）。

交通和地理

在大部分人类的历史中，交通是缓慢和无效的，且附之以昂贵地克服地形的成本。在18世纪的末期，除了一些驿站马车和轮船之外，交通工具甚至没有人来得快。地理学家记录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由科技的

革命而带来的变化。19 世纪见证了作为推进装置的蒸汽机的使用，以及钢铁在远洋船舶、火车和铁轨上的应用。20 世纪，以汽油为动力的内燃机的诞生，使得卡车和小汽车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大型的远洋超级货船，集装箱运输以及商业的喷气式飞机使得旅行的时间大大缩短（Dicken，1986）。①

马隆（Malone）和罗卡特（Rockart）界定了三阶效应，尝试着理解以交通为基础的变化的重要性。当人们乘坐火车或者汽车，而不是骑马或者是坐马车的时候，新旧技术的更迭是一阶效应。随后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二阶效应的产生，比如人们更多地从一地到另一地，不管是每日的工作，还是去拜访远处的朋友，或者是出席商务会议。最后，三阶效应以新的密集的交通社会模式的形成为标识。这其中主要包括了城市化、购物中心，更近期的是大量的城市远郊富裕阶层居住区，使人们生活在城市以外的半郊区地区。

我们可以从所谓的时空融合（time-space convergence）来理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的地理上的根本性大转变（Brunn and Leinbach，1991）。例如，直到 16 世纪，以每小时三英里步行在波特兰、缅因和圣地亚哥之间，需要耗时两年；17 世纪，骑马代步将时间减少为八个月；19 世纪中叶的驿站马车和四轮马车将完成这个行程的时间又缩短一半；到了 20 世纪之交，火车将其降至四天之旅；在 1950 年，空中飞行需十小时；而如今更是只需要花费五小时。16 世纪以前的人要是体验一下今天的交通方式，圣地亚哥实际上相当于如今距波特兰十五英里。或者，就横贯大陆或者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而言，美国像马里兰州和纽约州这样的州距离东京比殖民地时代距离费城更近（Woytinsky and Woytinsky，1955）。同样，汽车技术的创新和公路技术的发展将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路程由 1658 年

① 劳伦斯（Lawrence，1983）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仅需要注意的是克服地理限制的运动速度，而且需要注意服务的定期性。举例来说，从纽约到利物浦定期游船服务的发展相当重要，因为它相当规范，其中包括两地之间的信息分配的服务。

驿站马车所需花费的20 000 分钟，缩短为1840 年公共汽车所需的2 500 分钟，至1850 年铁路的800 分钟(1950 年为400 分钟)，到1970 年乘坐飞机来往这两座城市单程只需200 分钟。这表明这两座城市以每年29 分钟的速度在聚合。尽管伴随着交通运输的革新，地理聚合的速度在降低。1840 年以来，用马拉的长途客运车辆和帆船的最高时速不过十英里，而现在由于喷气式飞机的发明，现代交通运输速度已经是原来的七十倍了。①

传播和地理

直到19 世纪电子科学发明了电报，交通和通信才得到了有效地统一。因为电报技术使得信息能够和交通系统所能承受的速度同样快。普雷德(Pred)记录并图绘了电报出现以前信息在美国国内以及在美国和外国中心之间流通需要的时间。他还指出，虽然这些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其完全取决于交通技术的改进。例如，1836 年的邮政法案支持“特快”邮件路线，并且增加汽船在交通运输中的比重，使得辛辛那提和纽约之间公共信息上的时间滞后性，从十九天减少到七天。

虽然臂板信号、篝火和烟雾信号让通信脱离了交通运输的限制，但电报和海底电缆对运输和通信进行了最主要的联系，并带来了重大的地理影响。电报使得信息在国内得到及时传播；通过海底电缆，信息跨越了海洋。通信和运输系统共同努力奠定了现代美国商业制度的基础(Chandler，1977)。电报扩展了即时价格信息的传播范围，同时铁路加快了将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DuBoff，1989，1984)。与此相伴随的是，铁路公司和新的“交易”工作随着组织创新应运而生。这些交易工作，包括商人、批发商、零售商等，他们将形成于新的交通和通信系统所能延伸到范围之外的网络紧密联结(Beniger，1986)。今天，智能高速公路和

① 对不断下降的运输技术性价比提出质疑很难。然而，价格性价比走向并非是一味下跌的。例如，在美国小城镇的状态大幅度地受到巴士服务上升和下降的影响(Schwieterman，2007)。

地理信息系统与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相结合，有效地提高了大型组织分配的灵活性。

相对于距离来说对于时间的描述已经被通信琐碎化，即使并没有被完全地扁平化。地理学家因此转向更有趣的测量维度，例如成本空间聚合(cost-space convergence)。成本空间融合指，在一定距离中信息传递所需的花费(Knowles，2006)。例如，一个电话的时间空间融合仅仅依靠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电话的存在，而成本空间融合因地点的不同而变化，且影响企业在全球的运作。

在马隆和罗卡特(Malone and Rockart，1991)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李华(Hua Lee，2007)通过对将通信应用到空间化业务的三个阶段的描述，深化了他们的研究。降低通信成本的第一阶影响在于用信息技术替代人际协调。这主要表现在，电脑系统削减了在银行后台和保险业工作的员工，以及在电话公司的接线员。通信费用下降的二阶效应，表现在扩大了用以管理活动的通信规模。因此，旅行社和网站可以更便捷地给顾客提供多样性的旅游服务，航空公司可也可以提供更广泛的票价。三阶效应的出现伴随着向通信密集结构的结构性转移。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结构中，当销售人员给顾客送货时，他们通过使用手提式电子设备，对销售过程中的每一个项目进行记录。每晚这些信息都会汇总到高级经理人手中，他们对价格、产品和营销做出迅速调整。通信密集型结构同样跨越了公司之间的界限。举例来说，这个结构将纺织品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连接在一起，建立内部网络，以减少商品库存，并能迅速对流行趋势的变化做出回应。

研究者还发展了社会空间的方法，以指代特定地区内社会交往的数量——衡量不考虑传播者之间的距离而进行传播可能性的变量之一(Abler，Adam and Gould，1971；Hagerstrand，1968)。社会空间的方法多被应用于创新和扩展模式的研究，以计算所花费的时间。比如一项新技术从一个地区发展到另一个地区的时间。

除了这些有关时空融合的客观方法，地理学家还考虑了直观或者文

化层面的融合。事实上，埃布勒等建议：

> 从长远来说，人们对于距离和空间的思考比空间和距离“真实”的本质更重要。即使……融合对于产生一个在功能上没有维度的世界是成功的，但是人们依然会对地域及他们所能感知的距离产生强烈的情感(Abler et al.， 1975：53)。

事实上，融合的方法因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不同。尽管时空融合和成本空间融合都清晰地表明，地域之间更加靠拢。埃布勒指出，“对于那些拥有较少资源的人来说，时间空间融合可以被忽略。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融合促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极化”(Abler， et al.，1975：9)。例如，他引用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的大城市中，对白人而言，家庭和工作地点的平均距离减少了；但是对非裔美国人来说，平均距离却增加了。

研究文献提供了大量普遍的结论。不断降低的交通和通信的性价比促成了空间融合。融合的范围很普遍，但又因文化、社会和政治状况而有所不同。文化条件包括存在于特定地域以及地域之间距离的价值观念。例如，一个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人，在朝着纽约进发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觉。他对于纽约以及从阿克伦城到纽约的距离的感觉，取决于他把这次旅行当作是去世界文化中心参观的机会，还是将它降格为一种野蛮的行径。社会变化包括个体在各种经济、教育和社会身份等级结构中的位置。这些使得融合成为理所当然的现实，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融合实际上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有关交通(航空运营商飞这条线路吗？中途不停？多久一飞？价格多少？)和通信(两座城市的通信质量和费用)的政治经济决定影响着融合的本质。研究表明，融合通过增加空间的灵活性(更好利用计算机通信技术)和强调非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加强或者阻碍融合)以对地理进行转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的终结”。埃布勒对于前电脑时代的描述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一个没有距离的社并

不会是无差别的同质的空间；因为在这个空间中，偏好将进行自由的支配，这就使得世界将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和差异性”（1975：53）。政治经济学家能做的唯一修正就是：这个世界同样是非常政治的。

位置：分散和集中

关于组织地理位置重要性的研究以位置或者后勤理论为指导，这是一系列由艾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首次系统化的观点（Chapman and Walker，1987；Hoover，1937；Isard，1956）。[①]韦伯和他的追随者制定了规范的办法，旨在帮助企业在成本最低的位置建立工厂和办公室。他们考虑运输、制造（特别是劳动），以及销售成本，并以此选择最便宜的位置。韦伯对位置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聚合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概念。这个词意指在一个地点对工厂和办公室进行集中的价值。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公司在一个地区的聚合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Saxenian，2006），这一个概念变得特别重要。对企业实际选址做法的研究证实了韦伯主义者所认为的“次优”因素，其中包括了在企业选址决策中“个人考量”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对于地址选择的行为研究路径，它来自对成功和不成功的企业实际选址做法的推断。这一视角中概念和想法主要来源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著作，特别是他有关信息处理过程中时间限制的想法，从而导致了有限理性和满意行为的概念（这往往与最优性相对立）。根据这种观点，时间对各种空间选择施加了限制，从而限制了理性决策，进而限制了人或组织处理信息的能力。

除了常规理论家考虑的制造和移动物品的成本外，行为学家还考虑在企业中，制定和移动信息的成本，包括企业选址的信息。行为学家认为，常规理论家所认为的最佳选择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也是很少被选择的），因为这些选择忽视了生产、加工，以及及时进行信息传播（这些信

① 韦伯的研究直到1929年才进入英国。

息和地点的选择直接相关)的实际成本。普雷德创建了一个“行为矩阵”，旨在纠正规范方法中的“信息盲点”。“行为矩阵”将对位置的评估计入其中，而这些位置的评估，涉及信息以及公司对这些信息的使用。

通过考察选址决策的实际过程，并考虑到在决策过程中作为决策变量的信息，行为学家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研究慢慢转向传播的作用，特别是计算机通信在选址决定中的作用。研究通常阐述的一般结论是，技术增加了位置选择的数量，因为它克服了从物理上接近信息资源的需求。交通运输和电力技术一度消除了选址比邻于水域的需求。现在，计算机通信网络的普及削弱了一家公司需要选择一个特殊地址的需求(接近于无线通信网络)。选址决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上：即认为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合理地沟通。因此，决策基于仍然存在的机会和制约因素，如劳动力、客户、环境因素。

运输业特别是通信业的发展，让企业远距离的经营变得简单，同时曾经不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地理优势也得以被运用。实际上，集中和分散是构成当代经济地理学结构性转变的同一个过程。因此，重要的是研究空间聚合，这对城市、城镇及其居民有实际意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关注空间聚合尤为重要，因为权力在创造新的空间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Gibson，2003；Gibson and Lowes，2006)。具体来说，空间聚合产生了新的层级结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些城市，而其他城市中则下降。它同样建立了一种层级结构，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区域，而其他区域的财富和权力则下降。这些区域差距和正在日益明显的社会阶层差距共同存在。例如，纽约的财富权力上升和底特律的下降直接影响居住在这两座城市内部及附近居民的生活方式机会。同样，曼哈顿向权力中心转型也是以纽约周边市区(少数除外)的衰落为代价的。

这种空间化研究路线，进一步表明了在媒介集中分析中打开新局面的价值。空间聚合，以及所有权的聚合，是商业集中的重要形式。它汇集了诸多公司，无论是与所有权有关的还是无关的，将它们与生

产商、供应商，并与之相互依存的客户联合到了一个密集网络里。而这种相互依存性，在全球城市的地理层面得到加强，并通过电子化途径向全球扩散，因此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力量的集中形式（Sassen，2001）。这一发展对于通信和信息产业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是生产者服务部门的核心，而后者是如今空间聚合的主要原因。从本质上来讲，通信和信息处理过程，以及相关产业，从根本上促进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经济转型的主要形式：在企业的空间聚合中，经济力量不断集中。但是，还必须强调指出：媒介、电信和计算机设备与企业的整合，实际上使得所有的公司都成为传媒企业。

没有一家公司比沃尔玛对此有更好的领悟。沃尔玛以经营商品零售业为主，但如果不能掌握信息通信技术，它在当今的世界中也就不会成为最强大的公司。信息通信技术使得公司能够协调其供应商和经销商的网络。沃尔玛的供应商来自世界各地，但主要来自中国；而沃尔玛的经销商，将商品运输到零售商店中。对于买什么、向谁买、买多少以及以什么价格购买的决策，而进行的密切的协调，使该公司能够在相关企业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备受质疑的劳动力实践、在竞争中残酷的优胜劣汰，以及强大的游说努力对于公司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强大的游说努力不仅发生在华盛顿，而且还发生在北京，以及其他世界权力中心。除此之外，从公司对客户、工人、供应商、经销商等身上搜集到每一份数据，所进行的实际的价值提取的能力，对于公司的成功也至关重要。当然，还包括将此信息传达给那些处于最有利位置的人的能力（Bianco，2006；Fishman，2006）。此外，作为在美国唱片音乐的第二大经销商，沃尔玛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介公司之一。

对于空间聚合的研究和对于更为传统的媒介集中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它们共同提供方法来预见一个具有经济活力且充满动力的行业。空间聚合和媒介集中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空间化全景的描述都是必需的。不过，两者都需要进一步加深对政府的理解。

第三节　国家

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定，当代的国家机器不仅仅对企业及产业结构的变迁做出了反应，而且还回应于科技和服务的变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证据，足以认定国家机器以积极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促进了这些变迁的发生。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下面的结论：政治经济学如果更强调政治(political)，必然会从中受益，这会使得人们注意国家在面对传播产业的反应角色，同时注意到国家作为构成性(constitutive)的角色。这种正确的认识很难达成，因为国家在传播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来自政策制定者。在他们的修辞框架下，国家角色就只能流于狭隘了，仅仅只有一些例外(Braman，2007)。这种趋势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深谙于法律、规范和政策过程并能掌握它们的语言是相当困难的。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是，为了要完整地解释国家的角色，将国家—媒介关系放置在较为宽广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政治经济学必须将政策行动的认知，转为政治经济学的认知。

这个问题，以及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规制(regulation)这个概念中展示无遗。论述传播产业规制问题的文献很多，其中虽然有些不同的重点，但我们发现，这些文献一直坚持规制是政府对市场问题的反应。对于这个问题解释非常广泛，包括：自然垄断状态的存在、产业界对于政治机制施加的压力、来自市民团体的公共利益和压力等。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每种定义都倾向于把规制当成政府对其所认识到的问题的反应。结果，政策制定者与学术分析家在检视产业规制的时候，往往只分析政府的实践，辩论的问题则侧重于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的规制。因此，关于国家在传播产业的角色的辩论，经常变成了规制与解除规制之间的选择。

政治经济学的路径，特别是充分反省国家之建构角色的政治经济

学，对此问题的看法相当不同。政治经济学将整个社会场域（包括工业活动的类型）视为规制的一种形式。[①]举例来说，主要受到产业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国家介入的社会场域，可以说其特征是一种**市场规制**（market regulation）的形式，它和**国家规制**（state regulation）相对立，后者指的是国家扮演了影响社会场域的主要角色。[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关于是否解除规制的政策辩论是相当虚假的，因为解除规制根本不是规制的替代性选择。反之，真正的辩论应该在不同的混合形式中进行选择，究竟是强调市场机能、国家介入，或者在两者之外找寻其他组合。消除政府的规制并不是解除规制，而更可能是扩展市场规制。

政治经济学没有陷入语言的陷阱，它集中评估了不同规制形式（比如市场和国家）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为了思考解除规制这一个概念所掩盖的国家的建构角色，重新评估规制就显得十分地必要。它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对国家问题研究走出了新的一步，也就是强调研究国家如何积极主动地建构规制的形式。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当前国家建构活动的四个过程，而国家的建构活动则来源于空间化和商品化。第一个过程是**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也就是国家的规制形式舍弃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及其相关标准（如普适性），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制。在传播领域，这意味着即使在国有和公有的广播和通信公司中，也都更加强调市场机能与盈利性。具体来说，这使得对受众规模和广告收入更为强调。制作节目的时候，需要考虑外销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也需要考虑这个节目与其他盈利媒介的联系。在电信领域，商业化

① 被称为“规制学派”的学者们在这方面起着领导作用，但是其他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也提出了这个论述。在“规制学派”的主将利佩茨（Lipietz，1988）看来，规制是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对矛盾倾向的调整。

② 由于市场结构的不同，在市场形式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规制类型。这些类型的两端分别是寡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规制形式。一般传播部门中所谓的“扩大竞争”实际上是指一个或者更多的新公司加入社会场域，使得规制的形式可能由垄断转移到双头垄断或者寡头垄断。因此，“扩大竞争”可以使得政府的监督不断减少，这样的政策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意味着建立并组织网络和服务，服务的对象偏向于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顾客(主要是商业用户)。即使这意味着网络建设将侧重在国际大都市之间建立全球性网络，而不是把网络延伸到乡村和缺乏服务的地区。商品化使得国家传播机构将电信、网络和其他的盈利性活动同邮政及其他服务性活动区分开来，而服务性活动是由宪法和法律所强制要求的。商业化的支持者们论述到，商业化并不否定公共服务的目标，它甚至有可能更好地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比如增加服务的普适性(Noam，2008)。相反，商业化的反对者们反驳到，商业化是转化传播流通空间的手段，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商业化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使用者，而不利于其他的阶级。

第二，自由化(liberalization)指一系列的国家介入来增加在市场中参与者的数量。典型的做法就是引进竞争，或者减少引进竞争者的困难，从而使得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传播服务的提供者进入市场。通常来说，这涉及在国家垄断或者私人垄断的市场中，引进一个私营竞争者。自由化和商业化不同，对于传播产业来说，商业化就是使所有的商业实践都符合商业标准，无论是否存在着竞争。而自由化则特别强调增加在市场中企业的数量。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国家通过在原有的广播和电视服务中引进私营竞争者，从而对传播产业进行了改革。支持者们认为自由化使得价格降低，服务扩展，通常加快了创新的过程(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2007)。然而，批评者反驳到，自由化只是以私人的垄断规制形式取代了国家的规制，伴随而来的是，价格、服务以及创新都有利于垄断卡特尔的利益和具有优先权顾客的利益(Schiller，2007)。

第三个过程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从本质上来说，私有化是国家介入而卖掉国有企业(如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或国营电话公司)的过程。私有化有多种形式，通常根据出售的国营股份的比率、外国企业所有权允许的程度、分作多长期间出售，以及国家在私有化之后是否采取特殊的形式继续介入(典型的做法就是设置规制机关)来进行划分。私

有化过程加速进行有着许多的原因，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上倾向于私人控制经济活动的政府不断地兴起；国有资产卖出后，虽然只可能是一次，但对国库而言却是一笔新的收入，而且颇为诱人；以及跨国商业和政府组织的压力，其中有世界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和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对于私有化的支持者而言，私有化是必需的，因为商业化充其量也只是市场控制的第一步，而且是不充分的第一步(Vickers and Yarrow, 1991)。私有化的批判者们认为，私有化将使完全的市场规制成为主导，从而消除了任何可能的可替代的规制类型；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以后国家主权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对国家政策控制权的丧失。

最后，政府自身创造了地区性或者是全球性的组织，从而使其具有了不同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程度。这其中就包括地区贸易联盟(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Agreement*，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系起来)。从全球的层面而言，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大多数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就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或者欠发展)的条款进行协商。对于传播领域而言，国际化过程尤为重要，因为传播网络的国际化需要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协作。再一次需要强调的是，在传播领域，国际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国际电信联盟(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在19世纪60年代就促使各国政府在电报政策上进行合作。最近，各国之间建立了新的协定使得最富有的国家能够对全球传播政策施加的控制更为严密。这些发展带来了国际政策制定领域的显著变化，其中包括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最主要支持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影响力的下降，也包括国际电信联盟对大型私营电信公司的开放。

随着这些组织权力的不断削弱，用以聚会以及制订计划的短期的、特定功能或技术的网站的影响力不断增加，特别是那些汇集政府和企业

的决策者的网站。这些网站基本上都存在于对规制活动正式和公众可以获取的网站之外，而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通常对科技、服务和定价进行协调。在互联网时代，对于重要全球域名系统监管的正式的、规制的权力已经交给私营机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政府的管理下运作。通过所谓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过程，使其真正根植于全球治理的想法，为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舞台；但这并未改变那些对互联网具有影响力的决策。

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是一些重要的例子，它们说明了国家的构成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显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的价值，因为它的起点就是产业界与国家在规制形式创置过程中的相互建构。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资本的需求和利益，以及其对立面的性质。这并不是说，产业界和国家同等地(equally)塑造了传播结构与实践，就像我们不会认为产业内部的各种力量彼此相当。历史实践使得政治经济学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产业界和国家都是推动传播发展的主要力量，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建构，又是多变的。进一步说，政治经济学反对只集中分析政治或者经济。产业界和国家都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它们对于建立管理产业界与社会领域(包括与产业界息息相关的对立力量)的规制形式尤为重要。最后，积极活跃的国家并不能保证自己一定成功。事实上，传播领域内参与者数量的绝对增长，以及为处理这种增长而专门设置的弹性机制，导致了协调与控制等重大问题的出现，从而成功对于国家来说也并不是唾手可得的。这部分的原因归咎于，近来国家活动虽然有所拓展，但是国家活动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直接参与却没有增加，反而还有明显减少的迹象。这使得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问题显现得更为突出：国家一方面需要处理资本短期特定利益的多重性，另一方面它却不能全面地参与资本自身积累的过程。

第四节　全球化及其二律背反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指资本的空间聚合，这个过程由跨国产业与国家机器主导，转变了资源与商品（包括传播与信息）的流动空间。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传播与信息地理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伴随着一些空间与关系得到了加强。举例来说，纽约——伦敦——东京轴线划定了传播与信息服务的版图，它的延伸产生了第二层次的网络，连接了法兰克福、上海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形成了全球的联系网络。和其他任何的地图一样，这张地图也不可能被绘制得绝对精确（Jessop，2000）。纽约的连接并没有延伸到整个城市，只是包括了金融服务中心曼哈顿的下城，传播与娱乐企业集团总部所在的曼哈顿中城，以及部分的外围市镇和郊区。传播与信息技术扩展了富裕的轴心城市与人们进行联系的场所，但是同时也强化了轴心城市的重要性。在轴心城市，人们不仅能够直接使用科技，而且还能和主要的人物与组织联系，这些人物与组织拥有建构流动网络的权力。在艾格纽（Agnew，2001：52－53）看来，世界已经成为“一张复杂的马赛克图。这张马赛克图上有相互联系的全球性城市区、繁荣的农村地区、提供资源的网站，以及时空压缩切割下日益‘消亡的土地’”。这些转型造就了控制全球化的等级体系，使得全球化这个术语带上了神秘的光环。换而言之，全球化的实践创造了新的权力的等级网络。但是全球化的神话淹没在不愉快的现实中。乌托邦幻影下的世界是扁平的，是一个网络社会，并且最不切实际的空想便是地理的终结（Mosco，2004）。

这种神话的产生部分地根植于对下列观点深刻地抵制：即不仅是时间，空间也是动态的。我们所图绘的不管是物理空间、政治空间还是人类信息流动的空间都在不停地变化着（Massey，1992；Winseck and Pike，2007）。选择空间化这个术语，旨在精确地强调稳定的空间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存在于地理学对绝对空间、时间空间、成本空间、社会空间

和文化空间构成的范围之外。这个过程通常指全球化。它定位了今天空间变化的样式，但它并不意味着“地球是扁平的”或者说地理的终结。那些有权掌握政治经济资源的人和机构的能力得以真正地膨胀，这才真正为神话注入了活力。他们能通过改变流动空间的方式，更充分地把时间和空间当作资源来利用以牟取私利。这个过程是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它构成了对空间进行再分区的过程。再分区部分地依靠划分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来满足对权力的需要，且对权力进行集中。就如富克斯(Fuchs，2007：74)所说的，“这些空间非但不是包容的、开放的和可参与的；而是被分割的，排他的，中心化的和层级的。说这种网络社会是意识形态上的构建，它模糊了资本主义关系和结构的不平等，而这两者恰恰对当代社会进行了型塑”。

全球化视野认为“总之世界是小的”。这个理论使得人们难以面对空间化下的二律背反现象。但是却有必要通过这样的做法去理解空间变化正在给当今世界带来的变化。正如发生在2007年初以来的事情所告诉我们的，空间化可以超出其管理者所维持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稳定之外的范畴。例如，被用来扩展资本主义扩张工具的看似具有无限潜力的通信和信息技术所激发，投资行业和银行领域的企业创办的全新形式的市场信贷遍布全球。具体而言，银行将所持的住房抵押贷款聚集起来，同时在全球市场将其抛售，希望分散碰到问题时的风险。银行抱着希望政府将其从危急中解救出来的期望，又壮胆给风险客户提供贷款。这些风险客户没有按期还贷的能力，只能在贷款到期时出售财产从而脱身。2007年房地产市场不可避免地崩溃了，不仅给此类房屋贷款的发源地美国造成了影响，并且全世界范围内只要加入这个市场的银行和投资公司都受到了冲击。结果，许多国家不得不急忙注入大量现金，以拯救全球金融系统。这只是一个例证，说明了仅仅将本土经济与国民经济行为融入全球网络之中，就会使得全球经济受到影响，未来变得不可预期，更不用说如何管理全球的经济。全球化很容易超出它有效运行的能力范围，因为空间化更加强化了万事皆有可能这一观念。

此外，不仅只是合法的金融体系扩大了其全球化的覆盖面。空间化也给全球范围内犯罪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因为借助通信和信息技术可以将钱财迅速秘密地转移。这支持了非法赌博、毒品、武器贩运以及销售赃物的国际网络，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跨国界廉价劳动力和人口走私。据一位分析师的估计，国际化犯罪（包括网络犯罪）占全球生产力的20%（Glenny，2008）。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恐怖主义上。恐怖主义日益增长的能力，使得它能够攻击全球网络的中心节点，并以最低的成本造成巨大的损失。考虑到恐怖袭击所带来的显著的权力和政治变化，对于恐怖主义的关注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主要体现在“9·11”事件中。然而，在关注如闪电般出现的恐怖袭击时，我们很容易忘记依赖于通信网络的国际组织所带来的破坏。通信网络反映了合法企业正常运作中必不可少的系统。

同时，全球化还建立在空间简约论基础之上。可以理解的是，空间转型将流动空间作为重新图绘过程时的考虑因素；空间转型的支持者很容易忽视其他的相关过程，甚至相反的过程。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更趋向于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先进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进行区分，独立（alone）看待，不赞同将资本主义看成是存在于世界各国国内和国家之间，清楚地或者是没有被清楚表达的一系列等级的（hierarchical）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这个趋势并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施加重大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类型的阶级、帝国主义、民族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了空前的影响。更进一步讲，尽管“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当代几乎不存在，但社会主义宗旨，以及对生产、分配、交换和使用的民主控制等原则，还是在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动中体现了出来。最后，全球化的工具同样促进了当今全球化形式替代物的产生。社会运动利用通信和信息技术进行反击，它们反对过分依赖于私有市场的系统；私有市场，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将利润分配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了环境恶化。全球网络为穷人和受剥削群体的利益服务，推进

了全球民主建设，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给空间化进程带来了全新的视角(Della Porta, et al., 2006；Hardt and Negri, 2000, 2004；Tarrow, 2006)。正如杰索普(Jessop, 2000：356)总结的那样，全球化“充满了矛盾、且冲突不断，各个国家之间竞争激烈，是复杂的多标量、多时间、多中心过程的产物；这造成了时间和空间发展的不平衡；而且所带来的剥削以及差异的强化，即使没有超过，但也和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新的协作和一致性等量”。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全球分化和冲突产生的核心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全球化的宿敌——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全球化密不可分，并利用推动全球化产生的现代通信工具而不断发展。因而，促进全球化发展的因素和导致世界不断分化的因素本质上是一致的。

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与全球化对立的因素，因为民族主义代表了以竞争为基础的旧式的现代化秩序；并经常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国家抵制全球化市场和文化不可逆转的推动力。民族主义仍然是抵制全球化运动的一杆利器。在民粹分子看来，国家必须要对抗全球化对其国营公司、国内贸易协会、国家电视台和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渗透。如今民族主义已演变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各个国家都利用国家认同，及由此带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好服务于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考虑一下中国在激发了民族主义之后，就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了胜利。从这方面来说，全球化非但没有削弱民族主义，相反激发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成为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护自身利益、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有效武器。我们对此并不陌生。毕竟在19世纪，美国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拒绝保护作者的合法版权，作者的作品在国外大量印刷。包括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内的世界知名作家都表示了十分的愤怒，斥骂美国的盗版行为。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当时的美国也是在利用民族主义为自己在全球化早期谋求一个更好的位置，成为知识产权的净出口国之后，美国就加入了全球版权保护协定，和狄更斯一致，对知识

产权的盗版问题进行打击。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声称，国家有权通过战争手段保护其在全球石油竞争过程中的权力。地理学家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2005：16)说过："民族主义已经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血液里。"

如果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毫无干系，那么扎根于像基地组织这样的组织中的恐怖主义就应该是与全球化的宗旨背道而驰了。基地组织网络最近的成功正是遵循了全球化最强烈的拥护者所倡导的原则。兰德公司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曾经说过：

> 事实上，本·拉登(bin Laden)为基地组织做的就是，推行或者直接复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工业世界中大部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所采取的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20世纪90年代，大型跨国企业集团走向直线化、扁平化和网络化结构的时候，本·拉登顺应时势地改组了基地组织(Hoffman，2005：32)。

基地组织像现代企业一样，也以网络为基础，抛弃了旧秩序下的集中和严格的等级制；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对组织和个体之间根据需要的连接和分离，呈现出灵活性的特征。此外，像大多数全球化机构一样，基地组织也利用了对全球化运作至关紧要的最新通信方式。网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替代。驾机撞击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有几个就是通过 travelocity.com 网站订购了他们的机票。

最后，全球化进程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同步发展。宗教原教旨主义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点我们需要格外地引起重视。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其用有史以来最理性的经济战略建造了一个全球帝国，但现在美国三分之一的公民一出生下来就是基督教信徒，他们只相信对圣经的文本的解读。然而，使得宗教原教旨主义具有权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球网络的发展。宗教原教旨主义借机利用先进的计算机通信技术传播信息。基督教广播网络

(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现在成为了全世界公共和私人广播者的载体。教会曾经竭力反对包括进化论在内的现代科学，但是现在却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向全世界的受众传播古老的教义。现在教会更接近于全球化真正的精神。在全球化过程中，尽管冲突不断、矛盾重重，结果它还是没能高于或是脱离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些古老力量的藩篱。全球化推动了这些古老的力量，而这些古老的力量运用全球化。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对此进行表述：诚然，当马克思描述到，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力量，以此来克服在其发展道路中的一切阻力(或者，正如他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也有错误，因为烟消云散的物质现在又固化了，形成了奇怪的混合形式，它是对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以及全球运转的网络的再次混合。而全球运转的网络激化了空间化的矛盾。

结论

第七章以商品化为切入点，引介了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传播学研究。第八章增加了第二个切入点——空间化，强调了如何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本章描述了一系列社会科学术语的使用，包括社会学、地理学和新媒介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本章进而通过对传播研究中空间化的使用，强调了组织如何运用传播，以不同形式的集中来延伸其权力。这使得成功的组织在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很快地在全球扩张中获得成功。本章同时强调了市场力量的一些补充形式，它们存在于公司董事会、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以及现在所流行的销售协议和产品植入策略(这些扩大了公司的经济范围)的结点中。

本章通过政治经济学与地理学的结合，强调了在某一特定物理位置的空间聚合或企业集中的想法。地理研究记载了许多方面的运输和通信

技术克服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但是，这并没有终结地理的重要性，因为公司从好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相互作用中受益，比如说硅谷。像这种突出的区域中心以及其众多的分支表明，全球化即使在表征上也没有变得扁平。相反，它由地域的层级结构组成，而这些层级结构成为强大的企业聚合体的特征，进而使得有些地区在层级结构中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这样的层级结构存在于地区之间，以及城市之中。硅谷和纽约的曼哈顿地区存在的贫富差距，就像这些地方与世界上贫困地方的差距同样巨大。通信和信息技术似乎更是加重了这种全球分化，而不是克服了它。

这些分化表明了政府仍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些人寄希望于政府能弥合由当今空间化形式所造成的分化。但是如今由于企业力量的作用，使得政府更趋向于看起来像企业，并扮演企业的角色。因此，政府着力于以下的主要过程，其包括了商业化（以市场规制企业取代了公共利益规制）、自由化（将竞争引入市场）、私有化（使国有企业转化为私人企业），以及国际化（建立区域和全球管理组织）。国际化将政府与企业联系起来，共同经营国际贸易，从而取消了对企业的限制，而这些限制过去由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公共利益标准所施加。这些发展为企业带来了短期收益。但它们的长期有效性值得怀疑，因为政府缩减，最终使之更难以管理日益复杂的全球问题。

本章主要探讨作为一种乌托邦迷思的全球化的概念，将它看作是使资本主义企业蓬勃发展的系统；看作是一系列矛盾的力量，这些力量可能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的本质提出挑战，但是全球化仍然尝试着吸纳这些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人们对于通信和信息技术的信心，认为它们能够使得企业超越对自身实践控制的能力，而将其扩展到全球的范围。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挑战着全球化的顺利运作。同样，有组织的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以及以扩大民主为基础的社会运动都对全球化的顺利运作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最好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存在着冲突的进程——利用通信和信息技术工具

来克服全球市场化所带来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而全球向市场的转型是由集中的企业权力所控制的。但是资本主义并非完全将阻碍其发展的任何事物消解，而是对其进行重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本身也被它尝试着控制的事物而改变。第九章将对这个观点进行扩展，并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三切入点——结构化。

第九章

结构化：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霸权

社会和个人哪一个更有影响力？我们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结构的产物，还是自我独立的个体？我们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了我们？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持久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哲学家和社会生活非正式的观察者们。这章我们将回归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去，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同时，通过对社会结构和人类能动性之间建立的连接，这些问题拓展了传播政治学路径的研究领域。此外，正像空间化提供了政治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结构化连接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开始于对由商品化而带来的经济问题的研究，进而探讨曾一度为地理学所独享的空间问题。但是如果缺乏了对由社会学家所提出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结构化问题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不完整的。

结构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结构产生于人类的能动性，而结构同时提供了这个组建过程中所需的“媒介”[①]。社会生活由结构和能动性相互构建而成。简单地说，社会和个人分别创造了彼此。人类是结构的产物，而结构是人类社会活动或者能动性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却是在自己无法决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这章将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这些观点进行论述，而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在结构和能动性之间权力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将权力置于研究的中心，主要集中于对阶级、种族、社会性别和社会运动的结构化研究——这些对当

今权力关系的理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转换到文化的问题上来，本章将通过对权力如何将普遍认为的常识具体化为霸权的研究而作为结束。

结构化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杰出的论述。从一开始，吉登斯试图用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来弥合这样的裂痕：有些理论突出结构；而另一些理论则强调行为和能动性。这其中就包含了结构主义理论(建立在涂尔干、列维—斯特劳斯以及阿尔都塞的著作基础之上)、行为理论(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学家)和现象学理论家(舒尔茨以及伽达默尔)之间的理论“裂痕”。

为了进行这种弥合，吉登斯认为：结构具有二元性，它既包括强制规则，又包括能动资源。结构不再是给社会生活套上样板的僵硬框架，它既形构行为，又为行为所重构。就此而言，结构和行为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模式中相互联结。因此，吉登斯自己也认识到，结构化这个概念对于社会思想而言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语汇。它无疑是马克思历史著作中的核心元素，最显著的体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在这里，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名言：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却是在自己无法决定的条件下创造的。结构化这个概念现在广泛地被应用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中，包括我们对媒介实践活动认知拓宽的尝试(Couldry，2004)，对企业公共关系的研究(Durham，2005)，以及运用新的科技的协作性工作的研究(Evans and Brook，2005)。

结构化理论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对社会变革的强调。这里所说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过程，它描述了结构如何被人类的能动性行为创造和再创造；而同时，人类的能动性成为这些结构的媒介。功能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往往倾向于将结构看成是完全成形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些思想往往遭到直接的批判，而结构化的概念对这类批判做出回应。上面所提及的路径对于理解结构的运作有着

① 指人类的能动性。——译者

重要的贡献，但是它们并未对社会变化给予足够的描述。考虑到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我们同时需要考量结构的维护和社会变化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就像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论述到的那样：

> 结构模式仅仅认识到系统的维持，这是不够的。它应当反映出稳定和冲突这两种要素的同时存在……这样的一个二元的(辩证的)模式从建立到运用都相当困难。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喜好和情境的不同，人们习惯于将这样的二元模式简约为一种稳定的功能主义，或者一种变革性变化。而结构模式的有趣之处，却恰恰在于它是两者的结合(1973：280)。

本章试图通过将结构化理论与商品化和空间化的过程相联结，从而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结构化通过强调和对能动性、社会关系、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实践问题的涉猎，对于特定结构(主要是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政治经济分析的趋势进行平衡。同时，参照加纳姆(Garnham)以及其他人的论点，结构化的观点同样否定了另外一种极端的认识，即：认为对能动性的研究可以在没有结构的情况下完成。这是因为结构为能动性的运作提供了所必需的媒介。结构化理论是认知社会生活的一种路径，它旨在强调目标导向、自反性的人类行为；而同时并不放弃去理解权力的“缝合”，它们与社会行动相互建构。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太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而把结构的概念限制在一系列的运行规则(operating rules)和一个资源库(store of resources)之中，个体从中各取所需。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概念并不总是具有一致性，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他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往往没有联系对权力的理解，没有联系一种更广泛地对社会的批判路径。这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运行规则，就像汤普森(Thompson，1989：63)指出的那样，这些运行规则包括“道德规则、交通规则、政府组织规则、语法规则、礼仪规则、足球规则”。虽然吉登斯意识到存在

着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可能性的规则，但是他并未能够对此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回应——他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什么是明显区别于其他的社会(social)规则。也许一旦对社会规则进行明确的界定，他将难以建立超历史(transhistorical)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是他对立于马克思的要素(Giddens，1981)。在资源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吉登斯的资源一说也包罗万象，从福利机构的咨询服务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买卖都属于这个范畴。同样，一旦按照确定的形式来安排资源，就会使得其中的某一项资源(如权力资源)获得比其他种类资源重要得多的地位，从而将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广泛的理论转变为对众多社会表象之一进行特殊的历史性的解读。而政治经济学对于结构化的解读恰恰强调了这一点。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学在保留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和行为二元论一般观点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权力(power)上，以及将结构化植入于社会分析的批判(critical)趋向。

这个焦点从实质和方法论上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的权力分析。就像前面几章所论述到的，政治经济学对构成权力生产、分配与使用的商品、制度、实践以及社会影响等诸要素进行了持续性的分析，对社会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对传播实践的解释。为完成对权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了适合对权力进行大规模分析和宏观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例如，这些概念与方法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能够检视鲁珀特·默多克新闻集团是如何通过合并、购买、劳动实务以及借贷来积蓄力量，进而扩大媒介和信息商品的生产，以左右政府的规范政策。运用这类方法时，政治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关于传媒集团的营业收入、组织结构、雇佣情况的数据，同时政治经济学家也聚焦于传媒集团对于政府机关(比如规范和政策机构)的建议。

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行动和能动性，并通过考察权力在构成的、互动的、微观的层次上的运作，扩展权力的概念。举例来说，时代—华纳董事会面对如此众多的宏观压力，如何制定出优先的议事议程，从而决定进入此特定市场而不是另一个，购买此公司而不是另一个，投资于此

项新技术而不是另一项。这些决定被规范地用于客观地评估规范行为的“底线”。实际上，底线的客观评估值是宏观压力平衡的一种测量。然而，客观地评估掩盖了一系列微观的权力斗争，这些斗争源于具体的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狭隘的利益。政治经济学家需要使用和他们培训时期所掌握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将这种评估扩大化。这些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民族方法学、参与观察法和其他观察社会实践的方法——对一系列特殊的行为主体而言，社会实践构成了权力的含义(Pendakur, 2003)。

这里的重点不仅是社会性，也有微观性。对于能动性研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能动性强调微观层面的分析，所以更容易聚焦于个体的研究。但是能动性源于对结构化社会意义的理解。能动性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它指的是作为社会行为者的个人，其行为源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矩阵之中，其中包括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这些社会的和个体的趋势强调了在对结构化研究中的现存的一种张力。归纳起来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结构化是检验结构和能动性相互建构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从结构化出发，可以扩展权力的概念。除此之外，以结构化为杠杆还可以了解在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关系所采用的形式。

当政治经济学将目光投向能动性、过程和社会实践时，它倾向于聚焦在社会阶级(social class)上。我们有许多很好的理由将阶级的结构化作为核心起点来理解社会生活，因为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阶级的分化在继续。然而，结构化的其他维度与阶级分析相互补充又相互冲突，其中包括社会性别、种族和基于公共议题的社会运动(比如网络链接)。和阶级一起，这些共同构成了传播的社会关系的大部分议题。

从结构化理论的使用出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社会：在社会场域，由能动性所引发的建构性的行动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关系相互塑型。根据这个观点，社会的存在，即使不能说是天衣无缝的整体，但是至少可以说，在社会领域内，各式各样的过程交织形成了可以识别的社会关系。聚焦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关系，

并不意味着这些关系具有本质性，而所有其他的关系可以被忽略。相反，上述的论断再一次强调了这些关系是对于结构化分析的核心的路径，这些关系范畴仅仅具有纯粹的名义上的价值，而社会场域也并不是简单的这些关系范畴的一个连续体。阶级是真实存在的，它既是一种社会关系，又是一种分析的工具。此外，结构化的过程建构了霸权(hegemony)——霸权被理解为对世界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认识。霸权囊括了从宇宙观(上帝还是自然统治着宇宙)，到伦理观(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区别)，再到社会实践(什么构成了好的行为习惯)的各个方面——出现在每天的生活中，并引起冲突。霸权是一个既存的网络，由意义和价值相互构建而成。

本章通过展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如何运用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霸权等术语，而对这些术语进行分析。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超越下面的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霸权等术语仅仅是媒介影响下的关系范畴。本章旨在将这些关系范畴作为对传播实践中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practices)的描述，包括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服务于个体的能动性，而正是个体的能动性产生了这些关系范畴。为了脱离在各种各样的结构化的过程中存在着的矛盾和冲突，传播的媒介以完全的主流、反主流和可替代性的形式而组织运作。

第一节　传播与阶级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分析是驻足较多的领域之一(Weeden and Grusky，2005；Wright，2005)。传播和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一开始对阶级概念进行分析时就认识到，这是一个“有明显困难”的课题，无论是它的内涵范围的确定，还是它对于社会分化的具体应用，都是如此。这个术语来自拉丁语classis，指的是罗马人中按照财产进行划分等级；16世纪它出现在英语中，意指按照名利虚荣

划分的不同门第，这个说法为凡勃伦(Veblen)所赞同。关于阶级这个术语的问题之一，在于它的含义极为宽泛，可以指代动植物的种群，也可以指人类的集合体，并没有特定的社会性含义。工业革命伊始，现代的阶级划分标准(比如下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就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标准，比如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分类。我们也日益认识到，社会分化不仅仅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创造的。

对于阶级概念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它与分类观、联系观和形成观之间的区别而展开。这些术语被有效地应用于所有社会分化的主要形式之中，包括种族和社会性别。阶级的*分类观*(categorical)主要是对一类人群进行界定，以他们的财产和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进而判断其社会地位。阶级的*关系观*(relational)认为，人群基于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这个主要的过程中作用的不同，而形成了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不是依附于个人或者群体的某种位置，而是一种关系，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将资本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根据联系的观点，资本脱离了工人阶级无法独立存在，反之亦然。因此，阶级也就被具体地表现在对资本和工人阶级进行连接与区分的流变性的关系中。最后，像威廉斯(1976：58)指出的，阶级是“一种*形成*(formation)，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人类发展了对于自身环境的意识，并随之发展了相应的组织结构”。根据这个观点，阶级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范畴，也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它是构成认同的一系列的价值。

虽然有如上的区分，但是这些关于阶级的思考之间有着大量的重合。举例来说，社会学家E·P·汤普森的大部分的著作同时采用的是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另外，他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考察了工人阶级在与新的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如何兴起。在他们的新工厂中，资产阶级需要雇佣工人——曾经在手工作坊和农业生产中独立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工人阶级以新的价值观进行自我认同，并形成了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核心。对这些定义的某些特殊的维度也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什么是阶级分类的标准——收入、财富、权力、社会地位还是这些

因素的组合？什么界定了阶级关系——生产资料、再生产还是管理？什么构成了阶级意识：个人意识、社会传播还是组织的反抗？对于这些问题，以及不同立场之间的相容性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这些是当下关于阶级讨论的主要议题。

内含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文献，主要从分类观的视角出发，探索阶级权力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展示了媒介精英们如何创造和再造他们对传播事务的控制权，分析了媒介精英们的阶级成分及他们内部的融合与分化。早期的研究包括米尔斯(Mills，1956)对于美国媒介和娱乐界经营的研究以及克莱门特(Clement)关于加拿大媒介精英的评估。

一些类别的研究标志着当代对阶级的认知。第一种研究类别沿袭了检验媒介功能的悠久传统，其中包括对社会阶级建构中新闻和娱乐的研究(Bullock，Wyche and Willams，2001；Heider，2004；Kendall，2005)。这类研究分析了媒介是如何代表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以及阶级的组织成分实际的表现，或者在社会中它们应当如何表现的问题。其中的一些论点强化了阶级的刻板印象，尽管这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来说，举例来说，通过这些描述，工人阶级的“权威性”得到了直接的加强；另一方面，通过对上层阶级不道德或者是完全的不理性的行为的描绘，上层阶级的阶级地位普遍地被降低了。诸如此类的描绘暗指那些上层阶级并不能够进行自我控制，更不用说它们对整个社会所施加的理性和系统的剥削。

接下来，当代对阶级和媒介的研究同样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北美以外的媒介，以及投向了与大众媒介和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不断壮大的阶级网络(Chakravartty and Zhao，2008；Chinn and Fairlie，2006；Graham，2002；Mansell，2002；Pendakur，2003；van Dijk，2005)。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的关注。在这两个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媒介和信息技术空前地发展。关于电子化鸿沟或者新的媒介服务可获得性不平等的分配的研究相当显著与重要，其中包括了社会与全球化层面上分化的研究。同时，有些研究尝试着通过检验如何

发展一整套的传播与信息服务以满足人们对于传播这一基本人权的需要，超越对数字化鸿沟的研究现状。

第三，越来越多的研究因循着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关于权力精英经典著作的传统。这些研究检视将媒介企业家和其他的精英阶层进行联结的密集网络系统，包括一系列企业董事会、商业协会、公民自治组织和私人的俱乐部(Artz and Kamalipour, 2003; Chomsky, 1999; Edge, 2007; Herman and Chomsky, 2002; McChesney, 2000; Rothkopf, 2002; Sussman, 200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类研究描述了媒介商业巨头，如加拿大的阿斯皮尔家族(Asper family)是如何构造自己的传媒帝国，从而影响政府。同样，这类研究强调一系列强有力的机构性的“过滤装置”，如何在精英媒介中完成对新闻建构塑型的过程(如《纽约时报》)。其中一些研究认识到媒介不断地扩张到更宽广的信息领域，并描绘权力是如何被应用于不同的项目之中，如创建一个高科技的商业区(从社会对此更需要的部门中汲取资源)，以及在新出现的社会中，推广全球的品牌。

第四，有些研究集中考察了阶级统治在政策制定和规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Burkart and McCourt, 2006; Chakravartty and Sarikakis, 2006; Mosco, 2003; Schiller, 2007a)。这些研究范围广泛，涉及对电子音乐、互联网、通信系统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的斗争。具体来说，这些研究强调动员阶级权力，以构建一个利润可观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对音乐进行数字权利的管理；在对互联网的管理中扩大企业的控制；在通信和信息领域，从公共的利益转移到基于市场的定价。

这些阶级分析的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论证了：阶级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对于社会传播领域的生产、分配、消费的信息。然而，这些分析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从分类观(categorical)的维度对阶级进行考量；而其主要的兴趣在于决定阶级在一个范畴中的位置，同时描述相关的行为类型，包括负责对阶级范畴再生产的行为类型。这些类型的分析突出强调了阶级作为一种结构，阶级的形成过程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再创

造的过程。这些研究对自由主义多元论者所进行的批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自由主义多元论者看来，阶级结构的存在往往是被否定或者被忽视的；而媒介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仅仅是一个民主的市场的自然产物。按照他们的观点，市场需要做出某些调整，但是因为分析的主要单位是个体的消费者(被界定为个人或者是企业)，其所谓的调整也就是改善市场服务于个体的功能，而不是缓和根本意义上的阶级分化。

阶级分析的分类观对自由主义多元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是如果再注意以下三点的话，它的批判会更加有力： 首先，更多地强调阶级的联系观(relational)和形成观(formational)。第二，将阶级与结构化过程中的其他切入点联系起来，包括社会性别(gender)、种族(race)和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这些运动将抵制的力量组织为阶级权力)。最后，更紧密地与霸权(hegemony)的建构相结合，或者是“常识”的社会构成相构连。

当分类观界定阶级时，它往往以特定阶级范畴所包含的要素，即财富或者收入为标准；而联系观则寻找阶级类别之间的关联。根据这样的观点，阶级不是由它包含或者欠缺什么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没有劳动阶级，也就没有统治阶级，反之亦然。阶级之所以称之为阶级的主要原因在于阶级之间的联系要素，举例来说，包括： 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料、传播工具等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种关系可以用许多理想的类型进行概括，如： 协调型(harmony)，阶级之间相互整合，并共同接受阶级关系；分离型(separation)，一个阶级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另一个阶级之外；冲突型(conflict)或者说战斗型(struggle)，阶级关系通常是相互抗争型的。

在实际的研究中，分类观和联系观会有部分的重合，因为一谈到阶级类别，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区分各种范畴的阶级关系。因此，即使完全是对传播业精英阶层进行的研究，也会涉及这些精英对劳动者和消费者造成的影响。同样，联系观也会自然地涉及不同阶级关系所连接或者区分的阶级范畴。在实践中，这两种观点虽然只是在程度或者侧重点上

有所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对于阶级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学中强调分类的观点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对于阶级的解读，即强调资源对于阶级的重要意义。上层阶级拥有资源，也就拥有了阶级权力；而这恰恰是下层阶级所不具有的。这个发现意义重大，但又不够完整。决定阶级关系性质的资源分配方式对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意义。有的阶级试图打破这种方式，有的阶级则试图维持。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根据缺少的东西也可以界定阶级。我们需要再一次承认，缺少对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的控制，也就会相应地缺少财富、收入及各种机会。在传播领域，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缺乏对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通信的享有机会而造成的后果。分类观尽管重要，但是也仅仅限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较低的阶级缺乏带来权力的资源。一些社会学家强调这个问题，而把阶级结构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阶级序列（上上层阶级、下上层阶级，等等）。在这个序列中，沿着阶梯往下，阶级所占有的资源也一层层减少。在传播学中，菲斯克（Fiske，1989）很有名，就在于他特别针对文化资源领域而提出了阶级序列观。这种序列观是否能够很好地扩展到阶级结构，并且认识到阶级范畴边界的模糊性，这个问题有待于商榷；但是对于阶级分类观和联系观之间的真正差异而言，菲斯克所做的仅仅是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而并没有对此进行本质上的厘清。社会联系观拒绝消灭阶级范畴的要求，因为社会联系观反对将阶级范畴仅仅看成是真正连续体的机械存在，而强调应该把阶级范畴看成是范畴之间真正关系的具体化，并重点突出阶级的形成（formation）。

阶级形成在结构化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正是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阶级结构充当了社会能动性塑造阶级的媒介。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将阶级视为社会形成的一个活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运用阶级结构中的资源，但同时受制于这些资源。阶级因此不只是一个相对而言有没有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类别，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系列变化的社会关系（来自于社会能动性对这些关系结构的运用，和受到限制的行

为)。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人群自我建构，同时建构了阶级关系。与分类观相比，形成观显得不那么机械化，因为形成观既把阶级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阶级各方进行社会活动的产物。

由于过分的强调阶级的分类观，在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中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阶级权力具有加深人们“异化”感的能力。正如布尔迪厄(Bourdieu)所阐述的，在“权威语言的力量下”，从属阶级只能：

> 不断被迫接受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谨记心中；他们总是对自己产生陌生感，他们不再是自我评价的主体，也不再是自我信念的核心(转引自 Mattelart and Siegelaub, 1983：19)。

对于传播研究形成观分析的起点，来自马特拉(Mattelart)。他认为这项分析的任务就是寻找“失落的范式”，包括从属阶级如何自我建构：一方面涉及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对自身需求和利益产生的自我意识。马特拉(Mattelart and Siegelaub, 1983)承认超越分类观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他强调在西方社会之外，在西方社会对工人阶级普通的传播研究传统之外，考察大众媒介的使用和大众文化的实践。通过这种方式，他探讨了西方之外的人群是如何创造他们自己的传播方式、发展他们自己的传播语言，以及形成他们自己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构了自身流行的霸权，这种霸权与统治阶级的霸权相互构建，而且相互抗争。并且，这种霸权为社会行动(包括阶级斗争)提供了独立的土壤。政治经济学家开始从实质上对构建阶级形成观的要求进行回应(Artz, Cloud and Macek, 2006；Calabrese and Sparks, 2003；Downing, 2001；Dyer-Witheford, 1999；Fones-Wolf, 2006；Mazepa, 2007；Schiller, 2007b)。政治经济学开始将工人阶级看成是传播和文化的实际生产者。同样，对于扩展阶级视角研究的讨论也很重要，因为这些讨论

通过强调传播产业中的劳工问题而超越阶级的分类观。

劳动与社会阶级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工作场所阶级权力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从19世纪围绕着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过程中将执行和观念进行区分的简单讨论而展开的争辩，到当代关于对布雷弗曼(Braveman，1974)著作的辩论，从而使这个问题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对阶级的当代研究而言，存在着许多的分析角度，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对此进行更为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在传播工作场所，阶级权力是如何削减劳工，以及通过监控实施对剩下劳工进行控制(Deuze，2007；Huws，2003；McKercher and Mosco，2006，2007；Mosco and McKercher，2008)。此外，学者通过对传播领域中劳工和阶级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不断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

因为传播和信息技术已经变得愈加具有影响力，基于这些技术层面上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对于所谓的知识职位的阶级构成越来越投入特别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的涉猎富含了政治和理论的内涵。有些学者对于知识劳动力的界定非常的狭隘，通常将其与那些直接操纵符号以创造原发性的知识产品相连接，或者是对现存的知识产品添加额外的价值(Florida，2002)。根据这个观点，知识工人指的是，作家和艺术家，网页设计者和软件工程师，大学教授和电影导演。他们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创新阶层——可以将知识的力量转化为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他1973年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预测的那样。

对于知识工人更广泛的定义包含了那些处理、分配和传递信息与知识的劳动力。这就包含了在小学和中学层面的学校教师、大多数的记者、图书管理员、媒介技术人员(比如电信和有线电视的工人)，同样还包括在邮政服务部门工作的工人(参见，例如Day，2007；Deuze，2007；Kumar，2007；Martin，2007；Tracy and Hayashi，2007)。这些

都被认为是知识工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多地涉及对信息或者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快速和有效地传递产品，其产品价值在于扩展接受者的知识。从本质上来说，知识工人代表了在知识部门中的中产阶级。

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在生产和销售知识产品产业链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是知识工人。在这个观点看来，硅谷中收入很低的女工，以及那些在海外生产和组装有线和电子零部件的女工也都是知识工人。因为她们是价值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价值链为知识型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硬件条件（Pellow and Park，2002；Smith，Sonnenfeld，and Pellow，2006）。同样，通过电信网络出售产品和服务的呼叫中心工人，同样符合这个广义定义下的知识工人，因为他们对于销售信息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且他们使用传播技术完成他们的工作。此外，要不是不断发展的监控技术，那么对于这些知识工人工作的管理和控制将变得异常困难。而监控技术，往往是传播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Head，2003）。

本质上来说，对于媒介和知识劳动力的阶级分类观分析将产生上述三个层面的层级制。但是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需要跨越外部的标准，而检验工人们自身的主观体验。其中包括理解知识工人是如何组织和建构自身的工会。这就将我们引向社会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工会将不同种类的工人在同一个组织中联系在一起，比如美国传播工人工会（Th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CWA）以及它加拿大的同仁加拿大传播能源和文员工会（The Communications，Energy and Paperworkers Union of Canada，CEP）。在工会中，有记者和电话接线员、翻译者和售后服务的提供者、保健医生和印刷工人，同样还包括编写和广播新闻的人员，以及照相、摄影、音效工作人员，将节目提供给观众和听众。上述的两个工会在动员三个社会层次的知识工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附之以有效的劳工行动。但是，在北美传播领域中比较混合的劳工联合（其中包括一些有创造力的工会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始终让一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工会将如何将自身与知识工人这个术语相结

合(McKercher and Mosco, 2007;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这些都直接与强调社会阶级的重要性相关联，因为对于如何思考知识型工作范围的论证同时也是对社会层级制的思考。很多对知识型工作的研究认为，将其范畴变得更有包容性，对于工人们的发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工人推进了这个范畴不断宽化的进程。但是，对于某种类型定义的选择同时暗含着谁将成为知识工人中的主导，以及人数的多少。将对知识工人的定义局限于佛罗里达(Florida)所谓的创造性阶级，或者甚至局限在“超级创造性”的核心，都将很大程度上给予知识工人优先权——相比较于采用一个更广泛的定义，其包含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比如说所有呼叫中心的雇员，这些人很难被贴上优先权的标识。创造性的阶级为某种类型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可能性，比如对知识创造者进行的权力转移。对于知识工作范畴更具有异质性的考量，指向了另一种类型的政治：人们预测知识工人能够跨越职业和国家的界限而进行联合；知识工人是否可以将他们的团结性从建立在对自身社会阶级地位分类观的基础上，转向建立在形成观的视野上；最后，知识工人将如何运用他们的阶级团结?

对于知识工人概念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解具有重要且不同的政治含义。联想到我们刚刚描述的在纵向层级制中运行的连续体，位于最高层的直接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工人，以及那些位于最底层制造计算机硬件的工人。同时，知识工人也可以横向进行分类，在连续体的一端纯粹地强调内容范畴，而在连续体的另一端纯粹地强调技术范畴，而大多数的知识和信息工人位于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强调内容和技术团体包含着佛罗里达所指代的创造性工人，但也包括许多其他类型的工人。强调内容范畴，具体包括：艺术家、娱乐提供者、教师、记者、音乐家以及其他可能被称为文化工作者的人员。强调技术范畴，则包含了：软件的设计者、生物化学的工程师、视听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创造性的贡献在于创造符号、设计技术生产和信号生产的人员。这种类型的分类包含了文化劳动力和其他的生产者——通常被认为是内容的生产者。通过这种方法

的检视，就很明显发现，我们面临着困境，即所有的人都被称为了知识工人。工程师和作家之间存在着哪些共同点？记者和通信专家之间的共同点呢？音乐家与癌症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点呢？不管纵向维度的层级制，宽泛地或者是狭隘地对于知识工人的概念进行界定，我们始终面临着存在于聚焦于创造文化和聚焦于技术论点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从社会阶级的分类观或者联系观的视角来看确实如此；但是从形成观来看，不尽如是——在阶级中，知识工人如何认同？

横向分类具有实际意义，因为文化和技术工人越来越多地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或者参与到同一个劳动过程之中。这就提出了非常明显的问题：他们是否可以和谐共处？更重要的是，技术和文化知识工人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劳工组织中。诸如美国电讯工人工会和加拿大通讯能源及文书工人工会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工人进行联合，他们中不仅仅有在纵向层级制中地位高的人员与地位低的人员；而且还有（在横向层级制中）位于文化和技术分类两端的文化工人和技术工人。这对于建立劳工团结性的前景而言，意味着什么？劳动联合在一个单独的工会，或者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还是需要跨越边界，或者是跨越一个或者多个海洋，才能够实现？考虑到标识知识工人意义的横向和纵向的分类，我们很容易意识到组织知识工人所面临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昭示了其中的一些成功与失败（Mosco and McKercher，2008）。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简单来说，对于“世界上的知识工人是否将联合起来”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全球的政治经济。

第二节　传播与社会性别

政治经济学从社会阶级入手来考察结构化的过程。前面的章节认识到阶级分类观的价值，并描述了它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也指出了在此基础上，如何将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囊括其中一并进行考察。

这样的一种转化通过强调阶级意义的深化，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得到强化；而对社会阶级意义的考察，往往是大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基石。虽然阶级的课题非常的重要，但对结构化的分析还需要引进一些其他的概念坐标。

虽然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社会阶级这个切入点是必需的，但是它却不是结构化以及与传播关系研究的充分条件，部分原因在于阶级的分析没有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研究。用詹森（Janson，1989）的话来说，社会性别问题是“社会建构的沉默”。就像前面的章节所阐释的，与其他的研究路径不同，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保持完全的沉默，虽然它的典型做法就是将社会性别作为阶级关系的一个维度进行分析。举例来说，政治经济学对于信息技术和全球的劳动分工的研究，描绘了女性工人在微电子产业中所面临的双重压榨：一方面她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她们忍受着最为残酷的工作环境（Pellow and Park，2002）。然而，即使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研究已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它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可能地全面地将社会性别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McLaughlin，2004）。

一个明显的任务是，我们应当考虑性别研究的各种社会取向，评估它们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相容程度。我们的目标不是为社会性别（说得再具体一些，为女性）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寻找到一席之地，这种“寻求女性地位”的观点恰恰是问题症结所在。相反，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如何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最好地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理论化。也就是寻求理论上的共识，即使不能达成，也要找到框架之间能相互交融的概念和研究地带。米奇·李（Micky Lee，2007）、麦克劳林和约翰逊（McLaughlin and Johnson，2007）、米汉和赖尔登（Meehan and Riordan，2001）、萨拉卡奇斯和谢德（Sarikakis and Shade，2007）以及其他学者在试图弥合各种视野的裂痕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政治经济学承认明确的女性主义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明确的女性主义从对女性主义的特定关怀出发，思考女性主义与其他研究取向之间的关联（Chambers，

Steiner, and Fleming, 2004; Rakow and Wackwitz, 2004)。

政治经济学是最可能和社会性别理论达成一致的，因为它们都同时强调社会性而不是生理性或者是心理性的范畴。此外，根据一系列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取向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得到了下面的排列：首先，结合最紧密的是那些*以社会阶级作为切入点*(social class as an entry point)的理论，例如从阶级开始考察社会性别和权力的关系；其次，强调*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理论；最后是聚焦于*社会性别和阶级两重性*(duality of gender and class)的研究，或者说研究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相互构建的理论。

从阶级出发的社会性别理论强调的是生产体系，并且把社会性别置于其中进行分析。举例来说，这类观点考察国际分工是如何创造出劳动力层级，而把女性置于最底层的低技能、具有依附性的弹性工人的后备军中。传播学的阶级分析也相似地考察了在媒介与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劳动力层级，在整个阶级分化的系统中强调了非常重要的社会性别分化的存在(Antcliff, 2005; Huws, 2003; M. Lee, 2007; McLaughlin and Johnson, 2007)。进一步说，诸如此类的分析认为媒介享用机会的多寡取决于所属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性别纳入这个传播系统，来探究媒介分享在社会性别问题上的影响。例如，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在贫困人口中享有媒介的机会很少，而社会性别权力体系又使得女性在贫困阶层中地位更低。因此，也就使得女性和男性比起来，更加被边缘化，以至于很少能够享用到媒介、通信和信息技术——其中包括在这些产业内的工作以及由这些产业所创造出来的传播资源。

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向社会性别分析进一步迈进，因为它使得我们关注的中心从媒介的生产，或者就媒介的使用而言，从受众的生产，转向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具体而言，研究的焦点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家、家庭和性的倾向。虽然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社会性别的分析，但是政治经济学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社会再生产的分析考察资本主义和阶级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在家与家庭中的再生产

之间的结构联系。从这个观点出发，媒介通过女性的活动使得生产力的能量得到补充，而将人们和消费网络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家同生产和消费的系统联结起来。然而每一次新媒介与信息技术的浪潮，都使得消费网络得到加强。为了完成这个循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需要、兴趣与欲望，成为娱乐与信息节目的源泉，进而成为推动消费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载体（Dines and Humez，2002；Lovell，Hartmann，and Karski，2006；Mosco and Mckercher，2008：第三章）。

对社会再生产所进行的明确的功能主义分析坚持，并且认识到：相互矛盾的趋势和对抗形式的存在使得资本和社会性别权力之间的联系变得疏松了。举例来说，像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对于社会性别问题的理解是多维度的（同样，也包括对种族和民族的理解）。即使阶级权力所构建的生产层级将女性摒除在外，最好的情况也是将女性边缘化，但其仍旧消解了许多限制获得人力资源的传统行为。因此，尽管资本主义持续地为女性构建许多工作贫民区，但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放松了对女性在教育、职业，以及其他女性社会活动和社会流动形式的限制。相似地，传播的系统将女性与消费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同时也为打破女性传统的角色、实践和价值提供了相应的机制。这些都是证明资本主义是发展和矛盾结合体进一步的论证。此外，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在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中制造了社会矛盾，其中包括阶级与社会性别。资本主义运用权力来构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关系，但是资本主义并不能保证这个过程一定成功，主要是因为参与到这个构建过程中来的个体是具有自反性的，并且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采取社会行动。这个过程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认识到传统纽带断裂的可能性，并且都积极地参与到对传统纽带重塑的过程中去。因此，再生产的过程受到了挑战，对资本主义社会抵抗的力量成倍地增长，但同时也被分散开来。

阶级和社会性别同时成为反抗与抵制的基础，且有时候步调一致。比如在女性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电话接线员中，女性核心组织和电话工

人的工会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进行斗争。但是，像在女权运动内的争辩所表现的那样，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其中的一个矛盾的来源就是，在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下，阶级和社会性别的结合往往会出现裂痕，这些裂痕可能很严重。这种矛盾反映在下面的争论中：举例来说，阶级理论相对强调阶级分化的弥合在于给穷人提供更多获得和控制传播工具的可能性；而社会性别理论相对重视在社会阶级中弥合社会性别的分化，所以在媒介企业中，需要为女性开放管理职位。社会再生产理论受到了挑战，但是挑战社会再生产的形式同样也受到了冲击(Bakker and Gill，2003；Meehan and Riordan，2001)。

在社会性别问题上，除了从阶级入手的研究取向和强调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取向，还有一类观点把性别和阶级看作相互独立的(independent)类别，认为两者都为社会权力关系提供了基石。根据这个观点，社会既是一个父权社会(社会性别分化)，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社会性别和阶级在社会领域中独立共处，有时候相互作用，有时候相互建构(Steeves，2001；也可参见 Meehan and Riordan，2002；Sarikakis and Shade，2007)。建立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二元性上的研究路径，最近出现在女权理论的一些领域中(参见第六章)。这种研究路径的有利之处在于，它的研究领域比较开阔，使得我们不至于在关注一个方面的同时忽视了另一个方面，这在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和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取向面临的难题是所有二元性理论都普遍存在的，例如，如何确定其领域的特征：父权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两者之间谁是形容词，谁又是名词；以及如何确定两者相互作用的性质。另外这个路径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在没有阶级或者社会性别作为切入点的情况下，该怎样研究两者相互建构的过程(Dines and Humez，2002)。

这三种研究路径为总体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它们的长处是相同的：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可以应用于传播研究中具体的结构问题的分析，比如说：媒介的享有权问题，媒介组织中的权力掌握问题，以及政策决定过程中的参与权问题。这些研究路径的

缺点也具有共同性：很少注意到社会形成的过程，尤其很少注意人们是如何积极地建构大众传媒、阶级和社会性别选择范围（比如说异性恋和同性恋）。

*形成观*聚焦于社会性别产生的过程。这种社会性别的身份是在社会结构、传播的手段、传播的产物与能动的个体（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以社会性身份行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举例来说，形成观通过与媒介机构的关系考察社会性别的形成，而媒介机构通常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下；电视媒介；电视节目；以及受众（他们的大众媒介经验与自身具体的，但往往是能动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相联系）如何理解并对节目做出回应。对形成观维度出发的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少见，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它要求一种独到的跨学科和跨国界的视角，并且需要跨越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McLaughlin，2004）。最接近的要算是社会历史研究了，在这里不管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分析，都让位于对特定一个时期的社会性理解（Curran，2002；DiCenzo，2004）。[①]这就再一次印证了，社会再生产这个术语在描述社会性别认同过程中太过简单与模糊，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复制式”的社会发展理论，并认为文本和社会经验之间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化分析学者取得了进展，提示我们文本的多义性——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媒介产品的整个范围。但是文化分析者还是流于简单化，也就是说，他们对媒介产品和对媒介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制度性过程的关系，存在着长期的忽视。同样存在着的是，他们忽略对个体社会能动性的社会性内涵分析的趋势。此外，制度和社会角色不仅仅是为文本和个体的能动性提供了语境，它们还为在文化研究中制度和社会分类的盲点提供了解决的方法。制度和个体的能动性完全参与到相互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播科技的社会历史研究对于记录这个复杂的过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其中包括：道格拉斯（Douglas，1987）对

① 迪岑佐（Dicenzo）的文章非常重要，因为它既是对女性主义媒介历史的导入，同时强调了许多压力点的研究，如对女性、媒介、特定历史时期历史的平衡分析。

于科技和社会性别在相互构建“业余”电台和男子气概形成关系的研究(也可参见 Douglas, 2004);比瑟姆(Beetham, 1996)对于女性杂志发展的研究;哈拉诺维奇和拉宾诺维奇(Haralovich and Rabinowitz, 1999)对于女性和电视娱乐历史的研究;以及格林(Green, 2001)通过社会性别和种族的视角对电话历史的研究。

第三节 传播与种族

阶级分析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社会性别领域,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化这样强有力和多方面的努力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焕然一新。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相比,当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宽广和更深入的社会经验。然而,阶级和社会性别,无论是分开说,还是将其组合起来,都未能穷尽对于理解结构化过程至关重要的范畴。因为这两个概念并没有为种族的权力和与其相关的范畴,如民族和民族主义,留出足够的空间。

1903 年,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 W · E · B · 杜伯伊斯(Dubois)说道:“20 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对他而言,在国家内部和跨国家之间,肤色的划分是区别社会内部分化的主要源泉,也是区分大多数富裕且强大的国家(主要是白人占多数的西方社会)和世界上其他贫困且具有依附性国家的标志。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传播学研究主要通过强调媒介和信息科技在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广泛地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并且扩展用阶级划分来考察世界的方法——而不是社会性别划分(国际劳动分工中女性问题的研究)和种族划分(Ehrenreich and Hochschild, 2003; Sarikakis and Shade, 2007)。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种族视为结构化过程中一个重要要素的原因,这一点尤其重要。种族分化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下多层层级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种族既作为一个范畴,又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于国家和全球资源(包括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享用权)个体和集体的享用权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对于种族分类观的理解类似于对于阶级和社会性别分类观的理解。

种族分类观强调了由种族分化所带来的对传播资源不同的获得权。其中包括对以下资源的获得：传播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U. S.，GAO，2008），以及在媒介、传播和信息科技产业中的工作（Ankney and Procopio，2003；Benson，2005；Green，2001；Gutiérrez Chao and Wilson，2003；Johnson and Flamiano，2007；Newkirk 2002；Thanki and Jefferys，2007）。同时，它还包括媒介对少数民族形象范围和种类的描述（Clawson and Trice，2000；Downing and Husband，2005；Gray，2004；Henry and Tator，2002；Myers，2004）。金姆（Kim，2008）描述了其中的许多刻板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

> 黑人是具有威胁性的；
> 黑人女性“心直口快”；
> 亚洲人和亚裔美国女性是性感的，但同时往往比较被动；
> 亚洲人和亚裔美国男性缺乏男子气概；
> 拉丁美洲人并不被认为是当然的公民；
> 中东人是可疑的恐怖分子
> 原住民是“高贵的野蛮人”。

塔博尔（Tabor）证实了美国广播电视业对种族歧视的纵容由来已久，他举出大量例子来证明广播电视的管理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对于电视业中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白人中的一批超级种族歧视者经营着密西西比一家代号为“WLBT”的杰克逊电视台。每当电视台转播的电视网节目中出现非裔美国人的时候，屏幕就被故障信号所覆盖，字幕显示“抱歉，线路故障”。宗教界人士和当地公民纷纷聚会，声讨杰克逊电视台抹杀少数民族权利的行径。然而，联邦通讯

委员会不顾他们的抗议，仍然有条件地给该台续发了执照(Tabor, 1991：612)。

联邦法院推翻了这个决定，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不顾法院判决，还是向该台续发了三年期的营业执照，直至联邦上诉法庭最终裁决联邦通讯委员会必须吊销发给 WLBT 的执照[《基督教联合教会诉联邦传播委员会》，F.2d 543，549－550 (DC Cir. 1969)]。虽然早在 1968 年，联邦传播委员会就已经接受了在广播电视业中反就业歧视的法规，但是直到 1989 年才有了第一例该委员会对有照电视台就业歧视行为的控诉案。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种族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核心要件。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层级制中，包括阶级、社会性别；更重要的包含了种族。此外，种族也是全球政治经济下技能和控制管理的核心要素，而当今的全球政治经济越来越主要地由微电子和信息生产来进行界定(Smith, Sonnenfeld, and Pellow, 2006)。

对媒介和传播享用权中的种族分化，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并不是没有问题。当少数民族被排除在传播网络之外的时候，企业就失去了将其市场扩大深化的机会。同样的结论对于阶级和社会性别也适用。在创造市场过程中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是往往倾向于在新的人群和旧的基础上进行折衷。而旧的基础必须被新的信息和图像取代，因为这些新的信息和图像将最终挑战主导大多数视听空间的话语权。

对于种族和媒介分类观的分析强调了种族对于各种形式的媒介享有权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强调种族和媒介社会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相对较少(Gandy, 1998；Green, 2001；Hunt, 1997；Leung, 2005)。这些都表明，要理解种族在媒介中的结构化过程，就不得不考虑它的运作方式，包括少数民族为获得大众媒介工作机会的斗争；反映少数民族实际生活状态的非主流媒介的创建；以及改变大众媒介中少数民族信息和娱乐节目的内容而施加的压力。同社会性别的研究一样，对于种族最有趣的研究也聚焦于社会历史的分析。萨克斯顿(Saxton, 1990)就用这样

的方法研究了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他强调经济杠杆的作用，包括从奴隶市场到被隔离的职业市场；同时他也重视文化的力量，其中就包括对于种族自卑感和大众娱乐（比如白人扮演的化装黑人滑稽乐队的表演）的学术分析——这些都生产了一系列的种族（和社会阶级）关系。这些都远远地超越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种族（和社会阶级）的关系也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实践，在种族冲突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变化的背景下不断被检验、挑战、修正和重塑。这些实践因此本身也就具有了社会冲突的烙印。举例来说，白人扮演的化装黑人滑稽乐队的表演使得种族主义得以强化，但是如今它成了社会讽刺的力量，尽管小心翼翼，但是却直接对种族主义展开了攻击。像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马克·吐温（Mark Twain）以及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这些身份各异的人物，在萨克斯顿（1990：390）看来，“更多的是白人种族主义的政治的合作者，而并不是反对派……但是他们使我们对于人类可能性的视野变得更为宽广”。除此之外，在白人种族主义构成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反对派力量（如非裔美国人中的废奴主义者）都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反种族主义的文献，极大地动摇了种族主义存在的核心前提。上述讨论对西瓦楠丹（Sivanandan）关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论进行了具体化：

> 我认为把殖民主义看作是单向的，看作是强加于个体的，看作是对个体的掠夺，看作是强大到使个体难以抵制的，都是不正确的。从你自身的文化中，语言中或者是宗教中，总会存在一种抵抗的力量。这种抵抗力首先采取存在意义上的反抗——反抗一切有违你本性的事物（1990：3，也可参见 Linebaugh and Rediker，2000）。

第四节　传播与社会运动

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共同构成了整个结构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

面。要对这个过程进行完整的分析，就应该包括对代际间和其他过程进行考察，虽然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容易掉入多元综合体的陷阱里面，进而认为不同的社会范畴具有同等的影响力。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将结构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而且这种社会过程从对阶级的分类观、联系观和形成观出发，检验了它如何主要与社会性别和种族相互建构。这种研究路径很有价值，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风险，使人们很容易对这些术语在实际中的运用和整合产生机械的认识。哈拉维(Haraway)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将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三者联系起来的困难，并且建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几何学：

> 虽然女性主义理论中有最美好的意愿、最好的作者论点以及最精彩的前言评论，但是其很少将种族、性/社会性别和阶级放在一起分析。除此之外，对女性主义学者而言，建立种族/社会性别系统和性/社会性别系统同样重要，而且两者并非是同一类型的分析。此外，对于社会阶级的分析呢？建立一个“不同要素”的理论很有必要，这个理论的路径、范式和逻辑都需要冲破二元论、辩证法和自然/文化之间的藩篱。否则的话，三个要素总会简化为两个，很快又会变为一个，站在前列孤立无援。没有人提出考虑四个要素，这些在政治上也至关重要(1991：129)。

哈拉维的观点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很重要，即便仅仅因为她质疑了各种本质主义，不管是建立在阶级、社会性别还是种族基础之上。然而，就像上述引文所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色彩，也使哈拉维的论断超越了这些路径；她回避了本质主义，而是将她的论证建立在切入点和多重测定上。虽然本书对于考察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等社会关系的研究更为乐观，但是必须承认，对于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其他形式的考察，也是非常有益的。两个可能的研究焦点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和**霸权**(hegemony)的社会关系。

围绕着社会运动进行的分析，通过聚焦社会能动性和社会行为，具有了超越传统社会分类观的优势。社会运动将不同身份的人聚合在一起，或多或少被一个特定的利益所整合，比如说反对已经建立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并寻求变革。社会运动能够使同一阶级地位的人走到一起，如工会主义者、穷人，或者是商业精英；也能使人们因性别问题联合起来，如女性主义运动；因种族而联合，如美国人权运动与黑人权力运动。除此之外，社会运动还能动员其他身份类别的人群，如年龄和国籍。然而，社会运动之所以成功，通常是因为它们能够超越特定的身份类别，以一种具体的利益或事业将身份各异的人团结在一起，比如说支持公平贸易和反对以企业为主导的全球化的运动。

最近几年，以追求共同的利益和事业来取得认同的社会运动引起了大量的关注。这些社会运动不排除对社会分类观的关注(如，女性主义运动可能是最强大的社会分类观影响下的运动)，且主要围绕着特定的目标。这些“新社会运动”中包括非常著名的环保运动、全球化运动、健康运动(尤其是对艾滋病病毒的抗争)、性偏好(同性恋)，将跨越传统社会分类观下的人群联合起来，为给予非传统的社会分类更多的关注打下了基础。

虽然在对于新旧社会运动哪个更具有政治优越性问题上争执不下，但是新旧社会运动之间的界限并非铁板一块。一些人认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都更为重要；但是，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个立场，他们认为，一种后福特或者后现代的信息经济已经消除了社会分类的重要性，且更关注能够将不同人群集中在一个共同事业下的社会运动，比如说环保运动(Della Porta and Diani，2006；McDonald，2006；Meyer，2006)。旧的社会运动路径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要点相联系；而将注意力放在新的社会运动的人们更强调文化认同，包括各种媒介的权力(社会网点、实况电视、快闪族)。这些形成了新的文化链条，而其中的一些被推进为全面的运动。不幸的是，虽然对于新的社会运动的研究已经具有了新的基础，但是打破

旧的基础却占去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共同的基础得不到重视，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在新旧运动之间可能形成的政治联盟，很少被关注到。但是这个趋势稍稍有了些改变，因为新的研究尝试着将社会阶级，这类早期存在的社会范畴，和一些新的社会范畴，比如环保主义和性偏向连接起来。对于环境、社会性别和种族的关系无疑为20世纪后期主要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存在阶级分化，劳动力已经不再是社会运动的焦点和社会运动的核心力量，同样，这也并不意味着工会主义已经毫无政治意义了(Mosco and McKercher，2008)。除了关注政治活动的过程，社会运动观路径的价值，主要就在于它并不认同对新旧类别强制的分类观研究。

社会运动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发展。所有主要的社会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组织对内和对外传播的问题，并因此发展了自己的传播策略和政策。其中重要的议题，包括：民主化(democratic)如何才能成为组织内部传播的准则，社会运动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传播的主要形式，以及社会运动需要运用何种程度的专业和专家意见来指导媒介活动。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980)的早期著作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强调社会运动的媒介政策与它最根本的目标之间是不能割裂的。具体来说，他指出，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就在它允许其领导人成为媒介人物之后丢失了民主的精神支柱。

对于主要围绕着媒介生产和政策进行的社会运动，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也作出了贡献。从连接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理论(Hackett and Caroll，2006)、组织传播理论(Ganesh，Zoller and Cheney，2005)和自治社会思想(Dyer-Witheford，1999)的视角出发，世界范围内的非主流媒介运动已经对主流的媒介形态、技术、形象和信息提出了挑战。这些运动包括扫盲运动、街头剧场、非主流的报纸、录影带和电影制作、卡通、公共有线电视计划、可供选择的电脑网络、录影带的非法复制、电脑黑客，以及其他形式的网络行动主义。它们因向既定的媒介形式挑战

的方式而不同。一些形式，如在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的扫盲运动，除了政治哲学和实际的需要以外，对于技术密集型的传播和教育形式都提出了质疑(Mattelart，1986)。其他的形式，比如录影带的非法复制、电脑黑客，以及网络行动主义，对传播工具集中的控制权提出了挑战(Hanke，2005；Kahn and Kellner，2004)。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通过非主流报纸和公共电台与有线传播，提供了与主流媒介在本质上具有差异性的讯息和形象(Howley，2003，2004；Stengrim，2005；Switzer and Adhikari，2000；Waltz，2005)。

社会运动在对主导的媒介政策有组织的挑战中也有显著的作用。围绕着“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组织的运动是最重要的国际间的努力，虽然这一点上存在着争议，但是这一运动旨在取代媒介决策制定的主导形式，主要是西方社会跨国企业对于主要大众媒介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Sosale，2003；Traber and Nordenstreng，1992)。这个运动在今天仍旧在继续，这些运动围绕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和许多其他组织，旨在在被国际组织接受的基本的人权中，更有效地注重传播权利(Chakravarty and Sarikakis，2006；Thomas，2006)。

大量的社会运动关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其中包括促进对执照颁发、电波分配、产业结构以及媒介内容的民主化决策的尝试。历史地分析，在美国，这类运动尤其强大。在电报和电话的发展上，斗争非常激烈——由工会和乡村政治团体领导，要求将电报、电话业公有化，至少也要遵循公共邮政服务的旧例，在电信业发展中保障社会控制(DuBoff，1984；Stone，1991)。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发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斗争——以工会和教育的利益为先导，以促进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以及对商业频道施加强硬的法规(Fones-Wolf，2006；McChesney，1993；McKercher and Mosco，2007)。

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发展，为广播电视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民权运动通过法庭裁决，为代表普通公众利益的组织赢得了合法的地位；

而在此之前，联邦传播委员会这个联邦的管理者认为，普通公众的利益将会对其权力进行篡夺，因而将其排除在外。女性主义团体加入到民权运动的阵营中来，抨击了既存的雇佣实况和有辱妇女形象的节目（Creedon，1993）。在这些左翼运动的鼓动下，右翼也组织了自己强大的媒介运动，攻击那些他们认为有违道德的节目（Jamieson and Capella，2008）。当代对于互动媒介发展的兴趣，尤其是在媒介集中和获得新媒介资源上长期的不公平问题上，讨论激烈。同时，它将公共利益再一次植入媒介改革运动中，使其具有了新的生命力（*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2007；McChesney，2000，2007）。

第五节　霸权

霸权，通过描述我们关于社会的常识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提供了结构化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其中包括对这一章节种族部分所讨论的刻板印象，以及如何改变这些刻板印象的思想。这个术语在西方学术界主要体现在社会哲学家和活动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作中，而葛兰西对霸权的讨论也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具体来说，他通过聚焦资本主义通过建立在同意（consent）而不是物理的强制性的基础上，而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轮廓进行了分析。霸权的概念定位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两者之间。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蓄意扭曲或错误再现来发展特定利益，维护权力等级。另一方面，价值观则是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连接了身份、阶层各异的人群。霸权不同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要点，就在于它同时是形象和信息的不断形成，并图绘了常识。常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充分的说服性，因为它为社会生活的“自然”态度的定义提供了社会和文化坐标。所以，霸权比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更重要，因为它不仅仅简单地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但是霸权是在这个权力动态的几何结构（位于贯穿于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外，有机地（organically）构成。霸权也比价值观这个概念来得重要，因为

霸权结合了权力和常识，而价值观很少涉及对于权力问题的讨论。

对于霸权的构建来说，传统(tradition)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具。霍布斯鲍恩(Hobsbawn)尝试着去除对霸权概念的自然矫饰(其赋予霸权以跨历史的品质)并描述了“被构建的传统”，指出诸如英国君主制中的繁文缛节，看上去“年代久远，联系着无法追忆的过去”，实际上，它们也是被建构的。它们是：

> 一系列实践行为，它们通常由明显的或墨守的规则所支配，具有仪式或象征的性质，力求通过反复来向公众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种反复就自动暗示了它的历史继承性(Hobsbawn，1992：1)。

传统使得人们根植于神话般的过去，又使得这种神话无需经过来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验的验证。每年为纪念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而进行的庆祝活动为美国人再一次演绎了白人移民者的故事，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个体，但是在社会中努力工作，从而变得富有和得到了接受。

对于传统的建构只是在对霸权创造的核心社会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组成要素就是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8)所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个体化在传统之外寻求自身的发展。个体化是指，资本主义具有将集体性的范畴和身份转化为个体性的趋势，从而消解了对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其他集体性能量形式的社会权力。工人阶级、女性以及黑人因此而被重新构建为单个的主体。

霸权具体表现在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实际观念中，这些观念诸如：市场是生产型经济的支柱，这一点被广泛而普遍接受；投票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新闻的客观性表现在对现今问题的分析，总是提供了两种观点(Goldman and Rajagopal，1991)。自由的市场、自由的选举、自由的报纸、信息的自由流通，以及其他形式的霸权观点在政治上

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同时，也不是由上而下实施控制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构建了每日生活中通用的常识，从构建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等的层级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而来。

葛兰西的霸权分析不可避免地与他的政治计划相联系。他反对由在先锋队里面“开化”的领导人所引导的革命性行动和直接的军事攻击，取而代之的是反主流霸权和非主流霸权。这种反对霸权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新的通用常识，在经过斗争和“立场战争”后，取代资本主义常识，建立新的社会民主的选择。葛兰西的路径并没有用文化策略来替代(replace)政治策略。相反，它扩宽了革命性政治的概念，使其包含了文化和语言领域中的社会斗争。

考虑到霸权概念的力量，如何实现葛兰西所谓的转型？一旦认识到主流霸权所具有的动态发展力量，更使得我们对这个任务能否完成感到气馁。回应于变化着的政治社会关系，霸权也呈现出新的形式，比如说：它从国家扩展为各大洲乃至全球性的霸权集团；将曾经是反对的观点(比如说，形式上的社会性别的平等)纳入占主导地位的霸权集合体；重构关于社会福利和私人慈善事业的观点。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将世界看成一个由全球经济所管理的大型市场，并得到各国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支持，从而建构了一个强大的霸权。难怪一些知识分子会过犹不及地认为，世界将陷入“历史终结”的境遇——此时，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已经结束，所有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管理全球市场所产生的问题。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此提供了技术，并通过即时传播，在一些其他的学者看来，它们同时也将带来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Mosco，2004)。但是这类霸权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强大，此时互联网泡沫在膨胀，而“9·11”还没有发生。

尽管占有控制地位的霸权非常强有力，但是我们也能有力地论证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霸权并非是不可攻克的壁垒。的确，霸权比意识形态更强大，因为霸权的基础是同意，而并不是强制性。但是要获得同意是非常困难的，它是一个广泛而不断形成的过程，并且需要使对占统治

地位观点的接受变得理所当然。与建立在资本、主导意识形态，或者是体现在天然统治权的价值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不同，霸权的力量来自社会关系，同时需要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及其他层级的相互融合。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尤其是当经济泡沫破裂，恐怖主义者的攻击，导致了军事的入侵——这痛苦地提醒人们，历史、地理和政治将不可避免地予以带有仇恨的报复。

此外，一旦获得一致，同意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方式。但是获得(require)同意的过程可能暗含着抵抗的力量，以及对常识的认识存在着潜在的可替代的形式。所以，尽管霸权是社会关系得以结构化的核心手段，但是它并没有保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对于取得一致性(同意)而言，霸权需要经过一番斗争而实现，这个过程置于马洪(Mahon，1998)所谓的“表现形式不平衡的结构”；而同意是非常不可靠的，因此它为反主流和非主流的霸权提供了空间(Worth and Kuhling，2004)。

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确定主流霸权不稳定的根源，以及对反主流与非主流霸权所采取的各种形式进行评估。前一个任务包括存在于常识和现存经验之间的差距。资本主义霸权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它要求人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即资本主义能带来普遍的物质丰裕，但是人们面临的现实却是贫穷。即使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也是如此。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并不同意以下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制造了贫穷。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贫穷的文化(culture of poverty)，将穷人自身归结于其贫穷的原因。对于贫穷文化的极端理解，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对种族主义的学术虚饰：黑人、西班牙裔和原住居民只有克服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倾向，才可能有所进步；而这些社会和文化倾向，包括错误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和性行为，以及对于金钱的态度。

对于资本主义霸权另一个大受欢迎的辩护理论来自“滴入式效应”(trickle down)的观点。按照这种说法，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最终将通过不断渗入而使得整个阶级结构获益。这实际上是普通的辩护理论的变种。因为这个理论建立在短期和长期差异观上，面对着短期影响(一个决

策只对某一个集团有利)的存在，其声称最终将被长期的影响所抵消。康潘(Compaine，2001)运用“滴入式效应”的观点，对当前传播和信息资源的分配进行了辩护。他对于科技史的解读使他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从长期来看，建立在阶级和其他社会分化基础之上对资源的享有差异将不复存在。

与此不同的是，主流霸权自我保护的方式，往往是自我嘲讽——风格上超脱地认为其对于存在于常识与现存经验之间的差距了如指掌。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和媒介机构使得这种后现代性的嘲讽臻于完善，并通过建立愤世嫉俗的叙事者和受众之间建立连接，以回应早已存在的差距——我们早就发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想对此进行“隐瞒”(Glynn，2000；Miller，1988)。最后，另外一种保护方式，它并不提供直接的保护，但是通过娱乐节目和信息的生产而间接地予以防卫。这些娱乐节目和信息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与常识——现存经验的差距无关。它们通过其他的问题很好地分散了注意力，并指出：最好对其他问题进行思考，或者根本不需要思考。

雷蒙德·威廉斯(1980)发展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提出了文化和媒介实践中的反主流(oppositional)和非主流(alternative)的霸权概念。这两种霸权形式都要求新型的知识领袖的发展。新型的知识领袖与既定传统和革命的传统有所不同，它要求抛弃分析与政治实践中的分裂、概念与技术的分裂，以及思与行的分裂。对于葛兰西来说，这些领导品质构成了“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使用这些品质，从而发展了反主流和非主流的霸权。就像通过信息的、戏剧的、喜剧的和其他表现形式的悠久传统所展现的，反主流霸权攻击主流霸权的弱点，撕下了掩盖其矛盾的虚饰。这些反主流和反抗的文化履践并不一定产生非主流的霸权。但是，反主流霸权的成功将使得非主流霸权的产生变得更为容易些。因此，对媒介改革的抗争引导人们想象一个民主的传播系统；对于自由贸易的抗争导致了人们对于公平贸易的想象——公平贸易建立在对于全球管理决定权的广泛参与之中，以及对于所有资源平等享有权的允诺的基础之

上，这些资源是走向完整人生的保证。通过对非主流霸权表达的不同程度(或是直言不讳，或者是暗藏玄机)以及一系列形式的研究，描绘了构建社会生活新的常识不同路径的条件。对于这些不同路径的思考，并将其付诸实施，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现实性。这样，霸权的概念建立了基础广阔的组织原则和过程，并提供了理解结构化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与前面所提到的构成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及社会运动的过程有所重叠，相互补充，但又相互独立。

结论

本章检验了结构化或者说社会结构是如何于人类能动性之中获得建构的过程，即使人类的能动性是社会建构的媒介。对于结构-能动性这个二元范式而言，政治经济学更强调权力。通过使用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权力，结构限制了个体。而这种限制的结果之一，就是建立了社会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的社会范畴，这些都构成了社会领域中的主要分化。但是社会阶级和其他分化并不仅仅是社会结构性压力的一个结果，它们同样也是个体和社会集团能动性的结果。个体和社会集团运用自身的权力在世界范围内，以及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自我建构。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这些分化如何记录了媒介和信息技术，以及在媒介产业以及 IT 产业中工作享有权的不同。同样，传播政治经济学也考察人们是如何运用媒介和信息技术来增加其自身的权力，从而对社会结构进行塑形。除了考量社会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外，本章还考察了社会运动——如何运用传播来实现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创建民主传播体系的运动。最后，本章分析了霸权的概念，或者说如何建构一种理所当然的世界观的过程。与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不同的是，霸权通过获得一致性(同意)而汲取力量，此外，在变化的情况下，霸权同样需要权力的运作以维系同意。传播在霸权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无论是新旧媒介对于成功维系霸权的控制都至关重要，同时它们对于霸权的反抗以及反霸权

的建构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这将使我们对政治经济学三个切入点的分析进行总结。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的讨论为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思考传播提供了更宽泛的基础。但其外延也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下一章是本书的结论，我们将超越政治经济学，而涉足邻近的领域——它们与政治经济学接壤，然而却属于不同的学术地带。具体来说，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它既要接受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又要回应公共选择理论。然而，这种跨越学术边界的研究，必将使政治经济学受益匪浅。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第一节　边界

以上三章将视线投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部，评估了这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和观点。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和更新，同时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个学科之外，去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描述学术界全貌的路径不计其数，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置于社会学、政治科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其他路径的对立面。考虑到我们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界定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必要与文化研究相比较；另一方面，它需要与公共选择理论相对照。

毋庸置疑，在本章内对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路径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是冒失的。这两个领域的文献中充满着出色的图景描绘、分析和批判。相反，本章旨在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别与两者展开对话，以期各自从中受益。除了这个主要目标以外，本章也从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研究内部以及两者之间，指出其长处和缺点。这是对这两个路径进行不断反思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就像格罗斯伯格(Grossberg，1991：55)指出的那样，“这里的要点不是在两者之中选择，尽管可能这个会成为最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它们之中界定新的形式的联盟和合作。”

多年以来，传播学者已经界定了传播学内部分支的主要界限，包括行为学派与规范学派的区别、行政管理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区别。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区别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化研究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得到了充分发展，极

大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研究，并且对其他可替代研究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假设、方法和结论都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Deetz and Hegbloom，2007；During，1993；Grossberg，Nelson and Treichler，1992；Peck，2006）。此外，随着传播研究渐渐植根于大学中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它理所当然地需要同文化研究进行对话。因此，为了在传播学研究中确立不可动摇的政治经济学路径，迎接文化研究的挑战势在必然。

同时，政治经济学需要对其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评估。虽然对此传播学者的关注已有显著增长，但是仍然缺乏系统性的反思。对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界定有很多种方式，本章特别把它看作是在政治科学中的多元思想和在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思想的统一体。它的目标不仅是解释行为，而且具有建构规范的兴趣——对行为的政策方针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多元的方向已经占据了传统的政治科学和公共政策研究。而最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他们的核心假设、范畴和理论，转移了政策研究的重心。结果，标识着公共选择理论、政策科学，以及实证的政治经济学的多种途径都被置于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些领域的学者也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蜚声国际，其中的一位，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就致力于研究传播政策的主要课题。

文化研究是基础广泛的知识运动，它集中研究文本中意义的构成。文本的概念非常宽泛，几乎包括了社会传播的各种形式。文化研究从多个方面发展而来，其中一方面的驱动力来自反对学术正统的力量。学术正统强调根据学术规范来组织知识的倾向性，比如说，英国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否认将研究领域视为一个学术科目。部分原因在于文化研究对学科基础提出了的质疑，尤其反对为知识创设固定的主体和经典。用约翰逊（Johnson，1987：38）的话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过程，同时是一个制造有用知识的炼金过程；如果一旦对文化研究整理成典籍，那么就等于中止了炼金的化学反应”。雷蒙德·威廉斯也指出，文化研究的知识源头，是对英国文学研究中经典的质疑：

> 这里的顺序，首先是限定在已经出版的文本中；其次，范围缩小到被认为是“有想象力”的著作；最后，才是慎重地批判已经确立的少数的“经典的”文本。但是随之进行的是另一个更强劲的专业化过程：不仅仅是文学，而是特指英国文学(1981：53)。

文化研究包含许多流派和分支，从内到外，纷扰不息。

从一开始，文化研究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在英国这个语境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被视作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特别围绕着阶级、社会性别、种族而进行组织——尤其围绕着它们的不平等性与对抗性而展开。此外，马克思主义关注权力，尤其关注界定需求和利益并使之实现的权力，这对文化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举例来说，在汤普森(Thompson，1963)和威利斯(Willis，1977)的著作中，就得到了例证。他们首先关注社会阶级关系中的文化构建问题。马克思主义关注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在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中，它来源且回应于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 Birmingham，CCCS Women's Studies Group，1978)的研究计划。最后，还有一种观点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80，1982)等人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认为，文化既不是独立，又非外力所能决定的。相反，文化最好被看作是社会差异、社会斗争和社会冲突的场域。实际上，研究者已经指出，英美文化研究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采取了更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普遍的政治立场。美国文化研究虽然分支众多，但可以说，它更倾向于从社会与政治多元概念中汲取灵感，并且把权力视为广泛地扩散的。同时，美国文化研究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汲取灵感，且聚焦于文化实践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维持秩序和促进和谐。美国文化研究还包括从社会心理学的符号互动论中汲取灵感，使用仪式和戏剧的语言来考察符号性共同体的生产与再生产(Carey，1979)。美国文化研究因其“肯定性”而独树一帜，这主要是指它对美国文化的全貌(特别是文化的受众)作了非政治性的、肯定的评估。作为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批判，

美国文化研究有五方面致命的缺陷：

> 首先，它高估了受众作为接收者的自由度。其次，它最小化对受众商品化的过程(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分析)。第三，它无法区分大众广告与专业性媒介。第四，它将积极的接受与政治活动混为一谈。最后，它把偶然发生的对反对性亚文化中的有积极意义的解读当成了普遍情况(Budd, et al., 1990: 169)。

今天，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有些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文化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在一些方面有所助益。非常重要的是，它领导对实证主义进行广泛地批判，并强调知识的主体性和社会构成。从雷蒙德·威廉斯(1961)和理查德·霍加特(1957)的著作开始，文化研究将文学批评从对经典和精英文学的分析推向了对日常生活的分析。[①]具体来说，他们力图拓展文化分析的实质性内涵，并突出强调了其前提假设，即文化是普通日常生活的产物，由全体社会角色共同创造，而并不仅仅由特权精英所创造。此外，虽然历经冲突和重心转移，文化研究仍然坚持：社会不仅仅建构在社会阶级的基础上，同时，它也建立在社会性别、种族和民族以及身份的基础上(Fiske, 1989; Wilson, Gutiérrez and Chao, 2003)。

政治经济学能从这些分析维度中受益匪浅，同时它有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即使它的哲学取向接受主体性，并体现出更广阔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学仍旧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道德上的承诺，坚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差距。因此，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倾向于对主观性和主

① 威廉斯(1981：65)明确地将这个转变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它反对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特殊化，使之成为独立的价值源泉。它强调将实际上多样的文学与历史的进程相联系。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本质性的冲突(conflicts)已经必然发生，并且仍在发生。"

体的研究大相径庭，同时与文化研究中拒绝思考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的倾向迥异。此外，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中采用专业化语言的倾向不同，因为在它看来，专业化研究的使用违背了文化分析的初衷，即文化分析应该为普通人所享用，因为他们对文化分析的社会建构负责。最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忽视劳动力和劳动过程的倾向不同，文化研究往往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并否认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存在着任何价值。当然，对这种观点还存在着重要的例外（Ross，2004），但是不管怎么说，承认文化研究对于劳动（劳作活动占据了人们清醒时候的大部分时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还是相当勉强的。

政治经济学同样从公共选择视角的发展中获益。公共选择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其围绕着两个核心而展开；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向，与之相辅相成，或者对这两个主导的核心进行挑战。一个核心把分析重点放在以国家（state）为首的政治分析上；另一个偏重经济（economic）分析，目的是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推广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应用（Buchanan，2003；Posner，1992；Stigler，1988）。传统地来看，政治经济学试图从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来“读解”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力量。因此，它能从对国家构成角色严谨研究的路径中获益。此外，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对分析社会整体感兴趣，并关注社会改革。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与公共选择理论不同，在于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多元的政治分析，并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的仲裁者，它能够稳定各种社会力量，并使之达到平衡。与此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资本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及商品化过程是社会分析的必要起点。进一步来说，政治经济学抛弃了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整体分析和引导社会改革的价值观，建立在个体主义和市场理性之上的倾向。政治经济学坚持从社会过程进行研究，比如社会阶级的形成；同时强调社区和公共生活，反对市场和反对理性。在政治经济学看来，社区和公共生活对占主导地位社会阶级的权力进行了再生产。

第二节　他山之石：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拓展了认识论，使它超越了实证主义和本质论，并包含了社会建构论的知识观点，旨在决定个体和群体实际上是如何参与到他们所认知的社会整体的创造过程之中的。文化研究同样考量社会现象是如何创造的，进而被机构化，以及最后成为传统(Hobsbawn，1992)。

就其本质来看，与文化研究最为接近的对文化的看法，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的产物，被广泛地生产、分配和消费。因此，正统文学的辩护者论争到，文化不再限定于那些由精英创作的、多年来被尊为文化经典的作品。文化研究开启了对整个娱乐和新闻媒介的研究，包括电视情景喜剧、大发行量的通俗小报、滑稽浪漫故事、好莱坞大片等。并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把大众(mass)生产和分配的素材同流行(popular)文化和工作区别开来，后者是在相对民主的条件(强调广泛参与和平等)下，为争取民主的目标而创作和传播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研究反倒经常用一些难以理解的术语把自己弄得相对学术化，这些术语在文化分析与文化工作者和消费者之间制造了不该有的隔阂，而文化工作者和消费者本来最有可能从这些分析中受益。我们当然不否认学术研究中概念精细化的必要性，以及对运用复杂理论形式的要求也无可厚非，然而，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一些文化研究著作是如此难以接近，如此限制在专业学术读者范围内，以至于任何民主化的梦想和鼓舞力都不可逆转地消失了。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哈佛大学非洲-美洲研究中心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的批判。他注意到了正式文化研究中的不足，即它们的“异化策略”，这体现在他回顾了自己在课堂中对学生教授经典著作的痛苦经历。这一段话很长，但是值得引用：

> 我第一次上课面对着的是学院优等生讨论课的一小批听众。我

所犯的错误，永远也不会再犯第二次。那时我刚从研究生院毕业，还沉浸在当代文学理论那些神秘莫测的专业术语中。我打算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关于奴隶的论断进行容易接受的结构主义分析，追随其错综复杂的“二元对立”的游戏。一切都有条不紊地作了图解说明，确定了形式，并做了分析。这是我最好的一次结构主义分析，简直像我周日最好的礼拜服一样层次分明：笔挺的白衬衫、锃亮的黑鞋子。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如果你看到一个观众目光呆滞，那么实际上有一群人会感到索然无味。我大胆地完成了我的讲座；当然，我也请观众提问。“喂，老兄”，坐在最后排的一个年轻人打破了随即的沉默，“我们就想知道，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是不是一位汤姆大叔？”(Gates，1989：44)

后来，盖茨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我的讲述有趣得多。”它提出了文体的政治问题，关于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讲话的目的，关于怎样区分选举与微妙的颠覆。从本质上来说，盖茨醒悟了，“在我们批判性的话语和这些话语所依附的传统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裂痕”。他意识到了在文本和实际经验的隔阂，而文本通常产生于实际经验(Gates，1989：44)。

尽管有这样的问题，文化研究提醒了政治经济学，其内容的实质(对传播的分析)根植于普通人的需要、目标、抗争、失败与成功。文化研究尝试对普通人的生活进行诠释，即使他们面临着一个制度化和象征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由他们(普通人)自己完全创造，而实际上，这个世界更多地展现了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异化的力量。

文化研究对于批判工作的扩展同样作用显著，它超越了社会阶级分析，包括了女性主义和那些新型社会运动(例如环保运动)所启迪的研究。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经济学，虽然社会阶级是一个核心的分界线，或者从本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起点；但是，构筑结构化进程的是各种互相

重叠的层次体系，其延伸到社会性别、国别、种族和民族。此外，虽然文化研究的极端观点认为，当代生活中的政治就是找寻特定的身份认同，瓦解反对派政治；但是，文化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能动性的多种形式充满着潜能，而每种形式都带来了其对于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理解，这一点对政治实践生死攸关，却也很少被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关注（Kraidy，2005；Waetjen and Gidson，2007）。文化研究通常用这些术语进行界定。举例来说，根据约翰逊（Johnson，1987：43）的观点，“文化研究是关于自觉意识和主体性的历史形式。或者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主体形式……”约翰逊进而将这个定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连接起来，尤其是他们的早期作品，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后，他题注道：“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主体性形式的社会生活。这表现在它们循环的每一个时刻，包括它们的文本的具体化”（Johnson，1987：62）。这个观点和我所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相近。或者，像魏特简（Waetjen）和吉布森（Gibson）在他们对“哈利·波特丛书”的重要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里需要的是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慎重地思考，同时，我们需要将文本的开始与结束放置在对当代媒介生产和分配历时性和物质分析的框架下”（Waetjen and Gibson，2007：5）。

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文化是如何被生产和构成的，并把文化看作是商品化过程中动态规律的产物。这一点被广泛接受。用约翰逊（1987：55）的话来说，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经济学需要涉及“资本家及其他社会关系在现存语言和话语规则中的间接影响。特别是，阶级斗争和社会性别斗争的影响，它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符号和信号”。文化研究的路径隐约地认识到，仅靠资本逻辑分析得出结论，或单单以阶级分化为中心来组织抗争，都将是徒劳的。相反，它要求“来自深层的政治经济学”以更好地来理解“文化生产者自身微观的生产行为”（Wittel，2004：1）。不幸的是，当文化研究转而寻求社会几何体和抵抗运动新形式的时候，它的行动过于简单化；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大部分文化研究都彻底抛弃了旧有形式。而这些建立在阶级，尤其是雇佣劳动基础上的旧形式，

对于理解社会生活并促进改革具有核心意义。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已经准确地认识到了(McGuigan，2005；Miller，2004)。

政治经济学关注宏观社会的权力组织，并发展了用于此类研究的方法论。虽然文化研究基本上没有对权力问题作同等思考，但也有例外。有些研究侧重考察了地方性权力组织，集中研究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交互性主体”。除此之外，虽然一些文化研究分支几乎只关注对“文本”的研究——仅仅选择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来“解读社会”；但是另有一些分支汲取了民族志的方法论，开始关注文本接受与使用的社会关系，包括对媒介的研究(Donkor，2007)。文化研究告诉我们，权力具有地方性、交互主体性，以及通过观察技术的可获得性；因此，文化研究丰富了对于权力的政治经济的解读。[①]此外，一些运用民族志路径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了此类研究的局限，他们呼吁在研究中把全球性和地方性联系起来(Ferguson and Gupta，2002)。

第三节　他山之石：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汲取了多元政治科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对社会活动(包括传播活动)的可替代性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估。公共选择理论，同样也被称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和*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的路径，它的直接意图是把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工具移用到政治科学中，以创建一门政策科学(Buchanan，2003；Murshed，2003；Posner，1992；Stigler，2003)。具体来说，公共选择理论旨在创建一门科学，其关键词是市场、个人选择和私人利益。市场提供了所有集体行为的结构模式，包括企业、政府、志愿者协会、利益集团，以及家庭。集体被化简为个人选择的总和，不管怎样描述、解释和判定这些个人选择，它们都反映了私人利益。这里不存在特殊的社会或

① 对于民族志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参见彭达库(Pendakur，1993)。

者是社会集团，也不存在总和大于部分。因此，研究个体也就得到了集体行为的资料，因为结构也不过是为了方便描述个体追逐相似利益而杜撰的。此外，这个理论还使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它一开始就认定：人首先是个人私利的追逐者。公共选择理论家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描述在所有人类活动中的市场，包括传播活动。你的个人利益是什么？这个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爱？等等……你是否愿意支付以得到它？

对于公共选择理论家而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并非完美的各个市场，个体从中进行选择，参与进去，以实现个人效益最大化。正是在这个持续过程中，社会秩序产生了。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公共选择理论家或者实践家而言，主要的道德任务就是使得市场变得更好，不管这个市场提供信息、娱乐、教育、通信，创建家庭，还是赚钱。举例来说，在这个观点看来，政策研究的职责之一，就是提出能使选择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的策略(Murshed，2002)。①

公共选择理论在一系列学科中都有发展，并因它的数位领导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赢得普遍关注。比较著名的有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以及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公共选择理论的成功也使得其领导者，诸如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呼吁一统社会科学天下，将所有传统学科拆散整合纳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旗帜下(Olson，载 Alt and Shepsle，1990：212－231)。与保守主义观点相联合，公共选择理论吸引了一批取向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推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学者(Cohen，2000；Tarrit，2006)。然而，从一开始，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批判，因为公共选择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将市场的原则应用于社会生

① 交易成本指的是在交易过程中支付的行为成本，如使买卖双方走到一起的成本。信息成本指的是为进行最佳选择而获得关于产品、人员和市场等必要知识相联系的成本。机会成本或者说“沉没”成本则是为目前选择而进行的前期选择的成本。

活(Wood, 1989)。这种研究路径同样被应用于一般社会行为的经验分析，包括对家庭和性行为的研究(Posner, 1992)。结果，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思考政策问题的诸多方式之一，但在一些人看来，它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主导研究路径。[①]多年以来，这个取向也对传播研究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传播政策研究中，例如：广播波段的价值与适当的分配政策；在管理机构中雇员的势力拓展；去规则化的成本与后果；以及在数字化时代版权政策的发展(Coase, 1991; Crandall, 1991; Derthick and Quirk, 1985; Wilson, 1980; Wu, 2004)。

公共选择理论从许多方面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教益。它汲取了传统政治科学的成果，其在具体应用时的理论出发点是：有各种各样相对平等的参与者直接介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而且只有在讨论每一个参与者的特定利益和特定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勾勒出政策形成的全貌。[②]公共选择理论反对认为，资本逻辑(或者其他单一因素)是政策的驱动力。然而，公共选择理论确实倾向于极端多元论，而缺乏总体的倾向性——一种利益群体无政府形式，而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正确的批判。

公共选择理论如何解析这些问题并不是这章讨论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冲突的利益之间专门的、具体分析的整体承诺。这为政治经济学好好地上了一课，因为政治经济学有时候只是对资本主义过程的逻辑后果进行实验性的思考。再一次需要强调的是，公共选择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尤其强调处理政策问题时的法律—法规系统。这种形式主义的趋势(聚焦于研究政策议题在政府机关产生影响)，忽略了法律—法规机关之外广泛的权力资源和权力运用，也忽略了这些问题在得到国家注意之前的长期酝酿和发展过程。当然，公共政策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因为它提醒政治经济学

① 有数种期刊都以公共选择理论为特色，其中一种旨在以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观点取代异端政治经济学。它的主导期刊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学刊》。

② 关于公共选择理论在传播学中的运用，参见 Hallin 和 Mancini(2004)。

抛弃唯经济论，不要只从工业结构中去解读政策决定。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学一翼，也提供了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尤其是它满怀热情，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广泛而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处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传统的研究领域。然而因为这些学科都存在着有限的范围，所以常常冷落了这些广泛而意义重大的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不囿于传统经济学的支配区域，它继承了传统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实证主义，并将此运用于对决策过程的理解。这些决策过程广泛存在于家庭、国家、宗教组织中，而且涉及性关系、官僚制、家庭结构、预算等诸多方面。此外，公共选择理论也没有回避规范和道德问题，这类问题不久前还在社会科学主流研究边界之外。对于这样的价值回归，即使不是出于精密方法论策略的考虑，实际上，也促使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放开眼界，并将他们时代的核心道德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公共选择派以先锋的精神近观社会性，向社会科学现代论中的胆怯，以及在许多时代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发出挑战。这种先锋性精神在布伦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5）当今的经典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对道德构建的议题从未忽视，并通过道德的构建旨在在美国社会中创造新的“市民宗教”。公共选择理论在讨论这些课题时遭到了批评，比如，它将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推向了极端，并且把国家看作是利益竞争的独立仲裁者。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政策研究路径提示传播政治经济学扭转研究偏向，原有的研究倾向会导致研究目标的狭窄，还会在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筑起高墙。

强调普遍主义和共同性，而非分化与瓦解，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对中左的政治运动而言，这些运动关注身份政治和各种立场的理论——强调区分群体的特征，如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年龄以及性取向等。需要承认的是，身份政治对一系列多元的政治和知识运动注入了新的能量。并且，它同时也扭转了传统的左派—右派政治倾向的划分。左派曾经坚持普遍主义，无视其理论缺陷；而现在却提倡一系列分

散化的利益。而右派本来坚持单一的精英标准，而现在却自信满满地推广普遍主义的保守主义平民论。所以，观察左派话语中的普遍主义观点（举例来说，世界主义公民权）是否会生根发芽，变得非常饶有趣味（Brock and Brighouse，2005；Miller，2007）。

第四节　政治经济学的回应

政治经济学也分别对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中有些方面是重合的，从这些方面出发进行讨论的价值不言而喻——尤其是在传播分析中将权力置于核心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文化研究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权力占有相当大的分量。权力在政治经济学中既是达成目标的源泉，又是社会层级体系内的控制工具。多元主义（政策研究的核心政治倾向）把权力看作政治场域内广泛分布的资源，几乎使所有的利益主体可以得以分享（Derthick and Quirk，1985；Hallin and Mancini，2004）。权力的分配在特定例子中或许有重要意义。比如说，在某些课题中，权力分配偏向软件公司，比如微软公司；在另一些课题中，则偏向电信企业，比如说弗莱森电讯公司；在另一些课题中又偏向消费者团体。但是，根据多元主义的观点，权力不会有结构性的偏向，而集中在某个集团或利益主体手中。同样，多元主义认为，既然权力已经普遍散布在整个社会之中，那么它根本就不具有核心的形成性影响。

政治经济学赞成在将权力视作一种资源的同时，也把它作为控制形式来考虑。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而言，对于将权力置于何种位置，意见迥异。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是一种资源，用马洪（Mahon，1980）的话说，它被建构（constructed）在或是植根于“表现形式的不平等结构”之中。权力构成一个体系，谁在社会层级体系中拥有优势地位，谁就将有权获得相应的市场位置。此外，权力还不仅仅是资源——它也是一种控制（control）形式，用以反击挑战者，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虽然

在实践层次上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有所重合，但是在知识层次上，两者泾渭分明。它们对权力的认识，在本体论上有实质性的不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权力是分散的，是社会领域中起作用的众多力量之一。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则认为，权力是凝聚的、结构化的，是塑造社会领域的核心力量。这一点在下面的比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对媒介所有权和媒介集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汗牛充栋；另一方面，很少有公共选择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权力与其众多的表现形式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对于权力的研究差不多已经消失殆尽。

文化研究当然没有忽略权力，它从许多方面来考察权力，尤其强调它的个体性、地方性和交互主体性。然而，文化研究的权力观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路径更接近，而不是和政治经济学更接近。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Coombe，2005；Miller，2004)，文化研究的视角并没有把权力放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思考的根本性方法的中心。此外，文化研究视角下对于权力的概念，更多地将权力根植于个体的交互主体性、身份和集体行动之中；而不是像政治经济学那样，将权力构建在社会的制度结构中。文化研究往往对结构的概念避而不谈，一些极端的观点甚至否认社会和社会整体的概念——即使是那些概念被谨慎地提出，并考量了其适用的情境(Rutherford，2005)。

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回应，重新肯定了对社会整体性进行理论化的价值。社会整体性不应该将权力理解为抽象的和理想化的概念(系统理论所维护的观点)；而应该将其理解为对共同利益与权力结构的具体表现。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承认从主体性维度对权力进行思考的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它强调权力从控制社会结构的基本规则中获得客体性；而主体性和客体性共同构成了权力，两者不可或缺。

有趣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其实在媒介内容的多样性问题上持有相似看法。它们以各自的特定方式，将多样性和多个性相结合；它们都反对说多样性难以获得。换句话说，它们都不承认要获得多样性

就非得采取一致的政治行为。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立场倾向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内容的多样性同市场或社区中声音的纯数量(number)有密切关系。这个观点从本质上，和媒介集中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媒介集中限制了信息和娱乐内容的流通；但公共选择理论只满足于扩大市场竞争者数量的补救方法。举例来说，对于欧洲广播频道的国家垄断控制问题，典型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解决办法是向私营业者颁发营业执照。而对于北美电信业的私人垄断控制问题，标准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答复是支持一个或者一些竞争者。提供互联网的服务增加了市场的多样性，而市场中传统媒介却越来越少涉足。从这个观点来看，媒介集中的主要测量手段，需要评估市场中生产者与分配者的个数，以此来判断市场中是否有足够多的声音，构成充分多的竞争替代者。或者换种说法，只有当媒介集中对市场中的广告价值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媒介集中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公共选择把多样性等同于多个性，并将公平性与对于广告的合理价格相等同。

只有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外围，这个学科通过对国家的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公共选择理论尝试着消解声音的纯数量(多个性)和不同声音(多样性)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去除可获得媒介的数量和运用这些媒介的能力，以生产各种不同的内容，并将之进行广泛地分配之间的联系。公共选择理论称，竞争单位的存在必然产生多样性。根据这个观点，获得多样性相对而言就很容易了——只要增加生产者和分配者，以及单位的数量就可以。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结论所提出的尖锐的问题，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那就是：众多的生产者和分配者传递的是相同的讯息。多个性并非必然导致多样性。当鲁珀特·默多克的福克斯电视网络进入美国的时候，使得原来由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等寡头垄断的卖方市场中，声音的数量增加了。但是政治经济学质疑，福克斯电视网络所提供的新闻和娱乐，是否从根本上与标准的网络有所不同。它仅仅使得原有的保守性媒介变得更为保守。结果，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不

能保证多样性的提高，那么单纯增加媒介声音的数量的结果只可能是一无所获，或者获益甚少。

文化研究对当今传播的研究虽然在一般认识论、理论和实质立场上和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但是两者在媒介多样性的政治问题上，结论却很接近(Murdock，2004；Wood，1989)。文化研究从截然不同的受众观点出发，却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媒介多样性并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信息和娱乐是多义的(polysemic)；从本质上来说，受众可以对信息和娱乐进行多样的解读和理解，从而产生了多义性。这个和现存的生产者和分配者的数量没有关系。文化研究倾向于把每个信息的接收者都看作是生产者，因为信息的接收者对于信息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所以说，信息的意义主要取决于接收者特别的“主体性地位”——它可能往往是社会生活多种身份的相互重叠。媒介集中并不限制多样性，因为对于新闻、戏剧、滑稽表演等的诠释，并不是它们正式的生产者所能影响到的。相反，受众把主体经验的多样性，带到传播和信息产品中，从而产生了文本的多样化。文化研究的这个倾向以此来回应唯经济论和唯生产论所面临的双重问题。文化研究强调，也正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政治经济学。在这样的情境下，除了少数值得一提的例子，文化研究认为唯经济论，就是根据经济的逻辑、结构和发展来解读文本，以追求资本家的利益。唯经济论的特殊形式是唯生产论(productivism)，即从组成生产过程的资本循环中解读文本。①

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承认，增加讯息提供者可以增加讯息

① 作为文化研究的建立者之一的斯图尔特·霍尔，对此问题感到模棱两可，而这一点也表现在文化研究中。在他的一些著作中，霍尔将权力植入资本，以至于文化研究的捍卫者很难将其与他们所诟病的唯经济论的著作区分开来。举例来说，霍尔强调，“所有权和控制”非常重要，因为它“对此进行代表的整个机械系统，在财产和利润的价值体系中定下了根本的方向”(Hall，1986：11)。在霍尔看来，资本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阻止了新的集体类别、新的社会目标和新的控制形式进入文化生产的核心”。然而在他的一些其他著作中(1989：50)，他又尖锐地批判政治经济学，指责它是“不成熟的简单化理论”，“对于为意义而进行的斗争一点概念都没有”。

数量；而政治经济学家还介入政策制定过程，以实现这个目标。此外，政治经济学也同意文化研究的观点，即对同一个新闻或娱乐节目不可能只有一种受众反应。但是，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透彻地认识商品化过程如何影响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循环，对理解文化至关重要。公共选择理论，从它的各个理论立足点出发对此亦有所了解。但不幸的是，文化研究逊色很多，因为它对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都非常有限，这非常令人可惜。文化研究表现出对正统的和异端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深度、复杂程度、流派分支，以及整体的多样性都不甚了解。因此，文化研究并非根据经济学概念对经济学进行分析，而仅仅抛弃了建立在分类观基础上的经济学观点。经济学观点之所以被抛弃，只因为其唯经济论的特征。关于文化生产的经济过程也被视为唯生产论，而搁置一旁。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为抛弃而抛弃的立场极大地妨碍了文化研究的深刻见解；否则的话，它有可能同政治经济学一起，为创建一个有益的合作地带而作出贡献。请思考下面对唯生产论的批判：

> 生产的文本与解读的文本不是一回事。阿多诺(Adorno)的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也许是唯生产论观点中通常都存在的。这些分析不仅从生产的文本中推出解读的文本，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忽略了其他环节的生产要素，而只关注生产者和批评家的“创造力”。或许这就是存在于知识劳动分工中最深的偏见，它涵盖了作家、艺术家、教师、教育者、传播者，以及鼓动者(Johnson，1987：58)。

政治经济学并不否认生产的文本与解读的文本之间存在差异，它不否认读者也可以创造意义的说法。此外，政治经济学家也没有回避对当代新旧媒介的考察，并把它们看成是最根本的文化力量(Baltruschat，2008；Meehan，2005；Mosco，2004；Murdock，200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价值，它非常有助于记录对大众媒介看、听和观察的社会经验(Pendakur，2003；Wasko，

Phillips and Meehan, 2006)。然而，政治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作者和读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文本创造者，不管文本是书写的、视听的，或者是基于网络的。

政治经济学认为，将作者和读者等同起来，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说，读者和受众到底有多大力量成为文本的创造者？在多大程度上文本的生产者能够和确实影响了预期受众的范围及受众的反应？在控制文本生产工具和创造意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在意义的产生中的位置之间又有什么联系？[①]在面对巴赫金(Bakhtin)所谓文化产业的“独白式的演讲”时，反主流者和非主流者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又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一旦我们避免了抵制性的立场，这些领域将为有益的交流提供条件。不论“个人能批判地、自觉地评估媒介内容的力量，我们应该为此浪漫而欢呼”的想法是多么诱人，它确实并没有足够的论据对其进行支持(Evans, 1990: 152)。[②]举例来说，政治经济学路径接受文本多义性和文本多次生产的观念，也认识到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完整循环过程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把这些都视为建构社会生活和实现价值过程中的核心环节。[③]然而，政治经济学并不同意说多样性是多个性的自然产物，不管这种“多个性”指的是媒介单位还是受众。众多媒介单位只能提供根本上相同的媒介内容和形式。正如默里(Murray)在她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受众的抵抗因此被钳

① 埃文斯(Evans)从另一个方面展开了论述：“除了早期讨论的皮下注射模式，大众传播学中再也没有一种传统认定受众是消极的。实际上，真正的差别不在于受众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而在于受众行为是此类活动还是彼类活动的假定”(1990: 150)。

② 同样，在默多克看来，甚至在第一代文化研究中，包括霍加特(Hoggart)和威廉斯(Williams)的著作中，都“弥漫着对渐渐消逝的世界的怀旧情绪”，并“在他们评估这些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的‘真实性’的时候……染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③ 如埃文斯(1990: 148)指出的，文化研究认为自己和传统取向完全不同的表现之一，就是反对媒介效果论中的“皮下注射”模式。“皮下注射”模式，认为媒介可以把类似麻醉药一样的内容注入受众头脑中，来制造预期的效果。但是，到底是哪些人在有罪地使用皮下注射模式，这一点并未提及。实际上，一些学者怀疑，皮下注射模式从来都不是传播学中的重要传统。这种强调直接效果的模式，只是被视为方法上的挡箭牌而被广泛地使用，因为与它相比较，其他观点很容易看起来显得更缜密。

制在媒介产业设定的约束之中。

受众活动是主要的社会活动。聚焦于受众活动的结果之一，就是扩大了当微小的社会行为超越了合理的重要性程度后而面临的问题(Mosco and Kaye，2000)。此外，受众(audience)这个概念也不像阶级、社会性别、种族那样是学术分析的范畴，而是媒介产业自身的产物。媒介产业用这个概念来识别市场，进而界定商品。受众行为这样的提法，为这个词注入了分析的和经验的现实性。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所以使用时应多加小心。至少，断言人口学范畴意义上的“受众”确实可行，未免过于不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这个词在概念上的价值，尤其是还没有确定受众和社会阶级、种族、民族以及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才是真正超出人口学意义的团体——它们是即存的经验。以各种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方式而进行组织的社会行动者，他们进行着各种活动，包括反抗媒介的表达形式。这个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经验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程序而得以检验的。媒介权力授予了那些拥有市场控制权的人群，将体现他们自己利益的内容充斥每个媒介渠道。媒介权力建构媒介内容和多义性，以此限制了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其中一些核心的趋势在一系列可能性中显现出来，而与那些常规相去甚远的方式只能处在边缘地位。有些学者指责所谓的唯经济论和唯生产论是皮下注射模式的当代版本，和这种从范畴上来说否认反主流解读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将反主流的解读放置在具体的权力几何体中，或者以商品化、空间化，以及结构化为坐标对权力的图景进行识别。

将受众置于权力的图景中进行分析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新媒介的兴起，使得抛弃区分文化生产者和受众的观点变得流行。博客和社会网站是不是正在消蚀企业聚合体所产生的媒介权力？政治经济学建议我们不要仓促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政治经济学要求我们检视企业控制的影响：比如说，什么样的节目播出了(对于内容的限制)，以及对于播出节目所做出的改变(为了商业和控制的原因，私密性被侵犯了)。格雷

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2004：19)对此总结到，通过聚焦对传播“新”的研究，而忽略了对于“历史连续性、结构不平等，以及经济重构的尺度和范围”的研究，而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伴随着新媒介的出现而产生的问题。这些旨在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合二为一的学者非常乐观，他们认为两者的结合可以实现。在对哈里·波特现象的研究中，魏特简和吉布森(Waetjen and Gibson，2007：4)评论到，最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开始聚焦于文本的分析；而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文化研究开始注意对权力的研究。“在文化研究范围内，举例来说，具有长期传统的文本——受众关系分析开始和经济的实践和文化的生产进行重新融合”(也可参见，Deetz and Hegbloom，2007)。

政治经济学回应了分别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具体批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对工具主义、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的倾向进行了纠正。公共选择理论倾向于对政策形成过程采取工具主义的解释。它认为，团体行动对国家施加压力，可以使国家依照它们的利益制定政策。同样，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策是对那些成功利用国家工具达成特定目标的个体或团体的功能表达。这个观点可以用来解释电信业中的自由化和解禁浪潮，因为大型企业用户有能力把持国家决策机器。结果，大型的跨国企业，比如大型银行，将国家作为工具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即建立低成本、用户主导的网络和服务设施，以满足它们业务增长的需要。与此相类似，工具主义者在解释有线电视公司实力的壮大和利润的增长时，总是将它归功于这个行业的游说能力。行业的游说能力超过了广播公司、消费者群体及其他利益集团，从而使政府的政策根据公司的利益制定成形。

政治经济学承认工具主义分析的价值，但它认为更应该从传播产业在整个广阔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定位出发，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要把传播产业、国家管理和决策机构、平民社团等各种因素置于它们共同构成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中来分析。为了理解电信系统自由化的具体方式，政治经济学呼吁考察在不同国家或

地区起作用的特定的影响力，包括：是什么样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力量迫使大企业用户认识到政策过程的重要意义，并组织力量史无前例地大举介入；又是什么力量在政府系统内部和系统周边起作用，使政府更善于接受变革（例如在政府机构中的激进主义分子，打破了政府与电信垄断者之间的传统联系）；最后，政治经济学研究分化市民社会团体的力量，其中的一些强调对于公共利益规范的传统思考，另外一些支持大型用户，认为竞争才是最佳的企业改革之路。

从本质上来说，政治经济学认为，要理解怎样（how），就得知道谁（who）对谁做了什么（what to whom）。还有，只有怎样（how）也不能解释整个过程，还得判断出为什么（why）行为会发生，这就要求寻找传播政策在总的政治经济形势中的位置，包括历史的和当代的倾向。最后，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工具主义，它呼吁对政策过程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把结构层面和历史层面上的认识同一系列价值观或者说道德哲学的立足点结合起来，按照民主、平等、参与、公平与公正的原则来评估政策过程。这种评估的立场同时有助于政策分析走出狭隘的、叙述式的，以及实证主义的倾向，并把政策研究和改变政策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

公共选择理论有两种偏向，或过分强调政治方面，或过分强调经济方面，政治经济学认为应当在两者间求得平衡。前者，或者说政策研究的国家主义（statist）取向，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决策的最终权力归属于国家。这种权力可以是形式上的，即国家依法控制政策制定过程；也可以是实质上的，即国家有权决定政策制定的内容。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这种权力都属于政府。虽然国家会被外部团体（企业界）或者内部团体（机关雇员）所“把持”，成为其工具，但是正因为国家掌握着决策权力，才使得这些团体必须运用它来实现政策目标。这种认识的结果，造成了一种研究倾向，即仅仅关注于国家及其规范、立法、行政、执法机关，把国家看作是决策宇宙的核心，它决定了产业结构，塑造了产业能力（包括价格、服务及营业收入），还设定了消费者和公众介入的条件。从本质上而言，标准的国家主义观点

是，政府具有决定决策过程运作法律的权力。

公共选择理论具有偏向另一种完全相反极端的倾向，这一点更成问题。它提出了政策过程的唯经济论观点，以市场、效用、偏好等经济学语言取代了政治结构、权力等制度学语言。公共选择理论把政策领域看作一个市场，“买方”和“卖方”的意图都在这儿登记。“买方”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卖方”则提供政策输出。公共选择路径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确定一个均衡点，使政策问题各方的偏好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个观点的结果是，国家被简单地当成了一个仓库，任何不完善、不充分乃至市场竞争体系的失误都往这里堆放。对贝克和马利根(Becker and Mulligan, 2003)来说，行政管理和程序的负担，使得国家要承受日益加重的“负重成本”。佩茨曼(Peltzmen, 1976)指出，国家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他认为，在西方社会中，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得益于对平等主义的日益关注。换句话来说，国家寄生于良好的经济状况。最后，斯蒂格勒(Stigler, 1988)也认为，国家机关(例如制定规范的机构)，表面上纠正市场的失误，实际上却只不过是将收入进行再分配，并作为规范制定者自身权力进行积累的一种不完全的工具。①

政治经济学承认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各有所长。它指出，前者的一大功绩是确认了国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独立意义，以纠正政治经济学从资本逻辑中简单地对政策决定进行“解读”。政治经济学引入经济学语言的意图是冲淡国家主义。然而，政治经济学希望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构建中出发，矫正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的偏向，因为它们都片面地牺牲了关键要素，要么是政治的，要么是经济的。政治与经济，任何一个都不能对政策过程进行实质性的解释；要完整理解政策过程，必须

① 斯蒂格勒以公共选择理论家特有的自信论述到，对于这类规范观点的记录，完全没有必要：规范化所扮演的角色的根本性变更，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如此详尽地证实，以至于如果再在这里引述那些与日俱增的支持性研究，就太过于学术化了(Stigler, 1998: xiii)

将两者相结合。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抵制诱惑，不能因为正式的立法权归属国家机构，就将政策仅仅看作是政治的。正式立法权只是权力形式的一种，它仅仅对那些产生于规范制定过程以外的决策进行合法化。例如，企业界和学术/知识界各派力量的强大推动力，使得一些措施得以落实；而这些措施使得电子媒介、电信，以及互联网，通过商业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实现转型。这个力量的强度之大，以至于国家对采取这些措施兴趣渐减；虽然这些措施非常重要，而且充满着争论。大部分政策研究、替代性方案的评估、策划，以及公众意见的动员，在时间上或者先于正式的立法和规范考虑而产生，或者与之同时并行，但在空间上肯定是在正式机构之外进行的。政策研究过于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活动，因此大部分公共选择理论文献都忽略，至少也没有对这些正式机构以外活动的发展进行充分论述。政治经济学为了纠正国家主义的偏向，而致力于拓展政策过程的概念内涵，使之能够容纳那些国家正式机关之外的活动，包括政策研究和计划中心的活动，企业、工会、消费者、市民社会组织。这些都有助于左右政策议程，决定政策议题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政府关注的视野，对政府已经强调了的决策将如何推行。总之，政治经济学通过拓宽政策分析的基础，以回应国家主义的研究路径，并将那些共同构建政治过程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力量纳入其中。

政治经济学也力图纠正公共选择理论路径带到政策研究中的唯经济论倾向。具体来说，虽然政治经济学肯定了引入经济论点的价值，但是它反对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和假设纳入政策研究。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低估甚至根本忽略了权力的运作、制度化行动者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的形成对个体选择的建构。此外，政治经济学还批判地否定了分析政策问题并推动其解决问题时普适性市场模式的价值。政治经济学明确地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根本假设提出了质疑。它质疑市场的中立性、市场对于刺激的反应能力，以及假定的市场有效性。政治经济学认识到对于规范的社会成本进行认同的价值；同时，它提醒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竞争会

要求支付社会成本。而对于这一点，公共选择理论家或者完全忽略，或者只是漫不经心地尝试着做一些判定和评估。从本质上来说，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批判，政治经济学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那么无疑，它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也免不了存在缺陷。政治经济学给政策研究带来了基础广阔的分析，以取代公共选择派的唯经济论。这种分析的核心，包括总体上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三大过程。具体而言，政治经济学将政策过程及其中的角色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而这个社会背景主要形成于当前商品化的状态、构建空间化过程的制度图景，以及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等社会关系结构与霸权过程一起构建的结构化。虽然市场、个人偏好和选择在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层面仍然发挥着部分的作用，但它们也只是更为宽泛的经济过程中的几个方面。而这个更为宽泛的经济过程，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

对文化研究提出的直接或含蓄的批评，政治经济学强调了其中的一些回应。虽然文化研究（特别是源自英国和拉美的文化研究）中有一些倾向涵盖了政治的元素，但是总的来看，文化研究取向中漏掉了一个政治焦点。它没有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而这些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推动力——虽然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对这一点的争论非常激烈。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以及包括它在传播学中的应用，是一个存在着争论的领域；许多政治派别想要在这里占据知识的和政治的上风。不管是学科内部还是学科之外，即使追溯到它古典创建者的时代，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政治经济学明显是一门政治科学。也就是说，它模糊了甚至完全消解了分析与介入之间的界限。这也解释了实践在政治经济学路径中为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来看，文化研究中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不够清晰。但这个学科中也不是没有人赞同政治目标，这个目标虽然与政治经济学大不相同，但同样显而易见。这样的观点倾向于把政治目标的焦点从社会阶级上移开，转移到社会性别、种族及其他身份形式上

去，转移到跨越阶级界线的新型社会运动中去，并延伸至对环境和女性主义议题的关注。根据这个观点，文化研究通过关注构成社会身份和社会分化的文化实践和文化价值，为理解占主导地位的霸权的核心特征作出了贡献。举例来说，权威民粹主义如何将大多数工人阶级带到了撒切尔一里根阵营中，从而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及促进了反主流和非主流的大众社会运动的形成。但是这个观点在文化研究中并不被普遍持有(McGuigan，2005)。文化研究的一些实践者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更为暧昧。他们宣称，文化研究与具体的政治规划少有固定联系；文化研究中的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政治行为，就是研究行为本身。詹姆森(Jameson，1989：43)反思了文化研究中的政治不确定性。他很疑惑是否文化研究最感欣慰的是自我认同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的精神”并以此来热情地回应于费瑟斯顿(Featherstone)以及其他学者所认为的“今日世界各地的公众都更有民主意识和文化内涵”[①]。最后，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学者，自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学者对于现实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文本和话语的建构，因而否认研究的过程或实质内容与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任何联系。不论这里表述的意思多么明确，文化研究中的分歧并不是这么泾渭分明。但是只要说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对于自己同政治之间的关联，完全不像政治经济学对其与政治的关联那么确信无疑。

文化研究不能确信无疑的另一个方面正是政治经济学根本目标的核心之一，即理解社会整体。特兹拉夫(Tetzlaff，1991：10)指出，这源于文化研究的一个普遍倾向，这个倾向主要体现在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

①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经济学一翼都对无政府主义表示支持。两者都流露出为个体行为欢呼的意思，把它看作是对权力的抵制，尤其是对国家政府和垄断企业的制度化权力的抵制。考察詹姆森疏远这个立场的方式也饶有趣味。他承认，对他的批评非常正确；他对于“新无政府主义”欢呼确实没有足够的兴趣。

主义的思想中，主张统一等同于社会控制的概念，而自由化则相当于“统一体的碎片化”（Lyotard，1984）。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与其说社会整体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往往体现出系统固有的特征；还不如说它是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运作的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资本主义被理解为一个由社会过程构成的特定社会整体，这些社会过程以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为起点。它们为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具体的社会整体提供了一种途径；这个社会整体意味着对相互关联的社会过程的特定组合。这个组合以及这些过程间关系的实质是动态的，因此无法被绝对地具体化。但是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在研究工具许可的最大范围内，一方面描述社会整体的状态；另一方面描述主要过程演进的方向。因此，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理解社会整体是学科根本规划中确定不移的核心，同时它以开放的态度，在广泛的范围内探讨了社会整体的特征，以及整体组成关系的性质、形式与力量。

文化研究对探讨社会整体有何价值还不太确定，因为它怀疑这个概念在经验上的现实性和在理论上的实用性。文化研究偏爱聚焦于这样一些概念，诸如文化差异、特殊主体性，以及地方性认同等，而一旦提到范畴之间的联系，它总是万分谨慎，担心这些联系会很容易上升到理论，或者发展为客体化的形式，从而淹没了广泛权力下的特殊性和地方性。政治经济学承认这种谨慎并非毫无必要。例如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建立系统阶级分析的意图，反而会消解对阶级内部和跨越阶级中存在的强有力社会性别分化的认识。政治经济学考虑到对社会整体的探讨中可能会出现问题，但仍坚持研究社会整体性的价值（Lee，2006；McLaughlin，1999）。这种探讨中存在的危险是可能导致简化的系统思考，即拉克劳（Laclau，1977：12）所谓的“阶级简化主义的柏拉图式的洞穴”。但是，只强调差异性、主体性和特殊性，也会带来危险，它将终结于个人主义的复合体——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如果存在联系也只是偶然的。这种观点同时形成了浪漫主义的差异观，认为差异性的获得就意

味着政治性对抗行为的存在。①

这样一种观点消解了权力集中(包括阶级权力集中)的重要意义，而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证据已经表明，一种全球性的阶级分化正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加速进行。根据这个观点，政治性的抵抗充其量不过是将一系列符号合适地包裹起来，标新立异以反抗正统。它的后果是使我们不再关注物质分化，而更多地看到文化差异。这个视角的转移异常引人注目。

请思考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对多义性的分析。文化研究认识到多义性概念的局限性，但是它仍然强调(During，1993：7)，“多义性确实引导我们走向更动态化、更复杂化的理论概念，这有助于我们描述文化产品如何同新的要素结合，在不同环境中产生不同效果”。“混杂”和“协商”在这里被援用，并作为例子来说明广告形象的多种运用方式中展现的不同文化过程。例如万宝路的牛仔形象(出现在香烟盒上的帅气形象)，可以按杰夫·库恩斯(Jeff Koons)的方式“被制成闪闪发亮的、棱角分明的塑料雕像，放置在曼哈顿的高档公寓中以获得一种后现代效果；……可以把它从杂志上剪下来，用来装饰拉各斯贫民的屋子……还可以被拙劣地模仿在CD/专辑的封面上”。尽管这段描述准确无误，但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它离题甚远。因为它借用了极端的阶级分化状况，却只透过这种状况的表面看到了文化碎片的符号化运用。文化分析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碎片可以识别曼哈顿的公寓房客和拉各斯的贫民窟居民，从而把他们在符号化的社区中联系起来。政治经济学家则放眼更广阔的社会整体，在这里人们以权力关系相连结。正是这种权力关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从文化研究的框架出发，为社会整体观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辩护。他近乎表示歉意的语气更显示了他的立场的不寻常性：

> 任何人都会注意到，我的后现代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今天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要采取整体观的研究视角，而是为什么有人因为使用整体观而感到耻辱(或者学着感到耻辱)。在过去，抽象化确实是一种策略手段，使得现象，尤其是历史现象变得陌生，不再为人所熟知……(1989：33)。

系造成了他们现实生活的差异性。文化研究分析家从各种文化符号的非正统使用中看到了身份的价值，这可能是准确的，但是与认识到划分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权力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相比，前者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可参见 Kraidy， 2005)。

政治经济学与这种观点相反，它关注社会整体，认为这不仅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也具有知识上的重要意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去考察那些连结人群的对称或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其范围从权力与依附到平等与互相依存，并认为这才应该是核心的知识关怀。政治经济学还认识到，直接关系的缺失(体现为相互性的某种形式)并不一定意味着有重要意义的纽带的缺失。正如社会网络分析所展示的，联系通常极为复杂，那些个人及群体间最有力的纽带，往往是通过(through)其他人来联系的，而不是直接在彼此之间(to)加以连结的(Burt， 1992；Wellman and Hogan， 2004)。

政治经济学还坚持认为，关注社会整体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义。在细致严谨地将资本主义结构、过程以及影响纳入理论的工作中，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时有分歧，但他们都赞同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社会形成，看作一个社会整体——其各个部分形成了动态的但可以识别的关系。诚然，政治经济学家在对统治、霸权和反抗的社会关系如何被特征化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一致同意应当把注意力直接放在这些关系的社会或者集体性质之上，以及放在它们模式化的构连上。政治经济学家坚持这些立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具体体现了政治斗争的本质，而政治斗争对于政治经济学家的工作又是不可或缺的。作为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学家以解释资本主义，进而对其改革作为自己的义务；就像他们理解社会关系以求民主的推进。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它要求与社会整体密切相连，虽然有时候是批判性地相连(例如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同时要求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等社会关系密切相连。在政治经济学看来，焦点性的运动都在走向统一和社会整合，其中自然不免有差异和特殊性。文化研究批评政治经济学的取向，认为它的缺陷主

要是从资本主义和阶级权力中读解出了太多的统一性，反而掩盖了社会关系和文化中的重大差异。这两种立场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两种取向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总之，政治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批评家集中探讨了三个要点，以此构成纠正文化研究极端观点的核心方面。首先，批评家们对文化研究中的认识论转向表示担心。文化研究从现实主义转向了唯名论，否认文本之外存在可知行为。这也使得它的研究观发生了转变，原来文化研究尝试对行为做出可验证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个过程与社会实践相联系；而现在它只介入持续的对话而脱离了实践。其次，批评家们指出，文化研究中的相对主义知识论已经导致了更广泛的政治相对主义，从而丢失了政治作为决定性社会规划的意义。而正是通过规划，研究行为和其他行动才完全发挥它们的政治作用，为争取个体身份认同而进行斗争。文化研究自我满足的本质，以及它对广阔政治规划丧失兴趣，都助长了它知识的狭隘性，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话”也就曲高和寡。很明显的证据是，文化研究著作中的语言除了对话圈中的少数人之外，谁也看不懂。这就是批评家们指出的第三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家们，呼吁文化研究重返它的研究本源，即文化是大众的，它应当反映各类社会角色的需求和愿望，包括政治方面的。

结论：重返阶级权力

以阶级权力对本书做出结论是很合适的，因为阶级权力一直以来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核心位置。同时，它还标示出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重要边界。在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各个方面的旅程中，我们的兴趣一直围绕在扩展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实质论的范围，并批判性地评估社会理论中长期争论的核心概念，如本质主义和阶级权力。因此，对于构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提议，包括：

1．从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即非本质主义的）、批判的认识论

出发；

2. 采取强调社会过程和社会变革无处不在的本体论立场；

3. 发展建立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过程之上的实质论观点。

这些就是社会行为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坐标。社会阶级则是检视结构化过程的起点。即使传播政治经济学放弃了将一切要素简化为阶级的本质主义，阶级权力仍是一个核心要素。

因为公共选择理论中存在方法论和实质论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也在其追随者的著作中时有流露，所以公共选择理论很少谈及社会阶级。然而，对于文化研究来说，社会阶级和阶级权力并不是陌生的概念。实际上，这个领域的早期代表人物，包括霍加特(1957)、威廉斯(1958)、汤普森(1963)、霍尔和杰弗逊(1976)以及威利斯(Willis，1977)。他们的论著，都诠释了文化研究学者强烈感到有义务紧扣阶级分析进行研究，这使得我们相信迪兰(During，1993：1－2)的结论："早期文化研究没有退缩，他们直面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结构并不平等，个体并非生而拥有享受教育、金钱、医疗的相同权力。"然而时光流逝，文化研究，尤其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却从阶级问题以及物质不平等和阶级权力之间的普遍联系上撤退了下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化研究的兴趣将阶级分析进行扩展，从而包括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分化。此外，它旨在解释工人阶级对保守政策的明显支持，或者至少解释他们在面对生活水平下降时为何表现得无动于衷。再者，文化研究着力于解释旨在弥合阶级分化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研究兴趣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了以上这些引人注意的、且存在争议的有效转变之外，文化研究变得日益狭隘，直至退缩到文本分析，忽视对日常政治世界的关注。这样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文化研究几乎丧失了对传播工作和传播劳动过程的全部兴趣。虽然工人阶级也不时在文化研究中出现，他们却几乎从未被置于工厂或办公室的背景中。文化研究对于受众是否生产文本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但却几乎没有涉及工作本身的物质和符号本质。政治经济学家对此感到疑惑和忧虑。对于要求对阶级分析的

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思考的主张，我们可以欣然接受；但是我们却很难接受为了排斥阶级分析而找的借口。毕竟，在我们面对的世界中，贫富差距正在日益加剧。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观点正在得到转变。以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为领导的文化研究，通过对工厂的研究，正开始将注意力聚焦于劳动力(Deetz and Hegbloom，2007)，其中包括罢工和停工分析(Brennen，2005；Nagy，2007)。对“文化经济”的研究(Pratt，2004)，对企业大学的研究(Rutherford，2005)，以及对文化劳动力国际分工的研究(Miller，2004)都同时表明了对于权力研究兴趣的回归，从而开始将文化研究带回它的本源(也可参见 Denzin and Giardina，2007)。

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疏离。我们应当建立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去促进文化的民主化，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家们在为这个目标呼吁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还有更广泛的目标，那就是：跨越学科界限，使各学科的知识联系和政治联系得以融合。继续这类对话是有益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威廉斯(1981：54)所说的尴尬局面，成为“尽管时常衣衫不整，不守秩序，却还要充当体面的多元主义的座上宾客”。我们的交流自然要尽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社会现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知识活动应当组织起来，以促进社会现实的改革，争取使所有人都获得更大福利。

尾声：地平线上的挑战

本章记录了政治经济学在与其边界研究路径的交换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扩展，从而取得了进步。同时，本章也指出，还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虽然政治经济学议题众多，但是它仍需要思考来自这些边界以外的新的挑战。本书的末尾将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它们能够使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与科学技术研究相融合，以及参与到对人

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辩论中去。

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运动。它强调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对这个领域的范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科学技术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核心的思想。其中的领导者，包括：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003)、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05，1999)以及史蒂夫·伍尔格(Steve Woolgar，1988)。这些核心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有些学者错误地将科学技术研究认为是一种对知识和科学相对主义的研究——也就是说，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真实性；科学仅仅是社会过程的产物(Sokal，2008)。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与政治经济学一样，科学技术研究从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实际上，像拉图尔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研究支持强烈的现实主义立场，因为它强调物质事物，以及强调对其进行描述的理念的现实性。此外，与政治经济学相似，科学技术研究聚焦于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相互建构。我们通过对世界施加影响而认识世界；同样，世界也通过我们所认知的途径(比如实验和观察)而展现自身。我们和我们的世界通过扩展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数量而变得越来越真实和容易理解。最后，科学技术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同时关注民主议题的讨论。实际上，拉图尔研究的核心思想，包括推翻“对暴民的恐惧”(苏格拉底将其作为合理性的来源，从而提议用精英的科学取代大众的知识)，以及推翻在西方思想史中笛卡儿(Descartes)所提出的心与物的二元分离。

反对苏格拉底而相信暴民；抛弃笛卡儿“钵中之脑”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人、观念、动物、科技，以及任何其他事物所相互联系的世界，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与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相同的是，科学技术研究反对教条化的研究，以及对更宽泛的管制的质疑，因为后者伴随着对于思想的控制。实际上，被称为行为者网络理论，旨在理解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科技与哈拉维所指代的“伙伴物

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人们已经驯化的、寻猎的，抑或被称为动物或者宠物的生物。从这方面来说，科学技术研究超越了对政治经济学最为雄心壮志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旨在研究社会甚至是生命体的控制和存在，而科学技术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社会生活的层面（生命体的中心），它尝试着对科技研究注入活力。科技不仅仅是一个笨重的聚合体，比如说桌子上的电脑，更是一种力量，用来孕育、隐退，或者是相互影响在这个网络系统中的非科技行为者。

对于政治经济学需要与科学技术研究相融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科学技术研究超越了仅仅对人类生活的思考。在这个日益对积极主动的环境越来越敏感的世界中，以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技的发展超越了其原初的设计，这样的思考就显得迫在眉睫了。我们已经远离那个时代，即对人类的至高无上性的启蒙的观点绝非迷思。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科技，但是主要的政治经济研究领域还是聚焦于人类社会。然而，政治经济学对于权力的认识，和科学技术研究不同。仅仅是这一点，就为两者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其次，科学技术研究强调大众知识的重要性，以及行为者（也被称为行为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民主。政治经济学对于民主的研究源远流长，包括对民主必要性和有限性的讨论。苏格拉底呼唤精英统治，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错误的；而笛卡儿强调心存在于物之上的这样一个层次结构，也可能将我们引向一个错误的路径。但是，没有对民主以及对立面清晰的认识，相信暴民或者是物，可能导致专制的统治；这个痛苦的真理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家所证实。这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间的交流来说，又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收获颇丰的基础。

科学技术研究旨在重构科学和艺术（有时也被称为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1956 年，记者以及知识分子 C · P · 斯诺（Snow）提出了将两类文化相结合的幽灵，它联系了科学和人文，并将在实际中和对方毫无关联的人相互连接起来。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沟通，但是他们并不与小说家或是历史学家进行对话。影评家以及文化理论家之间可能相互交流，但是他

们从不与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进行谈话。科学家研发了武器，而对星球进行毁灭；而这恰恰需要人文学家对于武器的使用予以控制。如果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之间没有交流，那么损失在所难免，斯诺对此表示遗憾。如果人文学家不理解或者不想参与到科学家创造世界的过程之中，那么他们对于科学家所创造的世界难以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五十年以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朝好的方向发展。科学家取得了巨大胜利，在与人文学家的关系中，他们总是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大学的项目因为出于“实际”的需要，而往往由科学家所领导。人文学科为它们在教育和研究中的地位而抗争，而仅仅当它们接受了科学化或者科技化的思考方式，在抗争中，它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人文学科可能在缩减，但是“数字化人文”却不断发展壮大。

对于发展第三种道路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它既不同于将科学家和人文学家截然的分离，也不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方主导另一方的关系。一些学者指出，这需要创建第四种文化形式，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人文，亦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一种新的思考和行为的方式，由科学和人文共同对世界进行描绘(Lehrer, 2007)。非常清楚的是，这项工程的浩大规模与它的必要性相匹配。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介入这个讨论之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与人文(传播)相结合，并最近关注媒介研究和其他与之相关联的科技。通过界定，传播政治经济学根植于多元文化之中，并对构成多元文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进行解读。对人文和科学的重构成为对人类真正解放的工程，还是仅仅成为资本主义将创造性转化为可获利的产业，将取决于加入这个斗争过程的主体，以对这个工程进行塑形。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研究传播的学者，需要站在这个斗争过程的中心。

参 考 文 献

A Dictionary of Biology (2004) 'Communication', *A Dictionary of B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Online, available at: 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s/ENTRY.html?subview=Main&entry=t6.e963, last accessed May 30, 2008.

Abbott, J.P. (2001) 'Democracy@internet.asia? The challenges to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 Net: Lessons from China and Malays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1): 99–114.

Abler, Ron, Adam, John S., and Gould, Peter (1971) *Spatial Organ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Abler, Ron, Janelle, Donald, Philbrick, Allen, and Sommer, John (1975) *Human Geography in a Shrinking World*. Belmont, CA: Wadsworth.

Aglietta, Mich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Trans. 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Agnew, John (2001) 'The new global economy: Time–space compression, geopolitics, and uneve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7(2): 133–154.

Ahmad, Aijiz (1992)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Aksoy, Asu and Robins, Kevin (1992) 'Hollywood for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ritical mass in image market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6(1): 1–22.

Alt, James E. and Shepsle, Kenneth A. (eds) (1990)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zouma, G. (2005) 'Myth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Africa: Leapfrogging development',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3): 339–354.

Amin, Samir (1976)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msden, Alice (1992) 'Otiose economics', *Social Research*, 59(4): 781–797.

Anderson, Gary M. (1988) 'Mr. Smith and the preachers: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5): 1066–1088.

Andrejevic, Mark (2003a) 'Trading space: Monitored mobility in the era of mass customization', *Space and Culture*, 6(2): 132–150.

_____ (2003b) *Reality TV: The Work of Being Watched*.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Ang, Ien (1991) *Despa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London: Routledge.

Ankarloo, Daniel and Palermo, Giulio (2004) 'Anti-Williamson: A Marxian critiqu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413–429.

Ankney, Raymond and Procopio, Deborah (2003) 'Corporate culture, minority hiring and newspaper coverage of affirmative action',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3): 159–176.

Antcliff, Valerie (2005) 'Broadcasting in the 1990s: Competition, choice, and inequality?', *New Media & Society*, 27(6): 841–859.

Artz, Lee and Kamalipour, Yahya R. (eds) (2003) *The Globalization of Corporate Media Hegemon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rtz, Lee, Macek, Steve, and Cloud, Dana L. (eds) (2006)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New York: Peter Lang.

Arvidsson, Adam (2005) 'Brand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5(2): 235–258.

_____ (2004) 'On the pre-history of the panoptic sort: Mobility in market research',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1(4): 456–574.

Atkinson, Joshua (2005) 'Conceptualizing global justice audiences of alternative media',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8: 137–157.

Attali, Jacques (1985) *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Trans. B. Massum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twood, Rita and McAnany, Emile G. (eds) (1986) *Communication and Latin American Societ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Aubrey, Rebecca A., Kingstone, Peter R., and Young, Joseph M. (2004)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gainst neoliberal hegemony in Latin Ame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Le Centre Sheraton Hotel, Montreal, Quebec, Canada. Available at: www.allacademic.com/meta/p73320_index.html, last accessed June 24, 2008.

Babe, Robert (1990) *Telecommunications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Bagdikian, Ben H. (1992) *The Media Monopoly* (4th edn). Boston: Beacon Press.

Baker, Drucilla K. (2005) 'Beyond women and economics: Rereading "women's work"',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0: 2189–2209.

Bakker, Isabella and Gill, Stephen (eds) (2003) *Power,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London: Palgrave.

Baldoz, Rick, Koeber, Charles and Kraft, Philip (eds) (2001) *The Critical Study of Work: Labor, Technology, and Global Productio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altruschat, Doris (2008) 'Mapping global production: From cinematic co-productions to TV formats and interactive med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Burnaby, BC: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aran, Paul A.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ran, Paul A. and Sweezy, Paul M. (1966)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_____ (1965) 'Economics of two worlds', in O. Lange (ed.), *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etrics*. Oxford: Pergamon. pp. 15–29.

Basu, Kaushick (2000) *Prelude to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udr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_____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Becker, Gary S. and Mulligan, Casey B. (2003) 'Deadweight costs and the size of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6(2): 293–340.

Beetham, Margaret (1996) *A Magazine of Her Own: Domesticity and Desire in the Woman's Magazine, 1800–1914*. London: Routledge.

Bell, Daniel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_____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Bell, Daniel and Kristol, Irving (eds) (1981) *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Beltrán, Luis R. (1976) 'Alien premises, objects, and methods in Latin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107–134.

Beltrán, Luis R. and Fox de Cardona, Elizabeth (1980) *Comunicación Dominada: Estados Unidos en los Medios de América Latina*. Mexico City: Instituto Latinoamericano de Estudios Transnacionales/Nueva Imagen.

Beniger, James R. (1986) *The Contro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nson, Rodney (2005)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7(1): 5–20.

Bentham, Jeremy (1907)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st edn, 1789).

Benton, Ted (1989)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178: 51–86.

Berberoglu, Berch (ed.) (1993) *The Labor Process and Control of Labo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Relation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Bettig, Ronald V.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Bettig, Ronald V. and Hall, Jeanne Lynn (2003) *Big Money, Big Media: Cultural Texts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Bezanson, Kate and Luxton, Meg (2006) *Social Reproductio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Challenges Neo-liberalis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Bhuiyan, A.J.M. Shafiul Alam (2008) 'Peripheral view: Conceptualiz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s a postcolonial subje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0(2): 99–116.

Bianco, Anthony (2006) *The Bully of Bentonville*. New York: Doubleday.

Boettke, Peter J. and Storr, Virgul Henry (2002) 'Post-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Polity, society, and economy in Weber, Mises, and Hayek',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61(1): 161–191.

Boyer, Robert (2000) 'The political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e: Focus on some Regulation Schoo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4(2): 274–322.

Braman, Sandra (2007) *Change of St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raudel, Fernand (1975)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Trans. M. Kochan. New York: Harper & Row.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Breed, Michael D. (1999) 'How do animals communicate?',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74(2): 204–207.

Brennan, Geoffrey and Buchanan, James M. (1985) *The Reason of Rul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ennen, Bonnie (2005) 'Lockouts, protests, and scab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Los Angeles Herald Examiner* strik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2(1): 64–81.

Brock, Gillian and Brighouse, Harry (eds) (2005)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e, Dennis (2004) 'Fox and its friends: Global commodification and the new cold war', *Cinema Journal*, 4(3): 97–102.

Brophy, Enda (2006) 'System error: Labour precarity and collective organizing at Microsoft',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 619–638.

Bruff, Ian (2005) 'Making sense of the globalisation debate when engaging in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261–280.

Brunn, Stanley D. and Leinbach, Thomas R. (eds) (1991) *Collapsing Space and Time: Geographic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London: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Buchanan, James M. (2003) 'Public choice: Politics without romance', *Policy*, 19(3): 13–18.

_____ (1999)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 Two Contrasting Visions of the St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udd, Mike, Entman, Robert M., and Steinman, Clay (1990)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US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 169–184.

Bullock, Heather, Wyche, Karen, and Williams, Wendy (2001) 'Media images of the poo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2): 229–246.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kart, Patrick and McCourt, Thomas (2006) *Digital Music War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Burke, Edmund (1955)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1st edn, 1790).

Burke, Kenneth (1969a)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st edn, 1950).

_____ (1969b)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st edn, 1945).

Burkett, Paul (2006) *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s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tsch, Richard (2000) *The Making of American Audiences, 1750–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xton, William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he "Radio Wars" and the P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roject', in R.E. Babe (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pp. 147–175.

Byerly, Carolyn (2004) 'Women and media concentration', in R.R. Rush, C.E. Oukrup, and P.J. Creedon (eds), *Seeking Equity for Wome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Hillsdale, NJ: LEA Press. pp. 246–262.

Calabrese, Andrew and Burgelman, Jean-Claude (eds) (1999) *Communi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Polic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alabrese, Andrew and Sparks, Colin (eds) (2004)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alhoun, Craig (1994)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Camerer, Colin, Issacharoff, Samuel, Loewenstein, George, O'Donoghue, Ted, and Rabin, Matthew (2003) 'Regulation for conservatives: Behavioural economics and the case for "assymmetric paterna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51(3): 1211–1254.

Campbell, John E. (2005) 'Outing PlanetOut: Surveillance, gay marketing, and Internet affinity portals', *New Media & Society*, 7(5): 663–683.

Campbell, John E. and Carlson, Matt (2002) 'Panopticon.com: Online surveillance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privac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46(4): 586–606.

Cao, Jin and Zhao, Yuezhi (eds) (200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 Reader*.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ardoso, F.H. and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rey, James W. (1979)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An American view',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and J.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pp. 409–425.

Carlson, Matt (2006) 'Tapping in TiVo: Digital recorder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chedules to surveillance in television', *New Media & Society*, 8(1): 97–115.

Carlyle, Thomas (1984) *A Carlyle Reader*. G.B. Tennyson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stagnera, James Ottavio (2002) 'Groping towards utopia: Capitalism, public policy, and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Law and Public Policy*, 11(2): 297–308.

Castells, Manuel (2004)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st edn, 1997).

_____ (2002) 'Local and global: Cities in the network society',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zale Geografie*, 93(5): 548–558.

_____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Castree, Noel and Gregory, Derek (2006)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CCCS Women's Studies Group (1978) *Women Take Issue*. London: Hutchinson.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1) 'Research programme,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publication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March.

_____ (1984) 'Backgrou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Planning Document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Chakravartty, Paula and Sarikakis, Katherine (2006) *Globalization and Media Polic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hakravartty, Paula and Zhao, Yuezhi (eds) (2008) *Global Communication: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ambers, Deborah, Steiner, Linda, and Fleming, Carole (2004) *Women and Journalism*. London: Routledge.

Chandler, Alfred D., Jr.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a-Joon (2002) 'Breaking the mould: An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lternative to the neoliberal theory of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6: 539–559.

Chapman, Keith and Walker, David (1987) *Industrial Location: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Chase-Dunn, Christopher (1989)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Chinn, Menzie and Fairlie, Robert (2006)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global digital divide: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computer and internet penetra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9(1): 16–44.

Chomsky, Daniel (1999) 'Mechanisms of management control at the *New York Tim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1(5): 579–599.

Christopherson, Susan and Storper, Michael (1989) 'The effects of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on industrial politics and the labour market: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42(3): 331–347.

Clark, Barry (1991)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Praeger.

Clawson, R.A. and Trice, R. (2000) 'Poverty as we know it: Media portrayals of the po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1): 53–64.

Clement, Wallace (2001) 'Canadian political economy's legacy for 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6(3): 405–420.

_____ (1975) *The Canadian Corporate Elite: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Power*.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Coase, Ronald H. (1991)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ase, Ronald H. and Barrett, E.W. (1968) *Educational TV: Who Should Pa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Cohen, Adam (2008) 'The already big thing on the internet: Spying on users',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08/04/05/opinion/05sat4.html?_r=1&oref=slogin, last accessed July 4, 2008.

Cohen, G.A. (2000)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rev.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ander, David, Holt, Richard P.F., and Rosser, Barkley J., Jr. (2004) 'The changing face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6(4): 485–499.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 (2007) *Speed Matters: Affordable High-speed Internet for All*. Washington, DC: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

Compaine, Benjamin (2001) *The Digital Divide: Facing a Crisis or Creating a My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mpton, James (2004) *The Integrated News Spectacle: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al Performance*. New York: Peter Lang.

Connell, R.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ombe, Rosemary (2005) 'Legal claims to culture in and against the media: Neoliberalism and the global proliferation of meaningful difference', *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 1(1): 32–55.

Cooper, Kent (1942) *Barriers Down*.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Couldry, Nick (2004) 'Theorizing media as a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14(2): 115–132.

Crandall, Robert W. (1991) *After the Breakup: US Telecommunications in a More Competitive Er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rawford, Margaret (1992) 'The world in a shopping mall', in M. Sorkin (ed.),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pp. 3–30.

Creedon, Pamela J. (ed.) (1993) *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 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 (2nd edn).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5) 'Colloquy', 12: 60–100.

Crossley, Nick and Roberts, John Michael (eds) (2004) *After Haberma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ublic Spher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Curran, James (2002) *Media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_____ (1979) 'Capitalism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800–1975',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and J. Woo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p. 195–231.

Danielian, N.R. (1939) *AT&T*. New York: Vanguard.

Davis, John (1992) *Exchang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avis, John B. (2006) 'The turn in economics: Neoclassical dominance to mainstream pluralism',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1): 1–20.
Day, Wan Wen (2007) 'Commodification of creativity: Reskilling computer animation labor in Taiwan', in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85–99.
de la Haye, Yves (ed.) (1980) *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Deery, June (2004a) 'Trading faces: The make-over show as primetime infomercial', *Feminist Media Studies*, 4(2): 211–214.
_____ (2004b) 'Reality TV as advertainment', *Popular Communication*, 2(1): 1–20.
Deetz, Stan and Hegbloom, Maria (2007) 'Situa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conversation in the processes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4(3): 323–326.
Della Porta, Donatella, et al. (2006) *Globalisation from Below*.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Diani, Mario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Denning, Michael (2004)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ree Worlds*. London: Verso.
_____(1996) *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Denzin, Norman K. and Giardina, Michael D. (eds) (2007) *Contesting Empire, Globalizing Dissent*. Boulder, CO: Paradigm.
Der Derian, James (2001) *Virtuous War: Mapp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Media-Entertainment Networ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Derthick, Martha and Quirk, Paul J. (1985) *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DeSimone, Mark (1992) 'Information is value', *The Globe and Mail*, March 3.
Deuze, Mark (2007) *Media Work*. London: Polity Press.
DiCenzo, Maria (2004) 'Feminist media and history: A response to James Curran', *Media History*, 10(1): 43–49.
Dicken, Peter (1986) *Global Shift*. London: Paul Chapman.
Dines, Gail and Humez, Jean (2002)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edia*: Thousand Oaks, CA: Sage.
Donkor, David (2007)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and the radical intervention of Dwight Conquergood', *Cultural Studies*, 21(6): 821–825.
Dorfman, Ariel and Mattelart, Armand (1975) *How to Read Donald Duck*. London: International General.
Dorsey, Elizabeth, Steeves, H. Leslie, and Porras, Luz Estella (2004) 'Advertising eco-tourism on the internet: Commodifying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New Media & Society*, 6(6): 753–779.
Dos Santos,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231–236.
Douglas, Susan J. (2004) *Listening In: Radio and America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_____ (1987) *Inventing American Broadcasting, 1899–1922*.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owning, John (2001) *Radical Media*. London: Sage.
Downing, John and Husband, Charles (2005) *Representing Race: Racisms, Ethnicities, and Media*. Thousand Oaks, CA: Sage.
DuBoff, Richard (1989) *Accumulation and Powe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NY: M.E. Sharpe.
_____ (1984) 'The rise of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The telegraph industry, 1844–1880',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3): 52–66.
Durham, Frank (2005) 'Public relations as structuration: A prescriptive critique of the StarLink global food contamination case',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7(1): 29–47.
During, Simon (ed.) (1993)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Dyer-Witheford, Nick and Sharman, Nick (200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nada's video and computer game industry',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2): 187–210.
Eagleton, Terry (2003)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Eatwell, John, Milgate, Murray, and Newman, Peter (1987)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Edge, Marc (2007) *Asper Nation*.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Ehrenreich, Barbara and Hochschild, Arlie (eds) (2003) *Global Woman*. New York: Granta.
Emmanuel, Arghiri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Trans. B. Pe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Enzensberger, Hans M. (1974) *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Evans, James and Brook, Lawrence (2005) 'Understanding collaboration using new technologies: A structurational perspectiv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 215–220.
Evans, William A. (1990) '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media research: Innovation, iteration, or illus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 147–168.
Ewen, Elizabeth and Ewen, Stuart (2006) *Typecasting*.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Ewen, Stuart (2001)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 Hill (1st edn, 1976).
_____ (1996) *PR!: A Social History of Spin*. New York: Basic Books.
Fanon, Frantz (1965) *A Study in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st edn, 1959).
Featherstone, Mike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Ferguson, James and Gupta, Akhil (2002) 'Spatializing states: Toward an ethnography of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29(4): 981–1002.
Fishman, Charles (2006) *Wal-Mart Effect*. New York: Penguin.
Fishman, Mark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iske, John (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Flichy, Patrice (2007) *The Internet Imaginaire*. Trans. Liz Carey-Libbrech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lorida, Richard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Foley, Duncan K. (2006) *Adam's Fallacy: A Guide to Economic The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nes-Wolf, Colin and Fones-Wolf, Elizabeth (2007) 'Labor off the air: The Hearst Corporation, cross ownership and the union struggle for media access in San Francisco', in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1–18.
Fones-Wolf, Elizabeth (2006) *Waves of Opposition: Labor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Radio*. Chicago and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Foster, John B. (2002)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Frank, André Gunder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Free, Marcus and Hughson, John (2006) 'Common culture, commodity fetishism,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s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9(1): 83–104.
Freeman, Christopher (2007)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long wave', in G.M. Hodgson (e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London: Edward Elgar. pp. 75–97.
Freire, Paulo (1974)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Friedman, Benjamin M. (1988) *Day of Recko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under Reagan and Af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Fuchs, Christian (2007) 'Transnational space and the "networked society"', *21st Century Society*, 2(1): 49–78.
Fürsich, Elfriede and Roushanzamir, Elli P.L. (2004) 'Corporate expansion, textual expansion: Commodification model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5(4): 375–395.
Furubotn, Eirik G. and Richter, Rudolf (2005)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nd ed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Galbraith, John K. (2004) *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_____ (1987)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_____ (1985)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4th ed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_____ (1958)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allagher, Margaret (1992) 'Women and men in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12(1): 1–36.
_____ (1985) *Unequal Opportunities: Update*. Paris: UNESCO.
_____ (1984) *Employment and Positive Action for Women in the Television Organizations of the EEC Member States*. Brussels: Commission for European Communities.
_____ (1980) *Unequal Opportunities: The Case of Women and the Media*. Paris: UNESCO.
Gandy, Oscar, Jr. (2003) 'Privatization and identity: The formation of racial class', in G. Murdock and J. Wasko (eds), *Media in the Age of Marketization*. Creskill, NJ: Hampton Press. pp. 109–130.
_____ (1998) *Communication and Race: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London: Arnold.
Gane, Nicholas (2006) 'Speed up or slow down?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9(1): 20–38.
Ganesh, Shiv, Zoller, Heather, and Cheney, George (2005) 'Transforming resistance, broadening our boundaries: Critical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meets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2(2): 169–191.
Gans, Herbert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Garnham, Nicholas (2003) 'Class analysis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s mode of production', *The Public*, 11(3): 93–104.
_____ (2000)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rguments about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_____ (1979)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2): 122–146.
_____ (1978) *Structures of Televis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st edn, 1973).
Gates, Henry Louis, Jr. (1989) 'Whose canon is it, anywa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February 26: 1, 44–45.
Gibson, Timothy (2003) *Securing the Spectacular C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Gibson, Timothy and Lowes, Mark (eds) (2006) *Urban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Text, Context*.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Giddens, Anthony (2000)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Routledge.
_____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a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_____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1966) *Women and Economics: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s a Factor in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st edn, 1889).
Gilpin, Alan (1977) *Dictionary of Economic Terms*. London: Butterworths.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_____ (1979)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2): 205–253.
Gittings, Christopher (1998) 'Imaging Canada: The Singing Mountie and other commodifications of n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4): 83–97.
Glenny, Misha (2008) *McMafia: A Journey through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New York: Knopf.
Glynn, Kevin (2000) *Tabloid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odfried, Nathan (1997) *WCFL, Chicago's Voice of Labor, 1926–78*. Chicago and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olding, Peter and Murdock, Graham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pp. 15–32.
Golding, Peter, Murdock, Graham, and Schlesinger, Philip (eds) (1986) *Communicating Politic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Goldman, Robert and Rajagopal, Arvind (1991) *Mapping Hegemony: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f Industrial Conflict*. Norwood, NJ: Ablex.

Gonzalez-Manet, Enrique (1988) *The Hidden War of Information*. Trans. L. Alexandre. Norwood, NJ: Ablex.

Graham, Philip (2000) 'Hypercapitalism: A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al idealism', *New Media & Society*, 2(2): 131–156.

Graham, Stephen (2002) 'Bridging urban digital divides? Urban polariz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Urban Studies*, 39(1): 33–56.

Gran, Peter (1990) 'Studies of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Democracy, orientalism, and the Left', in H. Sharabi (ed.),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Arab World: Critic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pp. 228–254.

Gray, Herman (2004) *Watching Race: Televis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Blacknes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ray, John (2007) *Black Mass*. Lond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Green, Mark J. (ed.) (1973) *The Monopoly Makers*. New York: Penguin.

Green, Venus (2001) *Race on the Line: Gender, Labor, and Technology in the Bell Syste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rimes, Sarah M. (2006) 'Online multiplayer games: A virtual spa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bates?', *New Media & Society*, 8(6): 969–990.

Grossberg, Lawrence (2006) 'Does cultural studies have futures? Should it? (Or what's the matter with New York?)', *Cultural Studies*, 20(1): 1–32.

_____ (1991) 'Strategies of marxis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R.K. Avery and D. Eason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126–159.

Grossberg, Lawrence, Nelson, Cary, and Treichler, Paula (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Grossman, Elizabeth (2006) *Hi-Tech Trash*.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Shearwater Books.

Guback, Thomas (ed.) (1993)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 Dallas Smyth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_____ (1969) *The International Film Industry: Western Europe and America since 1945*.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unaratne, Shelton A. (2005) 'Public diplomacy,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world order: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ory of Living Systems', *Current Sociology*, 53(5): 749–772.

_____ (2004) 'Thank you Newton, welcome Prigogine: "Unthinking" old paradigms and embracing new directions. Part 2: The pragmatics', *Communications*, 29: 113–132.

_____ (2002a) 'An evolving triadic worl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8(3): 330–365.

_____ (2002b) 'Freedom of the press: A world system perspective', *Gazett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64(4): 343–369.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 Burger with F. Lawr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st edn, 1962).

_____ (1973)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Hackett, Robert A. and Carroll, William K. (2006)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Hackett, Robert and Zhao, Yuezhi (2005)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Hagen, Ingunn and Wasko, Janet (eds) (2000) *Consuming Audiences*. Creskill, NJ: Hampton.

Hagerstrand, Torsten (1968)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rans. A. P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ll, Stuart (1989) '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B. Dervin, L. Grossberg, B. O'Keefe and E. Wartella (eds), *Paradigm Exemplars. Vol. 2,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40–52.

_____ (1986) 'Media power and class power', in J. Curran (ed.), *Bending Reality: The State of the Media*. London: Pluto Press. pp. 5–14.

_____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and J.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pp. 56–90.

_____ (1980)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 57–72.
Hall, Stuart and Jefferson, Tony (eds)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Hallin, Daniel C. and Mancini, Paolo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oran, James (1981) 'The context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 McAnany, J. Schnitman, and N. Janus (ed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Praeger. pp. 21–57.
Hamelink, Cees and Linné, Olga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Problems and Policies*. Norwood, NJ: Ablex.
Hamelink, Cees and Nordenstreng, Kaarle (2007) 'A short history of IAMCR', in *IAMCR in Retrospect 1957–2007*. Paris: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Paris Nord. pp. 5–26.
Hanke, B. (200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ymedia practic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1). Available at: www.cjc-online.ca/index.php/journal/article/view/1479/1595, last accessed May 23, 2008.
Haralovich, Mary Beth and Rabinovitz, Lauren (1999) *Television, History, and American Culture: Feminist Critical Essay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raway, Donna (2003) *The Harawa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_____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arding, Susan (2003)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Hardt, Hanno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 Theory 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_____ (1990) 'Newsworkers,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m histor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 346–365.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_____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tsock, Nancy (1999)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Revisited*. New York: Basic Books.
Harvey, David (2006)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_____ (2001)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_____ (1999) *Limits to Capital* (2nd rev. edn). London: Verso.
_____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Head, Simon (2004) 'Inside the Leviatha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1(20). Available at: www.nybooks.com/articles/17647, last accessed December 7, 2004.
_____ (2003) *The New Ruthless Economy: Work and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ider, Don (ed.) (2004) *Class and New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Heilbroner, Robert L. (1986)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6th rev. ed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Heller, Walter W. (1967) *New Dimens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W.W. Norton.
Henry, Frances and Tator, Carol (2002) *Discourse of Domination: Racial Bias in the Canadian English Language Pres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Herman, Edward S. and Chomsky, Noam (2002)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Heyzer, Noeleen (1986) *Working Women in Southeast Asia: Development, Subordination, and Emancipation*.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Hills, Jill (2007)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mpire*. Chicago and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obsbawn, Eric (1992)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 Hobsbawn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_____ (1973)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in R.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pp. 265–283.
Hodgetts, Darrin, Bolam, Bruce, and Stephens, Christine (2005) 'Medi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health and lifestyle',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0(1): 123–136.

Hodgson, Geoffrey (2004)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gency, Structure and Darwinis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Hoffman, Bruce (2004)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terrorists?', *Global Agenda* (16 January) 32–34.
Hoggart, Richard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Hammondsworth: Penguin.
Holom, Olof (2006)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From tactics to strategy',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1): 23–33.
Hoover, Edgar M. (1937) *Location Theory and the Shoe and Leather Indus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pe, Wayne (2006)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tique of real time', *Time and Society*, 15(2–3): 275–302.
Hope, Wayne and Johnson, Rosser (2004) 'What is an infomercial?', *Advertising and Society Review*, 5(2). Available at: http://muse.jhu.edu/journals/advertising_and_society_review/v005/5.2hope_johnson.html, last accessed 24 December, 2008.
Horton, Byrne J. (1948)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Howley, Kevin (2005) *Community Media: People, Pla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_____ (2004) 'Remaking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Lessons from Allston-Brighton Free Radio',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3(2): 221–240.
_____ (2003) 'A poverty of voices: Street papers as communicative democracy', *Journalisim*, 4(3): 273–292.
Hund, Wulf and Kirchoff-Hund, Barbel (1985) 'Probl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5: 83–88.
Hunt, Darnell M. (1997) *Screening the Los Angeles 'Riots': Race, Seeing and Resist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tton, Will and Giddens, Anthony (eds) (2000) *On the Edge: 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Huws, Ursula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Ibrahim, S.M. (1981) *The Flow of News into Suda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Khartoum: El Sahafa Press.
Ingram, John Kells (1923) *A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tro. R. Ely. London: A&C Black.
Innis, Harold (1972)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07) *Telecoms Libera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Guide for Policymakers*. Paris: ICC.
'Interview with Harry Cleaver' (1993) *vis-à-vis* 1 (Autumn). Available at: www.geocities.com/CapitolHill/3843/cleaver.html, last accessed June 17, 2007.
Isard, Walter (1956)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 A General Theory Relating to Industrial Location, Market Areas, Land Use, Trade, and Urban Structure*. Cambridge: Technology Press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cobs, Katrien (2007) *Netporn: DIY Web Culture and Sexual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James, David E. and Berg, Rick (eds) (1996) *The Hidden Foundation: Cinema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Jameson, Frederic (1989)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176 (July–August): 31–45.
Jamieson, Kathleen Hall and Cappella, Joseph N. (2008) *Echo Chamber: Rush Limbaugh and the Conservative Media Establish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sen, Sue Curry (1989) 'Gender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socially structured sil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9(3): 196–215.
Jefferson, Therese and King, John E. (2001) '"Never intended to be a theory of everything": Domestic labour in neoclassical and Marxian economics', *Feminist Economics*, 7(3): 71–101.
Jenkins, Henry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essop, Bob (2002) 'Time and space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tate power', *Rethinking Marxism*, 14(1): 91–117.

_____ (2001)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yet again): Reviews, revisions, rejections, and re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149–174.

_____ (2000) 'The crisis of the national spatiotemporal fix and the tendential ecological dominance of globalizing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4: 323–360.

_____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Jessop, Bob and Sum, Ngai-Ling (2001) 'Pre-disciplinary and post-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Political Economy*, 6(1): 89-101.

Jevons, William S. (1965)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M. Kelley.

Jhally, Sut (1990)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Johnson, Paul (1993) 'Colonialism's back – and not a moment too soo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8: 22, 43.

Johnson, Richard (1987)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Social Text*, 17(Winter): 38–80.

Johnston, Anne and Flamiano, Dolores (2007) 'Diversity in mainstream newspaper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journalists of color',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2): 111–131.

Jussawalla, Meheroo (ed.) (1993)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ies: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Jussawalla, Meheroo and Taylor, Richard D. (eds) (200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rks of the Asia Pacific*. Armonk: M.E. Sharpe.

Kahn, Richard and Kellner, Douglas (2004) 'New media and internet activism: From the "Battle of Seattle" to blogging', *New Media & Society*, 6(1): 87–95.

Kapur, Jyotsna (2007) '"New" economy/old labor: Creativity, flatness, and other neo-liberal myths', in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163–175.

Keenan, Thomas (1993) 'Windows of vulnerability', in B. Robbins (ed.),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21–141.

Kellner, Douglas (1990) *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_____ (1989)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endall, Diana (2005) *Framing Clas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Wealth and Poverty in Americ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Keynes, John Maynard (1964)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Khiabany, Gholam (2006) 'Religion and media in Iran: The imperative of the market and the straightjacket of Islamism',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3(2): 3–21.

Kim, L.S. (2008) 'Representations of race', in R. Andersen and J. Gray (eds), *Battleground: The Medi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pp. 452–459.

Kiss, Simon and Mosco, Vincent (2005) 'Negotiating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workplace: A study of collective agreements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4): 549–564.

Klein, Naomi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Toronto: Knopf Canada.

_____ (2002) *No Logo*. New York: Picador.

Klein, Peter G. (1999)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B. Bouckaert and G. Geest (eds), *Encyclopedia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 *The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Law and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456–489.

Klüver, Jürgen and Stoica, Christina (2005) 'On the natur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 complex systems perspective', *Cybernetics and Systems*, 36: 877–902.

Knowles, Richard D. (2006) 'Transport shaping space: Differential collapse in time-space',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14(6): 407–425.

Kraft, Philip and Dubnoff, Steve (1986) 'Job content, fragmentation and control in computer software work', *Industrial Relations*, 25: 184–196.

Kraidy, M.M. (2005)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ristol, Irving (1983)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mar, Deepa (2007) *Outside the Box: Corporate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the UPS Strike*. Chicago and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Kumar, Keval J. (2003) 'India and Pakistan: From transitional to network societies', *Development*, 46(1): 41–48.
Kunz, William A. (2006) *Culture Conglomerat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Kyasny, Lynette (2006) 'Cultural reproduction of digital inequality in a US community technology initiativ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9(2): 160–181.
Laclau, Ernesto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Lash, Scott and Lury, Celia (2007)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London: Polity Press.
Lash, Scott and Urry, John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tour, Bruno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9) *Pandora's H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wrence, Stephen H. (1983)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he Communications Connection*. Incidental Paper I–83–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Policy.
Lawson, Tony (2005)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 2(1): 7–20.
Lazear, Edward (2000) 'Economic imperi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1): 99–146.
Lazzarato, Maurizio (1997) *Lavoro immateriale: Forme di Vita e produzione di soggettività*. Verona: Ombre Corte.
Lebowitz, Michael (1986) 'Too many blindspots on the media',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1(August): 165–173.
Lee, Chin-Chuan (2001)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 *The Public*, 3(5): 1–22.
Lee, Frederic S. (2002) 'The 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for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50: 29–43.
Lee, Hua L. (2007) 'Peering through a glass darkly', *International Commerce Review*, 7(1): 60–68.
Lee, Micky (2007)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and global women's povert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Gazette*, 69(2): 193–213.
_____ (2006) 'What's missing in feminist research in new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6(2): 191–210.
Lefebvre, Henri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J.W. Freiberg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Irvington. pp. 285–296.
Lehrer, Jonah (2007) *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Lerner, Daniel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_____ (1949) *Sykewa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Germany, D-Day to V-E Day*. New York: Stewart.
Leung, Linda (2005) *Virtual Ethnicity: Race, Resistance and the World Wide Web*. Aldershot: Ashgate.
Lewis, Justin and Miller, Toby (eds) (2003) *Critical Cultural Policy Studies: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Linebaugh, Peter and Rediker, Marcus (2000)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Commoner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 Boston: Beacon Press.
Lipietz, Alain (1988) 'Reflections on a tale: The Marxist foundations of the concepts of reg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6(Summer): 7–36.
Little, David I.M. (2002) *Ethic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rinciples of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u, Chang-de (2006)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er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 695–714.
Livant, William (1979)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3(1): 91–106.

Longstaff, Patricia (2002) *The Communications Toolki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ovell, Vicki, Hartmann, Heidi, and Koski, Jessica (2006) *Making the Right Call: Jobs and Diversity in the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Secto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
Losse, Robert M. (1999) 'Communication defined as complementary informative process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5(3): 1–20.
Luká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R.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ux, Kenneth (1990) *Adam Smith's Mistake*. Boston: Shambhala.
Lynch, Mona (2004) 'Punishing images: Jail cam and the changing penal enterprise', *Punishment and Society*, 6(3): 255–270.
Lyon, David (2007) *Surveillance Studies: An Overview*. London: Polity Press.
_____ (ed.) (2006) *Theorizing Surveillance*. Cullompton: Willan.
_____ (2003) *Surveillance after September 11*. London: Polity Press.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gder, Ted and Burston, Jonathan (2001) 'Whose Hollywood? Changing forms and relations in the North American information economy', in V. Mosco and D. Schiller (eds), *Continental Orde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207–234.
Mahon, Rianne (1980) 'Regulatory agencies: Captive agents or hegemonic apparatuses', in J. Paul Grayson (ed.), *Class, State, Ideology, and Change*. Toronto: Holt, Rinehart & Winston. pp. 154–168.
Malone, Thomas W. and Rockart, John F. (1991) 'Computers, networks and the corpor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128–136.
Mandel, Ernest (1995)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2nd rev. edn). London: Verso.
Mansell, Robin (2004)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new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 6(1): 96–105.
_____ (2002) 'From digital divides to digital entitlements in knowledge societies', *Current Sociology*, 5(3): 407–426.
Mansell, Robin and Nordenstreng, Kaarle (2006) 'Great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debates: WSIS and the MacBride Repor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4): 15–36.
Markusen, Ann (2005) 'Communicating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7(3): 269–280.
Marques de Melo, José (ed.) (1991)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Brazilian Perspectives*. Saô Paulo: ECA/USP.
Marshall, Alfred (196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st edn, 1890).
Marshall, T.H. (1964)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ssay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Martin, Christopher (2007) 'Writing off workers: The decline of the US and Canadian labor beats', in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19–35.
_____ (2004) *Framed! Labor and the Corporate Media*. Ithaca, NY: ILR Press.
Martin, Michèle (1991) *'Hello, Central?': Gender,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arx, Karl (1976a)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st edn, 1867).
_____ (1976b) *Collected Works*. Vol. V.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_____ (1973) *The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_____ (1963)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st edn 1869.)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87)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st edn 1845.)
Massey, Doreen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_____ (1992) 'Politics and space/time', *New Left Review*, 19: 65–84.
Mattelart, Armand (2000) *Networking the World, 1794–2000*. Trans. Liz Carey-Libbrecht and James A. Cohe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_____ (ed.) (1986) *Communicating in Popular Nicaragu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attelart, Armand and Mattelart, Michèle (1992) *Rethinking Media Theory: Signposts and New Directions* (2nd edn). Trans. James A. Cohen and M. Urquid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st edn, 1986).
Mattelart, Armand and Siegelaub, Seth (eds) (1983)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2: Liberation, Soc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_____ (eds) (1979)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1: Capitalism,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attelart, Michèle (1977) 'Création populaire et résistance au système des medi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Imperialism, Algiers, October 11–15.
Maxwell, Richard (2003) *Herbert Schille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_____ (ed.) (2001) *Culture Work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yer, Vicki (2005) 'Soft-core in TV-tim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cultural trend"',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2(4): 302–320.
Mazepa, Patricia (2007) 'Democracy of, in and through communication: struggles around public service in Canad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fo*, 9(2–3): 45–56.
_____ (2003) 'Battles on the cultural front: The (de)labouring of culture in canada, 1914–1944', doctoral dissertation. 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McAllister, Mathew P. and Giglo, J. Matt (2004) 'The commodity flow of US children's programming',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2(1): 26–44.
McAnany, Emile G. (1986) 'Seminal ideas in Latin America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 agenda for the north', in R. Atwood and E.G. McAnany (eds), *Communication and Latin American Society: Trends in Critical Research*. Madison, WI: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pp. 28–47.
McChesney, Robert W. (2007)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_____ (2004)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cy in Dubious Tim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_____ (2003)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A political economic contribution to an explanation of the crisis in contemporary US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4(3): 299–329.
_____ (2000)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_____ (1993) *Telecommunications,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The Battle for the Control of US Broadcas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2) 'Labour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WCFL and the battle for labor Radio broadcasting, 1927–1934', *Journalism Monographs*, 134 (August).
McChesney, Robert W. and Schiller, Dan (200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s for the emerging global debate about media ownership and regulation', paper no. 11,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Society Programme. Available at: www.unrisd.org/UNRISD/website/document.nsf/ab82a6805797760f80256b4f005da1ab/c9dcba6c7db78c2ac1256bdf0049a774/$FILE/mcchesne.pdf, last accessed May 23, 2008.
McCloskey, Deidre N. (2002) *The Secret Sins of Economic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_____ (1985)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cDonald, David A. and Ruiters, Greg (2005) *The Age of Commodity: Water Privatiz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Earthscan.
McDonald, Kevin (2006) *Global Movements*. Oxford: Blackwell.
McGowan, John (1991) *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cGuigan, Jim (2005) 'Neo-liberalism, culture,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1(3): 229–241.
McKercher, Catherine (2002) *Newsworkers Unite: Labor, Convergence and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McKercher, Catherine and Mosco, Vincent (eds) (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_____(eds) (2006)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
McLaughlin, Lisa (2004)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public space', *Sociological Review*, 52(1): 156–175.
_____ (1999) 'Beyond "separate spheres": 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studies/political economy deb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3(4): 327–354.
McLaughlin, Lisa and Johnson, Helen (2007) 'Women and knowledge work in the Asia Pacific: Complicat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n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249–266.
McMillan, Sally J. (1998) 'Who pays for content? Funding in interactive 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4(1). Available at: http://jcmc.indiana.edu/vol4/issue1/McMillan.html, (last accessed January 5, 2009.
McRobbie, Angela (2005)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Meadowcroft, James (2005)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and the state', *New Political Economy*, 10(4): 479–498.
Meaghar, Gabrielle and Nelson, Julie A. (2004) 'Survey article: Feminism and the dismal sci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2(1): 102–126.
Meehan, Eileen R. (2005) *Why TV is Not Our Fault*.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_____(1999) 'Commodity, culture, common sense: Media research and paradigm dialogu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2): 149–163.
_____ (1984) 'Towards a third vision of an information socie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6: 257–272.
Meehan, Eileen R. and Riordan, Ellen (eds) (2002) *Sex and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elkote, Srinivas R. and Steeves, H. Leslie (2001)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mpowerment* (2nd edn). New Delhi: Sage.
Mellor, Mary (2005) 'Eco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Integrating feminist economics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Feminist Economics*, 11(3): 120–126.
Melody, William (2007) 'Cultivating knowledge for knowledge societies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70–78.
Mercer, Claire (2004) 'Engineering civil society: ICTs in Tanzani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1(99): 49–64.
Meyer, David S. (2006)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ège, Bernard (2003)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 new era of society or an accentuation of long term tendencies', in A. Calabrese and C. Sparks (eds),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83–94.
_____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ill, John Stuart (184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C.C. Little and J.B. Brown.
Millard, Bob (2000)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iller, David (1989)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John (1992) 'URPE 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Whence we came', *URPE Newsletter*, Fall: 4–5.
Miller, Mark C. (1988) *Boxed In: The Culture of TV*.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Toby (2007) *Cultural Citizenship*.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_____ (2004) 'A view from a fossil: The new economy, creativity, and consumption – two or three things I don't believ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1): 55–65.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onakis, Dimitris (2003) 'New market socialism: A case for rejuvenation or inspired alchem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7(1): 97–121.
Mirchandani, K. (2004) 'Practices of global capital: Gaps, cracks, and ironies in transnational call centres in India', *Global Networks*, 4(4): 355–373.
Mody, Bella (ed.) (2003)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nahan, Torin (2004) 'Just another tool? IT pedagog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The Urban Review*, 36(4): 271–292.

Montgomery, Katherine C. (1989) *Target: Prime Time–Advocacy Groups and the Struggle over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Martin (2005) 'Interpretability and social power, or, why postmodern advertising work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7(5): 697–718.

Morris-Suzuki, Tessa (2005) *The Past Within Us: Media, Memory, History*. London: Verso.

_____ (1988) *Beyond Computopia: Information, Automation, and Democracy in Japan*. London: Routledge.

Morrison, David (1978)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chives of European Sociology*, 19(2): 347–359.

Mosco, Vincent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_____ (20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Canada', in W. Clement and L. Vosko (eds), *Changing Canada: Political Economy as Transformation*. Montreal: McGill-Queen's Press. pp. 287–308.

_____ (1989a) *The Pay-per Society: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oronto: Garamond, and Norwood, NJ: Ablex.

_____ (1989b) 'Labour in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A critic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B. Dervin, L. Grossberg, B. O'Keefe, and E. Wartella (eds), *Paradigm Exemplars. Vol. 2: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213–225.

_____ (1982) *Pushbutton Fantasies*. Norwood, NJ: Ablex.

_____ (1979)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novative Challenge and Organizational Control*. Norwood, NJ: Ablex.

Mosco, Vincent and Kaye, Lewis (2000) 'Questioning the concept of the audience', in I. Hagen and J. Wasko (eds), *Consuming Audiences*. Creskill, NJ: Hampton Press. pp. 31–46.

Mosco, Vincent and Lavin, David (2007) 'Political economic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obal Media Journal – Persian Edition*, trans. into Farsi by Hamid Abdollahyan, et al. Available at: www.dcsfs.ut.ac.ir/gmj/, last accessed June 6, 2008.

Mosco, Vincent and McKercher, Catherine (2008)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Mosco, Vincent and Schiller, Dan (eds) (2001) *Continental Order? Integrating North America for Cybercapitalism*.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Mosco, Vincent and Wasko, Janet (eds) (1983) *Labor,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Media*. Norwood, NJ: Ablex.

Mosco, Vincent and Zureik, Elia (1987) *Computers in the Workplace: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Telephone Industry*. Ottawa: Government of Canada, Department of Labour.

Mowlana, Hamid, Gerbner, George, and Schiller, Herbert I. (eds) (1992)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Murdock, Graham (2004) 'Past the posts: Rethinking change, retrieving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1): 19–38.

_____ (1989) 'Cultural studies: Missing link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December: 436–440.

_____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09–119.

Murdock, Graham and Golding, Peter (2005)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London: Hodder Arnold, pp. 60–83.

_____ (2000)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n). London: Arnold. pp. 70–92.

_____ (1973)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pp. 205–234.

_____ (2004) 'Dismantling the digital divide: Rethinking the dynamics of participation and exclusion', in A. Calabrese and C. Sparks (eds),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244–260.

_____ (1979)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and J.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 12–43.
Murdock, Graham and Wasko, Janet (eds) (2007) *Media in the Age of Marketization*. Creskill, NJ: Hampton Press.
Murray, Simone (2004) 'Celebrating the story the way it is: Cultural studies, corporate media, and the contested utility of fandom',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8(1): 7–25.
_____ (2003) 'Media convergence's third wave: Content streaming', *Convergence*, 9(8): 8–18.
Murshed, Syed Mansoob (ed.) (2002) *Issues i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Myers, Marian (2004)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nd violence: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the new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1(2): 95–118.
Nagel, Ernest (1957) *Logic without Metaphysics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Nagy, Ian (2007) 'Labor strife and carnival symbolism', in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285–298.
Negra, Diane (2001) 'Consuming Ireland: Lucky Charms cereal, Irish Spring soap, and 1-800-SHAMROCK', *Cultural Studies*, 15(1): 76–97.
Negt, Oskar and Kluge, Alexander (1972) *Oeffentlicheit und Erfahrung: zur Organisationanalyse von Buergerlicher und Proletarischer Oeffentlichkeit*. Frankfurt: Suhrkamp.
Newkirk, Pamela (2002) *Within the Veil: Black Journalists and White Med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man, Saul (2007) 'Anarch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SubStance*, 113: 3–18.
Nielsen, Mike (1990) 'Labor's stake in the electronic cinema revolution', *Jump Cut*, 35: 78–84.
Nisbet, Robert (1986) *Conservatis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Noam, Eli (2008) *Media Ownership and Concentr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rdenstreng, Kaarle (2004) 'Ferment in the field: Notes on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its disciplinary nature', *The Public*, 11(3): 5–18.
_____ (1993) 'New information order and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Reflections on a delicate relationship', in J. Wasko, V. Mosco, and M. Pendakur (eds),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Norwood: NJ: Ablex. pp. 251–273.
_____ (1984) *The Mass Media Declaration of UNESCO*. Norwood, NJ: Ablex.
_____ (1968)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Gazette*, 14: 207–216.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Padovani, Claudia (2005) 'From NWICO to WSIS: Another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 264–272.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Schiller, Herbert (eds) (1993)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orwood, NJ: Ablex.
_____ (eds) (1979)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orwood, NJ: Ablex.
Nordenstreng, Kaarle and Varis, Tapio (1974) *Television Traffic: A One-Way Street?* Paris: UNESCO.
Nove, Alec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O'Connor, Alan (1991)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Latin America', *Cultur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60–73.
O'Connor, James (1991) 'Socialism and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3): 1–12.
_____ (1987) *The Meaning of Crisis: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Offe, Claus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Hara, Philip A. (2002)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horstein Veblen's institutional-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35: 78–103.
_____ (2000) *Marx, Veblen, and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Ortega y Gasset, José (1957)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W.W. Norton.
Owen, Robert (1851) *Labor: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New York: Kelly.
Paavola, Jouni and Adger, W. Neil (2005) 'Institutional ecological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53: 353–368.

Palgrave, Sir Robert H.I. (1913)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I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Palmer, Bryan D. (1990) *Descent into Discourse: 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arenti, Christian (2003) *The Soft Cage: Surveillance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Park, David W. and Pooley, Jefferson (eds) (2008)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Peter Lang.

Parker, William (1986)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Oxford: Blackwell.

Pasquali, Antonio (1967) *El Aparato Singular: Análisis de un Día de TV en Caracas*. Caracas: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Peck, Janice (2006) 'Why we shouldn't be bored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debate', *Cultural Critique*, 64: 92–126.

Peiss, Kathy (1991) 'Going public: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al histor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3(Winter): 817–828.

Pellow, David N. and Park, Lisa S. (2002) *The Silicon Valley of Drea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eltzman, Sam (1976) '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2): 211–240.

Pendakur, Manjunath (2003) *Indian Popular Cinema: Industry,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_____ (1993) '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nography: Transformations in an Indian village', in J. Wasko, V. Mosco, and M. Pendakur (eds),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in Honor of Dallas Smythe*. Norwood, NJ: Ablex. pp. 82–108.

_____ (1990) *Canadian Dreams & American Contro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nadian Film Industry*.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erkins, Ellie and Kuiper, Edith (2005) 'Introduction: Explorations in feminist ecological economics', *Feminist Economics*, 11(3): 107–150.

Peterson, Spike V. (2005) 'How (the meaning of) gender matt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10(4): 499–521.

Piore, Michael and Sabel, Charles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Porritt, Jonathon (1984) *Seeing Gree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 Oxford: Blackwell.

Posner, Richard A. (1992) *Sex and Rea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tts, Nick (2005) 'The relevance of Marx to all students of economics no matter what the lev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32(9): 827–851.

Poulantzas, Nicos (1978)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Pratt, Andy C. (2004) 'The cultural economy: A call for the spatialized "production of culture"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1): 117–128.

Pred, Alan (1973) *Urban Growth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United States System of Cities, 1790–184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eston, William, Jr., Herman, Edward S., and Schiller, Herbert I. (1989) *Hope and Fo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ESCO 1945–1985*.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rokop, Dieter (1983) 'Problem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mass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5: 101–116.

_____ (1974) *Massenkultur und spontaneität: Zur veranderten warenform der massenkommunikation in spatkapitalismus (aufsätze)*. Frankfurt: Suhrkamp.

_____ (ed.) (1973) *Kritische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Aufsatze aus der 'zeitschrift fur sozialforschung'*. Munich: Hanser.

Rabinach, Anson (1990) *The Human Motor: Energy, 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Raboy, Marc (1990) *Missed Opportunities*.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Press.

Radziki, Michael J. (2003) 'Mr. Hamilton, Mr. Forrester, and a found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7(1): 133–173.

Rajagopal, Indhu and Bojin, Nis (2004) 'Globalization of prurience: The internet and degrad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First Monday*, 9(1). Available at: www.firstmonday.org/issues/issue9_1/rajagopal/index.html, last accessed July 6, 2008.

Rakow, Lana and Wackwitz, Laura A. (2004) *Feminist Communication Theo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Reid, Margaret G. (1934) *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New York: Wiley.

Resnick, Stephen A. and Wolff, Richard D. (2006) *New Directions in Marxian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_____ (1987) *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04) 31(99).

Ricardo, David (1819)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G. Bell and Sons.

Riordan, Ellen (2001) 'Commodified agents and empowered girls: Consuming and producing femin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5(3): 279–297.

Roach, Colleen (ed.) (1993)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War and Peace*. Newbury Park, CA: Sage.

Robinson, Joan (1962) *Economic Philosophy*. Chicago: Aldine.

Rodino-Colocino, Michelle (2007) 'High-tech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onize! A case study of WashTech's "new model of unionism"', in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209–227.

_____ (2006) 'Laboring under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 8(3): 487–511.

Rogers, Everett (1971)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s*. With F.F. Shoemak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oll, Eric (1942)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Prentice-Hall.

Roncagliolo, Rafael (1986)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R. Atwood and E.G. McAnany (eds), *Communication and Latin American Society: Trends in Critical Research*. Madison, WI: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pp. 79–88.

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ewarne, Stuart (2002) 'Towards an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0: 179–199.

Ross, Andrew (2004) *No Colla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3) 'The fine art of regulation', in B. Robbins (ed.),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257–268.

Ross, Karen and Nightingale, Virginia (2003) *Media and Audiences: New Perspectives*. Buckingham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McGraw-Hill.

Rothkopf, David (2008) *Superclas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Rothschild, Kurt W. (2002) 'The absence of power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1: 433–442.

Rucinski, Diane (1991) 'The centrality of reciprocity to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184–194.

Rusk, James (1991) 'The greatest moral challenge of our time', *The Globe and Mail*, February 19: B8.

Russial, John T. (1989) 'Pagination and the newsroom: Great expect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Rutherford, Jonathan (2005)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Cultural Studies*, 19(3): 297–317.

Rutherford, Malcolm (2001)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n and now',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3): 173–194.

Saad-Filho, Alfredo (2002) *The Value of Marx: Political Economy fo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Sahlins, Marshall (1976)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marajiva, Rohan (1985) 'Tainted origins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or*, April–July: 5–9.

Sanderson, Stephen K. (2005) 'World system analysis after 30 years: Should it rest in pe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46(3): 179–213.

Sarikakis, Katharine and Shade, Leslie Reagan (eds) (2007)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inding the Gap*.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Sassen, Saskia (2007) *A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W.W. Norton.

_____ (2001)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st edn, 1991).

Saxenian, AnnaLee (2006) *The New Argonau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xton, Alexander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Class Politics and Mas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Verso.
Sayer, Andrew (2001) 'For a critical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Antipode*, 33(4): 687–708.
Sayers, Sean (2007) 'The concept of labour: Marx and his critics', *Science and Society*, 71(4): 431–454.
Schiller, Dan (2007a)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IL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_____ (2007b) 'The hidden history of US public service telecommunications, 1919–1956', *Info*, 9(2–3): 17–28.
_____ (1999a)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_____ (1999b) 'The legacy of Robert A. Brady: Antifascist origin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2): 89–101.
_____ (1996)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New York: Oxford.
_____ (1982) *Telematics and Government*. Norwood, NJ: Ablex.
Schiller, Herbert I. (2000) *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_____ (1996) *Information Inequality: 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_____ (1993)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in C. Roach (ed.),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War and Peace*. Boston: Beacon Press. pp. 97–116.
_____ (1992)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2nd edn). Boston: Beacon Press (1st edn, 1969).
_____ (1989) *Culture, In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84)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 Norwood, NJ: Ablex.
_____ (1981) *Who Knows*. Norwood, NJ: Ablex.
_____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_____ (1973)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Beacon Press.
Schramm, Wilbur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udson, Michael (1984) *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umpeter, Joseph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Schwieterman, Joseph P. (2007) *The Return of the Intercity Bus*. Chicago: Chaddick Institute for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DePaul University.
Scott, John (1991)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Newbury Park, CA: Sage.
Scott, John and Marshall, Gordon (2005) 'Communication', in *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Online. Available at: 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s/ENTRY.html?subview=Main&entry=t88.e331, last accessed May 30, 2008.
Shannon, Claude E. and Weaver, Warren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iller, Robert (2006) *Irrational Exhuberance* (2nd edn) New York: Random House.
Shimony, Abner and Malin, Shimon (2006) 'Dialogue: Abner Shimony and Shimon Malin',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5(4): 261–276.
Shimpach, Shawn (2005) 'Working watching: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labor of the media audience', *Social Semiotics*, 15(3): 343–360.
Sivanandan, Ambalauaner (1990) *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Writings on Black Struggles for Soci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Smith, Adam (1976)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st edn, 1759).
_____ (1937)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st edn, 1776).
Smith, Anthony (1991) *The Age of Behemoths*. New York: Priority Press.
Smith, Neil (2005) *The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Smith, Ted, Sonnenfeld, David A., and Pellow, David N. (eds) (2006) *Challenging the Chip*.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mith-Shomade, Beretta E. (2004) 'Narrowcasting in 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A space for the audience',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5(1): 69–81.

Smythe, Dallas W. (1991) 'Letter to the author', December 4.
_____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_____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20–127.
_____(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27.
_____ (1957) *The Structure and Polic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nider, Laureen (2002) 'Theft of time: Disciplining through science and law', *Osgoode Hall Law Journal*, 40(1): 90–112.
Snow, C.P. (1964) *The Two Cultures*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kal, Alan (2008) *Beyond the Hoa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mavia, Juan (1981)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s: From minority social monopoly to majority social representation', *Development Dialogue*, 2: 13–30.
_____ (1979) *Democratización de las communicaciones: Una perspectiva latino-americana*. Mexico City: ILET.
Sosale, Sujatha (2003) 'Envisioning a new world order through journalism: Lessons from the recent past', *Journalism*, 4(3): 377–392.
Sparks, Colin (2007)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Sage.
_____ (1985) 'The working-class pres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7(5): 133–146.
Sreberny, Annabelle (2001) 'Mediated culture in the Middle East: Diffusion, democracy and difficult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Gazette*, 63(2/3): 101–119.
Standage, Tom (1998) *The Victorian Internet*.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Steeves, H. Leslie (2001) 'Liberation, feminism, and development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11(4): 397–414.
_____ (1989) 'Gender and mass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in P.J. Creedon (ed.), *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 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83–111.
_____ (1987) 'Feminist theories and media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4(2): 95–135.
Stengrim, Laura (2005) 'Negotiating postmodern democracy, political activism,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dymedia's grassroots and e-savvy answer to media oligopoly',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2(4): 281–304.
Steuart, James (1967) *An Inquiry i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st edn, 1761).
Stigler, George J. (2003) *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_____ (ed.) (1988) *Chicago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_____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cience*, 2(1): 3–21.
Stone, Alan (1991) *Public Service Liberalism: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nsitions in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one, Alan and Harpham, Edward J. (eds)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Policy*. Beverly Hills, CA: Sage.
Stouffer, Samuel Andrew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reek, Wolfgang and Kenworthy, Lane (2005)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neocorporatism', in T. Janoski, R.R. Alford, A.M. Hicks, and M.A. Shwartz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41–460.
Sussman, Gerald (2005) *Global Electioneering*.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_____ (1984)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6: 289–300.
Sussman, Gerald and Lent, John A. (eds) (1998) *Global Productions: Labor in the Making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ewbury Park, CA: Sage.
_____ (eds) (1991)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s: Wiring the Third World*. Newbury Park, CA: Sage.

Switzer, Les and Adhikari, Mohamed (2000) *South Africa's Resistance Press: Alternative Voices in the Last Generation*.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Tabor, Mary (1991) 'Encouraging "those who would speak out with fresh voice" through FCC minority ownership policies', *Iowa Law Review*, 76: 609–639.

Tarrit, Fabien (2006) 'A brief history, scope, and peculiarities of analytical Marx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38(4): 595–618.

Tarrow, Sidney (2006)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Phil and Bain, Peter (2004) 'India calling to the far away towns: The call centre labour process and globalizati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9(2): 261–282.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_____ (2000)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63): 33–58.

Tetty, Wisdom J. (20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Africa',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36(1): 133–153.

Tetzlaff, David (1991) 'Divide and conquer: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control in late capitalism',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3: 9–33.

Thanki, Ashika and Jefferys, Steve (2007) 'Who are the fairest? Ethnic segmentation in London's media production',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and Globalisation*, 1(1): 108–118.

Thomas, Pradip N. (2006) 'The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paign: Applying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to an analysis of global media refor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8(4): 291–312.

Thomas, Pradip, N. and Nain, Zaharom (eds) (2004) *Who Owns the Media: Global Trends and Local Resistance*. Mahwah, NJ: Erlbaum Associates.

Thompson, E.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Thompson, John B. (1989)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in D. Held and J.B. Thompson (eds),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6–76.

Thompson, Mark (2004) 'Discourse, "Development" and the "Digital Divide": ICT and the World Bank',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1(99): 103–123.

Thrift, Nigel (2006) 'Re-inventing invention: New tendencies in capitalist commodific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35(2): 279–306.

Thrift, Nigel and Crang, Mike (2007) *Thinking Spac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Tomlinson, Joh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London: Polity Press.

_____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raber, Michael and Nordenstreng, Kaarle (eds) (1992) *Few Voices, Many Worlds: Towards a Media Reform Movement*. London: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Tracy, James F. (2006) '"Labor's monkey wrench": Newsweekly coverage of the 1962–63 New York newspaper strik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 541–560.

Tracy, James F. and Hayashi, Maris L. (2007) 'A libratariat? Labor, technology, and librarianship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53–67.

Tran van Dinh (1987) *Independence, Liberation, Revolution: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 Norwood, NJ: Ablex.

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Tunstall, Jeremy (1977) *The Media are Americ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UNESCO (1979)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Final Report*. Paris: UNESCO.

Urry, John and Wakeford, John (eds) (1973) *Power in Britain*. London: Heinemann.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8) *Media Ownership*. Report to the Chairman, Subcommittee 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Internet,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GAO.

Van Audenhove, Leo, Burgelman, Jean-Claude, Nulens, Gert, and Cammaerts, Bart (1999) 'Information society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2): 387–404.

van Dijk, Jan (2005) *The Deepening Divide: 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ewbury Park, CA: Sage.

Van Galen, Jane and Noblit, George W. (2007) *Late to Class: Social Class and Schooling in the New Econom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Veblen, Thorstein (2005)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York: Cosimo. (1st edn 1918.)
_____ (193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st edn, 1899).
_____ (1932) *The Theory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New York: Scribner's.
Vernon, Raymond (199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here are they coming from, where are they head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1(2): 7–35.
Veron, Eliseo, et al. (1967) *Lenguaje y comunicación social*. Buenos Aires: Editorial Nueva Visíon.
Vertova, Giovanna (ed.) (2006) *The Changing Economic Geography of Globalization: Reinventing Space*. London: Routledge.
Vickers, John and Yarrow, George (1991)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2): 111–132.
Vosko, Leah (2002) 'The pasts (and futures) of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anada: Reviving the debate',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68: 55–83.
Waetjen, Jarrod and Gibson, Timothy A. (2007) 'Harry Potter and the commodity fetish: Activating corporate reading in the journey from text to commercial inter-text',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4(1): 3–26.
Wall, Derek (2006) 'Green economics: An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 Economics*, 1(1/2): 201–214.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4) *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_____ (2001) 'Global culture(s): Salvation, menace, or myth?', paper presented at New Cultural Formations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Globalization conference, Academia Sinica, Taiwan, October 6–7. Available at: www.binghamton.edu/fbc/iwgloculttw.htm, last accessed May 28, 2008.
_____ (1991)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ton, Douglas (2000) 'The place of dialogue theory in logic,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ynthese*, 123(3): 327–346.
Waltz, Mitzi (2005) *Alternative and Activist Media*.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Ward, Adolphus, Trent, William, et al. (1907)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Available at: www.bartleby.com/220/1406.html, last accessed May 28, 2008.
Waring, Marilyn (1988)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Wasko, Janet (2003) *How Hollywood Works*. London: Sage.
_____ (2001) *Understanding Disney*. London: Polity Press.
_____ (1994) *Hollywoo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eyond the Silver Screen*. London: Polity Press.
_____ (1983) 'Trade unions and broadcasting', in V. Mosco and J. Wasko (eds), *Labor,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Media*. Norwood, NJ: Ablex. pp. 85–113.
_____ (1982) *Movies and Money*. Norwood, NJ: Ablex.
Wasko, Janet and Erickson, Mary (eds) (2008) *Cross-border Cultural Production: Economic Runaway or Globalization?* Youngstown, NY: Cambria Press.
Wasko, Janet, Mosco, Vincent, and Pendakur, Manjunath (eds) (1993)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Norwood, NJ: Ablex.
Wasko, Janet, Philips, Mark, and Meehan, Eileen (eds) (2006) *Dazzled by Disney*.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Waterman, Peter (2001)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s*. London: Mansell.
_____ (1990) 'Communicating labor internationalism: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source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1–2): 85–103.
Wayne, Michael (2003) 'Post-Fordism,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Hollywood's media industrial complex', *Current Sociology*, 6(1): 82–103.
Weber, Max (1946)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H.H. Gerth and C.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pp. 126–156.
Weeden, Kim A. and Grusky, David B. (2005) 'The case for a new class map',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1): 141–212.

Wellman, Barry and Hogan, Bernie (2004) 'The immanent internet', in J. McKay (ed.), *Netting Citizens*. Edinburgh: St Andrew University Press. pp. 54–80.
Wheeler, D.L. (2003) 'Egypt: Building 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0(98): 627–642.
Williams, Raymond (1981) 'Marxism, structuralism, and literary analysis', *New Left Review*, 129(September–October): 51–66.
_____ (1980)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_____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75)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_____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Hammondsworth: Penguin.
_____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mmondsworth: Penguin.
Williamson, Oliver E.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3): 595–613.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Clint, Gutiérrez, Felix, and Chao, Lena M. (2003) *Racism, Sexism and the Media: The Rise of Class Communication in Multicultural America* (3rd edn). Thousand Oaks, CA: Sage.
Wilson, James Q. (ed.) (1980)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Winseck, Dwayne (2008) 'Media merger mania', *Canadian Dimension*, 42(1): 30–32.
_____ (1998) *Reconvergence*. Creskill, NJ: Hampton Press.
_____ (1993) 'A study in regulatory change and the deregulatory process in Canadian telecommunication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elecommunications labor un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Winseck, Dwayne and Pike, Robert (2007) *Communication and Empire: Media, Markets and Globalization, 1860–1930*. Durn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inston, Brian (1986) *Misunderstanding Med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ttel, Andreas (2004) 'Culture, labour, and subjectivity: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from below', *Capital and Class*, 84: 11–30.
Wood, Ellen Meiksins (1989)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Is the game worth the candle?', *New Left Review*, 177: 41–48.
Woodward, Kath (2004) *Questioning Identity: Gender, Class,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Woolgar, Steve (1988) *Knowledge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Worth, Owen and Kuhling, Carmen (2004) 'Counter-hegemony, anti-globalisation and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 and Class*, 84: 31–42.
Woytinsky, W.S. and Woytinsky, E.S. (1955) *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Trends and Outlook*.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Wright, Erik Olin (2005)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u, Tim (2004) 'Copyright's communication policy', *Michigan Law Review*, 103: 278–366.
Yates, JoAnne (2005) *Structuring the Information Ag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89) *Control through Communication: The Rise of System in American Managemen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Ya'u, Y.Z. (2004) 'The new imperialism and Africa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 villag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1(99): 11–29.
Zhao, Yuezhi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Zimbalist, Andrew (1979) 'Technology and the labor process in 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A. Zimbalist (ed.), *Case Studies in the Labor Proc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p. 103–126.